

土耳其现代简明史

〔苏〕安·菲·米列尔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内部读物

书号 11002·459

定价 1.55 元

出版说明

本书作者安·菲·米列尔是苏联历史学家，长期从事土耳其历史的研究工作，主要论著除本书外，还有《十九世纪初期的奥斯曼帝国》（1947年）、《基马尔政治观点的形成》（1963年）等。

本书论述二十世纪上半叶土耳其的历史，原著于1948年出版。作者首先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和战时的旧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政治经济情况作了概括的介绍，描绘出这个腐朽帝国的反动、落后和虚弱的形象，论述了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力图瓜分土耳其的野心和具体的瓜分计划，从而说明基马尔革命产生的历史背景。接着，作者对基马尔革命作了比较详细的分析，指出它产生的原因和动力，说明它是在土耳其工业无产阶级力量薄弱、资产阶级力量相对强大的情况下，为抵御英国和希腊武装干涉而由商业资产阶级领导的上层革命。基马尔党人废除了苏丹制度和哈

里法制度，宣布成立共和国，在文化、生活习惯方面进行了一些改革，但是他们没有摧毁封建的土地制度，没能建立独立自主的民族经济以巩固政治上的独立。最后，在论述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战后初年的土耳其历史时，用具体事实证明，在战争期间的土耳其表面上宣布“中立”，实际上是为法西斯德国效劳，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又沦为美帝国主义的附庸。

作者在本书中收集和利用的资料比较丰富，对我们了解现代土耳其的历史有一定用处。但也必须指出，作者在叙述英、法、德等帝国主义国家为掠夺土耳其而进行勾心斗角的斗争时，对沙皇俄国的侵略扩张政策却不作揭露，而建立俄国的世界霸权是当时欧洲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沙皇俄国“从不改变、从不忽视的目的”（恩格斯：《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征服土耳其，进而争夺整个近东，是沙皇俄国头等战略目标。为了霸占土耳其，沙皇俄国同英、法、德等西欧列强进行了最激烈的争夺。本书竟认为在土耳其和近东地区主要是英、德争霸，法国和英国资本家是土耳其的主要奴役者，而对沙皇俄国的南下扩张

侵略则多方加以掩饰。

本书中译本曾于 1958 年出版，略有删节，这次重印时，不作删节，译文作了校订。

1973 年 10 月

目 录

导言	1-13
第一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土耳其	15-123
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的土耳其	15
二 土耳其的参战	38
三 协约国瓜分土耳其的秘密协定	86
四 奥斯曼帝国的崩溃	116
第二章 安纳托利亚的民族解放运动和 独立战争	124-225
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土耳其的结果	124
二 协约国在近东的政策。土耳其的被占领	132
三 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对土耳其的影响	142
四 安纳托利亚民族解放运动的产生	147
五 穆斯塔法·基马尔和民族政权的组成	152
六 英希武装干涉和基马尔党人的胜利	174
第三章 土耳其共和国的建立	226-269
一 木达尼亚停战协定	226

二 苏丹制度的废除	230
三 洛桑会议	236
四 共和国的宣告成立和哈里法制度的废除	265
第四章 基马尔党人为争取国内的政治 垄断地位而斗争	270—311
一 文化和生活方面的改革。反动分子的 反抗	270
二 基马尔党人与买办分子的接近。人民 共和党垄断地位的确立	286
三 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状况	298
第五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和战时的 土耳其	312—387
一 蒙特罗会议	312
二 土耳其政策的转变	326
三 亚历山大勒塔州问题	333
四 基马尔党内部的斗争。阿塔丘尔克之死	344
五 土耳其与第二次世界大战	356
结束语	388—416
史料和参考书目	417—503
大事年表	505—545
人名索引	546—556

插 图

- 穆斯塔法·基马尔就关于必须在安纳托利亚，
而不应在伊斯坦布尔召开国会的问题所写的
一段信的照片170
- 1920 年英国军队占领伊斯坦布尔172
- 在苏联贷款和苏联工程技术人员帮助下建造的
开塞利联合纺织厂309
- 土耳其共和国总统基马尔·阿塔丘尔克350

地 图

- 1914 年奥斯曼帝国56—57
- 根据 1920 年色佛尔条约而被
瓜分的土耳其184—185
- 土耳其反对武装干涉者的战争
(1919—1922 年)200—201
- 海峡(1923—1936 年)324—325
- 现代土耳其374—375

导 言

本书的年代范围比近代史和现代史分期法所规定的范围稍广：《简明史》不是从 1918 年开始，而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开始；此外，书前又加上了一个简短的引言，阐明 1913—1914 年土耳其的内部状况。作者之所以不得不违背分期法，首先是因为安纳托利亚民族解放运动的前提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产生的，同时也由于必须对土耳其的半殖民地状况作一个即使是简单的叙述，否则便不能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产生的反帝斗争。

可供研究土耳其现代史的史料是很贫乏而且相互矛盾的。除了对于任何一个资产阶级国家现代史所能提出的共同意见（缺乏已公布的档案材料和弄不到未公布的材料，传记和政论著作的倾向性，直接的伪造）以外，还应当指出有关东方各国现代史的若干特点。不仅东方各国的现代史，

就是近代史也是一门最少研究的学科。斯大林、日丹诺夫和基洛夫等同志对近代史教科书纲要所提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意见，第一次给我们提出了一个任务：把附属国和殖民地的历史作为历史进程的主体来进行研究；从那时起已经过去十四年了，但编纂一部马克思主义的、包括十九至二十世纪东方史的任务还远未完成，在这方面史料特别缺乏是最大的困难之一。关于土耳其的现代史，首先必须注意的是，对于其他国家算是普通的材料，如国会的报告，各个政党在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上的辩论，政治和社会活动家的传记，大事年4 年鉴等，直到现在甚至还没有用土耳其文完全公布出来。只是不久以前才开始弄到在土耳其公布的一些重要史料——基马尔·阿塔丘尔克的演说，伊斯美特·伊涅纽的演说等。结合着以前公布的史料（其中最重要的有：基马尔的《演说》，1927年的调查材料，各个政党的纲领，条约和协定），这些新文件有很大的用处。可是，近年以来土耳其所建立的反动制度妨碍在报刊上披露公众的舆论。民主的派别，特别是共产主义运动，常遭警察和法庭的迫害，它们实质上没有任何合法

的讲坛。统计材料是由政府机关以“加工整理了的”形式公布的，这样便无法确定农村的阶级分化、工人的收支情况、工业中的利润率等。

现有的俄文和外文参考书不能完全补救这些缺陷。苏联的作者们曾对土耳其现代史上很多问题作了许多有益的和有科学根据的研究，但这类著作在数量上显然是不够的。А. Д. 诺维切夫有关土耳其经济的几本宝贵的专著，在年代上是写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Б. М. 丹泽格、И. 华西里也夫等发表在杂志和报纸上的论文，对于了解土耳其的历史发展是非常有益的，但它们大多只涉及经济和对外政策上的个别问题。有关现代史的综合性著作都过于简单，而有时还有点公式化。Б. М. 丹泽格所著《土耳其》一书，正如本《简明史》的作者所发表的《共和土耳其》、《土耳其》等书一样，与其说是具有历史性质，倒不如说是带有国家志性质，并且在很多方面都已陈旧了。М. П. 巴甫洛维奇和 В. А. 古尔柯·克仰仁的著作也陈旧了，它们还是在阿塔丘尔克的《演说》以及 1927 年土耳其第一次人口、农业和工业调查结果公布以前出版的。并且以前几年在我国所发表的书籍

和论文中，有些曾犯了严重的原则性和事实上的错误。

西欧关于新土耳其的著作比较多，但具有极端的倾向性。在著述有关土耳其的著作的西欧作者中，人数和作品最多的是法国记者，他们游历土耳其，然后发表自己的观感，并从很流行的书籍和小册子里吸取一些参考材料加到观感之中。并且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英法在土耳其问题上的矛盾，法国记者们通常都不惜对反对英希武装干涉的土耳其人大加赞扬，而把法国描写成土耳其人的保护者。

在最有名的法国作者中，可以指出摩里斯·帕诺、保罗·让蒂宗、刚托·比龙和列维朗等人，他们合著了一本十分有趣的书；还可指出施利克兰、雷内·马尔尚，特别是贝尔特·乔治·葛利（见参考书目录）。对于这些法国作者来说，他们对于基马尔党人中反动活动家的态度也是值得注意的。例如，贝尔特·乔治·葛利在其所著《安卡拉—君士坦丁堡—伦敦》一书中，简直是歌颂列菲特巴夏的长处，歌颂他的“远见”等等，这显然是因为列菲特巴夏领导了“西方派的”、实质上是反基

马尔的集团，而后来则成为反动的买办反对派中最有名的活动家之一。贝尔特·乔治·葛利对他极力赞扬，因为列菲特巴夏力求建立美国对土耳其的委任统治，力求基马尔党人与法国人勾结，而这种勾结是会使民族解放运动归于失败的。

作为一个研究土耳其的历史学家，拉穆斯也是很有名的。他的《土耳其史》出版于1934年。可是拉穆斯总共只用二十来页的篇幅叙述现代的土耳其，但尽管分量很少，他也没有忘记宣扬那种只有利于外国资本家和伊斯坦布尔商人的道德。他谴责土耳其人封闭外国的教会学校，谴责土耳其共和国的“过分的保护关税的”——如他所说的——经济政策等等。在拉穆斯看来，土耳其是一个农业国家，只应发展农业和增加农产品，而不应考虑建立自己的工业。

在法国作者的著作中，甚至在文艺作品里，都可以发现对“古老而善良的”土耳其过去的怀念。在那些还没有放弃对“东方风味”的爱好（实质上在这后面是隐藏着对土耳其独立所抱的仇视态度）的作家们中间，克洛德·法莱尔享有特殊的盛名。他的小说《杀了人的人》，当时几乎算作有关

土耳其的“经典”著作。克洛德·法莱尔在书中描写他所心爱的苏丹土耳其，旧的奥斯曼^①帝国及其一切特征——柏树、斯库塔利亚的坟地、带面纱的妇女等等。可是在三十年代，克洛德·法莱尔又到了土耳其，这时已是新土耳其了。他在那儿所看到的一切都使他很不欢喜。他感到悲哀的是土耳其人走上了欧化的道路，没有昔日的风味，
⑥ 奥斯曼帝国已为土耳其共和国所代替了。在其出版于1933年的名为《安哥拉的四位太太》的新小说中，他借自己书中的主人公之口叫喊道：“这些新土耳其人还自称民族主义者哩！摒弃过去的一切，而那是多么好的过去啊！”

至于德国的作者，他们的意图就是颂扬德国的作用。这种倾向甚至在法西斯以前时期就表现出来。例如，库尔特·齐姆凯所著的《新土耳其》一书，虽然也可以作为参考材料，但却为德国帝国主义辩护。作者把德国描写成土耳其的绝对大公无私的“恩人”，好象它曾出面保全奥斯曼帝国的完整和反对帝国的敌人。齐姆凯特别颂扬

① 奥斯曼是土耳其帝国的开国皇帝（1259—1326年）。
——译者

德国在土耳其的“文化作用”。

多年以前出版了德国人李劳所著《新土耳其》一书的俄文译本，但它没有超出起码的材料编纂的范围。

奥地利的外交家诺伯特·比萧夫所著《土耳其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一书，详细地研究了土耳其共和国的对外政治联系，可是作者看来是故意地闭口不谈土耳其与德、奥的关系。

美国作者的书籍的倾向性，主要是表现在美国自己与之有直接利害关系的那些问题上（关于石油、租让权以及一般地关于土耳其的外国资本、威尔逊的政策等问题）。美国出版了各种关于土耳其的手册，类如《贸易手册》，也有若干专著。1924年，纽约出版了一本密尔斯主编的论文集——《现代土耳其》。这是一本有用的参考书。但就在这本文集里也有很多具有倾向性的文章。例如，《论青年土耳其党人》一文就不能算是客观的作品，因为它是出于“哈里法^①陛下”私人秘书的手笔，这一

^① 哈里法——十三世纪以前阿拉伯国家穆斯林最高元首的尊号，他集政权和教权于一身。埃及和后来后土耳其苏丹也称哈里法。——译者

点就已说明问题了。论基马尔党人的文章是文集的编者密尔斯写的，他对基马尔党人中力求建立美国对土耳其的委任统治、或无论如何要与西方“更为密切地接近”的那一派入怀有明显的同情。1939年底，美国出版了韦伯斯特著的《阿塔丘尔克的土耳其》。书中有很多年代日期和数字，并且除若干次要的错误以外，材料一般地都是确切的。但是这本书也反映出美国人的意图：粉饰土耳其的真实情况，在美国资产者面前，把土耳其说成在已经开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有利于美国政客的样子。显著的例子是：作者说，在土耳其根本没有独裁，也不可能，因为（而且这是唯一的解释）基马尔·阿塔丘尔克本来是可以当苏丹或哈里法的，比方说，就象伊朗的列萨汗当了国王那样，但他自动地拒绝这样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在战争结束以后的年代里，美国出版的有关土耳其的书籍和文章具有更大的倾向性：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恬不知耻地为土耳其建立的反动制度作辩护，充满了对那些为争取自己国家从美帝国主义压迫下解放出来而斗争的土耳其民主团体的诽谤性的攻击。

英国的作者怀有露骨的倾向性，这是由于英国在土耳其民族解放运动时期所扮演的角色的缘故。艾物斯莱勋爵的巨著《土耳其帝国史》中包括有关于1914年以后时期的几章，它们是出自名记者齐罗尔的手笔。在有关现代土耳其的一篇中，齐罗尔暴露出异常凶恶的面目。他把民族解放运动描写成青年土耳其党人的运动，并且对于盟国放过时机，未能绞杀土耳其，允许土耳其民族解放运动发展起来而大发牢骚。另一位英国作者、以其很多有关对外政策的著作而著称的汤因比，与柯克伍德合写了一大部有关土耳其的著作，书中提供了有价值的事实材料，但也作了具有很大倾向性的叙述。例如，著者对英国同意由希腊人占领伊兹密尔一事作了如下的解释：他说，劳合·乔治当时是很天真的，他被“克里特的海妖”——维尼塞洛斯^①——迷住了，后者说服了他同意占领伊兹密尔。

阿姆斯特朗的《灰狼》一书在当时引起了强烈的反应，特别是在土耳其。书中有很多有趣的细

^① 维尼塞洛斯(1864—1936)，出生于克里特岛，多次担任希腊首相。——译者

节，但它主要是打算引起庸俗的廉价效果，充满着有关基马尔私生活的似不可信的报道，因此阿姆斯特朗在其书中引用的其他事实也很值得怀疑。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英国出版了一个叫做贾尔曼的人所著的《土耳其》一书。它是作为《列国》丛书之一出版的，书中含有很多重大的错误和别有用心的歪曲，更不用说作者在方法论方面的无能了。例如，作者写道，只是巴黎条约才为商船开放了黑海，奥斯曼国会“自动解散了”，而事实上它是由于英国人占领伊斯坦布尔而被解散的；他又说，哈里法制度的废除好象是由于印度的哈里法拥护者“天真的”发动所引起的，反动的所谓“进步”党仿佛是真正进步的等等。

- 8 作者对于阿里·费特希贝伊(奥克雅尔)领导的“自由”党表示特别的同情。作者硬说这个政党之所以解散，是因为土耳其的社会舆论还没有达到进行公开讨论和批评的程度。作者谴责把首都从伊斯坦布尔迁移到安卡拉。

西欧和美国有关新土耳其的著作就是如此。在这样的情况下，土耳其本国的著作就应具有特

别重大的意义。但是就在这里情况也很不顺利。事实上，整个土耳其的史学史都属于半官方的范畴。它基本上是重复基马尔的有名的演说。可是基马尔的演说决不符合对客观的历史研究所提出的要求。穆斯塔法·基马尔演说的开头第一句话是：“1919年5月19日我在萨姆松登陆”；这句话应当表明，在此以前，即在1919年5月19日以前，土耳其是没有任何民族运动的。当谈到政治发动（基马尔的演说就正是这种发动）的时候，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研究工作者不能以此作为土耳其全部现代史的根据。同时，以其第四卷阐述土耳其现代史的半官方的土耳其著作《历史》（Тарих）一书，不仅完全遵循基马尔的主张，而且也几乎完全以他演说中所包含的那些真实史料为限。如果说《历史》也补充了某些新东西的话，那就是在很多场合下它都有意地歪曲历史事实。例如，《历史》硬说，苏维埃俄国只是当土耳其在反对希腊的战争中显示了自己的军事威力以后，才同土耳其签订了1921年3月16日的条约；虽然大家都知道，条约是在“第二次伊涅纽”以前和远在萨卡里亚河战役以前签订的。

在记述和分析历史事件方面表现出独立自主精神的土耳其作者的书籍中，应当指出女作家哈里德·艾迪布的回忆录。她的英文著作《土耳其的痛苦经历》一书更特别有意义。可是哈里德·艾迪布由于代表伊斯坦布尔买办的利益，她是从反动的立场批评基马尔政策的。所以，对待哈里德·艾迪布的断语必须非常慎重。特别是基马尔曾经声明，她曾力求建立美国对土耳其的委任统治，而她对这些声明所作的驳斥也未必可信。

很明显，现有的关于新土耳其的著作很难尽述。在法国、英国、美国和其他国家出版了基马尔的很多传记；在许多杂志上曾刊载过长篇的文章；最近几年在土耳其本国也出版了几部有关现代史的书。可是它们基本上只是重复旧的东西，几乎没有引用新材料。土耳其的教授希克梅特·巴尤尔已着手编著一部多卷的《土耳其革命史》，并且他在序言中解释说，“土耳其革命”一词应理解为基马尔革命，即土耳其历史的现代时期。可是在已经出版的前三卷中，作者仅写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不知全书将在什么时候出全。

. . .

附在本书后面的参考书目归纳了作者所利用的史料和参考书，同时它也应帮助读者就书中论述的问题寻找补充材料。

编制地图和为索引以及大事年表准备材料的工作，是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H.A. 基谢辽夫完成的，作者对他表示谢意。

第一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土耳其 11

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的土耳其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奥斯曼帝国是帝国主义国家的半殖民地。法国和英国的资本家在奴役奥斯曼帝国方面扮演了主要角色。对奥斯曼帝国也抱有侵略意图的俄罗斯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在帝国的经济和财政方面拥有的势力不大。从十九世纪末叶起，帝国主义的德国在土耳其开始跃居首要地位。

如果仅就数字材料来看，那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法国和英国对土耳其有决定性的影响。1914年，奥斯曼帝国公债券的85%是属于这两个国家的（法国占62.9%，英国占22.3%）。除公债以外，在土耳其的其他外国投资（铁路、银行、公用事业、工商业企业）方面，德国的份额是很高的，

它占 45.4%，因为德国人把大量资本投到巴格达铁路的修建上。但就是在 1914 年总数约达八千万里拉（当时一里拉值八卢布五十四哥比）的这些外国投资中，法国仍占有 25.9%，英国占 16.9%。

可是，这一些数字决不能机械地运用到列强在土耳其的政治力量的对比关系上。实际上，早在阿布杜尔·哈米德二世统治时期，德国对土耳其的政治就有很大的影响。固然，阿布杜尔·哈米德曾从各方面取得金钱，并企图利用当时存在于大国之间的矛盾。但在各种情况下，玩弄矛盾的把戏都没有使土耳其的处境轻松一些，它只造成某种轻松的表象——延期解决土耳其问题。而

12 事实上，帝国主义国家的竞争异常痛苦地影响了奥斯曼帝国的处境。

帝国主义国家都利用自己各式各样的和非常强有力的统治手段。领事裁判权制度应放到首要地位。在过去，领事裁判权条款是由苏丹政府以单边形式颁发的一种证书，在那时，它并不破坏土耳其主权。

1535 年，由苏列曼大帝签署并授与法国国王

弗兰西斯克一世的领事裁判权条款，是苏丹赠与外国的最初的领事裁判权条款之一。这个领事裁判权条款并不表示奥斯曼帝国的软弱，而是反映它的强大。弗兰西斯克一世当时是较为软弱的一方。当他还是哈布斯堡王朝的阶下囚时，他就开始同土耳其人谈判；正是为了同哈布斯堡王朝进行斗争，他才需要土耳其人的保护并与他们结成同盟。所以，苏列曼所颁发的领事裁判权条款曾是强者赠与弱者的礼物。并且，这种领事裁判权条款也同此后颁发的一些条款一样，只是在颁发这些条款的苏丹在位期间才有效力。可是，这种情况并没有继续多久。土耳其日渐衰弱。和欧洲各国比较起来，它的经济和政治的落后性首先是造成了事实上的、然后甚至是形式上的不平等。1740年，法国从土耳其获得了新的领事裁判权条款，这次却是永久性的、永远固定了法国商人在近东的特殊优惠权的条款。

1740年的领事裁判权条款，是土耳其领事裁判权制度发展中的转折点。从此以后，领事裁判权条款就变成了奥斯曼帝国的一项推辞不了的义务。

1774年在库楚克开纳琪签订的俄土和约中，土耳其的这种义务以条约的形式固定下来了。在条约中直截了当地规定：领事裁判权条款既已逐字逐句载入本条约中，土耳其应予履行。

后来，奥斯曼帝国曾缔结了好几个贸易协定，其中主要的有1838年同英、法两国缔结的协定，以及1861年至1862年同英、法、奥、俄等国缔结的协定。这些贸易协定，把领事裁判权制度中很多因素运用到土耳其与外国的贸易实践中来了。

领事裁判权制度是土耳其经济发展道路上不可克服的障碍。首先，它决定了外国人不受土耳其法院审判。刑事案件由领事法庭审理，即由有关国家的领事审理。凡只涉及某一国家臣民的民事案件，也由领事审理；而同时牵涉土耳其人和外国人的案件，如果在土耳其的法院审理，则必须有有关国家大使馆的翻译官出席，即在他的监督和压力下进行。

其次，领事裁判权制度使外国人几乎免除土耳其国内的一切税务。由于这个缘故，居住在土耳其领土上的外国臣民，自然就比土耳其人自己

处于更为有利的条件。外国商人能比土耳其商人以便宜很多的价格出卖自己的商品，这样就使土耳其商人的竞争陷于瘫痪状态。尤其是在土耳其这个国家，人们很容易转入外国国籍。土耳其政府由于自己的软弱，无法阻止这件事。外国领事馆则为了一笔适当的金钱而出卖护照。结果，形成了这样一些“外国”臣民阶层，他们一辈子从来也未到过“自己的”国家，甚至连这个国家的语言也不懂。

根据领事裁判权制度规定的低额关税，是外国人极重要的优惠权。计算税收的方法本身就是不利于土耳其的。这就是所谓计值税，即按商品的价值课税。计值税制度对于工业不发达国家根本是不利的，因为它不允许区分和保护那种由于外国竞争而特别遭到损害的工业部门。但除此而外，关税率也是微不足道的。起初，规定税率为商品价值的3—5%，二十世纪时，达到了8%，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则达到11%。在这样低微的税率的情况下，薄弱的土耳其工业，显然是不能同不受任何限制而大量输入土耳其的外国工业品相竞争的。

除了领事裁判权制度以外，外国租让权也是奴役土耳其的强有力的工具。同时必须注意，外国人几乎都不把资本投入土耳其的加工制造业中，因为他们并不关心在土耳其建立起工业企业。外国资本主要是投在铁路修建和矿藏的开发上，部分地也投到公用事业和商业企业的经营上，投到银行里。

奥斯曼帝国的铁路是属于外国人所有的。希查斯铁路是一个例外，这条铁路是阿布杜尔·哈米德二世时借德国人的帮助、用从各国伊斯兰教徒^①中募集来的金钱修建的，它的使命是为泛伊斯兰主义的（同时也是为泛日耳曼主义的）目的服务。除此以外，还有一条不大的支线，它是土耳其的企业主修建的。外国人修建铁路只是从他们自己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土耳其的国民经济利益出发。甚至铁路的路线也说明了这一点。土耳其的第一条铁路是在十九世纪中叶修建的。这条铁路把伊兹密尔和亚伊丁联接起来，然后又从伊兹密尔延长到马尼萨。接着又修建了从海达尔巴

① 伊斯兰教徒，即穆斯林，下同。——译者

沙(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亚洲海岸)到伊斯美德,然后再到爱斯克舍希尔的铁路。在地中海沿岸一带也有一条不大的支线——美尔星到阿达纳。在土耳其的欧洲部分,所谓东方铁路把伊斯坦布尔和中欧的铁路线联接起来了。

几乎所有这些铁路实质上都是通向海港的支线。它们的任务,首先就在于使外国人便于把各种原料运到这些海港,在土耳其推销外国工业品。

此外,所有这些铁路在任何时候都能遭到外国军舰的炮击。因而,从战略观点来看,这些铁路对土耳其也是不利的。在这方面,著名的巴格达铁路——德国企业——是和土耳其修建起来的其他铁路不同的。虽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巴格达铁路尚未完工,即尚未钻通经过塔夫尔和阿马努斯的隧道,但就是这条铁路也不是为了土耳其的需要,而是为了德国的需要——作为通向波斯湾的战略要道。德国人正由于自己在同英国进行斗争,所以他们就巴格达铁路修筑在土耳其的中心地区,离开英国军舰的炮火远一些。

这些铁路的经营方式,带有典型的殖民地性质。它们是根据所谓公里保障制经营的,按照这

种制度，土耳其政府负责对每一公里铁路支付一定数额的金钱，不论铁路是否带来相应的收入。在这种制度下，外国租借者就不去关心提高铁路的赢利性，不采取增加和改善车辆的措施，也不关心降低运价，因为他的收入反正是有保障的。例如，在亚伊丁地区，有很长一个时期骆驼运输业就15 曾顺利地同铁路进行竞争，因为前者运费便宜得多，而归根到底又较铁路为快，这种情况是不足为奇的。

在外国人所获得的开发土耳其矿藏的租让企业中，最重要的是厄里格利—桑古尔达克（在黑海上）区的煤矿租让企业。这是土耳其唯一的煤矿区，它完全属于外国资本家、主要是法国资本家所有。后来在那里也出现了意大利资本家。

安纳托利亚西部（亚伊丁、班兑马等地区）富产各种矿物。这里有炼钢工业极为珍贵的铬，有铅和若干数量的锌。最后，这里还蕴藏着大量的金刚砂。这个地区的矿井几乎无一例外地属于外国人，埃尔加尼地区的铜矿也属于他们。地质勘探工作同样也操在外国人手里。

几乎所有土耳其的大的（就当时来说）公用事

业——伊斯坦布尔的自来水、电车、伊兹密尔的马车^①等等——都属于外国人。法国人拥有极其重要的租让权——烟草专卖权，即“奥斯曼帝国烟草专卖权”（土耳其人通常把它简称为“列热”），它控制了烟叶、烟叶制品的全部生产和出口。

外国银行是奴役土耳其的有效工具之一。其中最主要的是奥斯曼帝国银行。它只在名称上是奥斯曼的。实际上英国和法国的资本在这个银行里占统治地位。该银行有发行货币的权利。它还以土耳其的名义借贷外债。在二十世纪，德国的“德意志银行”成了奥斯曼银行的劲敌，青年土耳其党人曾通过它在德国借了几次外债。除阿布杜尔·哈密德二世统治时创办的仅有的一个农业银行以外，土耳其当时是没有本国银行的，而这个农业银行又软弱到这种程度，它甚至没有固定资本。

对外贸易也是奴役土耳其的一个工具。它是带有不等价性质的：廉价收买土耳其的原料，而外国商品在土耳其出卖的价格则比在其他国家昂

^① 此处马车是指在汽车和电车发明以前都市里行驶于轨道之上的马车。——译者

10 贵。对外贸易实际上是被土耳其的港口城市——伊斯坦布尔、伊兹密尔、贝鲁特、特拉布松——的外国人和买办垄断了。在奥斯曼帝国，买办资产阶级是在外国人及其在当地商人中的“被保护人”所享受的特权基础上形成的。在土耳其出现最早的英、法资本家，首先利用了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的商业资产阶级作为买办代理人。德国资本家出现在土耳其比英、法资本家较晚；他们也需要有自己的买办。由于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的资产阶级已经同英国人和法国人有了牢固的联系，所以德国人为了自己的目的，便开始从已经产生的土耳其资产阶级中间培养买办资产阶级。正因为如此，所以，当由于1908年资产阶级革命而掌握政权的青年土耳其党人自己鼓励买办商业的时候，就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正是土耳其人（就其民族而言）的买办同德国资本家有着最密切的联系，而这就促进了德国人对青年土耳其党人政府的政治影响的加强。但是，就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那个时期来说，还不应该夸大这一新的土耳其买办资产阶级的比重。土耳其的买办资产阶级在数量上是微不足道的。在奥斯曼帝国

没有确切的统计，但伊斯坦布尔、伊兹密尔和特拉布松等地的商人名册提供了有关商人民族出身的某种概念。这个名册上注明的日期是1911—1912年；在名册中伊斯坦布尔共有七十个土耳其人的名字（但其中有的也可能不是土耳其人，还有阿拉伯人，契尔克斯人^①等等），而在第一类的四十个商人中，只有两个土耳其人的名字。

除了对外贸易被外国人或外族的买办所垄断以外，它还给土耳其带来经常的亏损。在对外贸易方面，土耳其没有一年是有顺差的。战前的最后一年——1913年——提供了下列数字（以百万里拉为单位）：进口——四〇·八；出口——二十一·四。

由此可见，对外贸易赤字在这一年之内就达一千九百四十万里拉。

最后，奥斯曼的国债也是土耳其处于半殖民地地位的重要因素。根据1881年颁布的《穆哈列姆法令》（穆哈列姆是伊斯兰历的第一个月份），当时成立了奥斯曼债务管理处。该处是由外国代表

^① 契尔克斯人原来住高加索北部，后来有些人移居土耳其。——译者

组成的委员会领导的，后者把帝国收入的一切重要来源都操纵在自己手里。委员会自己有一个人员达五千人以上的专门机关，管理税收事宜。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奥斯曼债务的总数增加到一亿四千三百二十万土耳其里拉（此外还有不包括在奥斯曼债务以内的外债，它约有九百万里拉）。在这个数目中，约有六千五百万里拉是在青年土耳其党人执政时期欠下的。债务的利息和清偿债款耗费了土耳其预算的很大一部分。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土耳其半殖民地地位的基本情况就是这样。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人革命虽也打击了苏丹的专制制度，但它既没有解决土耳其摆脱对外国依赖的任务，也没有解决国家民主化的任务。弗·伊·列宁曾经指出：“如果以二十世纪的革命为例，那末无论葡萄牙革命或土耳其革命，当然都应该算是资产阶级革命。但是无论前者或后者，都不是‘人民’革命，因为人民群众，大多数人民，在这两次革命中显然都没有积极地、独立地为自己的经济要求和政治要求进行斗争。”^① 在对待外国统治方面，青年土耳其党人

^① 列宁：《国家与革命》，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5页。

实际上只限于发出一些毫无效果的宣言。有一个青年土耳其党人的首领在 1910 年发表的演说中，令人感动地声称：“有一种奴隶制，沉重地压在我们命运上，这就是领事裁判权条款的奴隶制。”但是在说完这些话以后就没有采取任何坚决措施来废除领事裁判权制度。在 1911 年青年土耳其党第四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纲领中，关于领事裁判权条款一项非常慎重地表述如下：“将重新寻求废除领事裁判权条款的办法。”

青年土耳其党人为了协助建立自己的民族工业，曾于 1913 年施行了《奖励工业法》。根据这个法律，工业企业享有某些优惠权。但是，这个法律对于建立在奥斯曼帝国境内的一切企业都给予优惠权，就是说外国企业也包括在内。因此，外国企业根据奖励工业法又获得了额外的优惠权，比土耳其的工业企业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结果这个法律几乎没有给土耳其的民族工业带来任何好处。

1913 年，土耳其进行过一次稍有缺陷的、至少是不完全的工业调查：这次调查包括了六个主要的工业据点，但煤矿工业和安纳托利亚内地的

企业等不算在内。当时共有二百六十九个工业企业(其中开工的只有二百四十二个企业),拥有一万六千工人;在这些企业中,15%的资本属于土耳其人,50%属于希腊人,20%属于亚美尼亚人,5%属于犹太人,10%属于外国人。由此可见,土耳其自己的民族工业薄弱到什么程度,青年土耳其党人对于发展民族工业的事情做得何等之少。

青年土耳其党人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解决土地问题。土耳其农民的处境即使在那些普遍艰苦的时期来说也是骇人听闻的。列宁为了强调指出俄国地主经济的农奴制性质,他感叹地说道:“不,这完全不是欧洲式的。这是老大中国式的。这是土耳其式的。这是农奴制式的。”^①在土耳其,5%的“农业人口”,也就是一小撮地主和富农,占有全部耕地的65%,而87%的农户,即绝大多数的农民群众,仅仅拥有35%的土地。此外,8%的农户则根本没有土地。按农民人口计算,大约每人平均为半公顷土地。与此同时,有些地主的地产则达到一万五千至两万公顷。这些地主一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186页。

部分是旧封建主的后代，一部分是半封建主类型的新式地主，还有一部分是占有土地的高利贷者。在安纳托利亚西部，大土地占有者是希腊人。最后，土耳其的最大地主是伊斯兰教教会，它们拥有广阔的教会土地。

农民所受的剥削带有资本主义以前的性质。主要是采用互分制和对分制。地主的土地是利用农民的劳动、农民的工具和农民的马匹耕种的。农民这样做只得到很小一份收获物，勉强强地度日过活。农民年年积债；他们无法清偿债务。

封建的什一税——“阿沙尔”是主要的税收。实际上，什一税甚至在形式上也规定为收获物的12.5%，而在事实上则为30—40%。什一税是委托给包税人征收的。他们承包整个的地区，然后再转卖给其他较小的包税人。事情一弄到直接收税人的手里，那为包税而付出的金额就增长许多倍。

1912—1913年，土耳其农产品的价值按人口计算，每人总共是三十二卢布，只相当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每人为一百七十六卢布，法国为一百一十卢布）的几分之一。在土耳其，种植农

19 作物总共只利用了宜于经营的土地的17—18%，其余的土地都空着。既没有正常的灌溉，也没有其他改良土壤的措施。土耳其的农民不仅不知道利用人造肥料肥田，而且也不知道利用自然肥料。两段轮种制或三段轮种制很盛行；农业的主要工具是粗笨的土耳其木犁，即所谓“卡拉撒撒”。

有一位到过土耳其的欧洲观察家（英国人卡莱尔·马克·柯安）说，那里用犁耕地，就象“当年诺亚用来搔爬阿拉拉特谷地的工具一样”。很多庄稼由于农作物害虫的侵害而落在地里。农民没有抵抗自然灾害的办法，也没有消灭蝗虫和毁坏庄稼的鸟雀的工具。直到今天土耳其还有这样一个令人忧郁的谚语：“一份给风，一份给鸟，一份给冬天，而如果老天爷造福，那末一份就给我。”土耳其的农民就是这样估计收获的前途的。

青年土耳其党人起初许下诺言，要给农民土地，但在革命以后过了一个月，他们又突然想起了一度忘掉的事情，因而在1908年9月通过的纲领中，他们答应“在不损害土地占有者利益的条件下”给农民土地，也就是说已经需要付钱了。在这方面什么事情也没有做。1908年的纲领

同时包含有废除什一税的诺言，但1911年8月通过的纲领宣称：“把什一税变为货币税是一个理想，但因为现在还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所以党将竭力消除征收什一税时的舞弊现象；一旦国家的财政状况允许时，则将采取措施使什一税恢复到最初的标准”（即仅只降低什一税的形式上的标准，从12.5%降低到10%）。

1913年，青年土耳其党人政府实行了地籍法，即调查土地并使土地固定给它的实际占有者的法律。在土地方面的另一项改革，是允许向银行抵押土地。这两种措施丝毫没有改善土耳其农民的处境。地籍法意味着土地最后地、不可改变地转变为私有财产，中世纪的国家土地所有制的概念正趋于消灭。当然，和过去比较起来，这是一个进步的措施，但从中得到好处的首先是地主、高利贷者和富农（可是，青年土耳其党人远不是在各地都实行了地籍法；直到基马尔党人执政时才彻底地实行了）。至于抵押权，即抵押土地的权利，那这也只是有利于大土地占有者和资本家，20
他们可以通过银行从破了产的小农手里收买土地。

在工人问题上，青年土耳其党人的政策是由他们对工人运动的惊慌恐惧心情决定的。青年土耳其党人虽然禁止罢工，但有一个时期曾容许过1908年革命以后立即成立的工会的存在；他们也容许奥斯曼社会党进行活动，该党在国会里甚至还有自己的代表。工会和社会党都很软弱，因此对于青年土耳其党人来说也就不是很大的危险。在那些年代里，奥斯曼社会党里还是有一些真诚的革命者，特别是穆斯塔法·苏布希已在那里开始了自己的活动，后来他是土耳其共产党的组织者之一。工会和奥斯曼社会党人虽还软弱，但仍起了积极的作用。他们唤醒了群众的觉悟，第一次在土耳其提出了无产阶级运动的问题。正因为如此，所以青年土耳其党人在1913年就利用镇压反动分子的机会（在宰相马茂德·谢夫凯特被刺以后），同时也拼命迫害民主分子，首先是工会和社会党。

青年土耳其党人在民族问题上的政策，对于多民族的奥斯曼帝国的命运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青年土耳其党人的反动性正是表现在这个问题上，这也是他们在政治上破产的主要原因。

在青年土耳其党人革命前夜和革命的最初几年，青年土耳其党人的主要学说是奥斯曼主义，即力图把奥斯曼帝国的所有臣民变成一个统一的奥斯曼人的民族。青年土耳其党人最著名的活动家之一——詹玛尔巴夏——就曾这样宣称：“我们奉行的不是土耳其政策，而是奥斯曼统一的政策。”但这位詹玛尔巴夏解释说，土耳其人是整个奥斯曼帝国的“基石”。可见，青年土耳其党人实际上是把奥斯曼主义理解为使所有其他民族土耳其化。后来，青年土耳其党人已不再讳言：奥斯曼主义的目的是使帝国的各族人民丧失他们的民族权利。在1911年秋天通过的“统一与进步党”委员会的决议中，十分肯定地写道，帝国所有的臣民迟早是要完全“奥斯曼化”的，“决不能靠信念来达到这一点”，而是要诉诸武力。决议中载称：“少数民族的人数是微不足道的，他们可以保持自己的宗教，但不能保持自己的语言。”

21

在几次巴尔干战争以后，奥斯曼主义的思想消失了。巴尔干半岛的非土耳其民族在实践中表明，他们是不承认任何奥斯曼主义的。因此，青年土耳其党人便把突厥主义这个新学说提到了首

位，仿佛作为土耳其民族的意识形态。当时又成立了所谓“土耳其发祥地”，这是一种类似民族俱乐部的东西。团结在“土耳其发祥地”中的知识分子证明：必须推行真正的土耳其语，提高土耳其的民族意识，发展土耳其的文学和艺术等等。但与此同时，青年土耳其党人又用种族思想暗中偷换了民族思想，立即把“土耳其发祥地”引导到泛突厥主义的、即沙文主义的道路上，反映出土耳其资产阶级和地主的侵略意图；“发祥地”变成了争取所有的“突厥人”——从博斯普鲁斯海峡到阿尔泰山——都服从土耳其统治这一思想的宣传鼓动中心。

除了泛突厥主义以外，青年土耳其党人又培植阿布杜尔·哈米德的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就是力图把所有的“突厥”族或所谓“土兰”族统一在土耳其统治下，而泛伊斯兰主义则力图把所有的伊斯兰教徒统一在土耳其苏丹-哈里法的统治下。作为一种宗教政治思想体系的泛伊斯兰主义，当时不仅在土耳其传播，而且也在其他伊斯兰教国家、在剥削阶级中传播着。这是企图“利用反欧美帝国主义的解放运动来巩固可汗、地主、

毛拉等地位的……”^①思潮之一。青年土耳其党人之所以需要泛伊斯兰主义，主要是为了保持对阿拉伯人的统治，但这个主义对于德国也是有利的，后者曾利用它来反对英国和俄国。在实际上，无论是土耳其的泛突厥主义者，或是泛伊斯兰主义者，都是德国帝国主义的代理人。

青年土耳其党人的这种民族政策推动了土耳其的少数民族去反对该党。土耳其的反动势力利用了少数民族的这一斗争，起初利用它的，是与阿布杜尔·哈米德共同领导了1909年反革命政变的组织工作的阿赫拉尔派，后来是“自由与和睦党”。

在1913年1月23日恩维尔举行政变以后，青年土耳其党人便对反对派进行迫害，而同年夏天宰相马茂德·谢夫凯特巴夏的被刺，又给他们提供了对一切持有不同意见的人采取残酷恐怖手段的根据。不久，在1914年，土耳其的全部政权都集中在三个人的手中，即所谓“青年土耳其党的三雄”——恩维尔、泰拉特和詹马尔。 22

^① 《列宁选集》，中文第2版第4卷，第275页。

恩维尔是一个名利薰心而毫无原则的冒险主义分子，他膺有巴夏头衔，并担任陆军大臣职位；同时又任总参谋长。所以土耳其的整个军事大权都操在他手里。他因有波拿巴的派头而获得了“小拿破仑”的绰号。为了升官发财，他和奥斯曼的一个公主（娜蟾公主）结了婚，这样就获得了宫廷“驸马”的头衔。他同德国人非常接近，特别是在柏林担任武官职务（1909—1911年）的时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他已是德国帝国主义的间谍了。

泰拉特是内务大臣，同时也是“统一与进步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他在青年土耳其党人的政治家和土耳其资产阶级人士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在1917年以前，他曾拒绝受任宰相的职务，因为从泛伊斯兰主义方面考虑，“三雄”宁愿让埃及亲王赛伊德·哈里姆巴夏担任宰相的职位。可是，尽管泰拉特有其威望，但归根到底他还是依赖恩维尔的，因为在青年土耳其党人所建立的政权下，军队是决定性的力量。

三雄的第三个成员詹玛尔巴夏是海军大臣，同时也是伊斯坦布尔的督军。詹玛尔管辖首都的

警察及其所属的秘密侦察机关，他并不反对对自己的三雄同伙玩弄阴谋诡计。但他既没有泰拉特所享有的威望，也没有恩维尔所操纵的军权——主要的东西。因此，詹玛尔在“三雄”之中是扮演近似从属的角色。泰拉特和恩维尔由于知道了他的阴谋，所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开始时便极力摆脱他，把他派遣出去，给他一个光荣的但显然是没有希望完成的任务——“重新征服”埃及。

青年土耳其党人其余的活动家，包括“统一与进步党”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大臣、和国会议员，所拥有的势力是不大的。“三雄”故意地不把自己的计划告诉某些土耳其大臣。这样做是为了使这些大臣由于不了解政策而忠心耿耿地坚持青年土耳其党人的三雄已经放弃了的某些立场。例如，对待财政大臣查维德贝伊就是这样的。查维德贝伊是主张依靠协约国、特别是依靠法国的人，但他不了解“三雄”已把自己的命运同德国联系在一起了。所以，查维德固执地、很自信地向协约国的代表们证明，对他们来说土耳其还没有完全丧失，协约国可以把土耳其保持在自己这一边。

奥斯曼国会失去了任何意义。苏丹穆罕默德

第五是一个七十二岁的老头子，无论是道德或体力都颓废不堪。他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是逃避国家大事，害怕干预它，即使是偶然的干预也怕。他基本上已做到了这一点。甚至连恩维尔被任命为陆军大臣这件事情，苏丹还是从报纸上知道的。

政权是这样地集中在一小撮具有冒险主义情绪的首领们手里，这种情况使那些把土耳其看作剥削对象和零用钱的帝国主义者的政策易于推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协约国和德奥集团完全不顾土耳其本身的利益，只是关心在日益迫近的武装冲突中可以利用土耳其来损害敌人。

二 土耳其的参战

近东的国际纠纷，是1914年笼罩着资本主义世界的总危机的最重要原因之一。所有各大国的利益都在近东发生了冲突，但英德之间的矛盾则起了最大的作用。除了英德在其他问题上和在世界其他地区的竞争日益尖锐之外，为霸占近东各国而进行的斗争，也具有主要是英德对抗的性

质。各种各样的妥协办法隐蔽了这种对抗；两国都极力利用第三方来为对方制造额外的纠纷（英国加深了俄德矛盾和意奥矛盾，德国加深了英俄矛盾和英法矛盾），但尽管如此，毕竟正是英德的对抗终于决定了近东的力量部署。在这里，首要的因素是：德国力求在最重要的交通线上站稳脚跟，因为这些交通线在重新瓜分世界的斗争中能起决定性作用，而英国却极力不允许这样做。“德国建筑了巴格达铁道，威胁到英国在近东的统治权。”^①

无论英德两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所缔结的协定如何，它们之间的对抗毕竟在近东整个国际关系的发展上打下了烙印。虽然与近东有关的其他每一个国际冲突都保持有独立的意义，但这些冲突本身并不具有破坏和平的危险。无论是希土关于爱琴海上岛屿的争吵，无论是俄土之间因亚美尼亚内部革新而引起的摩擦，无论是法国人和英国人对阿拉伯分立主义者的支持，无论是英俄在伊朗的竞争，无论是奥俄在巴尔干的冲突，

^① 《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 1954 年版，第 212 页。

或者甚至是关于海峡这个老问题，当然都不一定能引起战争。但这些局部冲突，是同把帝国主义列强分裂为英、德两个敌对阵营的主要对抗交织在一起的。

因此，每一敌对集团内部固有的和新发生的冲突，都隐匿起来，退居于次要地位；相反地，参加不同阵营的强国之间的冲突却尖锐起来了；同样地，争取新的同盟者加入某一集团的斗争也尖锐化了。

无论是对德国或对英国来说，近东始终是进行剥削和奉行掠夺政策的对象。尤其是由于战前紧张局面之出现，双方又都力图利用近东国家来达到纯军事的目的：利用这些国家作为对敌人发动进攻的根据地，或者相反地，利用它们作为阻挠敌人侵入自己本土或自己盟国领土要害的障碍物。奥斯曼帝国的地理位置，在这方面预先决定了双方的立场。德国不仅可以在这里建立基地来对付巴尔干国家、英国（苏伊士—埃及，伊朗—阿富汗—印度）和俄国（黑海，高加索），而且还可以利用奥斯曼苏丹—哈里法对英、俄、法三国伊斯兰教臣民所起的宗教和政治影响。同时，无论是

德国本身，或是它的盟国奥匈帝国，丝毫也受不到土耳其或伊朗的任何威胁。因此，尽管德奥帝国主义者表面上对于在近东获得领土似乎不感兴趣，他们在这里却推行了露骨的侵略政策；而英、法、俄帝国主义者虽然老早就想瓜分奥斯曼帝国，但到战争在欧洲爆发时，他们对土耳其却一直坚持着维持（即使是在危机时期）它的领土和政治现状的立场。

德奥集团顽强地、露骨地推行自己的政策，25
而协约国的行动却是犹豫不决、迟缓和不彻底的。这是因为：第一，操有主动权的侵略者在这种情况下通常占优势；第二，协约国内部矛盾虽然略微减弱了一些，但远远没有消除；第三，近东各国不信任协约国中一些国家的爱好和平的宣言，因为这些国家在这以前的整个时期一直表现出自己是威胁近东各国政治、经济和财政独立的最不可调和的敌人。协约国领导人物把近东各国看作零用钱这一根深蒂固的观点，也有助于德国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成功。帝国主义列强在其近东政策中，特别重视土耳其这个最大和最有势力的伊斯兰教国家。所以，一当萨拉热窝响起的枪声造

成了欧洲战前的紧张局势时，关于土耳其在即将来临的武装冲突中采取什么立场的问题，在列强的计划当中便立刻占有显著的地位。德国在土耳其的优越的军事和政治势力这时已十分明显了。土耳其的军队处于以李曼·冯·散德斯将军为首的德国军事使团的控制之下，它是1913年年底到达土耳其的。青年土耳其党人的“三雄”，尤其是恩维尔巴夏，采取了亲德立场。虽然如此，但当时还不能断定说：一旦欧战爆发时，土耳其就会毫不犹豫地立即去追随德国。

一个贫困、落后、在各方面都很软弱的国家，还没有从以前几次战争——的黎波里战争和巴尔干战争——中喘过气来，因为这些战争使它的经济和财政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奥斯曼的军队几乎处于彻底瓦解的状态。固然，德国人和恩维尔都相信：由于李曼·冯·散德斯使团的帮助，土耳其将重新具有军事威力，但许多公正的观察家，甚至土耳其的领导人物都对这一点表示怀疑，因为他们对于冯·德尔·戈尔茨领导的德国军事使团多年活动的、对土耳其来说是惨痛的经验还记忆犹新，而这个使团的活动是以巴尔干惨祸告

终的。土耳其军队缺乏最需要的东西——武器、弹药、服装、皮鞋，——这也是人所共知的事情。土耳其的海军既不能同黑海上的俄国舰队竞争，也不能在岛屿林立的爱琴海上同希腊舰队匹敌；它在英国订做的两艘战斗舰当时还没有造成。

在这种情况下，很难相信土耳其政府敢于参 26
与比以前各次都更为严重、更加危险的新战争。所以，绝大多数的土耳其政治家都认为必须保持谨慎态度。奥斯曼总参谋部的非正式公告后来不得不指出：“实际上，我们当时感到迫切需要的是和平与安宁。”甚至李曼·冯·散德斯也没有预料到土耳其将参加战争，正如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所肯定的那样：“因为大家都知道，大多数的土耳其大臣都有保持中立的情绪”。

从萨拉热窝刺杀事件那天（1914年6月28日）起，到奥地利向塞尔维亚提出最后通牒（1914年7月23日）那天止，在这差不多整整一个月的时间里，德国政府对土耳其始终是采取伺机而行的立场。虽然早在1914年7月5日，曾在波茨坦受威廉二世接见过的德国驻伊斯坦布尔大使冯·万根海姆就接到通知说，德国已坚决地决定发动

欧洲战争；虽然在这些日子里，被召至柏林的恩维尔巴夏已在那里同德国总参谋长冯·毛奇进行了初步的谈判，但德国政府仍未向土耳其政府提出关于缔结同盟的具体建议。

可是，协约国也并未采取任何措施，以便把土耳其争取到自己这边来。协约国完全没有考虑从土耳其方面取得积极的军事支援，而在英法两国看来，土耳其在财政和经济上对它们的依赖，就是土耳其人保持中立的充分保证。

的确，虽然德国的势力有显著的加强，但英法资本的势力在土耳其的财政和经济中仍占统治地位。英国人和法国人轮流担任奥斯曼债务委员会的主席。英国人和法国人操纵了除巴格达铁路以外的所有的租让铁路，所有的港口，绝大多数的矿井和矿山，发电站和公用事业等等。土耳其的银行事业也处在占优势的英法资本控制之下。固然，德国的“德意志银行”，这时在青年土耳其党人政府的财政业务中已起显著的作用，并且据当时人证明，它还是“德国在土耳其的政策积极传导者”，但是，它的地位决不能同英法的奥斯曼帝国银行的特权相提并论，后者享有发行货币以

及国家银行的其他特权。最后，英国在土耳其海军里看来是占有牢固的地位，因为以海军上将李姆普斯为首的英国海军使团在这里起着作用。

在这一时期，土耳其政府企图得到法国的支持，以便在一旦发生国际纠纷时，可以——在某些土耳其领导者看来——从国际局势中为土耳其取得政治上的好处。1914年7月初，即在萨拉热窝刺杀事件后几天，土耳其政府的海军大臣、青年土耳其党人的“三雄”之一詹玛尔巴夏到达了巴黎。他表面上是为了出席观看法国的海军演习，而实际上是试探缔结法土同盟的可能性的基础。詹玛尔在同法国外交部政治司司长戴·马惹里的谈话中（外交部长魏维安尼回避同詹玛尔讨论尖锐的政治问题），曾直言不讳地提议让土耳其加入协约国，条件是：把爱琴海上的一些岛屿归还土耳其人，帮助土耳其防止“来自俄国的经常威胁”。戴·马惹里回答说，法国不能单独行动，并且要“在共和国总统和总理去俄国以前”（事情发生在普恩加赉动身访问俄国的前夜）把詹玛尔的建议通知法国的盟国。詹玛尔巴夏认为戴·马惹里的答复是隐蔽的拒绝。于是他就利用了这个答复，

以便借助受了土耳其人煽动的法国报刊使法国人了解到：土耳其现在有权在法国的敌人那儿为自己寻求好处了。

1914年7月18日，詹玛尔巴夏离开了巴黎，而7月23日，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庆祝青年土耳其党人革命节的大会上，万根海姆便同他谈到了即将缔结德土同盟的事。这也就是奥地利向塞尔维亚政府提出了明知后者不会接受的最后通牒的那一天。德国政府一面鼓励奥地利提出这个最后通牒，同时又在近东转而奉行积极的政策。德国这时所抱的最近目的，与其说是要土耳其人立即采取军事行动，倒不如说是要给俄国制造不安（担心高加索边境的安全），消除塞尔维亚从它的巴尔干盟国——希腊和罗马尼亚——方面得到援助的机会。当时在德国人看来，从土耳其方面取得直接的军事援助还是一种多余的事情。他们

28 指望英国保持中立，坚信史里芬计划的“闪击战的”成功，只是关心在实现这一计划时不要发生新的困难。

德国外交当局异常迅速地进行活动。7月27日，冯·万根海姆着手进行关于签订条约的谈判。

7月31日，双方最后商定了条约的本文。第二天，即8月1日，德国对俄国宣战。为了要在这一决定关头消除土耳其人的最后犹豫，冯·万根海姆在偕同奥匈大使巴拉维奇尼侯爵拜会土耳其宰相赛伊德·哈里姆巴夏时，便对他宣布说：“根据维也纳方面的可靠消息”，俄国黑海舰队准备立刻进犯博斯普鲁斯海峡。这是有意的彰明昭著的造谣。在沙皇俄国的统治集团中，老早就有人对君士坦丁堡和海峡抱着一定的野心。但是那与其说是现行政策中的实际任务，还不如说是遥远的目的。

在世界危机迫近眉睫之际，俄国对于对土耳其展开军事行动完全不感到兴趣。1914年夏天，也正如1908年和1911年外交谈判时一样，俄国政府力求达到的不是把海峡归并到俄国，而是保证俄国军舰的自由航行。青年土耳其党人的领导者是不会不知道俄国政策这个真正的方针的，但巴拉维奇尼和万根海姆的声明终于对他们起了作用，或者更确切一些说，这一声明是为亲德方针作辩护的最好的理由。此外，德国人并未忘记广泛地散布“俄国威胁”的谣言。李曼·冯·散德斯

使团中的军官在这方面表现得特别卖力。正如法国驻伊斯坦布尔大使向本国政府所报告的那样，这些军官早在1914年8月初就采取了各种阴谋手段，以便引起俄土之间的冲突，“他们捏造了各种各样的荒唐无稽之谈，以便在海峡问题上恐吓土耳其人”。

8月2日下午4时，万根海姆和赛伊德·哈里姆签订了德土同盟条约。参加条约签字仪式的有恩维尔、泰拉特和哈里尔(司法大臣)。在所有土耳其的大臣们当中，只有他们完全了解条约的秘密。青年土耳其党人的其余首领们，包括“三雄”之一的詹马尔巴夏在内，或者完全不知道谈判这回事，或者只知道一些有关谈判的模棱两可和模糊不清的消息。第二天，其他一些大臣以及苏丹才获得了关于这一既成事实的通知。这几个得到了通知的人不赞成这一条约，但当然是不敢积极反对恩维尔的。

德土同盟条约具有仓促签订的痕迹，这种仓促的情况正好使德国人能够规定有利于自己的条款，而毋须对土耳其人提供保障以防军事行动地区进一步扩大。条约第一条规定德土两国在奥塞

“冲突”中保持中立；而尽管条约是在俄德战争业已爆发之后签订的，但第二条仍记载了以下的文字：

“一旦俄国采取实际的军事措施来干涉奥塞冲突并从而使德国对奥匈必须履行同盟义务时，那么这种履行同盟义务的必要性对土耳其也同样有效。”第三条规定：在战时，德国军事使团仍继续受土耳其指挥，但土耳其政府应保证使团能对土耳其军队发生“有效的影响”。第四条载称：德国在必要时应以武力保卫土耳其，使其免遭来自俄国的侵犯。其余各条（第五、第六、第七和第八条）提到了一些形式上的条件——期限、批准、秘密性及其他等。

这样一来，土耳其就承担了反对俄国的义务，而一旦一个或几个巴尔干国家对土耳其宣战时，一旦俄国的盟国，尤其是英国对土耳其发动战争时，德国却不受任何约束。但在德土同盟条约签订之日，即1914年8月2日，土耳其人也没有怀疑英国的武装发动即将到来。

协约国当时并没有揭穿以1914年8月2日签订同盟条约而告终的德土谈判的秘密。土耳其

正式宣布自己“严守中立”(1914年8月2日)。土耳其政府在保持中立的借口下，立即开始了总动员^①，并在奥斯曼帝国全境实行戒严(1914年8月3日)。同时命令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
30 峡布置水雷，但是商船在领港引导下仍可通过海峡。由于各国那时都感到惊慌不安，所以这些措施可以说是很自然的。实际上，正如詹玛尔巴夏后来在他的回忆录里所承认的，土耳其人之“宣布中立，只是为了赢得时间”。但企图“赢得时间”，是比单纯希望欺骗协约国和在中立的掩饰下站在德国方面来准备战争更进了一步。情况复杂得多。青年土耳其党人的首脑们在采取动员军队的措施时，曾打算造成一种局面，使加紧并充分备战的土耳其能够选择对自己最为有利的方案：是否站在德国方面，如果要站在德国方面，那么要在什么时候和在什么条件下出兵；或者不站在德国方面而仍旧保持武装中立，因此而从协约国方面获得补偿。

德土同盟条约本身并不妨碍土耳其人继续实

^① 土耳其关于局部动员的预先秘密措施，早从1914年7月30日起就开始了。

行中立政策。从形式上来看，这个条约使土耳其所承担的义务，并不比三国同盟条约使意大利承担的义务为多。战争一开始便退出了德奥集团的意大利的例子，是很容易被土耳其人用来为类似的行为作辩护的。此外，德土同盟条约签订后一昼夜间欧洲所发生的事件，完全造成了另一种国际局势，土耳其政府在这种国际局势下，就可任意地认为1914年8月2日签订的条约并不符合业已改变了的形势：8月3日，德国对法国宣战，并破坏了比利时和卢森堡的中立，而8月4日，英国又参加了战争。这样一来，对土耳其来说，现在问题已经不在于对德国和奥匈履行同盟义务来反对俄国，而是在于加入世界大战来反对整个协约国了，但是8月2日的条约完全没有规定这一点。并且，不论条约在法律上如何解释，土耳其政府在1914年8月的最初几天，实质上是有可能毫无危险地对德国采取独立的立场，因为德国人当时并没有有效的手段来影响土耳其。这种有利于土耳其的局面为时并不久，——只是1914年的8月上旬。可是，如果没有性质和目的互不相同、但终于导致同一个结果的三种因素的影响，

那末这个期限用来防止土耳其站在德国一边参加战争还是绰绰有余的。这三种因素是：第一，德国的积极性和决心；第二，英法两国不愿支持俄国用共同的努力来影响土耳其；第三，土耳其爱国人士的软弱无力和“三雄”的冒险行为。

德国采取了坚决措施来进一步加强自己对土耳其政府的影响。李曼·冯·散德斯使团仍然留驻在土耳其。使团中的德国军官的人数这时已达到七十人，虽然根据协定，他们只应该有四十二人。“李曼巴夏”非法地取得了第一军军长的职位，活动地区是伊斯坦布尔、色雷斯、达达尼尔海峡和班克马地区。安卡拉和伊兹密尔的几个军团都转交德国上校们来指挥。交战国军事使团留在中立国，这一事实本身就是破坏中立。土耳其政府关于这一点的解释听起来至少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例如，宰相曾告诉俄国大使说：恩维尔巴夏已准备好让德国的军官回国，但李曼·冯·散德斯却以柏林的命令为借口，声明说，使团仍要留驻土耳其。恩维尔巴夏也对法国大使说过同样的话；而英国代办却从宰相那儿得到了十分幼稚的答复：“德国使团的驻节是无所谓的，并没有政治上

的意义。”德国人的意图是很明显的。俄国驻伊斯坦布尔武官列昂节耶夫少将那时就指出，德国想借助自己军事使团使土耳其卷入与俄国的冲突，“以便从西部边界吸引我国的一部分力量和注意力”。德国人所采取的一些外交步骤也是为了同样的目的。1914年8月4日，奥匈正式加入了德土同盟。同时，德国外交界也极力要使保加利亚同土耳其亲近起来。德国人那时还不能使保加利亚卷入战争漩涡。这时，保土的亲近只有在中立的基础上以德奥集团为实际上的靠山才有可能。保加利亚驻伊斯坦布尔公使托舍夫曾在这个意义上同土耳其人达成了协议。

在这些日子里，协约国本身也给土耳其加紧进行采取亲德方针的宣传造成了适当的借口。英国造船公司阿姆斯特朗·维特伏尔脱应把两艘战斗舰“苏丹·奥斯曼一世”号和“列沙吉耶”号交给土耳其政府。奥斯曼国库当时已交清了这两艘军舰的价款（七百万英镑）。修建军舰的钱在土耳其是用全民募捐的方式收集起来的。1914年8月3日，英国驻伊斯坦布尔代办受爱德华·葛累爵士之托，向土耳其政府声明说，不列颠政府已扣

留了土耳其的军舰，以供英国之需要。土耳其政府向英国提出了坚决的抗议。报纸上也发表了尖锐的反英文章。当然，德国人就利用这一机会而在土耳其人中间尽力煽起不信任协约国的情绪。

虽然如此，但青年土耳其党人的大多数领袖们仍旧主张中立。英国的突然参战（对土耳其人说来），甚至使最接近德国的“三雄”的成员——恩维尔和泰拉特都感到惶惑不安，至于一贯采取暧昧立场的詹玛尔，那就更不用说了。在既成的情况下，在青年土耳其党人的领导者看来，破坏同盟条约而引起德国不满的危险，比对协约国作战的危险要小得多。詹玛尔巴夏（他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至少也是这样说的）曾直截了当地向自己的内阁同僚指出，在没有完成动员之前，土耳其如仓卒地进行武装发动就等于自杀。詹玛尔巴夏判断说：“英国、俄国和法国都分明知道我们无论在达达尼尔海峡，无论在君士坦丁堡，无论在俄国边境都没有一兵一卒，如果它们突然从达达尼尔海峡、波斯普鲁斯海峡来攻击我们，并同时侵犯埃尔祖鲁姆时，那末，它们在占领了君士坦丁堡和埃尔祖鲁姆后并经过西发斯向安纳托利亚腹地

挺进时，就会使我们的军队不可能动员起来，而奥斯曼帝国的灭亡也就不可避免了。”

赢得时间的希望使青年土耳其党人采取了突然的决定，——向俄国提议建立俄土同盟。恩维尔和俄国武官列昂节耶夫将军就这件事进行了谈判。恩维尔声称，土耳其的动员决不是针对俄国的；如果俄国政府愿意的话，土耳其就从高加索边境撤回自己的一部分军队，土耳其甚至准备同俄国缔结防御同盟，它将允许俄国在巴尔干利用土耳其军队。恩维尔举出爱琴海上的岛屿和西色雷斯作为对土耳其补偿的对象，同时，希腊也可在伊壁鲁斯，保加利亚在马其顿，塞尔维亚在波斯尼亚和黑茨哥维那获得补偿。恩维尔指出，在这种情况下，所有巴尔干国家，包括土耳其在内，就可组成一个牢固的反奥集团。土耳其军队就可作为这个集团的总预备军。如果任何一个巴尔干国家反对俄国的话，那么土耳其就要拿起武器去反对这个国家。恩维尔说：“最后也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所有巴尔干国家都愿意保持中立，而这 33
对俄国是有利的。最好是那时我们也将平安无事。”恩维尔建议俄土防御同盟的期限定为五年至

十年，以后如双方同意还可以延长。

这次谈判没有获得任何结果。第一，恩维尔巴夏是没有诚意的。关于德土关系他简直是撒谎，因为他曾对列昂节耶夫说，“与现有的舆论相反，土耳其与三国同盟，尤其是同德国还没有任何协定的联系”。第二，无论是列昂节耶夫，或是俄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格尔斯，虽然都很重视恩维尔的建议，但未能给他迅速的答复，因为他们向之请示过的俄国外交大臣萨庄诺夫认为，和土耳其缔结同盟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只限于训令列昂节耶夫继续向恩维尔进行“善意的解释，以便那怕是赢得一定的时间，但要避免作任何受到约束的声明”。虽然如此，但俄国政府却没有外交行动的自由。它无论在形式上或在事实上都受到了对英法所承担的义务的约束。格尔斯在萨庄诺夫面前主张立即接受恩维尔的建议，而“不要对任何人作任何预先说明”，但萨庄诺夫未经盟国的同意是不能这样做的。而当恩维尔和列昂节耶夫进行谈判的消息传到巴黎和伦敦以后，那里对这个方案表示了显然怀有恶意的态度。

可是，俄土同盟是不能实现的，这首先是因

为：在积极的泛突厥主义者的有加无已的压力之下，土耳其政府本身就使土耳其屈服于德国的影响之下。青年土耳其党人中温和的活动家想利用1914年8月上旬形成的局势，削弱土耳其对德国的依赖关系，但这种企图是畏首畏尾的，因而也是没有成效的。

宰相在8月4日的军事委员会^①会议上声明说，德土条约决没有使土耳其承担参战的义务。当时决定，在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立场没有弄清楚以前，土耳其无论如何都应该伺机而行。8月9日，军事委员会通过了以下的决议：

- 一、从法律观点上来研究德土条约的本文。 34
- 二、试图同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缔结同盟。
- 三、要使协约国相信土耳其打算仍旧保守中立。
- 四、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来负责供应居民和

^① “军事委员会”是一个非正式的组织，其成员为：宰相（赛伊德·哈里姆巴夏）和几个大臣——内务大臣（泰拉特贝伊），陆军大臣（恩维尔巴夏），海军大臣（詹马尔巴夏），财政大臣（查维德贝伊）及司法大臣（哈里尔贝伊）；其他一些大臣甚至还不知道有这个“军事委员会”存在。

军队的粮食。

五、在战争结局还不明显的时候，应努力赢得时间。

六、不准德国大使干涉军事，不准李曼·冯·散德斯将军干涉政治。

七、在同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以及希腊进行的谈判未获得良好转变之前，无论如何决不能站到任何一方来参加战争。

八、同法俄两国大使开始进行谈判。

但在这个决议通过后，第二天土耳其政府就失掉了实现它的可能。1914年8月10日，德国军舰“戈本”号和“布勒斯鲁”号因逃避英国舰队的追击而开入达达尼尔海峡，8月11日，出现在马尔马拉海上，即临近土耳其首都。从这时起，德土关系的性质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德国获得了影响土耳其的有效手段，因而土耳其人想拒绝履行德土同盟条约的可能的企图，现在对他们来说却伴随着很大的危险。

给予“戈本”号和“布勒斯鲁”号两艘军舰在土耳其水域的避难权一事，是恩维尔和与他有联系的军阀集团一手造成的。不愿把土耳其变成德国

附庸的土耳其爱国人士过于软弱，他们无力反对恩维尔。此外，很多土耳其人，甚至连恩维尔的政敌也在内，都被这种唾手可得的机会有所吸引；以德国两艘军舰来补充土耳其海军实力，使土耳其因英国扣留两艘战斗舰而受的损失得到补偿。德国的两艘军舰不会成为土耳其人手中的武器，而要成为德国人用来对土耳其人施加影响的武器，这一点除了恩维尔及其集团以外，那时在土耳其是未必有人估计到的。但这时更为有力地支配恩维尔思想的，不是冷静的考虑，而是不可遏止的冒险主义。首先，他需要的是外交上的成功，军事上的胜利以及某种有效的成就，从而使得在国内没有足够支柱的“三雄”能够继续维持自己的政权。从这种观点出发，恩维尔就觉得采取依靠德国的方针是最为有利的。德国当时好象是列强中最强的一个国家。恩维尔坚定不移地确信它的不可战胜和“闪击战”的成功；德国外交当局则尽力鼓励恩维尔的泛突厥主义的和泛伊斯兰主义的野心。虽然在比较谨慎的青年土耳其党人首领的影响之下，恩维尔不得不建议俄国缔结同盟，但格尔斯和列昂节耶夫的拖延答复却丝毫也没有

使他感到发愁，而相反地，却给他进一步加强同德国的联系以新的论据。

“戈本”号和“布勒斯鲁”号之出现于土耳其水域，对协约国来说并不是意外的事情。追击德国军舰的英国舰队本身就是朝着通往海峡的方向追赶它们的。彼得堡当时也是知道“戈本”号和“布勒斯鲁”号打算在达达尼尔海峡躲藏的。萨庄诺夫还在1914年8月8日就把此事电告了格尔斯，并向他建议说，如果德国军舰进入达达尼尔海峡时，就应同英法两国大使共同坚决要求土耳其政府驱逐它们，或解除它们的武装。巴黎也深深地了解德国统帅部的意图。普恩加赉在他1914年8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两艘巡洋舰好象海盗船一样在爱琴海上游荡着，很明显，它们同土耳其人目前是有协定的：它们应帮助土耳其人进行佯攻，这正是德国等待土耳其人在俄国后方所做的事情。”

虽然如此，但是当事实形成时，只有俄国一国就这一事实可能产生的后果敲起了警钟，而英法两国却表现出了惊人消极态度。当时造成了这样一种印象：这两国对于事态的这种转变非常满意，因为随着“戈本”号和“布勒斯鲁”号之离开地

中海，北非和埃及的港口遭受轰击的威胁消除了。看来，德国军舰之停泊于土耳其水域完全没有使英国人和法国人感到不安。

土耳其政府在“戈本”号和“布勒斯鲁”号出现于海峡后，就立刻声明说，它以八千万马克从德国购买了这两艘军舰。这笔交易纯系虚构，无论对谁来说也不是秘密。德国人自己也没有隐瞒这一点。德国外交大臣冯·亚哥夫曾向希腊驻柏林公使正式声明说，买卖军舰一事“实际上从来也没有发生过”。德国的舰上人员并没有离开军舰，而这两艘军舰的“土耳其化”，只是把“戈本”号改名为“雅乌斯·苏丹·栖林”号，把“布勒斯鲁”号改名为“米吉利”号而已，不过德国水兵和军官也都戴上了伊斯兰教徒的礼拜帽。最后，即使这笔交易不是虚构而是事实的话，那么当这两艘军舰遭到敌方追击时，中立国向交战国购买军舰，反正也是公然破坏中立和公认的国际法规范。根据这种理由，俄国政府曾建议英法两国向土耳其政府提出联合抗议。可是英国和法国却没有支持俄国。葛累曾使柏肯道夫确信，土耳其人将使舰上的德国人员离开军舰，如果他们做不到这一点，那

么英国就要立即从土耳其召回自己的海军使团^①“作为报复”。同时葛累承认：他宁愿“看到这两艘军舰掌握在土耳其人手中，不愿看到它们落在地中海上的德国人手中”。总之，在他看来，土耳其不会反对俄国，而且“现在君士坦丁堡的情况比以前好多了”。法国人还更露骨地表示了自己的观点。法国海军参谋长在同俄国驻巴黎的海军武官的谈话中说道：只有俄国一国有理由抗议土耳其人购买“戈本”号和“布勒斯鲁”号，因为“谁也不能禁止交战一方自愿地削弱自己”。结果，协约国驻伊斯坦布尔大使的联合抗议就没有成功。萨庄诺夫曾设法反驳葛累，并在致柏肯道夫的电报中以明显的气愤口吻指出：“土耳其舰队的实力由于‘戈本’号而加强了，我们黑海舰队中没有任何一艘军舰的武器口径比得上‘戈本’号，这就使黑海舰队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而尤其遗憾的是，英国人当时是有可能不让他进入达达尼尔海峡的。”

^① 奇怪的是，无论是柏肯道夫，或甚至是萨庄诺夫都没有对葛累这种实在令人惊奇的意见有所反映，似乎都同意：消除德国人在土耳其舰队中完全主宰一切的最后障碍是对土耳其人的“惩罚”。

这种论战并没有继续发展下去。同时，德国人又加强了自己在土耳其的政治地位。这时，查维德贝伊和一位比利时的外交官曾进行了一场很有趣的谈话。查维德说：“我要告诉您一个可怕的消息：德国已经占领了布鲁塞尔。”对此，比利时人反驳说：“我有一个使您更为可怕的消息：德国人已经占领了整个土耳其。”

由于英国海军使团实际上的自行退出和以后正式的被召回（1914年9月13日），整个土耳其舰队便很快转由驻在“戈本”号上的德国海军上将苏邵指挥了。随着德国海军上将乌兹道姆之到达伊斯坦布尔，沿海炮兵的指挥权也在8月底转到德国人手中。此后，土耳其对德国的依赖关系加强了。土耳其政府虽然还是对协约国常作出宽慰人心的保证，但它现在却更没有力量来反抗德国人的压力，因为德国人对土耳其的陆军和海军拥有决定性的影响，并使整个伊斯坦布尔处在自己炮口的威胁下。 37

恩维尔和列昂节耶夫进行的关于缔结同盟的谈判逐渐停顿下来了。在“戈本”号和“布勒斯鲁”号来到后的几天中，格尔斯曾在萨庄诺夫面前主

张同土耳其人立即签订协定，并警告说：“明天也许就迟了。”列昂节耶夫也企图在这一方面去影响俄国总参谋部，并且他从军事上考虑，认为另一个方案、实质上是相反的方案也是可以接受的。列昂节耶夫在发往彼得堡的电报中说：“假若这事（即同恩维尔签订协定）达不到或不符合我们的利益，那么从军事观点看，我认为最好是不要人为地拖延不可避免的结局，因为我方任何的拖延都只会加强土耳其的力量，使它有机会安然地动员和集中兵力，并可为此而利用海上交通。”俄国政府对列昂节耶夫提出的两个方案既不能选择第一个，也不能选择第二个：同土耳其缔结同盟是与协约国在巴尔干的勾当相抵触的，而立即同土耳其决裂就必须在高加索集中大量的兵力，这些兵力当时只有从西线调来，但英国和法国也坚决地反对这样做。所以，俄国政府在自己盟国的压力下，继续进行最少有利于它的关于土耳其保持中立的旷日持久和徒劳无益的谈判，但也不可能给予土耳其以任何重要的补偿。

8月中旬，萨庄诺夫向英法两国政府提出了下列具体建议，以便同土耳其政府进行谈判：

“（一）为了证明自己保守中立的诚意，土耳其应开始复员自己的军队；（二）作为交换条件，三大国保证土耳其领土不可侵犯，并准备为此而讨论任何的联合；（三）土耳其接收德国在小亚细亚的所有经济的、铁路的和其他租让权和企业，而这种占有将在和约中加以保证。”在既成的局势下，这些建议很少有成功的可能。正如倾向于协约国的土耳其政府财政大臣查维德贝伊对格尔斯所说的，德国人这时在伊斯坦布尔发出了更为诱惑人心的诺言。为了压倒德国人的诺言，尤其是在“戈本”号和“布勒斯鲁”号到达之后，当时必须向土耳其人提出比列强过去一再宣布而又屡遭它们自己破坏的、关于领土不可侵犯的保证更为重要的诺言，提出比收回还控制在远没有被战败的德国手中的租让权更为重要的东西。但土耳其人提出的却完全是另外一些要求：废除领事裁判权制度；英国应把土耳其军舰归还给它；列强不得干涉土耳其内政；归还爱琴海上的岛屿和西色雷斯。 38

不但如此，甚至萨庄诺夫这些要求不高的建议，也被英法两国政府作了不利于土耳其的删改。法国人显然是由于耽心自己在土耳其投资的命

运，因而拒绝答应土耳其人占有德国在小亚细亚的租让权和企业（首先就是巴格达铁路）。英国人希望继续保持把土耳其当作零用钱，特别是当作吸引俄国的诱惑物来加以利用的可能性，在保证土耳其领土不可侵犯的措词上作了“词句上的”修正，实际上使保证只局限于战争时期。同时，英国和法国从萨庄诺夫的建议中删去了复员土耳其军队这一条，认为这个要求“太高，而且有破坏全局的危险”。结果，当几乎费时半月的、关于保证的措词的商榷最后达成协议时，三国宣言才取得了以下的形式：“三国向土耳其政府声明：它们决意在当前的战争期间保证奥斯曼领土不可侵犯，反对任何敌对的侵犯行为，并准备以友好的精神研究贵国政府希望在经济和司法方面向三国提出的各种要求。贵国政府方面应负责在目前分裂欧洲的冲突期间严守中立。”宣言于1914年8月29日交给了土耳其人。普恩加费在自己这一天的日记中指出：“三个协约国家的大使今天将要把一个建议交给土耳其政府，这个建议无疑地具有两个缺点：它提得太迟了，而且仍然是很不明确的。”

在土耳其统治集团中，主张站在德国一边参战的一派越来越强了。不能说这一派已获得了很多的拥护者。它仍然是少数派，但这个少数派却是操有主动权的、积极的并拥有达到既定目的的有效手段：如归恩维尔和李曼·冯·散德斯管辖的陆军；实际上由苏邵操纵的海军；受德国资助的很多报刊，它们颂扬德国军队成就，煽动对协约国的不信任，发动泛突厥主义的侵略宣传。 39

德国人——技术人员、工人、改穿便服的军官、士兵、水兵——象流水一般地从德国涌往土耳其；大批的军事物资——大炮、步枪、手榴弹、子弹、地雷也源源而来了。运输是经过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进行的。协约国曾向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两国政府徒劳无益地对此提出抗议。在博斯普鲁斯海峡里，在靠近德国大使馆对面的地方，停泊了一艘德国轮船“科尔科瓦多”号，以供德国间谍分子作广播电台之用。英国对此曾向土耳其政府提出了抗议，但也仍然没有结果。土耳其的中立具有几乎是公开虚构的性质。很多代表从伊斯坦布尔被派到北非去进行泛伊斯兰主义的宣传。按照恩维尔的密令，在叙利亚准备好了军队

要去进犯埃及。德国军官克里斯·冯·克里辛施坦领导了这一准备工作。

1914年8月的下半月，当协约国还在彼此商讨致土耳其的声明本文时，内务大臣、“三雄”之一的泰拉特贝伊前往布加勒斯特和索非亚，企图促使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在德国保护之下与土耳其缔结同盟。泰拉特没有得到具体的结果，因为保加利亚人和罗马尼亚人都宁愿保持那怕是暂时的行动自由。但是在这次访问时，泰拉特在与各种政治家进行的谈话中，就已露骨地对俄国表示出不信任和仇视态度，并且也不掩饰他在两个巴尔干国家首都同德奥两国代表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

英国以及法国不仅没有促成俄国政府使土耳其脱离德国的企图，而且却以自己的外交计谋加强了土耳其人对协约国的怀疑和不信任。法国外交部长德卡赛在他被任命担任这一职务的前几天，曾通过伊兹沃尔斯基转告萨庄诺夫说：“他不认为同土耳其进行谈判能获得什么结果，并且认为更为恰当的是抓紧时间保证恢复巴尔干联盟，指使它去对付土耳其。”德卡赛当了部长之后，就在三国大使受托把关于领土不可侵犯的书面

保证交给土耳其政府的同时，更加果断地建议伊兹沃尔斯基：集中一切努力来吸引保加利亚去同希腊和塞尔维亚结成同盟以反对土耳其，为此，就“应该立即使它（保加利亚）依靠牺牲土耳其的利益而得到报酬”。

萨庄诺夫十分不愿听从这种劝诫。他的外交任务也是使保加利亚同希腊以及塞尔维亚缔结同盟，但其目的是反对奥地利，而不是反对土耳其。萨庄诺夫打算不以保加利亚人还需要去占领的土耳其土地作为诺言来促使保加利亚加入上述同盟，而是以塞尔维亚人和希腊人在使保加利亚人感到兴趣的马其顿和爱琴海沿岸地区对保加利亚作自愿让步的办法。法国，特别是英国，不愿在希腊政府面前坚持主张作有利于保加利亚人的让步，这就使得萨庄诺夫在尼什和雅典的外交步骤陷于瘫痪。并且，希腊政府由于感到有英国方面的支持，因而在同土耳其进行的关于爱琴海上岛屿的谈判中采取了不妥协的立场。这种态度使土耳其人极为愤怒。由于这些情况而气愤的萨庄诺夫，甚至决定对英国人和法国人采取十分坚决的态度，要求他们给予支持来影响希腊。他对英法

两国政府解释说：“由于我们在对德国和奥地利进行战争，所以我们就不能不极力避免由于受英国人纵容的希腊的狂妄行为而同土耳其以及保加利亚发生冲突。”

英法两国口头上同意了萨庄诺夫的要求，但却一再表现出如此的拖延和犹豫不决，以致关于塞尔维亚和希腊给予保加利亚人以补偿的谈判毫无希望地拖延下去，而土耳其这时却继续与协约国疏远。英国外交当局完全不再反对这一点了。

葛累早从1914年8月底起就以谨慎的和极其暧昧的方式向俄国政府暗示说：土耳其的命运其实已被预先决定了；它之加入德国一边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它必须承担一切后果，包括“极端的”后果在内。葛累对俄国大使说，对英国政府来说，重要的只是一件事，——让土耳其自己引起关系的决裂，否则便可能同印度和埃及的伊斯兰教徒发生纠葛。葛累认为：“德国现在所作的努力在不久的将来将引起土耳其的发动，这种发动将使土耳其和德国显然要担负起发动战争的责任。”因此，葛累断定说，只需要等待一个时候，让形势“由于德国的行动而发展起来，不要跑在前面”。

俄国政府也不愿“跑在前面”，但它所遵循的方针是力求防止或者即使是拖延对土耳其进行战争。而英国却以土耳其参战会招致“极端后果”的远景来诱惑俄国，同时它自己故意摆出毫无作为的态度，只是使德国人易于在土耳其推行其挑衅政策。⁴¹ 英国外交家甚至在同土耳其人进行的谈话中，也不再掩饰自己已把土耳其当作一个必遭灭亡的国家的看法。有一次，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路易斯·马里特爵士向泰拉特说，据他所知，土耳其政府并不重视协约国关于土耳其领土不可侵犯的声明，虽然土耳其政府的这种态度使他感到惊讶，但他“个人仍旧感到相当的轻松，因为保证土耳其领土完整和独立，反正就象保证一个决定自杀的人的生命一样”。

德国宣传机关在土耳其巧妙地煽动起来的对协约国的不满情绪，在1914年9月因废除领事裁判权制度问题而得到了新的推动。土耳其政府以1914年9月9日的照会通知列强说，从1914年10月1日起，所有的领事裁判权特权一律无效。土耳其政府所以采取这一步骤，是因为政府中的温和分子企图稍稍满足一下社会舆论，并表明即

使不用战争，土耳其人也能利用欧洲的冲突来获得某些好处。在答复时，列强大使向土耳其政府提出内容相同的抗议照会（协约国这一方与德国以及奥匈方面的大使是通过意大利大使的中介而商量好了照会的本文），并声明说，土耳其政府的片面行动是不会得到承认的。虽然德国和奥匈也参加了抗议，但抗议却引起了土耳其人主要是对英法两国的怀恨，因为正是这两个国家无论就其利益的范围或年代的久远来说，在土耳其人心中始终是领事裁判权特权的主要代表者。尤其是德国和奥地利大使，在抗议照会递交后又在土耳其人面前立即把这次抗议的全部责任完全推到协约国身上，并且声明说，德国和奥地利都决意承认废除领事裁判权制度。同时德国人是不担什么风险的，因为要废除领事裁判权制度，土耳其人在法律上反正是需要得到所有强国同意才行的。

最后，从1914年9月中旬以后，为争取土耳其而进行的外交斗争已进入了最后的决定性的阶段。这时德国由于在马恩河上遭受失败，已面临在两线进行持久战的严重前景。在这种局面下，德国人力求土耳其人履行同盟义务比以前要坚决

得多。后来关于这件事，詹玛尔巴夏写道：“德国原先同意：在我们尚未完成我国军队的动员工作和我们尚未完全准备好展开军事行动之前，我们仍旧保持中立。但在马恩河战役后不久，德军由进攻转为防御，俄军向东普鲁士胜利地挺进，并占领了加里西亚很大一部分，我们盟国的情况发生了某些变化时，德国为了把俄国的兵力吸引到高加索和迫使英国人在埃及保持大量兵力，就更加坚决地主张我们干预战争了。”⁴²

德国驻伊斯坦布尔的外交和军事代表老早就拟订了吸引土耳其参战的办法。土耳其舰队应该作为一个推动力量，因为它如果进入黑海就很容易找到同俄国发生冲突的借口。从1914年9月下半月开始，土耳其政府由于怕同俄国发生突然的冲突，于是便禁止舰队开出博斯普鲁斯海峡。但德国人不经过土耳其政府也可能行动起来。奥匈驻伊斯坦布尔大使巴拉维奇尼在一份电报中曾十分显明地叙述了这一问题的实际情况。巴拉维奇尼向本国政府报告说：“9月20日，德国大使对我说：昨天大臣会议决定不向黑海派遣舰队。虽然如此，但德国大使却建议海军上将苏邵命令

‘布勒斯鲁’号就在今天进行一次短时间的侦察。在‘布勒斯鲁’号返航后，德国大使立即通知宰相说，德国军舰只在某种程度上服从土耳其人支配；它们不仅应当为土耳其利益服务，而且主要地是为德国利益服务。”

德国人在伊斯坦布尔、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公开地主宰着一切。副大元帅恩维尔巴夏(苏丹自己是大元帅)既不理睬宰相，也不理会大臣会议，就把海陆军全权赋予了德国陆海军将领。经过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而来到土耳其的德国人数以千计。1914年9月27日，一艘土耳其鱼雷艇载着德国人员企图由达达尼尔海峡进入爱琴海；英国进行巡逻的巡洋舰阻止了这件事。这一事件就成了土耳其政府完全封锁达达尼尔海峡的借口。事情显然是要诉诸战争了。在土耳其政治和军事家中不安的情绪增长了。很多人都懂得，战争将使奥斯曼帝国有遭受灭亡的危险。此外，那些最有远见的人还看到德国本身也必遭失败。在反对土耳其参战的人物中还有穆斯塔法·基马尔，那时他还是一位年青的军官，担任驻保加利亚武官的职位，后来则是争取土耳其独立运

动的领导者。土耳其著名的外交家们曾对土耳其政府作了严重的警告。奥斯曼驻法大使里法特巴夏在自己的一份电报中写道：“德国是孤立的，而且注定要失败……对土耳其唯一有益的政策，就是通过严格而真诚地保持中立的办法从协约国方面获得好处。”在里法特巴夏的另一份电报中载称：“土耳其很低的生活水平和原始的发展状况需要长期的、和平的成长。可能取得军事胜利的不可靠的诱惑只能使我们毁灭。必须立刻结束德国的干涉……如果我们作为协约国的敌人而行动起来的话，那协约国就准备把我们置于死地。德国并不关心我们的生死存亡……一旦失败时，它就会利用我们来作为满足战胜国野心的工具；一旦胜利时，它将把我们变成保护国。”

但任何忠告和警告都已经不能改变局势了。土耳其人已经不是自己家里的主人了。政府中某些有势力的人，其中包括宰相赛伊德·哈里姆、司法大臣哈里尔、财政大臣查维德，甚至连“三雄”当中的两个人——泰拉特和詹玛尔在内，都企图拖延不可避免的结局。但他们在德国的坚决要求、协约国的完全无所作为和恩维尔及其军阀集

团的冒进的态度面前，都显得无能为力。

土耳其政府向德国人指出，土耳其国库空虚妨碍军事行动的开展。对此，德国人便给予土耳其一亿法郎的贷款。1914年10月11日，冯·万根海姆男爵把此事正式通知了土耳其的领导者，并要求立即行动起来。詹玛尔巴夏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指出，万根海姆以“极其阴郁的神态”作了这个声明，他好象要说：“噢，现在您不要再捏造任何借口了吧。”土耳其政府的代表立刻同万根海姆签订了一项议定书：一当答应给予的贷款的一部分到达伊斯坦布尔时，土耳其就“必须立即展开军事行动”。

虽然如此，土耳其政府仍然犹豫不决。土耳其人由于没有弄清楚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立场而深为不安。1914年10月20日左右，意大利政府向土耳其政府所作的声明，使土耳其人愈益不安，该声明说：“如果土耳其放弃中立，意大利将处于最艰难的境地。”泰拉特和哈里尔在土耳其政府收到这个声明后曾会见了巴拉维奇尼，并说服他说，土耳其最好拖到春季再开始军事行动。哈里尔贝伊由于不相信同万根海姆和巴拉维奇尼所

进行的谈判获得成功，便根据军事委员会的决定，甚至准备前往柏林和维也纳，以便在那里促使德国和奥地利政府允许土耳其人延迟到春天。只有恩维尔一人坚决主张立即采取军事行动，并向德国人担保说：舰队“在最近几天”就会得到相应的命令。

10月26日，作为既定贷款的第一批黄金从德国运到了伊斯坦布尔。恩维尔允许苏邵把舰队开往黑海，而在10月29日，便发生了一个“既成事实”：德土军舰袭击在黑海中的俄国舰只；炮击塞瓦斯托波尔和俄国其他港口。从这一天起，土耳其在事实上就加入世界大战了。

黑海上所发生的事件的消息，在土耳其政府中引起了惊慌不安。查维德贝伊和其他三位大臣抗议性地提出了辞呈。詹玛尔巴夏和泰拉特贝伊都故作姿态：海军的行动对他们来说是完全出乎意料的事件^①。宰相发表声明说：他将留在自己

^① 泰拉特于1918年在“统一与进步党”的代表大会上说：“在演习的借口下，把舰队开进黑海的苏邵海军上将袭击了俄国舰队，而后又袭击了俄国港口。大家都以为我知道这一计划。我敢向你们说实话：我和你们一样，只是在事情发生以后才得到通知的，事情的发生我并不知道，而且也未经我同意。”

的职位上，以便通过谈判来挽救局势。关于“俄国舰队所引起的敌对行动”，土耳其驻彼得堡代办法赫列丁曾受托向俄国政府表示遗憾，并答应土耳其舰队今后不再驶入黑海，条件是：俄国舰队也不要再出现于土耳其水域，并希望俄国政府在这种情况下也象土耳其政府那样，表现出同样的和解精神。萨庄诺夫回答法赫列丁说：俄国舰队首先采取敌对行动是根本谈不上的，而“总之，现在进行任何谈判是为时太晚了”。萨庄诺夫补充说：“如果土耳其声明立即驱逐一切德国人，驱逐陆军和海军人员，那么现在还可以就背信弃义地进攻我国沿海和因此遭受损失而给予赔偿等问题着手进行谈判。”

三个协约国家曾委托它们驻伊斯坦布尔的大使向土耳其政府宣称：如果它不从陆军和海军中立即辞退德国军人，那末就要承担同协约国作战
45 的责任。然而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任何谈判都已经不能挽救局势了。

在哈里尔贝伊家里举行的土耳其政府要人的会议上，大多数人都反对战争，并准备辞退德国的海陆军将领和军官，废除德土同盟，以给予协

约国完全的满足。但是，当泰拉特提到土耳其政府和伊斯坦布尔城已处于德国大炮威胁之下时，大家都不得不顺从了。此后，被派往法国大使那儿试探缔结协定基础的查维德贝伊不得不公然承认，土耳其政府甚至无力宣布让德国人离开土耳其国境，而实现这一措施就更不待言了。

1914年11月2日，法赫列丁贝伊在彼得堡、格尔斯在伊斯坦布尔都领到了自己的护照。同一天，英国和法国同土耳其断绝了外交关系。11月3日，英国舰队对达达尼尔海峡进行了示威性的轰击。到11月12日，协约国各成员国都已正式地同土耳其处于战争状态了。

德国人和泛突厥主义者的阴谋就这样实现了。

后来，当战争的惨痛结果在土耳其引起了人们对那些把国家引到这种招致灭亡的冒险行动的青年土耳其党人的首脑的普遍仇视时，土耳其人民广大阶层的意见，才十分清楚地表现在总检察长在安卡拉“独立法庭”审讯前“统一与进步党”委员会委员时所说的下列一番话中：“土耳其是在德国的进攻已被阻止在马恩河上，冲突的未来结局

已变得明显的时候加入了战争的。整个土耳其国家是由于德国海军上将根据德皇命令造成‘既成事实’的结果而卷入战争的。换句话说，一个伟大的历史上的帝国却成了这个德国海军上将手中的玩物，而他的名字在土耳其人民中是默默无闻的。屈从于这种行动的土耳其大臣们，看来与其说是对土耳其的幸福安宁负责的大臣，还不如说是德皇的顺从奴仆。”

战争的最初几个月就表明：恩维尔及其党羽的冒险行为给土耳其招来了何等悲惨的结果。尽管土耳其从动员到参战时已经过去了三个月，土耳其军队在1914年11月，还象在8月那样，对军事行动仍很少有所准备。土耳其人同德国人共同制订的动员计划充满着严重的错误。后来，土耳其军事专家、上校符亚德贝伊在自己的书中写道：“这个计划在参谋学校中只可以得零分。”因此，动员进行得很不顺利，常有很多逆行转运和很大耽搁的现象。

其次，取得德国总参谋部人员同意的恩维尔的主要军事战略计划，遭到了可耻的破产。该计划规模很大。它决定在两方面进行进攻战：在高

加索对付俄国，在苏伊士运河和埃及对付英国。该计划认为，这两个敌人的抵抗在很短期间就可被摧毁，所以便规定把军事行动扩展到幅员广阔的整个伊斯兰教地区。苏丹-哈里法所宣布的“圣战”，应该把伊朗和阿富汗吸引到土耳其这边来。然后，根据德国-恩维尔这个荒诞计划，三个伊斯兰教国家的联军应在伊朗集中起来，通过阿富汗的狭窄的山道攻入印度西北部，把印度的伊斯兰教徒归并到土耳其。同时，土耳其军队在突破苏伊士地峡后就可征服埃及，并扩张到整个北非去，而附和他们的塞努西信徒^①和苏丹人就会把“圣战”带到协约国在非洲的其他殖民地中去。至于高加索，那么在这里问题应该是十分简单的：“所向无敌的”土耳其军队将会占领俄国整个南高加索，转入伊朗的阿塞拜疆，从各方面来包围里海，而后，征服鞑靼人居住的伏尔加—乌拉尔地区和中亚细亚。具有德国军阀和恩维尔—泛突厥主

^① 塞努西信徒，也叫穆斯林兄弟会会员。该会是个宗教政治组织，1837年成立于麦加，后在北非开展活动。其创始人是穆罕麦德·本-阿里·塞努西。他的重要政治主张之一是对异教徒进行圣战。——译者

义分子的肆无忌惮的冒险主义的明显特征的计划就是这样。德国总参谋部人员把一切细节，如军队的布置、突击方向和日期等都安排好了。但结果是一事无成。

德国人和恩维尔对泛伊斯兰主义所抱的希望完全没有实现。苏丹-哈里法于1914年11月宣布了圣战。为了给正统伊斯兰教徒解释这次目的只是反对一个非伊斯兰教国集团的圣战的特殊性，伊斯兰教教主曾颁布了五项“费特瓦”^①。其中指出：“俄国、英国和法国……竭尽一切努力——愿阿拉保佑——来扑灭崇高的伊斯兰教之光”，所以住在协约国领土上的一切伊斯兰教徒都必须起来反对本国政府。同时又解释说：只有协约国才应当算作异教徒的国家，而德国和奥地利则是伊斯兰教的靠山和保护者。

47 圣战的实际结果是微不足道的。这种陈旧的号召无论在印度、埃及或是在俄国都丝毫没有得到认真的响应。被派往伊朗和阿富汗的德国和土耳其代表，在几次想把这两个国家拖入战争的企

^① “费特瓦”(Фетва)是伊斯兰教教主根据可兰经对一些行为和事件的解释。——译者

图遭到失败以后，便被迫放弃了自己的使命而逃跑了。甚至在奥斯曼帝国本土，圣战也象泛伊斯兰主义宣传一样，对于早在战前就发生的非土耳其族的各族人民（虽然也是伊斯兰教徒）的民族运动，也是无能为力的。叙利亚、巴勒斯坦和汉志的阿拉伯人，没有表现出为德土两国的统治而斗争的任何倾向。1916年夏天，汉志的阿拉伯人在英国支持下举行了起义，麦加的统治者胡赛因·伊本·阿里领导了起义者，他宣告自己为阿拉伯人的国王，并对土耳其苏丹宣布了圣战，同时向正统的伊斯兰教徒解释说：应该认为德国人及其青年土耳其党人同盟者是异教徒，而英国则是伊斯兰教的靠山和保护者。

同时，德国人想战胜俄英两国军队的希望，也立刻化为泡影了。为了从英国人手中夺回埃及，詹玛尔巴夏以军长资格被派往叙利亚。他的参谋长是德国上校克里斯·冯·克里辛施坦，或简称冯·克里斯（土耳其人通常这样称呼他）。詹玛尔巴夏在离开伊斯坦布尔时怀着非常美妙的幻想，他在车站上对为他送行的朋友们说：“我回来时将从亚历山大经海道而返。”现实打消了他的梦

想。按照冯·克里斯的计划而准备好的对苏伊士运河的远征遭到了失败。1915年2月间，土耳其人曾企图强渡苏伊士运河，但却被击溃而退却了。以后还对苏伊士运河进行了几次袭击，但也遭到同样的结局。此后，英国人自己转入进攻，而在1917年间，阿林比将军的军队已把战事转移到巴勒斯坦领土上了。

在高加索地区，恩维尔和他的参谋长德国将军布罗萨特·冯·雪伦道夫亲自负责领导了对俄国进行的战役。1914年末，恩维尔巴夏把军队都投入到亚达汉—萨雷卡麦什—乌尔米亚线上，以便突破俄国的阵线，打算以迅速的突击占领南高加索和伊朗。这次战役以土耳其人真正的惨败而告终了。土耳其第三军起初曾有一些不大的进展，但接着就从萨雷卡麦什被击退并完全被歼灭了。仅仅在这一次战役中，土军就丧失了七万人（该军
48 一共有九万人），其中冻死的约三万人。恩维尔巴夏和他的司令部逃回了伊斯坦布尔，在那里，他在很长一个时期里还是对舆论界隐瞒了已经发生的灾祸。尽管地形和气候的条件很困难，俄军还是在安纳托利亚发动了进攻，而在1916年初就

拿下了埃尔祖鲁姆，以后又占领了特拉布松、爱尔辛詹。

按照德国人的计划并在德国人指挥下所发动的进攻战的悲惨结局就是这样。

在其他两个战线上——达达尼尔海峡和美索不达米亚战线上，土军从战争刚开始时就处于防御地位。达达尼尔海峡战线看来对土军是很顺利的。但原因主要是盟国方面愚蠢的军事领导和它们之间在政治上的意见分歧。至于美索不达米亚战线，那么在这里土军也取得了一些暂时的胜利。陶斯亨特将军指挥从南部进攻的英国部队，被包围在库特-艾马赖，并在1916年投降了。但这一事件对军事行动的进程并没有发生重大的影响。1917年春天，英国人在重新发动进攻之后便拿下了巴格达。

到1917年初，土耳其的军事形势实质上已经不可救药了。只是战争在德国战线上的拖延，才使土耳其有可能苟延残喘。但协约国认为反正土耳其是注定要灭亡了。早在战争的头几个月里，它们就着手进行关于瓜分“奥斯曼遗产”的谈判，并在拟定了一系列秘密协定后结束了谈判。

三 协约国瓜分土耳其的秘密协定

土耳其的参战，消除了协约国在瓜分奥斯曼帝国领土问题上进行彻底勾结的最后一个障碍。除了土耳其版图中的异族土地——塞浦路斯、埃及和亚洲的阿拉伯地区以外，现在这里所谈的已经是纯粹土耳其领土了，首先当然是伊斯坦布尔和海峡。在土耳其大势已定之前，在土耳其保持中立的最后机会还没有丧失之前，俄国政府曾力图防止与土耳其发生战争，没有提出自己的领土要求。而当战争爆发时，伊斯坦布尔和海峡对于俄国来说，不仅又成为最诱人的目标，而且看来也是十分现实的。关于伊斯坦布尔和海峡的建议，现在正是来自那些在过去不仅最反对俄国兼并伊

49 斯坦布尔和海峡，而且甚至反对给予俄国军舰从黑海进入地中海权利的强国。

土耳其在历史上第一次面临着对它极为不利的和凶险的英俄法同盟。自从作为“奥斯曼遗产”问题的东方问题产生时起，从来还没有过英、俄、法三国同时站在一个军事阵营中的情况。土耳其

参加战争来反对这个同盟，实际上是把自已的生存孤注一掷。

在协约国同德国的冲突中，英国的利益具有决定性意义，它最重视俄国政府关于保持和加强把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的愿望。从英国的观点看来，获得伊斯坦布尔和海峡的希望，是一个最好的刺激物。因此，早在1914年10月29日以前，英国领导人就说出了（虽然以暧昧的方式）土耳其必遭灭亡的意思，在黑海事件后他们立即公开地向俄国示意说：俄国可以指望实现自己长期以来最为大胆的愿望了。

正如法国代办关于这件事情向自己本国政府所报告的那样，1914年11月1日，英国外交部发表声明说：它“已绝不认为需要怜悯土耳其政府”，并且，在英国人看来，土耳其“已不再是海峡的守卫者了”。英国驻彼得格勒大使馆在1914年11月2日致俄国外交大臣的备忘录中指出：“在英王陛下政府看来，土耳其不应受到大家重视，因为它已表明自己是不可救药和令人难以容忍的了。英王陛下政府认为，关于土耳其本身招致一切它要遭遇的不幸事件这一思想，将为伊斯

兰教人民的广大阶层所领会。”此后过了几天，柏肯道夫曾向彼得格勒报告说，据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葛累爵士所称：“如果德国被击败，那末海峡和君士坦丁堡的命运这次一定要按照我们的（即俄国的）利益来决定。”

50 法国不太愿意对俄国发出这样广泛的诺言。法国资本家同伊斯坦布尔买办的联系比英国人更为密切，所以他们认为，这一最大的贸易中心转入俄国手中是十分不利于自己的。同时，法国外交当局又没有英国外交当局那么眼光远大和手腕灵活，它认为，俄国政府就是没有占领伊斯坦布尔和海峡的希望，也将把对德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由于土耳其参战而使法国感到忧虑的主要东西，就是唯恐俄国从德国战线上调回自己的军队来加强高加索战线。法国人在从彼得格勒得到了“一个士兵也不从欧洲战线上撤回”的消息以后，便安心了，并且决定：至少在最近的将来，没有任何必要同俄国讨论土耳其问题。正因为如此，所以英国的倡议对法国人产生很不愉快的影响。共和国的总统普恩加雋 1914 年 11 月 17 日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英国政府曾委托乔治·布肯南

爵士向萨庄诺夫声明说：鉴于土耳其在欧洲冲突中的行为，英国认为‘关于海峡和君士坦丁堡问题必须按照俄国的愿望来解决’。萨庄诺夫‘怀着极满意的心情’接受了这个保证，这是很自然的。但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赞成这种满意的心情。部长们和我都不明白，大不列颠为什么不征询我们的意见，就在使所有盟国都很关心的问题上给予俄国如此充分的行动自由，俄国对待这个问题从来就是别有用心的，并且法国拒绝在这个问题上束缚自己。”

可是，法国政府也热中于利用更为密切的联系，把俄国束缚在协约国这一边。因此，法国人只好压制自己对英国言论的不满情绪，归根结底在这个问题上还是跟着英国走。他们一度还作出姿态，说伊斯坦布尔和海峡问题之“按照俄国愿望”来解决，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兼并，但俄国政府却紧紧抓住英国人所提示的解决办法，所以继续反对是徒劳无益的。

英国和法国这时只是极力为自己争取由于这一让步而得到补偿，并且主要的是通过条约的方式固定这样一个对它们极其重要的论点，即俄国

除了以参加对德战争到最后胜利为代价来取得伊斯坦布尔和海峡以外，不能有别的办法。在英国和法国所提出的条件中，许多条件是俄国实行起来没有什么困难的（把对德战争进行到胜利结束，满足英、法对阿拉伯地区的要求，商船自由通过海峡等等），但其中有一个条件是沙皇和俄国政府并非毫不犹豫地就接受了。这个条件就是把伊朗的所谓中立区转让给英国人。可是，这种犹豫不决的态度并未持续多久。英国驻彼得格勒大使乔治·布肯南爵士叙述自己和沙皇关于这个问题的谈话如下：“沙皇向我问道：‘您有什么事情要告诉我吗？’我回答说，我受到了一个委托，我希望它使您感到和我同样的满意，这就是英王陛下政府同意在它不难接受的条件下，实现俄国对君士坦丁堡和海峡的长期以来的要求。接着，我就列举了这些条件。沙皇在请我向国王陛下政府转达他诚挚的谢意之后问道，现在关于中立区的现行协定是怎样的。我一般地解释了这个协定的实质，并且补充说，中立区并入不列颠势力范围，将结束我们两国政府之间经常的摩擦，并且在彻底的和友好的解决波斯问题方面将前进一大步。

因为沙皇犹疑不决，所以我又允许自己向他指明说，如果我在一年以前向他建议用君士坦丁堡来换取关于俄国对中立区不发生兴趣的声明，那末我就会毫不怀疑陛下的答复。沙皇笑笑说，我是完全正确的。”这样，在伊朗推行侵略政策的英国，只是用一个满足俄国在海峡问题上的要求的诺言作为交换条件，便扩大了自己在伊朗的势力范围。

在1915年3、4月间，盟国之间以秘密协定的形式把伊斯坦布尔和海峡问题在条约上固定下来了，这个协定包括有萨庄诺夫的两个备忘录（第一个是3月4日致英国和法国驻彼得格勒大使的，第二个是1915年3月22日致英国大使的），1915年3月12日英国大使布肯南的备忘录，1915年4月10日法国驻彼得格勒大使馆的口头照会等。该协定的基本条款归结如下：

一、俄国有权兼并伊斯坦布尔、博斯普鲁斯海峡、马尔马拉海的西岸和达达尼尔海峡，兼并色雷斯南部直至爱诺斯—密地阿线，马尔马拉海上诸岛，伊姆布洛斯（伊姆洛斯）岛和特涅多斯（波士查达）岛，以及处于博斯普鲁斯海峡、萨卡里亚

河和应在伊斯美德湾沿岸确定的地点之间的土耳其亚洲海岸之一部分。

二、俄国保证竭力保护英国和法国在这个地区的特殊利益。

52 三、俄国同意规定货物自由过境和商船通过海峡的自由。

四、俄国同意伊朗中立区并入英国势力范围之内，并且以确定俄国和英国势力范围之间的界限的方式，把伊斯法罕和伊斯得市区以及祖尔法加尔附近的中立区的楔形地带的一部分，划归俄国势力范围。

五、英国和法国同意俄国在下列条件下获得上述的成果，即战争要进行到最后胜利，英国、法国能在东方以及在其他地方实现自己的计划。

盟国在同意俄国对伊斯坦布尔和海峡的要求时所作的保留条件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关于英国和法国实现它们自己“在东方以及在其他地方的计划”这一条件，使俄国将来兼并伊斯坦布尔和海峡更成问题了。虽然如此，俄国政府却感到满意。当时已经可以把达成协议的消息告诉俄国公众了（固然是以一般的形式，因为交换的备忘录

和照会的本文还是秘密的),而这就巩固了沙皇政府在俄国统治集团心目中的地位,削弱了早在1915年就已呈现出来的缔结对德单独和约的趋势。同时,关于伊斯坦布尔和海峡的诺言,使俄国政府在与盟国就进行战争和缔造战后和平等其他问题所进行的谈判中变得较为顺从了。

特别是俄国政府以前曾反对盟国因意大利站在协约国方面作战而给予意大利过于广泛的补偿,这时它则取消了自己很大一部分反对意见,虽然意大利未来的收获将给塞尔维亚带来损失。1915年4月26日,意大利和协约国在伦敦签订了秘密协定。意大利必须与法国、英国、俄国共同“反对它们的一切敌人”,对此意大利则取得了领土和其他的补偿,这种补偿的详细列举也正构成了协定的主要内容。在有关土耳其的那一部分中,协定规定:让意大利“完全占有”它从1912年时就已占领但无合法权利的多得坎尼群岛;废除1912年洛桑条约保留给土耳其苏丹在利比亚的一些形式上特权的最后残余;承认意大利在土耳其沿地中海地区(安塔利亚省和邻近的地区)有特殊“权利和利益”,并且如果土耳其的亚洲部分

将受到完全或部分的瓜分时，那末意大利将占有上述的地中海地区，而如果“土耳其帝国领土的不可侵犯性得到保持，如果列强利益范围将有所改变时”，那末在这种场合下，“意大利的利益也将同样受到重视”。

英国、法国和俄国在接受意大利加入协约国时，并不认为有必要把关于伊斯坦布尔和海峡的协定通知自己的新同盟者，直到后来它们才向自己的新同盟者介绍了这个协定，但就是在这时也没有完全说出来。可是，意大利本身在自己参加世界大战的初期，并没有在近东表现出积极性。意大利由于耽心利比亚阿拉伯人反意运动的加强，拒绝公开地参加反对土耳其的军事行动，甚至没有参加盟国的达达尼尔海峡战役。这种情况以及比较一般的其他原因（意大利拖延对德宣战），使得意大利政府就是在它加入协约国之后，在盟国关于瓜分土耳其和阿拉伯领土的秘密谈判中也没有享受到平等权利。

当时，协约国企图用暴力打开海峡的方法迅速地解决土耳其问题。严格说来，这几乎只是英国的措施，因为法国只用一小部分兵力参加了这

项措施，而俄国和意大利则完全没有参加。达达尼尔海峡战役经历了两个不同的阶段：在第一阶段中，盟国只限于海军的行动，指望只依靠自己的舰队强渡达达尼尔海峡；在第二阶段中，在格利博卢（加里波利）半岛登陆的陆军参加了战斗。

在达达尼尔海峡战役的第一阶段中，盟国之间就已经表现出了重大的意见分歧。法国担心伊斯坦布尔遭到破坏，或者至少是怕使它遭到严重的经济上的损害，因为这样就触及了法国的直接的金融利益。俄国由于不可能从黑海^①方面调出自己的海军力量进行突击，因此，它担心达达尼尔海峡战役的胜利将使伊斯坦布尔和海峡转入英国手中，并且担心在这种情况下，俄国将得不到按照刚刚缔结的秘密协定答应给它的东西。同时，54俄国政府又因英国人对希腊的谄媚态度而气愤。维尼塞洛斯建议在达达尼尔海峡战役中帮助盟国，而俄国政府也懂得：希腊参战就能鼓励它对

^① 直到1915年5月，还有这样一个打算：俄国将使陆战队在土耳其的欧洲沿岸登陆。到5月底时这个希望消失了，因为在这个时候，马凯逊将军指挥的奥德军队在加里西亚展开进攻，迫使俄军退却。

君士坦丁堡的野心。1915年3月18日，英法两国的舰队在企图抢渡达达尼尔海峡时遭到了严重的失败。这次失败引起了一些重要的政治后果。希腊政府更换了：公开同情德国的古纳利斯代替了维尼塞洛斯担任首相。以前在依靠协约国或依靠德国的方针上犹豫不决的保加利亚，这时也确定了自己的政治路线，只是等待反对塞尔维亚的良机。

英国和法国企图挽救局势，采取了军事和外交两方面的措施。军事措施表现为陆战队在海峡地区登陆，打算首先占领格利博卢半岛。外交措施是向希腊人提出新的建议，其目的是鼓励他们站在协约国这方面参战。不论军事或是外交措施都没有导致积极的结果。盟国的陆战队未能取得胜利（在达达尼尔的保卫战中，当时土耳其方面的上校穆斯塔法·基马尔贝伊是有卓著战功的），并且被迫转入没有前途的阵地战。吸引希腊参加协约国方面的企图，也因希腊国王康斯坦丁和古纳利斯首相的坚决反对而没有成功，虽然英国人现在允许把伊兹密尔、甚至塞浦路斯给予希腊人，而这在以前是希腊人所不能幻想的。不但如此，

英国人的冠冕堂皇的建议已被巴尔干半岛的其他国家，特别是保加利亚知道了，这就加强了这些国家对协约国政策的不满。

达达尼尔海峡战役特别强有力地暴露了盟国之间的矛盾。俄国是以勉强掩盖起来的仇视态度对待这一措施，正确地把这次战役看作是英国夺取海峡、使俄国处于既成事实面前的尝试。法国则认为，把西方战场上如此需要的军事力量（自己的和英国的）消耗在加里波利半岛上是不适当的。在英国的政治活动家中也有反对达达尼尔海峡远征的人。某些英国外交家，由于不完全了解达达尼尔海峡战役的主要拥护者丘吉尔的秘密阴谋，因而认为在战役胜利时还得履行对俄国所发出的诺言并把海峡让给俄国。德国人挑起了这种猜疑。他们通过各种途径暗示英国人说，夺取伊斯坦布尔和海峡对英国本身是不利的。1915年9月初，当加里波利半岛战役的结局还不明显，而保加利亚紧张地注视着战役的进行，以便在协约国胜利时能重新改变方针时，纽约《世界报》驻柏林记者发表了下面一封显然是受德国人指使的电报。这个记者写道：“英国由于惧怕德国而简直是

发昏了。英国一些优秀的政治家由于这种已成固执念头的荒谬的恐惧而惊慌失措，他们忘记了本国的基本利益，准备做出那种一旦成功时对英国的未来会是极大不幸的事情……英国占领达达尼尔海峡从而给自己的未来劲敌大开方便之门的努力，乃是骇人听闻的政治错误。”德国人暗示英国在达达尼尔海峡作着有害于自己而有利于俄国的事情，这对英国的很多有势力的政界人物（固然，与其说是“优秀人物”，还不如说是最没有远见的人物）产生了很深的印象。例如，英国驻巴黎大使伯尔蒂勋爵在把上面所引用的一段报导记入自己的日记本上之后，补充写道，在这些话中是有“不少真理的”。

盟国在达达尼尔海峡的军事失利以及它们在外交上的不彻底性和动摇，首先影响了保加利亚的行为。1915年8月底，德国人在索非亚加强了自己的固执立场。德国人一面鼓励保加利亚人，一面向他们声明说，奥地利正在准备对塞尔维亚举行新的进攻，保加利亚军队的任务这样一来也就要减轻了。的确，奥地利人正准备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战役。塞尔维亚政府企图与保加利亚达成

协议，甚至还准备做某些领土上的牺牲。可是柯布尔格的斐迪南^①为了履行自己的奥德主子的指示，宣布了动员^②。德国人为了彻底地使保加利亚人跟着自己走，要求土耳其人对保加利亚作领土上的让步。尽管有土耳其有势力的人士反对，恩维尔还是做了这些让步。1915年9月6日，与德保和奥保同盟条约在索非亚签订的同时，保土公约也缔结了，根据该公约规定，马里查河右岸，56包括亚得里亚堡的市郊——卡拉加奇和亚得里亚堡车站，以及马里查河左岸两公里宽的地带（这样，斯维林格勒至迪迪阿加契的铁路就完全在保加利亚的领土上了）属于保加利亚所有。随着这些协定的签订，保加利亚就彻底地从属于德国人

① 斐迪南一世，保加利亚国王，出身于德国萨克森-柯布尔格-戈塔公爵家族。由于德奥外交当局的阴谋活动和保加利亚一部分资产阶级的支持，斐迪南被选为保加利亚大公（1887—1908），后为国王（1908至1918年），1918年退位后逃回德国。
——译者

② 盟国在苏夫拉（在加里波利半岛上）战役（1915年8月7日至21日）中所遭的失败结局，对保加利亚人产生了决定性的印象。这次战役实质上预先决定了整个达达尼尔战役。穆斯塔法·基马尔也在这次战役中大显身手。

了。1915年10月14日，与奥德军队开始进攻塞尔维亚的同时，保加利亚进攻了自己的弱小邻国（随后在10月15日就宣战了），从而也就作为第四个参加者加入了德奥土集团。

到1915年底时，达达尼尔海峡战役注定要遭失败的形势已经很明显了。盟国并没有抛弃在近东采取军事行动的念头。英国和法国的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是不一致的。在西线战场上担负了对付德国人的主要重担的法国人认为，必须把一切努力集中在欧洲战场上，而在巴尔干只是进行佯攻，并为此开辟了萨罗尼加战线。

饶富尔将军反映了这种观点，他用以下这番话判断了1915年12月的局势，这时正是盟国召开山提里亚会议的前夕。他在致法国政府的秘密报告中写道：“欧洲战争只能在军事行动的主要战场上，即在法国和俄国解决；我们把意大利也加上，为的是不使我们的盟国受委屈。近东（巴尔干半岛、小亚细亚）只是军事行动的次要部分。”相反地，英国人，特别是劳合·乔治和丘吉尔，则坚持要把军事行动的重心转移到近东，认为在这里，即在敌人阵线最薄弱的一环上有着打开德

国“后门”的最大的可能性。例如，劳合·乔治还在他领导政府以前就证明，必须首先使土耳其退出战争。他说，但是为此所需要的不是象“达达尼尔冒险”那样轻举妄动的和准备得不好的战役，而是在亚洲的土耳其战场上集中盟国相当大的力量，完全歼灭土耳其的军队。劳合·乔治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在整个战争期间，还没有过英国和俄国政府不能以其联合的努力来击溃土耳其帝国的时机。在战争的任何时候，至少在战争的最初三年中，战胜土耳其对于战争总的进程是有决定性意义的。土耳其退出我们敌人的队伍，就会给我们打开通往俄国、罗马尼亚的捷径。我们非常需要这一点，而没有这一点则迫使俄国和罗马尼亚退出战斗。在1915年，对土耳其的这种战略能使我们恢复我们在1915年9月失去的对巴尔干的控制，并且把我们的力量同罗马尼亚以及俄国的力量联合起来。盟国将会把自己的剑刺入奥地利的致命之处——多瑙河战线，后者在地理上和民族方面都是奥地利最弱的侧翼……战争总的进程就会完全改变，战争的期限就会缩短。”在劳合·乔治（以及丘吉尔）的这些议论中，

最重要的动机(虽然没有说出来)决不是渴望帮助自己盟国，而是英国帝国主义集团要在巴尔干巩固下来，确立英国在海峡地区的统治，并把经过土耳其通往印度的陆上交通线攫为己有。

劳合·乔治认为土耳其退出战争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劳合·乔治继续说道：“如果不谈达达尼尔海峡，那末土军的力量就象幻影一般。即使在加里波利，假如组织得正确而进行得及时的话，我们也能轻易地战胜土耳其人。在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除了我们的总参谋部之外，谁也不能在1915年和1916年使土耳其人免遭完全破产。奥斯曼帝国的真正堡垒不是在阿奇-巴巴，也不是在巴格达或耶路撒冷，而是在伦敦的英国政府所在地——白厅。在三年之间，这种庸碌无能的严酷的驻防军击退了对正在瓦解的土耳其军队的每一次进攻，使土耳其能把自己将近一半装备不好的军队派到俄国战线上的亚美尼亚去。”

劳合·乔治在担任首相以后，逐渐地实现了自己在近东开展军事行动的计划。但在这之前进行了巨大的外交上的准备工作。英国政府与阿拉

伯人发生了秘密关系，允许后者建立独立的阿拉伯国家，鼓励他们起义反对土耳其人。同时，英国在瓜分战后赃物方面，也极力使法国以及部分地使俄国和意大利安下心来。因此，虽然实际上这些赃物的大部分应落在英国人手中，英国政府还是同自己的盟国继续进行并完成了关于瓜分奥斯曼帝国的秘密谈判。

英法俄三国关于瓜分土耳其亚洲部分的谈判，是关于海峡和伊斯坦布尔谈判的直接继续。英国和法国正是在这些谈判中确定了自己在“东方的计划”，它们以这些计划的实现作为把伊斯坦布尔和海峡转让给俄国的先决条件。1915年秋天，谈判只是在英法两国之间进行的。在这个阶段，俄国还没有参加谈判。英国专家马克·萨伊克斯和法国专家乔治·皮柯，制定了只考虑到英法利益的瓜分奥斯曼帝国亚洲部分的草案。后来在1916年初，萨伊克斯和皮柯到达了彼得格勒，在那里他们使自己的草案与俄国政府的愿望协调起来。英国和法国在得到俄国原则上的同意之后，便于1916年5月间在伦敦交换照会，达成了关于瓜分小亚细亚各阿拉伯国家的协议。1916年9月1

日，俄国政府最后同意了瓜分的条件。所有这些文件通常称为“萨伊克斯-皮柯协定”，它规定了关于瓜分奥斯曼帝国亚洲领土的下述原则：

一、俄国兼并埃尔祖鲁姆、特拉布松、凡湖和比特利斯诸地区，直到特拉布松以西黑海沿岸所应规定的地点，以及凡湖和比特利斯以南的库尔德斯坦的一部分。

二、法国和英国部分地兼并、部分地以“势力范围”的形式，获得安纳托利亚的东南地区和小亚细亚的各阿拉伯国家。这些领土被分成几个地区，每个地区在形式上都有不同的制度^①，但在实质

^① 协定规定，在“甲”区和“乙”区（势力范围）将成立一个独立的阿拉伯国家或几个阿拉伯国家的联邦，由一个阿拉伯人领袖行使宗主权。在这里法国和英国对地方企业和贷款将相应地拥有优先权和提供外国顾问或官吏的特殊权利。“甲”区是法国的，它从约旦开始，由此向北，经大马士革西面和霍姆斯—阿勒颇铁路以西，然后在亚历山大勒塔东面向东转，一直朝东去，直抵伊朗国界（在美尔格维尔附近）；接着沿伊朗—土耳其国界直到塞尔德施特以西的据点，然后向西去，经基尔库克以南、阿布—基马尔以北和大马士革以南回到起点。“乙”区是英国的，“甲”区的南界是它的北界；从伊朗—土耳其国界上的塞尔德施特西面的据点起向南，直到卡纳金东北面的据点；接着朝西南方向，到巴格达西面幼发拉底的交叉点地方；由此向南转，沿幼发拉底河，直到波斯湾的巴士拉南面结束；然后在波斯湾稍靠南

上这些地区都变成了英国的和(相应的)法国的殖民地。

巴勒斯坦被划分为一个特别的——“褐色的”——地区。在这里将根据盟国同麦加统治者的代表所缔结的协定，建立一个国际行政机关。⁵⁹

三、盟国中每个国家在某一地区的租让铁路、金融、贸易以及其他的权利和利益，当这一领土转为另一盟国占有或为其势力范围时，上述利益应予保留。

四、至于阿拉伯半岛(汉志、内志、沙马尔、亚西尔和也门)，那末在这里，英法两国政府以面的地方它又重新开始，以一个弧线越过阿拉伯半岛，在亚喀巴附近伸向红海；从亚喀巴朝西北方向引向地中海；接着“乙”区从南面和东面围绕巴勒斯坦，直到自己在约旦的北界。

除此以外，协定还规定了“蓝”区和“红”区，在这里法国和英国相应地将有权自行建立行政机构和监督；换句话说，就是法国和英国兼并这些地区。“蓝”区是法国的，它从士麦拿西面的地中海开始，起初向西北，然后向东北——沿直线到西发斯西面的据点，由此向东到穆西西面的据点，然后向东南到詹西尔-伊本-奥马尔，由此沿直线向西，经马丁、乌耳法、比列哲克、基利斯等地的南面，再向南，沿“甲”区的西界到它的南界，最后再向西北，在阿加北面到达地中海。“红”区是英国的，它包括“乙”区(西面)、波斯湾(南面)和伊朗(东面)之间的一片土地；此外，巴勒斯坦的雅法和海法市也作为兼并区划归英国。

“阿拉伯国家的保护者的身分”保证不取得领地，也不同意任何第三国获得这样的领地或在红海东部沿岸岛屿上建立海军基地。

无论是关于谈判或是关于萨伊克斯-皮柯协定本身，意大利起初都没有得到通知。意大利在知道关于这一协定的消息以后，曾向盟国提出了抗议，但在提出了自己的领土和其他的要求之后，它终于还是参加了这一协定（1916年11月19日意大利驻彼得格勒大使馆的备忘录）。盟国对意大利的要求起初并无反映。直到1917年4月，即在俄国二月革命以后，英法两国才同意在小亚细亚给意大利分出一个补充地区。对意大利的这项协议，是1917年4月19日在圣让德莫廉召开的英、法、意三国会议上达成的，俄国没有参加会议，甚至也未得到通知。给予意大利的地区（“绿色的”），包括伊兹密尔连同亚伊丁省和附近的领土，
60 直到法属地区。可是，英法两国慎重地作了保留说，俄国也应当参加这一协定；而因为它们确切地知道，俄国临时政府将不能参加关于瓜分土耳其的秘密勾结，所以对意大利人所作的诺言，在任何时候也都可以被解释为没有法律效力。

所有这些谈判和协议都是秘密的，但土耳其政府毕竟毫不怀疑协约国正在准备消灭奥斯曼帝国。在土耳其社会的广大人士中形成了这样一种看法：土耳其把自己的命运同德国人联系在一起之后，将遭遇不可避免的惨祸。但防止惨祸无论如何已不取决于土耳其人本身了。土耳其完全丧失了最后一些独立的因素。在战争期间，德国“已把土耳其变成了自己的财政和军事上的附庸国”^①。恩维尔巴夏完全受德国统帅部支配了。到1916年初，暂时由李曼·冯·散德斯使团指挥的德国军官已达二百人。他们被分配在奥斯曼的各军和兵团里担任参谋长。土耳其的总参谋部不经该使团的同意没有权利调动这些军官。在军长当中也有德国将军——李曼·冯·散德斯和冯·德·戈尔茨。德国人并不以此为满足，他们于1917年决定建立特种集团军，在这个集团军中，司令官和整个司令部都将是德国军官。这个集团军在土耳其获得了一个暗号——“闪电”；它所担负的任务是夺回巴格达，并继续向波斯湾推进。冯·法

①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185页。

尔肯汉因将军被任命为“闪电”集团军的司令官。

可是，德国统帅部在慷慨地供给土耳其一些高级军官时，决不是用战斗人员帮助自己的同盟者。1917年从德国派出的所谓“亚细亚军团”（六千人）留驻在后方。“亚细亚军团”的所有士兵都享受德国人专门组织的粮食供应，至于这个军团和军事使团的军官就更不用说了。他们的特权地位以及不断发生的横暴行为和掠夺行为，在土耳其官兵中引起了很多怨言。

不仅如此，尽管在土耳其战线上军队不足，但由于秘密谈判的结果，德国统帅部于1916年还是从恩维尔那里取得了十二万土耳其士兵供给德奥战线。并且按照恩维尔的命令，一些精锐的战士被派往欧洲。软弱的士兵都用其他部队的士兵替换下来了。远征军团依靠牺牲留在土耳其的部队的利益获得了较好的军服和装备。可见，德国人不仅没有帮助自己软弱的同盟者，而且还利用土耳其人当炮灰。前德国总参谋长冯·法尔肯汉因，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就这件事情十分露骨而厚颜无耻地写道：“对我来说，下述事实是用不着证明的，那就是如果……两万五千土耳其人代替两万

五千德国人在加里西亚流血牺牲，那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德国帝国主义残酷无情地榨取土耳其的粮食和原料资源。德国人建立了一个垄断土耳其出口的专门的“中央采购委员会”。土耳其本身都感到非常缺乏的粮食、橄榄油和其他食品，被大量地运往德国和奥地利，这种情况甚至引起了伊斯坦布尔交易所里德国马克牌价的剧跌。而当土耳其政府在商人的压力下被迫禁止粮食出口时，中央采购委员会就加强了工业原料的输出。

德国人为了使土耳其的农业受自己控制，占据了土耳其农业部和其他与农业有关的机关的领导职位。在农业部之下建立了一个农业发展委员会，由德国代表担任主席。德国人被安置在农业银行的领导地位上。德国农学家、植棉家和水利技术人员被派到土耳其各省。德国驻伊斯坦布尔总领事实际上领导了首都的“粮食委员会”。按照德国人的指示，土耳其政府于1917年初通过国会实行了农业强制义务法。根据这一法律，全国所有的农业人口，除应征入伍者以外，不论男女都可能被农业部“征集”从事农业劳动；逃避征集者

则处以罚金和监禁。

土耳其经济和财政的其他部门也转入德国控制。一些在战前属于协约国资本家的租让权都被转让给德国人了。以“德意志银行”为首的德国集团开始经营厄里格利—桑古尔达克煤矿区。为了煤的运输和分配，当时设立了一个由德国军官担任局长的“煤矿局”。德国人开始开采埃尔加尼的铜矿。德国的军事工程师被派到各矿。森林采伐、港口和所有的铁路都被德国人控制了。在奥斯曼债务委员会中，在英国和法国的代表离去以后，奥地利代表担任了主席。一个德国专员被任命管理奥斯曼银行。

德国帝国主义除了军事上和经济上侵入土耳其以外，同时也利用了政治和思想的途径。德国人在恩维尔帮助下完全使奥斯曼政府从属于自己。他们认为没有必要去重视青年土耳其党人其余的活动家。无怪乎在德国，人们十分严肃地把土耳其称为“恩维尔国”，并且在开往伊斯坦布尔去的军用火车上都挂有写着这种字样的牌子。可是，由于德国人并不完全信任恩维尔，因此又采取了某些补充的步骤。例如，他们把战时书报检

查机关掌握在自己手里，甚至使苏丹的敕令和伊斯兰教教主的“费特瓦”也遭到军事检查。陆军部和土耳其政府都是由德国部队担任守卫。各个部里德国顾问的人数异乎寻常地增加了。在伊斯坦布尔大学里，德国教授的人数也增多了。1916年（在塞尔维亚失败和柏林至伊斯坦布尔的直接交通建立以后）开始运转的最初一些“巴尔干列车”，把各种“专家”、新闻记者和东方学家——很多德奥间谍——带到了土耳其。德国的天主教徒力图用自己的“圣芳济派神父”来代替战前土耳其的许多法国教会学校里的法籍教士。为了这一目的，当时曾有一个以埃尔茨柏格尔为首的专门代表团来到过土耳其，埃氏以德国同意于1916年废除领事裁判权制度作交换条件，同土耳其政府达成了关于“保护德国天主教教会的”协定。仅在1916年一年之内，就有几百名奥德传教士和“修道女”被派到土耳其。

德国帝国主义者及其青年土耳其党人附庸蛮横地主宰一切，彻底地破坏了土耳其经济。土耳其农村弄到了民穷财尽的地步。斑疹伤寒流行成灾，在叙利亚，死于饥饿者达六万人。许多尸体

过了几天仍然没有埋葬。在安纳托利亚，为开采厄里格利煤矿和修筑安卡拉—西发斯铁路而动员来的农民，由于饥饿不得不停止工作。

63 城市劳动群众的生活状况也好不了多少。甚至在伊斯坦布尔这样的城市，每天死于饥饿的人也数以十计。每人每天按配给证可以领到二百五十公分烤得不好的几乎是不能吃的玉米面包，而有时甚至只有一百五十公分。

在这些年代里，土耳其的亚美尼亚人也经历了悲惨的事件。苏丹和青年土耳其党人当局，决定利用战争来完成还是“血腥的苏丹”阿布杜尔·哈密德所开始的那些暴行。1915年5月，在俄国军队占领凡城以后，奥斯曼政府就颁布了一项关于所谓遣散的法律。鉴于当时发现所谓有“通敌、叛卖和给敌人以武装协助”等事件，该法律正式规定从靠近前线的地区撤退居民。实际上，遣散变成了惨无人道的屠杀。一百五十多万亚美尼亚人从自己的乡村和城市中被驱逐出去，并且分批被遣送到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的集中营里。除了居民破产以外，遣散还使为数众多的人牺牲了。被遣散的人得不到粮食的供应；男子同妇女、小

孩分开，并被遣散到不同的地区；疾病、殴打、凶杀夺去了几万人的生命。而那些最终到达了集中营的人，也由于疟疾、伤寒和饥饿而死在那里。遣散并不限于靠近前线一带的地区，它扩大到了整个安纳托利亚，甚至扩大到伊斯坦布尔。在这种悲惨的事件中死去的约有一百万亚美尼亚人。德国人鼓励对亚美尼亚人实行这种“取缔”。一些德国军官甚至极力想借这个机会大发横财，他们在土耳其警察的帮助下，以迫害相威胁，强迫亚美尼亚商人以极低的价格交出商品。在安纳托利亚的一个小城市里，有一群亚美尼亚人，其中也有妇女和小孩，守卫在一所房子里。土耳其人未敢开枪。于是来到那里的一些德国军官便亲自向亚美尼亚人开火。

把土耳其变成德国殖民地的青年土耳其党人政府的政策，在国内引起了普遍的愤恨。士兵逃跑的现象非常严重。尽管有戒严，在各个城市中，其中也包括伊斯坦布尔，却发生了饥民暴动。被德国人的殖民者的方式所激怒的很大一部分军官，都激烈地反对恩维尔。在青年土耳其党党员及其中央委员会委员中间，反战情绪增强了。

青年土耳其党的某些活动家因为怕爆发革命，于是便开始准备宫廷政变，以便排除恩维尔，同协约国达成协议，并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在1915年，即在达达尼尔海峡战役时就曾发生了这样一个尝试。英国舰队的行动使伊斯坦布尔惊恐万状。人们以为强渡海峡已指日可待了。在首都，撤退政府机关和苏丹宫廷等工作都准备就绪了。档案和黄金储备迁移到科尼亚。在这种局势下，“统一与进步党”委员会的一部分委员同协约国的代表进行了关于缔结单独和约的秘密谈判。试探工作是做得很胆怯的，而且协约国并不乐意去迎接这种试探工作，因为它们确信最近就可以攻下伊斯坦布尔。虽然如此，委员会中反对恩维尔的委员们只是等待盟国突破达达尼尔海峡防线，以便举行政变。尤其是谋叛者们把皇太子尤苏夫·伊塞丁拉拢到自己这一边，后者是以亲法派和恩维尔的反对者而著称的。盟国在加里波利半岛上的失败打乱了这些计划。1916年2月1日，在盟军从达达尼尔地区撤退以后，根据土耳其政府的官方消息，尤苏夫·伊塞丁立刻就自杀了。可是一直流行着这样的传闻：皇太子是根据

“三雄”的判决而被秘密地处死的。

第二个严重的政变的企图是在1916年夏准备好了的。谋叛者的首领是雅库布·詹米尔少校。他在青年土耳其党人和军官中间是十分有名的，这是因为他以“炸弹手恐怖分子”的身分积极地参加了1908年革命以前的马其顿运动，并因此而被称为“炸弹手詹米尔”。在詹米尔后台活动的有“统一与进步党”中央委员会的著名委员：纳兹姆博士、米德哈特·修克鲁以及恩维尔的其他一些秘密的反对者。可是，雅库布·詹米尔不仅打算反对恩维尔，而且也反对青年土耳其党的所有上层分子。他打算实现军事暴动，把政权交给在保卫达达尼尔海峡以后成为当时极有声望的穆斯塔法·基马尔巴夏。根据奸细的密告，雅库布·詹米尔被逮捕。军事法庭控告他由于个人自私自利的动机而参加了反政府的阴谋。1916年9月间，雅库布·詹米尔被处绞刑。有同谋嫌疑的几百名军官都被逮捕并被派往前线。

恩维尔之所以能把自己的反对者镇压下去，主要是因为谋叛者害怕向人民群众呼吁，而人民群众本身又还未推举出自己的组织者。

65 虽然如此，但是土耳其却掀起了反对德国人的愤怒浪潮。自发的愤慨和刺杀德国军官的事件不断发生。土耳其的高级指挥官和德国将军们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早在1915—1916年期间，即在达达尼尔海峡战役期间就已同李曼·冯·散德斯发生冲突的穆斯塔法·基马尔，于1917年在叙利亚战线上由于法尔肯汉因干涉土耳其内政而公开地拒绝同他合作。

在1917年年中，在大多数土耳其的军事和政治活动家中形成了这样一种固定的看法：与德国结成同盟将使奥斯曼帝国发生灾难。在伊斯坦布尔的资产阶级人士中，有些人说：“不管怎么样，贫穷的土耳其又要为打碎了的罐子付钱。”只有恩维尔、泰拉特及其亲近的人，把德国看作自己独裁的最后的靠山，继续坚持以前的政策。

四 奥斯曼帝国的崩溃

俄国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根本地改变了近东的国际局势。帝国主义阵线在俄国被突破了。

以前青年土耳其党人用来进行有利于继续进

行战争的煽动性宣传的工具之一，就是借口说：俄国沙皇制度威胁土耳其的领土完整。现在这些借口已经消失了。

苏维埃政府所宣布的政策，给土耳其提供了在保持自己本国领土完整的条件下退出战争的可能性。协约国在这个时期也有尽快地停止对土耳其人作战的意图。英国和法国因耽心德国人把全部兵力从俄国战线调到法国北部，使盟国遭到致命的打击，便开始试探与青年土耳其党人政府缔结单独和约的可能性。同样由于这些原因^①，劳合·乔治于1918年1月初声明说：被盟国占领的土耳其领土有权要求“承认它自己的民族条件”，以前的秘密协定不应妨碍盟国对未来和约条件的自由讨论，“因为俄国的崩溃根本地改变了形势”。1918年1月8日在美国总统致国会的咨文中发表的威尔逊的“十四条”，也有大致相同的意思（即关系到土耳其的）。与土耳其有关的第十二条载称：

①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人违背萨伊克斯—皮柯条约而想建立对巴勒斯坦统治的企图，以及想使由于协约国秘密条约的被揭露而愤怒的英国工人阶级和印度伊斯兰教徒安静下来的意图，也具有不小的意义。

“奥斯曼帝国现代版图中的土耳其部分应得到有保障的巩固的主权，但现今处在土耳其人统治下的其他民族应得到生存的明确保障和自治发展的绝对不可违反的条件。达达尼尔海峡在国际保障下应对各国船只的自由航行和贸易经常开放。”

英美帝国主义者的声明都不过是策略上的手腕。很明显，这里所指的不是使土耳其人享有“有保障的和巩固的主权”，而是促使土耳其人缔结单独和约。虽然如此，但在很大一部分土耳其资产阶级人士中，当时已经产生了一种基于希望（而有时也基于有意识的自欺）的“威尔逊幻想”：美国人抱着“崇高的”目的，他们使土耳其具有独立发展的可能性。

德国人也开始了解土耳其可能脱离他们。为了使同盟关系活跃起来，威廉二世于1917年10月访问了伊斯坦布尔。这次访问对于德国来说并没有产生积极的结果。而苏丹太子瓦希德丁于1917年冬季回访德国，则产生了否定的结果。担任瓦希德丁侍从武官的穆斯塔法·基马尔是一位富有经验的将军，他在访问德国前线时不仅能够研究德国统帅部指给瓦希德丁看的那些目标，而

且还按照自己的意图研究了一些其他的東西。基马尔当时已确信，对于德国来说战争是失败了，土耳其无论如何必须摆脱对德国人的从属地位。

然而，恩维尔及其党羽顽固地把土耳其引向灾难境地。恩维尔由于企图实现自己的泛突厥主义的侵略计划，用抢劫他人领土的办法来巩固自己已经动摇的地位，便对南高加索实行了武装干涉。1918年3月3日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确立了土耳其和苏维埃俄国之间的和平。奥斯曼的军国主义者粗暴地把它破坏了。1918年3月末，土耳其军队侵入了南高加索境界，4月间他们占领了巴统和卡斯。南高加索的反革命分子使土耳其干涉者的任务易于完成，因为他们按照土耳其的要求宣布南高加索脱离苏俄而“独立”，同土耳其人缔结了协定，为后者进一步向巴库石油和高加索的其他富源挺进开辟了道路。由于分赃而在土耳其人和德国人之间发生的意见分歧，妨碍了土耳其人占领梯比里斯，但在1918年6月间，他们已经占领了干驻（现在的基洛夫巴德），在这里建立了反革命的傀儡“阿塞拜疆政府”和由恩维尔的弟弟努里巴夏指挥的“伊斯兰教军”，然后

又向巴库挺进。1918年9月15日，巴库被土耳其人占领了，这个城市遭到了他们的破坏，而居民则遭到了骇人听闻的屠杀。

这是奥斯曼军国主义的垂死挣扎。1918年9月20日，苏维埃政府向土耳其政府发出了照会，坚决抗议土耳其军队在高加索的侵略行动，并宣布废除与土耳其缔结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苏维埃的照会中列举了奥斯曼政府破坏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的事实，最后指出：

“奥斯曼政府在过去的半年中，不顾苏维埃政府的屡次抗议，不断地破坏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现在，除此而外，它终于又侵占了俄罗斯共和国的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并使它遭到骇人听闻的破坏。奥斯曼政府以此表明：俄国和土耳其之间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已经不存在了。俄罗斯联邦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不得不认为：奥斯曼政府的行动事实上已废除了建立俄国和土耳其两国之间和平关系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

在这以前几天，土耳其在欧洲和亚洲遭到了惨重的失败：9月15日，由弗兰士·戴斯帕列指

挥的盟国军队突破了马其顿的土保阵线。9月18日，由阿林比指挥的英军在巴勒斯坦的那布鲁斯附近击溃了土军，并且给自己开辟了前往大马士革和阿勒颇和进而前往叙利亚北部的畅通无阻的道路。

土耳其军队中的瓦解状况变成了普遍现象。士兵们，甚至有很多军官都带着武器从前线逃走。这已经不是一般的开小差。“逃兵”的人数超过了前线士兵的人数。现在是整批部队，有时是全部人员携带步枪、机关枪和其他武器从前线逃走。68 这种“临阵脱逃”的政治性质就连最高统帅部也感觉到了。李曼·冯·散德斯在给奥斯曼帝国总参谋长冯·塞克特的报告中写道，在以前的战争中，在土耳其是几乎没有临阵脱逃的现象，因此，不能认为它是“土耳其军队传统的缺陷”。有些地区完全控制在逃兵们的手里，1918年9月，“逃兵”占领了班兑马城，殴打德国军官，要求立即缔结和约。

国内的危险局势使苏丹和青年土耳其党人的上层分子异常不安。土耳其政府了解到问题是要导致革命的，因而急如星火地力求缔结停战协定。

为了谈判易于进行，当时曾改组了内阁。泰拉特和恩维尔辞去了自己的职务。“无党派的”但毕竟是接近青年土耳其党人的阿赫美特·伊塞特巴夏担任了宰相。他公开地宣称，“反对英国的战争是一种罪恶行为”，并且请求被土耳其俘虏的英国将军陶斯亨特做调停人。最后，1918年10月30日，在停泊于摩德洛司（爱琴海上）的英国巡洋舰“阿哈梅隆”号的甲板上签订了停战协定，这样土耳其就完全向战胜者投降了。

例如，停战条件规定：开放达达尼尔和博斯普鲁斯海峡，协约国的军舰可以自由进入黑海；盟国以军事力量占领海峡的要塞、塔夫尔的隧道，“如一旦在某一亚美尼亚的省里发生混乱时”，盟国则占领亚美尼亚各省，“如一旦情况威胁到盟国的安全时”，盟国则占领任何一个战略据点；立即复员土耳其军队；交出全部军舰；土耳其在阿拉伯、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等地的驻军全部投降盟国；委派协约国军官监督铁道、电报局和广播电台；立即把全部战俘交给盟国等等，虽然土耳其的俘虏仍然受盟国的支配。

土耳其站在德国一边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就

是这样悲惨地结束了。把土耳其拖入这次战争的德国人急急忙忙地撤退了。恩维尔、泰拉特以及惹起这次灾祸的其他青年土耳其党人的罪魁祸首地逃跑了。泰拉特巴夏在逃跑之前承认了“统一与进步党”委员会的政治破产。他在青年土耳其党的代表大会上说道：“我们的政策遭到了失败。因此，我们以任何形式来保存政权都是不可能的了。”

奥斯曼帝国寿终正寝了。

第二章

安纳托利亚的民族解放 运动和独立战争

69

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土耳其的结果

德国人及其青年土耳其党人附庸的主宰一切，使土耳其完全破产了。早在1913年至1914年间，国家就遭到了重大的困难，因为在世界大战之前曾发生过的黎波里战争和巴尔干战争的震荡。但是，与1913年至1914年比较，土耳其的经济到世界大战结束时又暴露出了进一步的衰落。土耳其的播种面积（不包括各阿拉伯国家），在1913—1914年是六千四百万得留姆^①，而在1916年缩减到二千五百万得留姆。1917年，谷物播种面积才达到三千万得留姆，而以后却再没有继续

^① 土耳其亩，约等于一点五市亩。

扩大过。由此可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谷物的播种面积就缩减了一半以上。

1913年，土耳其的耕畜和商品牲畜共有四千五百万头。而到世界大战结束时则为一千九百万头。并且牡牛和水牛——即农民经济最重要的牵引牲畜——的总数缩减得最为厉害。这类牲畜在1913年是二百七十万头，而到世界大战结束时总共只剩下三十八万头。所以，无怪乎在没有一个具有劳动能力的成年男子的安纳托利亚，常有老农用他剩下的唯一的犍牛和自己的女儿来拉犁耕地的景象。

在世界大战的年代里，烟叶的收获量由四万九千吨缩减到一万八千五百吨，棉花由二万四千吨缩减到两千吨。对土耳其国民经济很重要的一些作物，象葡萄干、无花果等等的收获量也急剧地下降了。在大战开始时，收获的葡萄干有六万二千吨，而到大战结束时仅收获二万五千吨。

德国人所设立的“煤矿局”甚至都没有保证德 70
军指挥部的直接需要。煤的开采量急剧地下降了：从1913年的八十至九十万吨下降到1917年的十

四万吨。

土耳其的国债(外债和内债)在世界大战期间增加了两倍:由一亿五千三百六十万里拉增加到四亿六千五百七十万里拉。奥斯曼政府的财政大臣查维德贝伊在国会里发言时说:这些数字是“巨大而惊人的”。一半以上的债务(两亿五千二百六十万里拉)是德国人所给予的借款,并且主要的不是现款,而是武器,或者是德国国库的纸币。可是,奥斯曼帝国1916年至1917年的全年预算大约为两千一百万里拉,并且预算的收入只是在纸上的数字而已:收入实际上只有一千九百万里拉,支出不是预算表上所规定的三千二百万里拉,而是七千五百万里拉。由此可见,一年的赤字表面上载明为一千一百万,而实际上则为五千六百万里拉。

物价越来越贵。食品价格更特别地高涨了。即使不以因外国占领而使土耳其粮食情况发生恶化的1918年为例,而以1917年为例,就在这种情况下,物价也是大大地上涨了。例如,一奥克^①

① 一奥克约等于一点二五公斤。

面包在 1913 年值一点二五皮亚斯特，而在 1917 年就涨到十六皮亚斯特。一奥克肉的价格在同一时期由十皮亚斯特涨到三十皮亚斯特，大米由三皮亚斯特涨到四十五皮亚斯特，黄油由十六涨到二百皮亚斯特。1918 年，食品的价格更高了，例如：一奥克肉已经卖到一百三十皮亚斯特，大米卖到九十皮亚斯特，糖为二百皮亚斯特，黄油为四百皮亚斯特。这时，每个工人每天的平均工资是十五到五十皮亚斯特，而应征参军的军人家庭每天得五皮亚斯特。当然，广大的居民阶层只好过半饥饿的生活。一个工人的一餐普通“午饭”是一块面包、一个葱头和一撮橄榄。

但是，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并没有改善农民的物质福利，因为所有的利润都流入了什一税的包税人、投机商人和高利贷者的口袋。贷款收购农产品的农业银行和战时设立的其他国家银行也捞到了一些东西。此外，农民所需要的工业品的价格也暴涨起来。一普特重的一桶煤油，战前价值十六皮亚斯特，在战争的头几年卖五十皮亚斯特，以后卖一百皮亚斯特，而在罗马尼亚参战后就卖到二百五十皮亚斯特了。

青年土耳其党人首领们的肆无忌惮的投机倒把行为，在这种背景上更显得可恶之极。建立垄断公司似乎是为了反对物价腾贵和投机行为，而其实是为了个人发财致富。这些公司的老板都是著名的青年土耳其党人。查维德贝伊在国会里坦率地说：“现在我们对做买卖都有了嗜好。”

在伊斯坦布尔建立了“爱斯纳夫·詹米也蒂”组织。这在字面上是：“手工业者协会”或“小商人协会”，但实际上却是买卖食品的垄断公司，也就是操纵首都居民生死的组织。该公司的老板是青年土耳其党人著名活动家之一、“统一与进步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卡拉·基马尔。他本人靠这事大发横财，并使自己的亲信也发了财。有一次有人提出要他报告公司业务的帐目，他说利润总共只有几十万里拉。虽然大家都知道，除了已经分出的股息外，这时在公司的钱柜中还有四百万里拉。粮食大臣伊斯麦尔·哈克（浑名“跛子”），青年土耳其党半官方报纸《回声报》编辑胡赛因·詹希德（现在姓雅尔琴），著名的记者阿赫美德·艾明（雅尔曼），以及青年土耳其党许多其他大大小小的活动家的贪图私利和投机倒把行为，都是人所

共知的事实。投机分子厚颜无耻地夸耀自己的发财致富。新公司在伊斯坦布尔排成了整整的一条街坊。这些房子都是靠从事沙糖、煤炭和甚至空麻袋的投机而获得的利润所建成的，并且直到现在还保留着具有特征的名称，如：“糖宫”，“煤宫”和“袋子宫”等等。但是谁也不敢反对投机分子。当青年土耳其党人运动的一位元老、上议院议长阿赫美德·里萨对伊斯坦布尔市长提起控诉，谴责他进行投机倒把活动时，阿赫美德·里萨就被拘押了二十四小时，此后，他就再不敢反对投机分子了。

同时，在战争期间土耳其发生了这样一个重要的变化，即经济生活中心从伊斯坦布尔转移到了安纳托利亚。

世界大战使土耳其的对外贸易受到了重大的打击。土耳其的进口在1913年达到了四千二百万金里拉，而在1918年只不过是四百七十万金里拉。出口也相应地由二千一百万降到五百五十万金里拉。因此，买办——进出口商——就开始丧失他们原有的势力。他们向往着投机行为，但这并没有巩固他们在土耳其国民经济中的作用。

同时，内地（安纳托利亚）资产阶级的作用也开始加强起来了，他们先前完全没有从事过对外贸易，而且在工业中的地位也是很弱的。土耳其的工业基础一般是很薄弱的。如上所述，领事裁判权制度和各资本主义国家保存土耳其封建和半封建关系的共同企图，妨碍了土耳其工业的发展。1913年的“奖励工业法”和特别是1915年的修正案对工业发展曾稍有推动，因为修正案规定只有“奥斯曼的自然人和法人”才能享受该法令的优待（但在“奥斯曼”的公司中，大多数公司只在名义上而不是在资本的构成上是奥斯曼的）。就是根据1915年的调查，土耳其总共只有二百八十二个企业，主要是纺织工业和食品工业，即总共比1913年多十三个企业（同时，经过调查的企业在1913年开工者为90%，而在1915年仅仅是69%）。这些企业中的工人总数约为一万七千人。即使在这里加上调查时未计算在内的工人，即加上运输、煤矿和其他工业部门的工人以及租让企业中的工人，那末土耳其无产阶级的人数在世界大战前夜和战时仍然没有超过六至七万人。而且，工业企业有75%都集中在伊斯坦布尔和伊兹密

尔，而在安纳托利亚内地则特别少。

世界大战期间，情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第一，安纳托利亚的商业资产阶级、地主和部分的农业中剥削阶级上层分子，因向德国和奥地利输出农产品而加强起来了。这种输出实质上是无情地榨取土耳其的原料，但这对土耳其内地资产阶级却是有利的，因为它第一次获得了通向国外市场的途径。第二，一些小企业在安纳托利亚已建立起来了，它们的建立根据战时条件是有必要和可能的：土耳其急剧地缩减了国外商品的进口，因而便需要自己想办法。另一方面，国防上的利益要求建立供应军队的企业，如制造鞋类的制革业和制造军用呢绒的纺织业等等。根据战时条件，73 这些企业都没有建立在港口城市，而是建立在安纳托利亚。在战时，领事裁判权制度实际上至少已不再适用于敌国臣民，也就是说不适用于大多数的外国租让者，这种情况也有助于安纳托利亚资产阶级势力的加强。

因此，安纳托利亚资产阶级就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和提出自己的要求。安纳托利亚资产阶级在战时就曾对德国的横霸势力进行过斗争，虽

然是非常微弱的。例如，土耳其商人曾要求对输往德国的商品建立监督，并争取建立一个出口委员会。它的活动并没有给土耳其带来良好的结果，因为德国人仍旧在榨取原料。虽然如此，但这个以及诸如此类的事实毕竟标志着安纳托利亚资产阶级的比重有一定的增长。

大战结束后，安纳托利亚资产阶级是不能容忍在今后丧失既得地位的。它不希望回到以前那种既没有利润也没有独立自主性的地位。相反地，它力图发展自己本国的资本主义。后者虽然规模不大，但却表现出了日益增长的趋势。协约国要消灭土耳其国家存在的企图，推动了安纳托利亚资产阶级走上反帝斗争和民族革命的道路。

二 协约国在近东的政策。 土耳其的被占领

在摩德洛司停战协定签订以后的头几个月里，甚至头两年中，协约国都认为土耳其问题是国际政治中的简单问题之一。无论如何它们都没有预料到：在土耳其能够出现一种必须予以重视

的力量。战胜国觉得：这个备受压迫和贫穷的国家的命运完全要由它们来决定。

那时，英国在协约国的近东政策中起着领导作用。劳合·乔治利用了他在“四大国”中对自己伙伴所占的不可辩驳的优越地位。英国的目的是瓜分土耳其。英国政府从这样一个仿佛很明显的情况出发，即“病夫”（人们通常是这样称呼旧土耳其的）终于死亡了，而且是死在最有利于英国的时候。的确，国际局势也是非常有利于英国计划的。沙皇俄国是英国在近东的老敌，它的政策过去经常和英国发生矛盾，这个国家现在已不复存在了。而苏维埃俄国在英国人看来则过于软弱，不足重视。并且，协约国的政策的整个方针那时具有尖锐的反苏性。那就是武装干涉和公开支持白匪的政策。由于几个协约国家在这个反苏政策中意见一致，因而英国在自己的近东计划中便也能利用既成的局势。 74

对英国有利的另一个情况是，法国在解决对法国人来说更为重要的政治问题——如德国赔偿、萨尔区和来因问题——时要依靠英国的支持；为了争取这种支持，克里孟梭准备把在近东

的优先地位让给英国人作为报酬。

至于说到美国，那么与亚美尼亚人以及希腊人买办资产阶级有联系的美国资本家集团，早就有瓜分土耳其的念头，虽然威尔逊在自己的“十四条”中宣称：土耳其本土仍归土耳其人所有，——实际上他并没有反对英国的计划，并打算利用它来达到自己的帝国主义目的。

意大利无论在欧洲或是在近东事务中都处于从属地位。根据战时签订的秘密条约，它将获得一些土耳其领土，但英国认为，违背这些诺言是不会担什么特别风险的。

但主要的是，到世界大战结束时，无论法国或是意大利，在近东几乎没有武装力量，美国就更不用说了。英国军队已经决定了在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土耳其战线的命运。在土耳其水域英国海军占统治地位。所以，当瓜分土耳其的时刻到来时，英国是最强的，而且是处在“近水楼台”的地位。它认为可以完全忽视自己盟国的利益，摒弃萨伊克斯—皮柯协定及战时协约国之间签订的其他条约。甚至表面上以所有协约国名义签订的摩德洛司停战协定，事实上也是由英国海

军上将卡尔托普口授给土耳其人的。英国人干脆不让法国代表到签订停战协定的英国军舰上来。而法国的多次抗议没有获得任何结果。

英帝国主义者在近东的胃口确实很大。在二十世纪初，担任印度总督的寇松勋爵声称，“印度的边界是在幼发拉底河上”，现在新的要求又补充了寇松的这一论点。从今以后，按照寇松的理解，75“印度的边界”不仅要扩大到巴格达、摩苏尔、开罗和喀土穆，而且扩大到了喀布尔、德黑兰、伊兹密尔和伊斯坦布尔。英国除了武装干涉苏维埃俄国以外，还打算掠夺巴库的石油，对阿富汗和伊朗建立保护制，从印度到波斯普鲁斯海峡建立起连成一片的英国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地带。在这一体系中，伊斯坦布尔应该成为第二个直布罗陀，而安纳托利亚应该成为第二个埃及。

但是，为了实现整个这一庞大的计划，首先就必须瓜分土耳其。英国在土耳其领土上驻扎自己的占领军已经不可能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整个局势要求尽快地复员英国的军队。此外，英国人还必须在下列地区驻扎军队，即在他们想使之处于自己保护下的伊朗，在当时奋起捍卫自

己独立的阿富汗边境，在居民要求使他们有权独立决定自己命运的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因此，英国人认为最好的出路就是把土耳其分裂成几块，其中每一地区本身都不能独立存在，并且它们将处于英国仆从的有名无实的统治之下，或由完全依赖英国的当地傀儡政府来管理。

摩德洛司停战协定使英国在这方面有了广泛的机会。根据停战协定的条件，达达尼尔海峡允许协约国军舰自由航行。“一旦亚美尼亚六省之中有一省发生混乱时”，协约国军队有权占领它们，“一旦情况威胁到盟国时”，协约国军队就有权占领土耳其任何一个战略据点。

但是英国人甚至不打算理会他们亲自迫使土耳其人接受的摩德洛司停战协定。在签订停战协定时，土耳其政府海军大臣胡赛因·饶夫贝伊曾三次询问海军上将卡尔托普：英国是否将遵守这些即使对土耳其是如此苛刻的条件。卡尔托普的三次回答都是肯定的。但事实上简直在第二天协定就开始遭到破坏。驻巴格达的英军司令要求土耳其人立即撤出摩苏尔以及“整个伊拉克”。摩苏尔的土耳其司令官引证理由说，摩苏尔从来就没

有被认为是伊拉克的一部分，而且它也不是在停战之前被英军占领的，它应该仍旧归土耳其所有。对此，英国的将军便送去了一张地图，图中伊拉克的版图（象英国人所绘制的那样）不仅包括摩苏尔和整个摩苏尔省，而且还包括安纳托利亚东南部的很大一部分，其中狄雅巴基尔也在内。同时英军司令部又采用了武力。英军越过了他们在签订停战协定时所保持的界线，1918年11月8日英国的国旗就飘扬在摩苏尔省政府的上空了。

70

在亚历山大勒塔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件。到停战时，土耳其人还把这个重要的战略据点保持在自己手中。穆斯塔法·基马尔将军在这里指挥着土耳其军队。他反对英国海军陆战队在亚历山大勒塔登陆，并将此事电告了伊斯坦布尔。宰相阿赫美德·伊塞特巴夏命令基马尔立即停止对英军的抵抗。不错，宰相也承认：根据停战条件，英国人没有权利占领亚历山大勒塔。但是，正象宰相的电报中所说的，英国驻伊斯坦布尔代表已答应把停战协定的某些其他条款作有利于土耳其的订正。阿赫美德·伊塞特写道：“为了换取这种绅士气魄，我们应给英国人一点面子，允许他们利

用亚历山大勒塔来运输粮食和军事物资。”穆斯塔法·基马尔回答说，这里完全与运输无关。他指出，英国人的目的是强占亚历山大勒塔区，以便进一步侵犯基里基亚和安纳托利亚。基马尔声明说，在这种情况下他将辞职，最后他用以下的话结束了自己拍给宰相的电报（1918年11月6日）：“我荣幸地报告，我是没有适当的委婉态度来既尊重英国代表的绅士气魄，又要以上面指示的殷勤态度来答复他的。”

苏丹政府卑躬屈节的顺从，使英国人易于实现他们自己提出的任务。英国军队占领了亚历山大勒塔（后来，亚历山大勒塔和基里基亚让给法军占领了）。意大利人占领安塔利亚（亚达里亚）及其邻近地区，直到科尼亚。英国的代理人在“独立”的口号下在库尔德斯坦策动了库尔德人的暴动。英国人答应把色雷斯交给希腊人。在萨姆松和特拉布松两地曾有成立希腊人的“黑海国家”的打算。英国在小亚细亚东部扶助了亚美尼亚的反革命分子——达什纳克党人，挑拨他们去同土耳其人冲突，加深亚美尼亚—土耳其的纠葛。最后，在1919年5月15日又曾发生了一件使土耳其特

别痛心的事件：希腊军队按照“四大国”的决定在伊兹密尔(士麦拿)登陆了。伴随着占领而来的是对土耳其居民的蹂躏、屠杀和奸淫。

希腊人占领伊兹密尔对土耳其人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伊兹密尔是一个大城市和重要的港口；伊兹密尔省和邻近的亚伊丁省都拥有各种重要的原料、粮食产品和许多工厂。失掉这些地区使土耳其遭受了巨大的物质损失。打击之所以更为严重，还因为占领者正是希腊人；在这些地区住有许多希腊人，所以希腊所抱的野心就不是临时的，而是经常的占有它们。不容置疑，从此以后希腊人和土耳其人在安纳托利亚就不可能继续和平相处了。正因为如此，所以伊兹密尔的被占领也就是土耳其民族解放力量的武装发动的直接推动力。1919年5月末，针对希腊占领者的第一枪在亚伊伐力克(在伊兹密尔以北)打响了。土耳其游击队总共有六百人。土耳其争取独立的战争开始了。这不仅是反对希腊，而且是反对协约国、首先是反对英国的战争。

后来，当英希两国反对土耳其的武装干涉以破产而告结束时，英国帝国主义的辩护人曾企图

证明说：英国在占领伊兹密尔问题上起了消极作用；一切都要归咎于希腊首相维尼塞洛斯——“克里特的海妖”。就是他“迫使”协约国最高委员会作出了危险的决定，并“用自己的手腕和说服人的手段把劳合·乔治迷惑住了”。英希两国在小亚细亚的冒险行为一开始就不利于法帝国主义者，但后者也完全不能解释他们为什么同意这种冒险行为。例如，法国的政论家和历史学家雷内·格鲁赛肯定说法国不过是“醉心于回忆”古代文化，又说“在1919年春季这些具有决定意义的日子里，后期希腊文明的代表人物是……忒密斯托克利^①和伯里克里斯^②”。

实际上，维尼塞洛斯也不过是协约国领导者的意志的执行人，主要是劳合·乔治的意志的执行人。英国人（包括劳合·乔治本人在内）后来想用选择执行人不当为理由来解释小亚细亚冒险行

① 忒密斯托克利（公元前约514—449），古希腊雅典的名将、政治家。在希腊—波斯战争中曾立大功，他极力主张扩大海军，建立雅典海上霸权。——译者

② 伯里克里斯（公元前495—429），雅典大政治家，公元前461年执政，大兴海军，是希腊极盛时代。——译者

为破产的企图，是没有任何根据的。从英国的利益来看，英国所作的选择并不坏。“在1919年春季这些具有决定意义的日子里”，希腊是实现英国计划的最适当的工具。它拥有较有生气的军队。希土两国旧日的民族纠葛，使英国人和维尼塞洛斯有可能唆使安纳托利亚的希腊人去反对土耳其人，并能造成一种印象，仿佛斗争是为希腊的民族理想而进行的。同时英国也知道，希腊在占领伊兹密尔以后也不会加强到足以摆脱顺从地位的程度。这方面的保证，是希腊在经济和财政上对英国资本的依赖，是希腊这个半岛国家和岛国易受英国舰队的侵袭（由于又获得了一个沿海地区，这种侵袭机会只会有增无减）。因此，希腊扮演英国所需要的陆上力量的角色比任何其他一个小国都好，这种力量既要绞杀土耳其，而本身又要处于英国海军的压力之下。 78

英国的失算并不在于它选择了一个不能奏效的工具来达到既定的目的，而在于这个目的本身是不能达到的。作为协约国政策的出发点的主要前提就是有缺陷的：确信土耳其人没有反抗的力量。帝国主义列强只看到了一个土耳其——官方

的土耳其、苏丹和宰相们的土耳其。这个土耳其确实是衰弱无力的。但还有另外一个土耳其——人民群众的土耳其，而协约国就是看不到它，也不了解它。

帝国主义者是没有注意到整个现代史上一个最重要的政治因素——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并且，这个因素在土耳其民族解放运动的发生和发展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三 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对土耳其的影响

由于俄国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结果，“……出现了处在西方和东方之间，处在世界财政剥削中心和殖民地压迫舞台之间的强大的苏维埃国家这样一个新因素，单是这个国家的存在就能使全世界革命化。”^①

这个新因素对土耳其民族解放思想的形成起了巨大的影响。不管苏丹和德国的，以后还有协约

^①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344页。

国的书报检查机关如何横行霸道，关于俄国所发生的事件的消息还是传到了土耳其。早在1917年3月，在安纳托利亚东部的一个偏僻角落的名为乌舍的小地方，曾庆祝俄国工农推翻了专制政体。土耳其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都感觉到，废除沙皇制度的消息是和平快要来临的标志。当俄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而奥斯曼帝国正趋于军事和政治破产时，土耳其人民的广大阶层都认定苏维埃俄国是唯一的希望之光。土耳其的士兵——同 79
俄国革命军队在高加索战线进行过联欢的人，从俄国回去的战俘，从德国回国的土耳其工人（其中很多人都成了斯巴达克同盟盟员）——他们都讲述在沙皇俄国建立了崭新的工农国家，它摒弃了掠夺计划，向殖民地和半殖民的被压迫民族伸出了友谊和援助之手。苏维埃政府的最初一些对外政策措施——和平法令，列宁和斯大林的《告俄国和东方全体伊斯兰教劳动人民书》，关于“土属亚美尼亚”的法令，俄国军队退出伊朗等，对土耳其人产生了强烈的印象。

苏维埃政府提出了完全崭新的对外政策原则。俄国放弃了沙皇政府的掠夺政策，摆脱了自

己盟国的支配，向近东各国发表了友好的声明。1917年11月8日，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和平法令就已经声明说，沙皇政府以及临时政府签订的一切秘密条约“无条件地立即”废除。这样一来，有关土耳其和亚美尼亚的条约就被废除了。由列宁和斯大林签署的1917年12月3日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人民委员会《告俄国和东方全体伊斯兰教劳动人民书》，说得更为明确。该书宣称：“我们声明：由已被推翻的沙皇所签订的而又为已被推翻的克伦斯基所确认的关于侵占君士坦丁堡的秘密条约，现在已被撕毁和废除了。俄罗斯共和国及其政府——人民委员会反对侵占他人土地。君士坦丁堡应该留在伊斯兰教徒手中。我们声明：关于瓜分波斯的条约已被撕毁和废除了。一当军事行动停止，俄军即撤出波斯，并保证波斯人有权自由决定自己的命运。我们声明：关于瓜分土耳其和从土耳其手中‘夺取’亚美尼亚的条约已被撕毁和废除了。一当军事行动停止，亚美尼亚人自由决定自己政治命运的权将得到保证。”

1918年1月11日，列宁和斯大林签署了关

于“土属亚美尼亚”的法令。其中声明：苏维埃政府赞助“土属亚美尼亚”的亚美尼亚人自由的自决权，直到完全独立为止，并且，为了保证亚美尼亚人民全民投票的自由，必须从土属亚美尼亚境内撤出一切军队，而散布在各国的难民或土耳其当局在战时强迫迁往土耳其内地的难民——亚美尼亚人，应不受阻挠地返回祖国。 80

在摩德洛司停战协定签订后，协约国军队侵入土耳其就愈益明确地指出了帝国主义者的政策和苏维埃俄国政策之间的区别。对“布尔什维克”的同情心不仅在土耳其的劳动人民中，而且在土耳其的商人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都增长起来了。

这种强有力的因素决定性地改变了土耳其的国际形势，使土耳其民族解放运动的发生和以后的顺利发展成为可能。正是由于这种原因，所以“帝国主义国家对土耳其的掠夺已经引起土耳其的反抗，由于这种反抗迫使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收回自己的魔掌。”^①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2卷，第139页。

土耳其人民争取自己独立的斗争，对东方其他各国的人民也具有重大的意义。这种斗争是这样的一些因素之一，这些因素把民族问题“……由局部的和国内的问题变成了一般的和国际的问题，变成了附属国和殖民地被压迫民族摆脱帝国主义桎梏的世界问题。”^① 斯大林同志在俄共（布）党第十次代表大会上谈到民族问题的扩大和变化时指出：“其次第二个因素是各帝国主义集团瓜分土耳其并且使它亡国的尝试，这一因素使民族问题扩大和发展成了整个殖民地问题，使它由解放运动的星星之火变成燎原烈火，蔓延到全球各地。土耳其在国家制度方面是伊斯兰教民族中比较发达的一个国家，它不堪忍受这种前途，于是就举起了斗争的旗帜，把东方各民族团结在自己周围来反对帝国主义。”^②

① 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 1971 年版，第 51 页。

②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 5 卷，第 30 页。

四 安纳托利亚民族 解放运动的产生

在摩德洛司停战协定签订后，土耳其人民运动就立刻爆发了。它是在安纳托利亚发生的，当时外国占领者还没有侵入土耳其的这一部分，并且在这里很早就形成了土耳其民族的主要核心。这一运动的主要动力是农民。起初，农民的发动带有自发性质，实质上是表示对封建地主压迫的抗议。在1918年末和1919年初，农民游击队员在许多场合下曾同宪兵进行武装斗争，同时把他们看作自己直接的、眼前的敌人。可是，外国军队的侵入便把这一斗争转移到了民族的轨道上。国家的最主要地区被外国占领，给农民带来了新的负担、新的破产和外国掠夺者的横暴行为。以前在俄国边境地区以及在伊斯坦布尔和伊兹密尔等地谋生的很多农民，由于战争和占领而丧失了这种生活来源。 81

希腊军队占领伊兹密尔，严重地影响了郊区的土耳其农民。他们的土地甚至自身生命都有完

全丧失的危险。希腊人的统治对土耳其农民来说乃是真正的灾难。希土两国从前在安纳托利亚就存在着深刻的纠葛。希腊人的资产阶级依靠“领事裁判权条款”和外国庇护，在奥斯曼帝国享有各种特权，因此，这种纠葛也就加强起来了。希腊人的买办廉价地收买尚未收割的土耳其农产品；希腊人的高利贷者则因债务关系而出卖土耳其农民的最后一点财产；外国人从希腊人中招收奥斯曼债务管理处、租让企业和垄断组织的代理人。此外，在伊兹密尔地区还有不少希腊地主，他们拥有大量土地，残酷地剥削土耳其农民。当然，安纳托利亚的希腊农民遭受本国和土耳其地主、高利贷者、富农的压榨，也不亚于土耳其农民。但是，两国资产阶级和各大国帝国主义者巧妙地煽动起来的民族纠纷，却把土耳其和希腊的农民分成了两个敌对的阵营。土耳其农民认为，一切希腊国民都是自己的敌人。

同时，对土耳其民族运动命运极其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农民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土耳其工人阶级当时人数还太少，政治上还过于软弱，不能成为运动的领导者。它没有战斗的政党。多少

聚集一些工人阶级群众的主要工业中心，如伊斯坦布尔、伊兹密尔、阿达纳等地，在民族革命一开始时就被占领了，所以他们未能积极地参加民族斗争。尽管占领，这些地区的工人当然还是帮助了安纳托利亚的运动，例如：伊斯坦布尔的码头工人和船夫曾把武器秘密地运往安纳托利亚；租让企业中的工人举行了罢工；志愿人员一个一个地经过秘密途径来参加安纳托利亚的游击队。但这仅仅是援助，而不是领导。 82

因此，在没有先进阶级领导的情况下，农民自发的发动就未具有土地革命的性质，而很快地转入反对外国掠夺者的民族斗争轨道上的农民，在这一斗争进程中却未能实现、甚至未能提出(除了个别孤立的发动以外)自己直接的阶级要求。

结果，以全民利益代表者资格出面活动的安纳托利亚资产阶级就领导了民族解放运动。在世界大战年代里这个资产阶级巩固起来了，并成为一股严重的政治力量。经济发达的地区——伊斯坦布尔、伊兹密尔、基里基亚及其他地区——之被侵占，不能不引起资产阶级的坚决反抗，因为安纳托利亚资产阶级所面临的实际威胁不仅是

丧失这些地区，而且是整个土耳其国家的灭亡。

在摩德洛司停战协定签订后，资产阶级的民族组织开始出现于全国各地。它们具有各种名称，如：“反对兼并”、“国民大会”、各种的“联盟”、“委员会”、“同盟”等，但在各个地区最常见的是“护权协会”这个名称。起初，民族组织都具有极温和的性质。土耳其资产阶级，特别是大资产阶级还对苏丹抱有希望，而且还受“威尔逊幻想”的支配。例如，伊斯坦布尔的民族组织主要是从事于发表文章，阐述土耳其人对土耳其领土的权利，向协约国的代表发出呼吁，恳请苏丹召开国会等等。代表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许多伊斯坦布尔的活动家，都主张接受美国对土耳其的委任统治。他们之中有记者阿赫美德·艾明（雅尔曼），女作家哈里德·艾迪布等人。

甚至比伊斯坦布尔的组织较为激进的安纳托利亚民族资产阶级的组织，也没有立刻参加农民的武装斗争。安纳托利亚资产阶级一度曾采取观望态度，等待运动规模得到确定的时机。现代土耳其作家之一——布尔汉·查希得——在其所著《伊兹密尔的故事》中，用以下的话描述了在希军

登陆伊兹密尔前夜所发生的事件：“伊兹密尔的大街上聚满了人群。人们发表演说。黑夜降临了。居民在退伍军人领导下袭击警察管理的军火库，夺取了步枪和军需品。以后人群拥向军事监狱，释放了因对外国人表示不恭和各种政治罪而被逮捕的政治犯。” 83

早晨来临了。决定的时刻迫近了。在城内进行抵抗已不可能。大家拿着武器就匆忙地赶出城外。军团司令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保卫城市。相反地，他为了制止年青的军人发动起来，便命令他们不得离开兵营。尽管如此，仍有很多人武装起来离开了城市。”

由此可见，在最初时期资产阶级仍然阻止人民运动。但等待的时期并不长久。对苏丹政府和协约国的“宽宏大量”所抱的希望很快地就幻灭了。另一方面，农民反对占领者的声势浩大的自发的发动表明：在土耳其本国是有着反击帝国主义的强大基础的。安纳托利亚资产阶级参加了人民运动，并变成了它的领导者。

安纳托利亚运动的这一特点后来引起了严重的后果。安纳托利亚资产阶级由于领导了民族革

命，所以就能限制反帝斗争的范围，阻止它过渡到更高阶段。斯大林同志指出：“基马尔式的革命，只有在象土耳其、波斯、阿富汗这些没有或几乎没有工业无产阶级、也没有强大的农民土地革命的国家内，才有可能。”^①因此，它，基马尔式的革命就“停留在‘第一步’，停留在自己发展的第一阶段即资产阶级解放运动的阶段，甚至不打算转入自己发展的第二阶段即土地革命阶段。”^②

五 穆斯塔法·基马尔和 民族政权的组成

土耳其的爱国知识分子，主要是其中的军人阶层，是安纳托利亚资产阶级思想的传播者和反帝运动的组织者。土耳其人民的民族斗争的领导者——穆斯塔法·基马尔就是出身于这些阶层的。土耳其资产阶级民族革命便按他的名字而称为基马尔革命。

^①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231页。

^②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16页。

1880年，穆斯塔法·基马尔生于萨罗尼加的一个不大富裕的土耳其资产阶级家庭中。基马尔在受完中等和高等军事教育后，也象土耳其其他许多军官一样，还在青年时就在伊斯坦布尔总参谋部的学院里参加了青年土耳其党人运动。1905年，他在该学院毕业时就被逮捕了，后来被派到大马士革(叙利亚)去服役。他在这里建立了一个“为祖国和自由”的革命组织，进行反对阿布杜尔·哈密德政权的宣传，和马其顿青年土耳其党人建立了联系(为此他曾非法地去过萨罗尼加)，而从1907年起，当他一调到马其顿后，便同自己的组织一起加入了“统一与进步”党。基马尔积极地参加了1908—1909年的革命事件。他担任过“行动军”的参谋长，这支军队是1909年4月为了镇压阿布杜尔·哈密德所策动的反革命叛乱而组织起来的。但不久他却同青年土耳其党委员会的上层分子发生了意见分歧(基马尔特别是同恩维尔结下了仇恨)，于是就完全献身于军事了。基马尔在的黎波里战争和巴尔干战争的前线上战绩卓著，后来担任了驻保加利亚的武官。在土耳其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又被派到作战军中工作。

1915年，由于顺利地保卫了达达尼尔海峡，使英军未能登陆，基马尔在军界获得了很大的名声。他的声誉使恩维尔巴夏感到不安。1916年，基马尔被派往高加索战线。在那里他获得了将军的头衔和巴夏的称号。1917年，他被调到叙利亚担任军长职务，这个军属于德国将军冯·法尔肯汉因指挥的“闪电”集团军。基马尔由于法尔肯汉因粗暴地干涉土耳其内政而同他发生争吵后，便到伊斯坦布尔去了。1917—1918年的冬天，如前所述，基马尔曾去德国，在那里他才确信：土耳其必须尽快地使自己摆脱对德国人的依赖关系。首先必须从政权中铲除德国的代理人——恩维尔和泰拉特。基马尔企图在这方面影响瓦希德丁，但却没有成功。瓦希德丁当了苏丹后，继续奉行使土耳其从属于德帝国主义的政策，而当基马尔直率地建议他撤销恩维尔副大元帅的职务时，瓦希德丁却把此事转告了恩维尔和泰拉特。基马尔接到了再度前往叙利亚战线的命令。1918年9月间基马尔到达了叙利亚。摩德洛司停战协定签订时他正在这里。

这时，英军正无理地向停战协定所规定的界

线以外推进，特别是向亚历山大勒塔进军，因此基马尔便企图促使土耳其政府抵抗英军，但在这个徒劳无益的企图失败以后，他便放弃了指挥职务，回到了首都。他在首都同军界人士恢复了联系，并企图激发苏丹和那时还存在的国会议员们的民族感，但这一切都是徒劳的。

穆斯塔法·基马尔并不是孤立的。其他一些 85
土耳其爱国者这时也在致力于组织对占领者的抗击。但在伊斯坦布尔，这种活动是注定要失败的。买办资产阶级过于懦弱。政府和苏丹对协约国卑躬屈节。城市实际上是在英国人的支配之下。但是，在安纳托利亚，民族解放运动这时已充分地展开了。在南方，土耳其农民对法国占领者展开了游击斗争。在东部各省，各民族组织都要求抗击希腊人和达什纳克党人的侵犯和挑衅。在安纳托利亚西部，许多土耳其军官也加入了农民游击队，准备对帝国主义者进行武装反抗。

穆斯塔法·基马尔懂得：只有在安纳托利亚才能组织民族力量来争取独立，即在土耳其民族的中心、离外国占领者很远、在已经展开了的游击运动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基马尔借朋友们之助

争取出差到安纳托利亚。他的希望既没有遭到苏丹的、也没遭到宰相达马德·费里特巴夏的反对。基马尔是倔强而坚忍不拔的。他本人和他的朋友们都要求为他在政府中谋一职位。但一个这样具有反对派情绪和这么有声望的将军之居留首都，使土耳其政府大为棘手。所以苏丹也就乐意地批准了派遣穆斯塔法·基马尔巴夏前往安纳托利亚做军队检查官的建议。只有土耳其政府的陆军大臣好象是预感到不妙，在最后时刻表示犹豫不决。他甚至想拒绝在发给基马尔的全权证书上签署，但却不敢违反苏丹的命令，结果只是如此漫不经心地盖上了自己的印鉴^①，以便使签字模糊不清。1919年5月16日，即希腊人占领伊兹密尔后的第二天，穆斯塔法·基马尔由伊斯坦布尔动身，于5月19日来到了萨姆松。

后来，穆斯塔法·基马尔对这时所形成的局势描述如下：“奥斯曼帝国所加入的集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战败了；奥斯曼军队到处遭受损失；按照苛刻的条件签订了停战协定。好几年的世界大战

^① 土耳其以前采用阿拉伯字母，所以当时流行着一种习惯，即在文件上签字时要用刻成的印鉴。

使得人民破产和疲惫不堪……把人民和国家引向世界大战的那些人，由于关心自己的生命而隐蔽起来了。瓦希德丁这个堕落分子占据着苏丹和哈里法的宝座，而他唯一关心的是要用卑鄙的手段挽救自己的生命和王位。以达马德·费里特巴夏为首的内阁既无力量，也无威信，又无勇气；他完全听从苏丹的意旨，并顺从地同一切足以保证统治者和政府成员安全的情况相妥协。

86

军队的武器和军需品继续不断地遭到剥夺。

协约国根本不认为需要遵守停战协定的条件。它们的军队和舰队在各种借口下驻扎在伊斯坦布尔。法军占领了阿达纳省；英军占领了乌耳法、马拉士、安泰布；在安塔利亚和科尼亚驻有意大利军队，在米尔则芬和萨姆松驻有英国军队。外国军官和官吏以及他们的私人走狗到处展开着积极活动。”

当基马尔到达萨姆松时，东部各省的许多城市也正象在西部一样，已经有各个地方的“护权”协会（即保卫民族权利协会）了。1919年6月间，在巴利克西尔（安纳托利亚西部）举行了民族组织的代表大会，会上提出了赶走希腊军队的要求。

但安纳托利亚西部的民族组织同东部各省却没有联系，而在东部各省中，护权协会也没有一个统一的中心。

穆斯塔法·基马尔担负起了统一民族组织的任务。他向全国发出了通知和电报，其中声明：“祖国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和民族独立正处于危险中”；“中央政府已不能履行自己的职责了”，所以必须召开一个“不受任何影响和控制的国民会议”。基马尔参加了早在他到达之前就已经开始筹备召开的东部各省护权协会代表大会。在基马尔的最初一些呼吁书中已包含了这样一点：“从今以后，伊斯坦布尔将不能再行统治安纳托利亚，并必须从属于安纳托利亚。”基马尔从容易受到英国舰队攻击的萨姆松转移到了安纳托利亚内地，经亚马西亚和西发斯而到达了埃尔祖鲁姆。

基马尔的积极活动引起了苏丹及其政府的不安。这时，即1919年6月，土耳其政府派遣了代表团出席巴黎和会，并希望借助于对协约国的唯命是听的态度而获得有利的和平条件。苏丹并不是为土耳其，而是在为自己寻求好处。他完全不打算保障国家的独立。相反地，苏丹却依次建议英

国、法国和美国承担起对土耳其的委任统治。他的希望是：在一个从属于西方帝国主义者的国家里实现自己封建的神权统治甚至更容易一些。他只是争取协约国把伊斯坦布尔和亚洲领土尽可能多的部分留在他的有名无实的主权之下。

安纳托利亚的运动，以及拥有很高军衔和苏丹授予的广泛职权的穆斯塔法·基马尔之参加这一运动，使土耳其政府的这些计划有遭受破坏的危险。英国人提醒苏丹政府注意，派往安纳托利亚的将军在鼓动反抗协约国，并要求把基马尔召回。因此，土耳其政府内务大臣阿里·基马尔贝伊便向安纳托利亚各省省长发出了通令，其中声称：“穆斯塔法·基马尔巴夏是一位伟大的统帅，但他对目前的政治不是很内行的”，“根据英国高级专员的请求和坚持”，他应从自己的岗位上被召回。接着，即1919年7月初，苏丹用电报向基马尔发出了命令，要他立即回到伊斯坦布尔。

但是，基马尔拒绝返回。这时，他对苏丹还保持着表面上的忠诚，同时为了不受军纪的约束，便提出了辞呈，并声明说：他将以一个公民的身分留住安纳托利亚。实际上，他通过这种决定把

自己的命运与民族运动完全联系在一起了。

指靠苏丹和土耳其政府保全国家完整的最后一线希望很快地就消失了。奥斯曼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遭到了彻底的失败。向协约国十人委员会陈述了意见的宰相达马德·费里特巴夏声称：自恩维尔政变以来（1913年），土耳其的全部政策都完全由青年土耳其党人支配；无论是苏丹或是土耳其都完全不能对这种政策负责。费里特断言，因此协约国不应该使土耳其担负过于苛刻的和约条件。费里特尤其强调指出，他的发言不仅代表土耳其人，而且还代表世界上三亿伊斯兰教徒；协约国如使土耳其承担苛刻的条件，就会同全体伊斯兰教徒发生冲突。但协约国以最尖锐的方式拒绝了这些要求仁慈的呼吁。协约国在其照会中指出：协约国认为，不能够“仅因土耳其的事务在其历史上最危急关头落在那些毫无道德基础……和甚至不会指挥的人的手中”，而解脱土耳其的责任。协约国也驳斥了费里特关于三亿伊斯兰教徒的声明，并以明确的语言指出：大家认为必须尽量多地削减土耳其的领地，因为，如照会所称，“无论在欧洲、亚洲或在非洲都找不到这样一个例

子，即土耳其对任何一个国家确立统治时没有降低该国的物质福利和文化水平”。照会最后指出：协约国自己还打算用些时间来讨论土耳其问题；奥斯曼代表团继续出席会议是徒劳无益的。照会最后建议奥斯曼代表团离开巴黎。

1919年7月中旬，代表团回到了伊斯坦布尔。达马德·费里特巴夏向报界发表了一篇假报告，隐瞒了代表团在巴黎所受的屈辱。但真实的消息还是传到了土耳其，而费里特歪曲真象的企图只是在国内加强了对宰相的蔑视。这时，以前人们对土耳其政府所抱的一切幻想都彻底地破灭了。安纳托利亚的民族组织深信，必须依靠的只有人民的力量。

1919年7月23日，东部各省护权协会的代表大会在基马尔的主持下在埃尔祖鲁姆开幕了。会上讨论的问题是：如何防止分割安纳托利亚东部和阻止在该地建立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的国家。基马尔在代表大会上发表的演说中，描述了土耳其的国际和国内的形势；他谈到了帝国主义者的掠夺计划，指出了伊斯坦布尔政府的束手无策，并强调说：人民必须自己为独立而斗争。基马尔

指出：土耳其在自己的斗争中并不是孤立的。他叙述了埃及、印度、阿富汗、叙利亚、伊拉克和阿拉伯的民族解放运动；他同时补充说：“俄罗斯民族由于感到危险威胁到它的独立，看到外国武装干涉者从各方面来侵害它，于是便一致奋起反对这些建立世界霸权的企图。”

埃尔祖鲁姆代表大会开了两个星期，直到1919年8月6日才告结束。大会所通过的决议和宣言载称：土耳其人民不允许安纳托利亚东部遭到瓜分和奴役。在代表大会上选举了以基马尔为首的“代表委员会”，它获得了在必要时成立临时政府的全权。实质上，代表委员会如果不是新土耳其正式的临时政府的话，那也是事实上的第一个临时政府。

89 同年9月4日至12日，护权协会在西发斯召开了代表大会，这时参加大会的不仅有东部各省的组织，而且有土耳其各地的组织。在埃尔祖鲁姆代表大会上，主要是讨论如何抗击在安纳托利亚东部领土上建立亚美尼亚人和希腊人国家的企图。而在西发斯代表大会上则讨论了全国反对协约国帝国主义者的斗争问题。所以西发斯大会不

是只限于确认埃尔祖鲁姆的各项决议，而且还通过了包括各种民族要求的广泛的纲领：国家的独立；停战协定界线以内的一切土地归土耳其所有；撤退占领军；土耳其有独立发展的权利；不准外国干涉；废除一切破坏民族主权的限制。西发斯代表大会决议的第一条载称：“位在协约国同奥斯曼帝国之间于1918年10月30日签订的停战协定的条款所确定的界线以内的全部领土，其大多数居民均为伊斯兰教徒，这片领土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这些地区的全体居民同样充满着团结一致和互相尊重的感情，鉴于现有的地理和民族条件，他们应该被认为是亲生兄弟。”大会参加者庄严地保证“竭尽全力甚至流尽最后一滴血来共同保卫自己祖国，使其免受任何的侵犯”。西发斯大会成立了统一的全土耳其的“安纳托利亚和隆美利亚护权协会”，来代替各个分散的地方委员会和在埃尔祖鲁姆建立的安纳托利亚东部护权协会。

西发斯大会选举了仍以基马尔为首的新的代表委员会。除了外国人占领的一些地区外，整个安纳托利亚实际上都服从这个委员会。

在西发斯代表大会行将结束时，苏丹政府和

英国人策动了库尔德人的暴动，以便驱散代表大会和逮捕其领导者。这一企图以失败而告终了。对此，代表委员会停止了安纳托利亚和伊斯坦布尔之间的邮电联系，并要求苏丹以享有全国信任的政府来代替费里特巴夏内阁。

基马尔党人这时并没有公开地反对苏丹本人。加入民族阵线的有各色各样的人物。为了争取恢复哈里法对整个土耳其的支配和保全自己的特权，伊斯兰教教会也附和了基马尔。一些著名的青年土耳其党人、将军、以前的大臣（如卡兹姆·卡拉贝基尔将军、前海军大臣胡赛因·饶夫等等）也和基马尔结合在一起，他们希望借助人民运动将能重掌政权。伊斯坦布尔的土耳其买办的某些代表，也对民族运动表示了同情，因为他们指望促使安纳托利亚和帝国主义列强进行妥协（他们诱劝基马尔党人接受美国的委任统治，甚至在西发斯代表大会上也在这方面作出了坚定不移的建议）。这些分子都热中于保留苏丹和哈里法制度。基马尔党人为了照顾他们，便放弃了对苏丹-哈里法这种“神圣人物”的攻击。此外，基马尔党人还害怕失去外国伊斯兰教徒的同情。所以基马

尔便集中火力攻击宰相，谴责他在苏丹面前“隐瞒真相”，妨碍君主和人民的团结。

实际上，苏丹瓦希德丁不仅知道宰相的行动，而且完全赞同这些行动，甚至还加以指导。达马德·费里特巴夏在苏丹的最高庇护下在伊斯坦布尔组织了一个英国之友协会。加入该会的有苏丹的官僚和反动的伊斯兰教教会的某些代表，但真正的领导者是费里特巴夏和一个姓福鲁的英国牧师。这个协会的正式任务是争取把对土耳其的委任统治权转给英国。协会秘密地进行破坏和恐怖活动反对基马尔党人，向安纳托利亚派遣奸细、破坏分子和间谍。同时在苏丹的赞同下，达马德·费里特巴夏同英国进行了关于委任统治权的谈判。后来，外国和土耳其的报刊甚至断言：在1919年9月间，费里特巴夏同英国人签订了一项秘密条约，其条件如下：英国取得对全土耳其的委任统治权；海峡归英国控制；土耳其放弃自己对埃及的一切权利；承认库尔德斯坦的独立，并负责以自己一切精神上 and 道义上的威信协助英国巩固在伊拉克、叙利亚和其他伊斯兰教国家的统治；委托英国组织土耳其军队；为了这一切，英

国政府同意在和会上保卫土耳其政府的利益^①。固然，英国对土耳其的委任统治方案反正是不会实现的。不用说这个方案对土耳其人是极其可恶的，而且它有引起法国和协约国中其他国家强烈反对的危险，以致英国人未必敢提出这个问题来公开讨论。虽然如此，但在安纳托利亚谁也不怀疑土耳其政府正在把土耳其出卖给英国人。袭击西发斯大会的尝试，引起了人民不满情绪的爆发。人们公开控诉费里特的卖国行为。虽然基马尔党人的领导者极力制止反君主的发动，但人们还是不恭顺地批评了苏丹本人。群众大会和集会的浪潮弥漫了整个安纳托利亚；安纳托利亚西北部各

^① 1921年11月10日和11日的法国《晨报》第一次发表了关于这个条约的消息（这是对英国人攻击法国和基马尔党人于1921年10月20日签订单独条约的报复）。英国驻巴黎大使馆通过报刊立刻声明说：文件“是彻头彻尾的伪造”。虽然如此，但许多法国的政论家和历史学家仍坚持该条约的真实性。基马尔党人所著的《历史》一书，虽然没有引用那些足以确信原文的可靠性的细节，但也无条件地提到了它。著名的土耳其女作家和女政治活动家哈里德·艾迪布也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记载说：她在从事“基马尔党的地下”活动时，就在伊斯坦布尔看到该条约的土耳其文副本，但又附带说明，她终究不相信该条约的真实性。

个分散的游击队联合成一支较大的部队，并采用了“国民军”这个总的名称；很多的决议都要求立即向伊斯坦布尔进军，基马尔本人惧怕声势浩大的反苏丹运动，所以警告苏丹说：如果他不准费里特辞职，那么“国民将认为自己被迫采取必要的行动，而那时什么东西也阻挡不住它了”。

为了赢得时间，苏丹于1919年10月初同意了费里特的辞职。另一位不太受人民仇恨的大臣阿利·里萨巴夏被任命为宰相。新政府接受了基马尔党人关于召开奥斯曼国会的要求，而基马尔党人则恢复了同伊斯坦布尔的联系。英国人决定不反对这种协议。他们以为：国会由于在被占领的伊斯坦布尔召开，就会成为他们手中的顺从工具，而且也可以使它同“非法的”安纳托利亚组织相抗衡。

穆斯塔法·基马尔确信，国会应在安纳托利亚召开，而不应在处于外国大炮威胁之下的伊斯坦布尔召开。他表现出很大的远见，所以，在自己从西发斯发往伊斯坦布尔的致民族解放斗争拥护者们的一封信中指出：“在陛下和中央政府的压力之下，国民会议将在伊斯坦布尔召开；协约国

要把中央政府和国会置于自己监督之下，并要迫使它们接受自己所希望的那种决议；如果国会表现出能够保卫自己自由的话，那么它就会遭到袭击和被驱散。在这种情况下，国民为了保卫自己现有的组织和依靠它们，就要奋起反对侵害自己生命和利益的行为。这种后果是不能预言的……”

但是，无论是基马尔在伊斯坦布尔的拥护者，或是大多数的安纳托利亚的活动家在这个问题上都不赞同基马尔，代表委员会接受了土耳其政府关于在伊斯坦布尔召开国会的建议。

02 基马尔党人在国会选举中获得了绝大多数。基马尔也当选了。但他拒绝到伊斯坦布尔去，而于1919年底由西发斯转移到安卡拉，并使后者变成了代表委员会的总部。从此以后，安卡拉就成了民族解放运动的中心。

伊斯坦布尔和安纳托利亚之间的和平外貌还继续保持了几个月。1920年初，奥斯曼国会开幕了。1月28日通过了所谓“国民公约”。实质上，这是国会固定了埃尔祖鲁姆和西发斯代表大会所宣布的各项原则。国民公约以庄严的土耳其独立宣言的形式确认了这些原则，因此，它就成了民族

斗争的旗帜。

这一文件确定：“位在停战协定所规定的界线这一边的全部领土，即为大多数在出身、种族和宗教方面完全一致、并无限留恋自己的民族和社会权利的奥斯曼的伊斯兰教人民所居住的全部领土，在法律和事实上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国民公约建议通过当地居民自由表达意志的途径，来决定大部为阿拉伯人所居住的地区命运。并建议采取同样的方法来决定西色雷斯和安纳托利亚东部三个州的命运。同时提出了保障伊斯坦布尔和马尔马拉海的安全免受任何侵犯的要求；关于海峡的通航制度应符合这项条件。国民公约极重要的条款之一，是关于土耳其独立这一条。该条载称：“我们生存和我们前途的重要条件，就是赋予我们以享有与任何国家一样的完全独立和自由之机会，以保证我们的发展，使我们民族兴旺和经济繁荣成为可能，使我们能够建立现代的和正确行动的组织。因此，我们仇视阻碍我国政治、法律和财政发展的各种限制。关于偿还我国债务所应规定的条件，也不得与这些原则相抵触。”

国民公约表明：指望国会“唯命是听”的打算



穆斯塔法·基马尔就关于必须在安纳托利亚，
而不应在伊斯坦布尔召开国会的问题
所写的一段信的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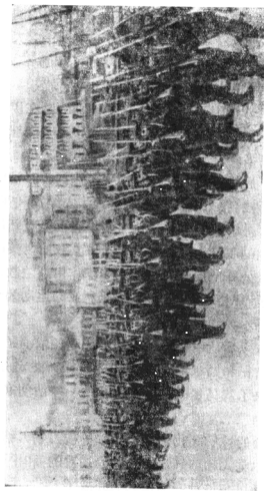
是错误的。并且，国会在 1920 年 3 月初使内阁重新更换了；政府中包括了几个接近基马尔党人的活动家。这一切都引起了英国人和苏丹的不安。于是他们便决定采取镇压手段了。

1920 年 3 月 16 日夜，英国陆战队在伊斯坦布尔登陆，该城正式宣布被占领了。英国部队占领了许多政府机关、营房、邮局和电报局等。城内实行了戒严。几十个议员遭到了逮捕，并被流放到马耳他岛；只有部分议员逃到了安纳托利亚。⁹³

国会被解散了。达马德·费里特巴夏重新取得了宰相的职位。这时苏丹和土耳其政府以英国为靠山，公开地反对安纳托利亚了。伊斯兰教教主颁布了“费特瓦”，宣布安纳托利亚的运动为叛乱，基马尔为罪犯。⁹⁴

不久以后，伊斯坦布尔军事法庭便取消了基马尔的官衔和勋章。军事法庭的另一个决定是，缺席判决了基马尔以及民族运动的一些活动家的死刑。

国会的被解散和伊斯坦布尔的被占领，结束了基马尔党人和苏丹政府之间的相对的“和平”时期。伊斯坦布尔对安纳托利亚开战了。



1920年英国军队占领伊斯坦布尔

现在，安纳托利亚在形式上也不承认苏丹政府了。国会解散以后，基马尔接着就在安卡拉召开了新议会，取名为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它于1920年4月23日开幕。出席议会的有从伊斯坦布尔逃来的议员以及安纳托利亚的新议员，后者是由那些曾经选举过被解散的国会议员的选举人选举出来的。实际上，新议员都是代表各地护权协会的。议员的阶级成分是由基马尔运动的性质本身所预先决定了的，例如：他们的绝大多数都是商人、官吏和军官；而伊斯兰教教会、地主、半封建分子以及封建分子的代表也不少。

大国民议会选举了穆斯塔法·基马尔为主席。议员们组成了对议会负责的政府，它也是以基马尔为首。大国民议会宣布自己是土耳其唯一合法的政权。议员们立誓为争取国家的独立而斗争，并宣誓忠于国民公约。议会把立法和行政职权都集中在自己手中。苏丹及其政府在伊斯坦布尔被占领后所颁布的一切命令，都被宣布不应予以执行。但基马尔党人仍旧保留了苏丹制度和哈里法制度的虚名。所以，大国民议会便以苏丹-哈里法“是异教徒的阶下囚”这一点来解释自己的行为。

这样安纳托利亚的民族政权就组成了。

96 新政权的第一个外交文件是致苏维埃俄国的呼吁书。1920年4月26日，穆斯塔法·基马尔曾写信到莫斯科给列宁，建议建立外交关系，并请求在革命土耳其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给予援助。不久，安卡拉政府的代表团就动身前往莫斯科。

六 英希武装干涉和 基马尔党人的胜利

1920年4月底，协约国在圣雷莫会议上着手确定关于瓜分土耳其的条约。在这里达成了关于瓜分阿拉伯国家的最后协议。英国在“委任统治权”的幌子下获得了伊拉克和巴勒斯坦，而法国则获得了叙利亚和黎巴嫩。同时，法国把摩苏尔区让给了英国，该地根据1916年的秘密条约应归法国所有，而英国则把摩苏尔的石油分给了法国一部分，并同意把基里基亚归并到叙利亚。结果，会议拟定了对土“和”约的最后草案。1920年5月间，草案被交给了苏丹政府，并在报刊上公布了。同时，协约国还建议苏丹和希腊人“整顿”

安纳托利亚秩序，因为在这里，土耳其的民族组织已明确地准备武装反击协约国所提出的掠夺性的“和约”条件。

苏丹通过自己的代理人在安纳托利亚挑起了几次反动的叛乱。此外，他还在伊斯坦布尔由各式各样的流氓组成了“哈里法军”，以一个名叫安萨乌尔的人为首领。安萨乌尔的职业原来是宪兵，苏丹为此曾赐给他一个巴夏头衔。英国人供应安萨乌尔武器，并用英国军舰把他的“军队”运到了安纳托利亚。安卡拉的《民族主权报》关于这件事情写道：“英国人想在我们这儿重复在俄国已遭失败的经验……大家都知道，英国人曾在那里花了千百万巨款来资助被击溃和被歼灭了的高尔察克、尤登尼奇和邓尼金。现在他们又想在我国重复那个经验。”

国内的反革命势力是不大的。基马尔党人镇压了反动的暴动。“哈里法军”在同安纳托利亚游击队发生的最初几次冲突中就被击散了。不久，深信自己软弱无力的伊斯坦布尔政府，便完全放弃了反对安纳托利亚的武装斗争。

英国人对直接的外国武装干涉的办法抱有更 97

大的希望。1920年6月间，由英国充分供应金钱、武器和弹药的希腊军队从伊兹密尔出发了。7月间它就占领了巴利克西尔、布尔萨和其他许多城市，并开始向安纳托利亚内地推进。另一支希腊军队进入了色雷斯，并占领了亚得尔那（亚得里亚堡）。

协约国的领导者们认为：基马尔党人的抵抗是不会长久的。所以，协约国决定趁早办好瓜分土耳其的手续，并以最后通牒的形式要求土耳其政府签订条约。土耳其政府在短时间的拖延之后便屈服了。8月10日，条约在色佛尔^①签订了，而土耳其爱国者则立即把它看作是对土耳其宣判的死刑。

色佛尔条约是凡尔赛体系的一部分。其参加国一方是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达什纳克党人的亚美尼亚、比利时、希腊、汉志^②、波兰、

① 色佛尔在法国巴黎附近。——译者

② 汉志仅仅被算是条约参加国。实际上，汉志国王胡赛因由于英国人违背了关于建立一个幅员辽阔的独立的阿拉伯国家所承担的义务，也象拒绝加入国际联盟一样，拒绝在色佛尔条约上签字。没有在条约上签字的还有拒绝承担偿还一部分奥斯曼债务的南斯拉夫代表。

葡萄牙、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另一方是苏丹土耳其。这个条约是一个篇幅冗长累赘的文件。它共分十三编，每编又分为章和条（总共四百三十三条）。条约的第一编也象在 1919 年至 1920 年间所签订的其他条约一样，是国际联盟规约。第二编叙述了土耳其的疆界。根据这一编的规定，土耳其丧失了它在欧洲的所有领地，只有伊斯坦布尔及其邻近的不大的一块地区除外；而在亚洲它不仅丧失了所有阿拉伯领土，而且还把基里基亚和沿叙利亚边境的广阔地带割给了法国，把摩苏尔让给了英国。

但是，在名为“政治条款”的第三编中，包括了更重要的领土决定。在这一编中，战胜国利用各种形式并在各种借口之下，使土耳其丧失了对很多省份和地区的主权。

根据这些“政治条款”的规定，协约国将来仍有权从土耳其手中夺取伊斯坦布尔。根据条约规定，这座城市，即奥斯曼帝国的首都，只是有条件地——土耳其人忠诚地遵守条约各项条款所规定的义务——归土耳其所有。并且，土耳其预先同意：一旦协约国修改关于伊斯坦布尔归土耳其

所有的决定时，土国将“接受在这方面所通过的任何决定”。

其次，海峡区转交特别的国际海峡委员会管理，它有权“完全不依赖地方当局”而对博斯普鲁斯海峡、马尔马拉海和达达尼尔海峡的水域和沿岸实行监督，有权竖立自己的旗帜，有单独的预算和自己的组织机构，其中包括官员、军官、警察等等；土耳其代表只有在“它（土耳其）成为国联会员国时”才能加入委员会，并“从土耳其加入国联之日算起”。

伊兹密尔城及其邻近的广大地区也划为一个特别区；表面上，这个区域仍在土耳其的主权之下，但实际上却转让给希腊了。正如条约所载称：“土耳其把自己对士麦拿^①城和上述地区行使主权的权利交给希腊政府”，而土耳其的主权仅是：“奥斯曼的国旗将经常升在城外一个要塞的上空”；在条约生效五年以后，当地议会就可请求国联行政院把伊兹密尔区最后并入希腊王国，而且，由于预见到这种可能性，“土耳其从现在起声明：

① 士麦拿是伊兹密尔的旧称。——译者

一旦在这种情况下发生时，它将把自己对这个地区的一切权利和法律根据让给希腊。”

条约规定，将来根据国联的决定，在小亚细亚东部可能要建立一个脱离土耳其而独立的库尔德人的国家，由土耳其东南各省组成，并且在这种情况下，土耳其还预先放弃了对这些地区的“一切权利和法律根据”。

最后，色佛尔条约拟定把埃尔祖鲁姆、特拉布松、凡湖、比特利斯等省的广大地区，列入“独立的”（独立于土耳其之外，但依赖协约国帝国主义者）达什纳克党人的亚美尼亚；土耳其在这些地区的疆界之确定，交由美国总统仲裁解决，而土耳其则又预先放弃了对让给亚美尼亚的领土的“一切权利和法律根据”。

如果把所有这些同当时英、法、意三国签订的关于在安纳托利亚划出法、意特别“势力范围”的条约对照一下的话，那么就必须承认，协约国事实上只给土耳其人留下了安卡拉与黑海之间的一小块地区，这里没有什么自然资源、工业、交通线，而且也根本没有维持独立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源。但就是这块土地也必须变成半殖民地。

色佛尔条约第三编和其余十编的很多条款，都使土耳其受到了各种各样的限制，并使它完全附属于战胜国之下。土耳其应当被解除军备。它的武装力量只限于总数为七百人的苏丹私人卫队；总共为五万人的宪兵队和所谓“特种部队”（包括司令部、军官、军事学校人员和非战斗人员在内），以及有七个小汽艇和六艘水雷艇的舰队。领事裁判权制度完全被确定下来了，其优惠甚至扩大到了在1914年以前并未享有这些特权的“协约国家”（例如汉志、日本）。外国的财政监督所采取的形式，使土耳其丧失了最后一点点财政上的独立性；除了恢复起前奥斯曼债务管理处的一切特权外，条约还规定成立一个由英、法、意三国代表组成的特别财政委员会；委员会拥有下列的特殊权利：批准土耳其预算，监督预算的执行以及各种财政法案和条例的遵守情况，领导专门建立的“奥斯曼财政检查机关”，而检查机关的人员只有取得委员会的同意后方可任用；正如条约中所载：“土耳其的一切资源，除了用来保证偿还奥斯曼公债的收入以外，都要受财政委员会的支配。”

色佛尔条约的全部内容，使土耳其人对协约

国的、首先是对英国^①的真正意图不再有丝毫的怀疑了。如果条约实现了的话，那么土耳其这个国家就不复存在了。甚至苏丹也不敢批准色佛尔条约。安纳托利亚对它的回答是：暴风雨般的抗议和动员一切力量来保卫国家，使其免于危亡。

从此以后，希腊远征军在协约国看来是获得了似乎“合法的”根据，——实现色佛尔条约的各项规定。在英国政府的心目中，这是轻而易举的军事游戏。100 劳合·乔治向下议院保证说，不管怎样，对英国来说，全部问题只在于“支付运输费用”。大体上同意劳合·乔治意见的丘吉尔，对此毕竟还指出：“可是，到这件事情结束时，我们可能在这个问题上深深地陷入泥潭之中。”

法国政治家表现出了更大的不安情绪。英法

^① 色佛尔条约的反苏倾向并未引起任何怀疑。协约国在没有俄国的情况下解决中东问题的这一事实，就暴露出了它们解决这个问题时是抱着反对俄国的企图的。的确，色佛尔条约的一切最重要的条款都指望继续进行反苏的武装干涉：如确立协约国对海峡的统治，建立象“独立的”库尔德斯坦和达什纳克党人亚美尼亚这样一些军事基地，把留给土耳其的领土变成半殖民地，因而也变为帝国主义的战略后备队。

两国之间在土耳其问题上存在着深刻的矛盾。早在签订摩德洛司停战协定时，法国人就对英国人在近东建立其独占统治的企图表示不满。无怪乎劳合·乔治后来在自己的《战争回忆录》中指出：“与土耳其人签订的停战协定，使我同克里孟梭发生了唯一的一次认真的争吵。”后来，在英、法签订关于瓜分阿拉伯国家和摩苏尔石油的协定时，克里孟梭才稍稍平静一点。他甚至认为这种勾结是有利的，并就这件事声明说：“好吧，我就让出摩苏尔，但是……我要把这事当做诱饵，以便取得基里基亚……基里基亚和亚历山大勒塔并不是什么坏东西。所以我对英国人说：‘二者之中你们想要那一个，摩苏尔还是基里基亚？’他们回答说：‘摩苏尔。’我说：‘好吧，我就把它给你们，我要基里基亚。’如果以后土耳其人把我们从小基里基亚赶出来的话，那难道能责难我吗！”

但是，大多数的法国政治家，尤其是和近东的资本主义企业直接有利害关系的那些人，完全不象克里孟梭那样来看待土耳其问题。这些活动家，尤其是普恩加费、白里安和其他一些有势力的政治家都认为，英国人所拟定的瓜分土耳其的

计划和对基马尔党人采取的军事措施，将给法国带来直接的损失。在所有帝国主义国家中，法国在土耳其的投资最多。它在奥斯曼债务中所占的份额高达 63%，超过二十亿金法郎。法国在土耳其工业、铁路、公用事业、商业和银行业中的投资，据大致估计约为五亿法郎。英国人在安纳托利亚发起的“战后的战争”，每天都使法国丧失在奥斯曼债务方面的收入，破坏了用法国资本修建起来的铁路和许多企业，并使作为贷款保证的土地荒芜起来。从基里基亚获得的好处并没有补偿法国的损失。基里基亚还必须从土耳其人手中夺过来，但同土耳其游击队发生的冲突已向法国人表明了，任务并不是轻而易举的。而且，瓜分土耳其的原则一般地对法国说来也意味着丧失它在富庶的伊兹密尔、色雷斯、库尔德斯坦、亚美尼亚，甚至在伊斯坦布尔的殖民利润，在伊斯坦布尔这里实际上已建立了英国的统治。法国的一个记者厚颜无耻地但却坦率地表现出了这种意图，他在报纸上声明说：“把伊兹密尔交还给希腊人，这就意味着对法国进行偷窃。”

101

这就是为什么色佛尔条约在法国遭到了冷

遇。被迫跟着英国走（主要是从欧洲政治方面考虑）的法国政府签订了它，并以条约中规定了能够获得领土和财政经济监督而自慰。但是，在法国领导人物的言论中，当时就已流露出了不安的情绪。普恩加费在自己的一篇政论中写道：“土耳其条约是在国立色佛尔工场（色佛尔瓷器厂）的所在地签订的……它这个物体本身就是很脆弱的，也许是一只破花瓶。不要去触动它。在最后时刻，希腊和意大利对罗得岛命运所持的针锋相对的观点险些儿破坏了全部事情。几度宣布的签字仪式一再延期。最后仪式终于在疲倦而冷淡的气氛中举行了，因此，任何一个仔细的观察者都会不无忧郁地指出，这次仪式正象征着法国在东方的影响的急剧低落。”

色佛尔条约的墨迹未干，法国统治集团就已经表示出了修改它的愿望。法国军队仍然驻在基里基亚和伊斯坦布尔，但形形色色的非正式的法国官员便访问了安卡拉，并都向基马尔党人保证，他们“同情”土耳其的民族斗争。阿里斯蒂得·白里安早在1920年夏天就在众议院里说：“当任何一个国家，在长期战争之后又受到‘苏格兰式的淋

浴’^①时，象人们对土耳其所做的那样，忽而对它说：‘你会存在下去’，忽而又声明说：‘你不会存在下去’，——它的神经会因此紧张到痉挛的程度，在人民中则形成爱国主义的义愤，并开始借助叛乱匪帮表现出来。这对我们来说是强盗匪帮；而在我们这里这会称为爱国者的队伍。”

意大利人也不满意英国的政策。在原则上他们不反对瓜分安纳托利亚，但他们由于伊兹密尔问题而感到愤怒，因为根据战时秘密条约的规定，曾允许把伊兹密尔让给意大利，但现在却让给了希腊。此外，在欧洲事务中意大利认为自己是“分少了”。因此，意大利在安纳托利亚的占领当局和意大利驻伊斯坦布尔的代表，就利用各种机会来损害英国人。例如，意大利人把武器卖给基马尔党人，而这些武器则被用来对付希腊军队。 102

美国在签订色佛尔条约时完全拒绝支持英国在近东的政策。1920年6月1日，美国参议院否决了关于美国对亚美尼亚实行委任统治的建议。美国的某些活动家仍继续谈论关于美国对整个土

^① 原文是法文的 *duche écossaise*，意思是一种冷水和热水交替放出来的淋浴。——译者

土耳其确立委任统治的合理性问题，这一点曾得到了伊斯坦布尔买办资产阶级的同情，但就是这些谈论也逐渐消沉下去了。美国人拒绝签订色佛尔条约。他们声称：条约是同威尔逊的原则相抵触的，但实际上，却是英法在圣雷莫签订的关于石油问题的协定激怒了他们，因为这个协定的签订没有美国石油托拉斯参加，并且是违背他们的利益的。

除了协约国阵营的意见分歧外，英国人又遇到了另一个困难——伊斯兰教徒都不满意英国对土耳其的政策。协约国进攻安纳托利亚和侵占哈里法的官邸——伊斯坦布尔，在各国伊斯兰教徒中引起了对基马尔党人的广泛同情。从印度、埃及和北非捐助的现款，不断地汇到了安纳托利亚。英国政府的反土政策，促进了印度教徒和印度伊斯兰教徒在共同进行反英斗争的基础上亲近起来。英国派往土耳其的印度军队越来越不可靠了。有一次，在英希军队占领土耳其的一个小城市时，曾发生了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印度士兵整夜射击的不是土耳其军队，而是希腊军队，到早晨他们则解释说，他们之所以发生“错误”，是

由于他们仿佛一点也不知道英国同希腊之间结成了同盟。

在伊斯兰教徒的心目中，安卡拉变成了第二个麦加。各个伊斯兰教国家的代表都来到了安纳托利亚，把它看作为反对共同敌人而斗争的中心。阿富汗国王阿马努拉在给穆斯塔法·基马尔的信中，表示同情战斗的土耳其，并请求大国民议会派一个军事使团到阿富汗来改组阿富汗的军队。“大教长”塞努西从遥远的利比亚来到了安卡拉，发表声明说，他要以自己本身和自己在宗教上的威信来为土耳其的事业服务。叙利亚、伊拉克、阿拉伯等国阿拉伯人的领袖们，都发表了同情新土耳其事业的保证。内志苏丹伊本·萨乌德尽管先前一贯痛恨土耳其人并和英国订有“同盟”（实际上是保护）条约，但他也给土耳其驻也门代表写信说：“我从您那儿了解到：名为穆斯塔法·基马尔巴夏的英雄在为神圣的崇高目的而对异教徒进行着斗争。您不能想象我是多么欢喜和幸福。在得到这个令人高兴的消息时，我们曾在这里举行了隆重的庆祝会。他（穆斯塔法·基马尔巴夏）应该是我们大家的保护者。”

但土耳其对外政策方面最为有利的因素，乃是苏维埃政府所给予基马尔党人的援助。1920年6月2日，苏维埃政府在答复大国民议会的呼吁时向安卡拉发出了一封信，其中指出：它“向世界各国人民伸出了友谊之手，始终忠于自己承认每个民族有自决权的原则”。苏维埃政府指出：“它兴高彩烈地注视着土耳其人民为自己的独立而进行的英勇斗争，在土耳其这些艰苦的日子里，它荣幸地奠定了巩固的友谊基础，而这种友谊一定会把土耳其人民和俄国人民联系在一起。”

苏维埃政府的援助，在土耳其反对外国武装干涉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种援助的意义不仅仅是物质的，而且是巨大的道义上的支援，因为这种援助是在土耳其最艰苦的时期，即它的对外政策处于孤立的时期给予的。

安卡拉政府清楚地意识到，这时广大的土耳其人民阶层对苏维埃俄国表现了多么深厚的热爱。土耳其人民在各地，直到安纳托利亚的最偏僻的角落，都对俄国表现出了依恋和感谢之情。伊斯坦布尔大学的学生们要求授予列宁以诺贝尔和平奖金，使反动的教授们为之恐惧。安纳托利

亚的报纸经常刊载关于各苏维埃共和国的大量报道和论文，并说出了“土耳其人民对伟大的高尚的盟国——苏维埃俄国所抱的友谊和兄弟般的真挚情感”。甚至一些地方上的小刊物（实质上，其内政方针是反动的），都不断地强调指出了苏维埃国家的伟大作用。这些报纸写道：“列宁是人类的骄傲”，“列宁是一切人的太阳和荣誉”。

基马尔党的领导人考虑到了这种情绪。穆斯塔法·基马尔在1920年1月打给苏维埃政府的电报中写道：“我以极愉快的心情把土耳其人民对俄国人民所抱的敬佩感情奉告你们。俄国人民不以粉碎自己本身的镣铐为满足，他们为了永远铲除人类的压迫，已为全世界人民的解放进行了两年多的史无前例的斗争，并以满腔热诚忍受着空前的苦难。” 104

在安纳托利亚当时充满着这种情绪时，苏维埃国家支援的道义上的意义是特别重大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后来不得不进行重要的坦白。汤因比写道：“在斗争的危急关头，他们（土耳其人）热烈地握住了俄国伸给他们的的手，而这种支援对他们的事业具有重大的价值。除了供应物资和金

钱这种物质上的援助以外……由于土耳其人意识到他们不是孤立地在同胜利了的盟国进行战斗，而是有一个即使在失败和不幸的情况下仍具有潜力的伟大国家作为后盾，所以他们的勇气无比地增强起来了。”

因此，早在1920年，即在色佛尔条约刚一签订后，主张实现该条约的英国就遇到了许多重大的困难。卷入爱国运动中的土耳其人，都拿起武器来保卫自己的民族独立。在协约国阵营中矛盾加深了。基马尔党人得到了苏维埃政府的支持；这种支持以后还有更加巩固和发展的趋势。

尽管如此，但土耳其仍处于危急状态中。敌人从四面八方包围了安纳托利亚。希军从西部发动了进攻。意大利军队占领了安塔利亚。在基里基亚（直到叙利亚边境）土军同法国军队在进行战斗。达什纳克党人在东部从事挑衅活动。英希舰队封锁了黑海沿岸。土耳其欧洲部分完全被占领了：希军占领了东色雷斯，协约国占领了伊斯坦布尔和海峡区。

安纳托利亚还没有正规军。除了前高加索战线外，旧的军队都瓦解了；新的国民军尚待建立。

农民游击队轻而易举地战胜了“哈里法”匪徒，但现在他们却遭到了装备优良和训练有素的希腊军队的袭击。后者在人数、技术和组织上都占优势。几乎整个的铁路网都在被占领区。安纳托利亚的主要运输工具是两头牛拉的双轮车。当时就用这种105大车沿着泥泞不堪的道路从远处向前线运送炮弹和装备。武器和弹药非常缺乏，仅有的一点儿还是世界大战时剩下来的。一部分弹药是靠游击队勇敢地袭击武装干涉者的仓库来补充的，一部分是靠从伊斯坦布尔私运和向国外购买来补充的。但金钱很少。破产的国家在忍饥挨饿。

在这种局势下，安纳托利亚掀起了一种异常的热情。新的志愿兵补充了游击队。妇女也参加了斗争。土耳其的农妇们背着婴儿用大车向前线运送子弹。农妇们在火线上肩运炮弹。很多妇女和战士们在一起进行战斗。在没有步枪的情况下，他们就拿起猎枪来作战。

土耳其工人阶级给予民族解放斗争以各种支持。土耳其工人不仅走上了前线。他们在简陋的兵工厂中制造炮弹；冒着生命危险旋出已装好弹药的炮弹，以便使这些炮弹能够用在小口径的炮

上；在伊斯坦布尔，他们不怕迫害，帮助向安纳托利亚秘密运送武器。沿安纳托利亚的黑海各港口上的码头工人，在接收和卸下武器时忘我地进行工作。

尽管自己人数很少和发展条件不利，土耳其无产阶级仍开始组织起来了。1920年，土耳其共产党成立了（最初的几个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得更早——在1918—1919年）。如前所述，土耳其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是穆斯塔法·苏布希。他是一位忠于无产阶级事业的战士。他从青年土耳其党人革命时起就参加了土耳其工人运动。从1910年起，他加入了奥斯曼社会党。1913年夏天，青年土耳其党人（因宰相马茂德·谢夫凯特巴夏被刺）对反动分子施行镇压，同时又乘机使社会党失去领导。穆斯塔法·苏布希被逮捕了并被流放到西诺普。1914年初，他设法逃到了俄国。在土耳其参战后，他又在俄国被扣留了。在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穆斯塔法·苏布希便着手成立一些共产主义小组，这些小组和早先在安纳托利亚以及在伊斯坦布尔成立的小组一起，为成立土耳其共产党打下了基础。

土耳其共产党当时是非常软弱的。其中有很多小资产阶级分子。但是党给土耳其人民灌输了共产主义思想，号召人民不仅为民族独立而斗争，而且还为满足土耳其无产阶级和劳动农民的迫切的政治和经济要求而斗争。由于共产党人的活动，第一次出现了用土耳其文出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 106

基马尔党人很怕共产党的活动发展起来。在民族战争的初期，他们还不肯对工人阶级的革命先锋队公开地进行镇压。所以基马尔党人便采取了迂回手腕。他们用以前的青年土耳其党人和泛伊斯兰主义者组成了自己的所谓“共产党”。他们希望借助它来麻痹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对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影响。御用的“共产党”利用当局的庇护从事挑衅活动。而真正的共产党却受到了基马尔政府当局的迫害。

西欧帝国主义者估计到了基马尔党人的对内政策的这种方针。但英国和法国在局势的估计上和行动的方法上发生了分歧。法国人认为，必须使基马尔党人彻底地离开“布尔什维克”，并为此采取外交上的手段来加以影响。

英国人仍继续顽固地希望武装干涉的成功。除利用希腊人外，他们还企图利用达什纳克党人，以便从东部和西部同时打击基马尔党人，不让土耳其和苏维埃俄国之间建立起直接的疆界。1920年9月，英国人策动的达什纳克党人展开了反对土耳其人的军事行动。这给亚美尼亚人民带来了惨痛的后果。还在达什纳克党人发动很久以前，土耳其人自己就准备去侵犯亚美尼亚。为此还成立了在卡兹姆·卡拉贝基尔将军指挥下的特别军。狂热的反动分子卡兹姆·卡拉贝基尔的行动并不是孤立的。正在这个时候，协约国也开始对基马尔党人认真地表示好感（关于这一点以后还要谈到），而安卡拉统治集团则愿同帝国主义者进行有害于土耳其独立的危险的勾结，以便实现自己对高加索特别是对亚美尼亚的侵略计划。

不到两个月，达什纳克党人完全被击溃了。他们请求协约国给以援助，并声明说：“我们是孤立的。”列强没有给予任何援助。于是达什纳克党人便急忙同土军指挥部在亚历山大堡（今天的列宁那坎）签订了可耻的“和”约（1920年12月2日），使亚美尼亚处于土耳其保护之下。并且，达什纳

克党人是从反革命方面考虑而签订亚历山大堡条约的，而卡兹姆·卡拉贝基尔则从沙文主义和掠夺的方针出发争得了它。卡兹姆·卡拉贝基尔趁着苏维埃俄国忙于同波兰进行战争和因此把一部分红军调往波兰前线的机会，企图彻底消灭亚美尼亚，并使苏维埃俄国处于“既成事实”的面前。亚历山大堡条约的实现就会给亚美尼亚人民带来无数的新的灾难和外国的沉重压迫。

斯大林同志在估计这个时期所形成的局势时指出：“毫无疑问，达什纳克党人的亚美尼亚成了协约国的挑衅行为的牺牲品，协约国唆使它进攻土耳其，然后又可耻地把它抛弃，任凭土耳其人宰割。几乎不用怀疑，亚美尼亚除了和苏维埃俄国结成联盟以外，没有任何别的生路。”^①

幸运的是，在签订这个奴役性的条约时，达什纳克党人已经不是亚美尼亚的统治者了。1920年11月29日，革命委员会关于宣告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宣言公布了。从此以后，土耳其人在同亚美尼亚的相互关系这个问题上，必须与苏维埃政

^①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362页。

府进行协商，这至少已经预先决定了亚历山大堡条约的废除。

达什纳克党人政府的被推翻对土耳其所产生的直接结果，是土耳其通过高加索边境同苏维埃俄国建立了直接联系。这无论从政治或是军事观点来看，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土耳其在东方所得到的不是敌对的战线，而是可靠的友谊的后方。

达什纳克党人的失败，使英国人和法国人在对待基马尔党人的战略问题上暂时接近起来。英国人也决定以外交诱惑的方法企图影响安卡拉政府。而当时的国际局势也促使英国采取这一决定，这就是：弗兰格尔的被击溃，维尼塞洛斯的辞职和国王君士坦丁的返回希腊，英国殖民地和英国附属国中日益加强的动荡不安的局势，英国在伊朗的政策破产等等，而另一方面则是希望土耳其同苏维埃军队在亚美尼亚发生武装冲突。

108 英国人和法国人为了影响基马尔党人，于是便求助于伊斯坦布尔集团。还在1920年10月，泰腓克巴夏就代替了已经变得无用的费里特巴夏担任宰相职位，前者也是赞成同协约国妥协的，但他本人却没有因武装反对基马尔党人而威信扫

地。英国人借泰腓克巴夏的帮助向基马尔党人暗示：只要土耳其人停止民族斗争并同苏维埃俄国断绝关系，协约国就可作出许多重大的让步。伊斯坦布尔政府派出了代表团前往安纳托利亚同基马尔进行谈判。帝国主义的报纸公然表示希望基马尔党人能够同协约国勾结起来，使安卡拉政府转到苏维埃俄国的敌人的阵营中去。

的确，这是新土耳其政治中的转折关头。安纳托利亚运动的命运，决定于它是保持反帝性质、还是由民族解放运动转变为沙文主义的反动运动。

斯大林同志在他于 1920 年 11 月底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这一切都是说明协约国向基马尔主义者极力讨好和基马尔主义者的立场可能稍许变右的征候”。同时斯大林同志还指出：“协约国讨好的结果怎样，基马尔主义者将向右转多少，——这很难说。但是有一点总是没有疑问的：几年以前开始的争取殖民地解放的斗争无论如何将加强起来，这个斗争公认的旗手俄国将用一切力量和一切方法支持这个斗争的拥护者，如果基马尔主义者不背叛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这个斗争将

和他们一起走向胜利，如果基马尔主义者站到协约国的阵营中，这个斗争将不顾基马尔主义者而走向胜利。”^①

基马尔党人没有放弃民族斗争。伊斯坦布尔政府的代表团没有获得成就：基马尔的代表在代表团到达安纳托利亚时曾给它以殷勤的接待，为了对苏丹的大臣表示表面上的尊敬，曾把他们引到安卡拉，但在这里他们实际上是处于受尊敬的俘虏的地位。至于说到同协约国可能缔结协定的条件，那基马尔党人仍旧坚持要切实履行国民公约。

109 英国人又重新采取了老一套的影响手段——希腊军队。希腊国王君士坦丁在这方面比起维尼塞洛斯来，乃是英国任务的更为热心的执行者。他从英国又获得了一些金钱和物资以后，便向希腊军队发出了进攻令。

基马尔党人认为，游击队不会阻止而且也不可能阻挡住希军。在技术和组织上的差别太大了。基马尔党人领导方面决定加速建立正规军。新任

^①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383页。

西线司令官——上校伊斯美特贝伊肩负着这一使命从安卡拉出发了。

虽然如此，但基马尔党人却把建立正规军的任务，和另一个与其说是军事的倒不如说是社会政治的任务——取消农民游击队——结合在一起。起先，游击队实质上是土耳其在西线和南线上的唯一民族武装力量。安卡拉政府招募新兵的企图遭到了失败，因为农民仍愿在自己游击队指挥者的旗帜下进行战斗，保卫自己的家乡。

在反对“哈里法军”的斗争还在进行时，基马尔党人自己是愿意保留农民的游击队组织，因为哈里法的号召对这些组织不发生任何影响。在“哈里法军”被击溃以后，基马尔党人的这种兴趣就消逝了。相反地，基马尔党人所耽心的是，唯恐游击队把争取农民的土地要求提到日程上来。的确，在民族解放运动的第一阶段，农民没有大规模地提出土地要求。这时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斗争占着首要地位。但基马尔党人却力图防止农民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斗争在将来有可能转变为争取土地、反对本国地主的斗争。换句话说，基马尔党人是想阻碍民族运动过渡到土地革命的阶段。

因此，他们对农民稍有争取土地的企图便给以极严厉的惩罚。1920年秋天，大国民议会颁布了关于成立特别法庭、即所谓“独立法庭”的法律。这些法庭的正式目的，是对付临阵脱逃行为以及苏丹和帝国主义者代理人的反革命活动。但除此之外，安纳托利亚资产阶级却利用独立法庭来镇压农民反对地主的暴动。

110 另一方面，一部分游击队却受到了冒险分子、民族事业的叛徒的影响。他们利用了农民对资产阶级基马尔党人领导方面自发的不满情绪，并把这种不满情绪引上了反动的道路。在很多场合下发生了游击队的领袖们不服从军事指挥部的事实，发生了给土耳其人带来严重损失的任意发动、不守纪律和无政府状态。

由于所有这些原因，基马尔党人便急忙取消了农民游击队。1921年年初，伊斯美特按照基马尔的命令采取了这项措施。一部分游击队员举行了暴动；正规军被调来对付他们；游击队员被包围并被击溃了。另一部分，即最大的一部分游击队员自愿地加入了正规军。

希军指挥部由于了解基马尔阵营内部的复杂

情况，便决定利用时机，对一个极重要的据点——爱斯克舍希尔举行进攻。

1921年1月10日，基马尔党人刚刚组织起来的土耳其军队在伊涅纽村与希军遭遇了。希军当时有六万人，而土军总共只有一万五千人。但希军仍旧未能战胜土军的抵抗而退却了。固然，土军也后退了。但重要的是希军的进攻第一次被阻挡住了。土耳其军队的士气加强起来了。为了奖赏起见，伊斯美特获得了将军头衔和巴夏称号。

这次胜利，更确切一些说是半胜利，具有两个重要的后果：一个是内政性质的，另一个是对外政策性质的。

内政方面的后果是，以基马尔为首的基马尔党人的主要核心，显著地提高了自己在大国民议会中的威信。因此，辩论了九个月之久的《根本组织法》，即实际上是土耳其的新（虽然是不完全的）宪法通过了。以前在这项法律上的长期争论，是因议会中的封建教权派的反对而引起的。反动的议员们要求：要么就在这项法律中确定国王的特权，要么就指出大国民议会的权利具有临时性——“到哈里法和苏丹被释放时为止”。基马尔坚

决地反对。早在1920年9月，他就在大国民议会的一次秘密会议上证明说：苏丹瓦希德丁是卖国贼，决不能对他表示忠诚；另一方面，在基马尔看来，不应该通过关于废除瓦希德丁和关于用另一位苏丹来代替他的决议，因为瓦希德丁住在伊斯坦布尔，他不会服从这项决定，结果将造成两位哈里法之间的有害于民族事业的内讧。实际上，基马尔力求通过一项默口不谈苏丹和哈里法问题的法律，以便日后有行动自由。

在伊涅纽战役以前，基马尔及其集团一直未能把反动分子的反抗情绪制服下去。在战场上取得的胜利造成了更为有利的局势。1921年1月20日，法案终于得到了大国民议会的批准。这项被通过的法律载称：“最高权力没有任何限制地和无条件地属于国民”，“土耳其国家由大国民议会管理之”，议会尤其拥有以下的权利，如组织政府，以及“实现有关宗教的各项决议，颁布、修改和废除各项法律，签订和约和条约，宣布祖国处于防御状态中”等等。法律规定了大国民议会主席、议员、政府和地方行政机关，直到各县县长和各乡乡长的职权。只是关于苏丹-哈里法却只字未提。

《根本组织法》表面上没有废除旧宪法(即 1876 年的《米德哈特宪法》,它在 1909 年作过一些修改),而只是“补充了”它,但实际上,《根本组织法》在国家管理方面没有给国王留下任何地位。这是基马尔党人的重大胜利。

“第一次伊涅纽”战役在对外政策上的后果,是协约国不得不重视基马尔党人这个现实力量。在 1921 年 1 月底召开的协约国的会议上,法国和意大利要求英国召开不仅有伊斯坦布尔“合法”政府代表参加,而且有安卡拉代表参加的会议。英国只好同意了。但是,协约国之所以作出这种决定,与其说是由于土耳其军队所表现的坚定不移的精神,倒不如说是由于协约国渴望破坏即将在莫斯科举行的苏土和平会议。

1921 年 2 月底,协约国在希腊和土耳其代表参加之下在伦敦举行了会议。土耳其出席会议的有两个代表团——一个代表伊斯坦布尔,一个代表安卡拉。这样一来,不久以前被英国人称做“叛乱者匪帮”的安卡拉政府,却得到了协约国事实上的承认。甚至土耳其宰相在获得了在会议上的发言权以后也被迫声明说:“我让大国民议会的首席

代表发言，因为大国民议会是土耳其人民的真正代表。”

会议实质上毫无成就地结束了。英国政府在伦敦故意提出了关于近东形势和德国赔偿这两个问题交由协约国讨论。由于这种外交手腕，英国人才能够影响法国，并以在对法国人来说极其重要的赔偿问题上对他们让步为交换条件，使法国在土耳其问题上同意英国的建议。结果，土耳其人又碰到了协约国的统一战线。安卡拉代表团坚持国民公约的原则，而协约国则要求以色列佛尔条约为协定的基础。1921年3月12日，会议在徒劳无益的讨论之后宣告闭幕。

协约国想使基马尔土耳其与苏维埃俄国疏远的企图也同样失败了。安卡拉代表团首席代表、安卡拉政府当时的外交部长贝克尔·萨米贝伊在伦敦就这一问题进行了谈判。他是隐蔽的反动分子和沙文主义者，曾亲自建议劳合·乔治把土耳其列入反苏战线中，同时发出诺言说：一旦英国改善对土和约的条件，他就力求安卡拉政府同意土耳其与北高加索山区反革命分子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布尔什维主义”。就是这个贝克尔·萨米贝

伊曾同法国和意大利签订了单独协定，给予它们广泛的租让权和其他经济特权，以作为从安纳托利亚撤兵的代价。

贝克尔·萨米的行为被揭发了，而他在回到安卡拉以后就被迫辞职了。他同法国和意大利签订的协定并没有得到大国民议会的批准。

在莫斯科进行的谈判顺利地结束了。但谈判并不是容易的。安卡拉的反动集团为莫斯科会议的顺利进程制造了许多障碍。解决苏土两国陆上边界的问题是极复杂的一件事。如上所述，土耳其军队在达什纳克党人统治亚美尼亚期间曾侵占了亚美尼亚一部分领土。此外，土耳其人在格鲁吉亚利用孟什维克对格鲁吉亚人民所起的叛卖作用而占领了一些地区，并逼近了巴统，打算把它归并到土耳其。土耳其人明显地违背国民公约中113所规定的义务，竟未在他们占领下的三个“州”（卡斯、亚达汉、阿尔特温）内举行任何的公民投票，因为他们深知这三个地区的居民会坚决反对把它们转交给土耳其统治。

帝国主义列强，尤其是英国，都希望从苏维埃俄国和土耳其之间发生的纠纷中取得利益。这

时，帝国主义者所抱的目的是挑起苏土战争，以便削弱苏维埃俄国，嗾使土耳其民族主义者不要去进行反对英希武装干涉的解放斗争，而去到高加索进行掠夺战争。英国殖民当局的机关报《近东报》写道（1921年2月13日）：“在亚历山大堡签订的和约中，反对俄国的成分多于反对亚美尼亚的成分……亚美尼亚新政府现在请求安卡拉大国民议会来修改〔该项〕和约……土耳其人处在困难的境地中。不难预料，一旦拒绝时，他们就有招致俄国人对自己表示公开仇视态度的危险。谁知道，也许我们将是结束1914年悲惨事件的俄土新战争的目击者。”

英帝国主义者的这些希望并没有实现。苏维埃俄国和土耳其在它们反对帝国主义斗争中的利益的一致性，使两国政府达成了协议，防止了它们之间的战争。

同时，苏维埃政府注意到了当时土耳其运动的民族革命性质，认为新土耳其正在紧张地进行着武装斗争，采取独立，反对当时苏维埃俄国也与之作斗争的敌人。

1921年3月16日，“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

联邦共和国和土耳其友好亲善条约”在莫斯科签订了。条约名称本身所表示的两国之间的亲密友谊，应该是土耳其将来忠实于苏维埃俄国的保证。土耳其的东北新边界的确定，实质上也正是以这种设想为基础的，以前包括在俄罗斯帝国版图内的三个州（卡斯、亚达汉、阿尔特温）都划给了土耳其。

一般地说，莫斯科条约中彼此互有联系的各个条款，都充满了双方的互相信任和合作精神。双方确认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它们之间在反对帝国主义斗争中所存在的团结精神，以及对于两大民族中的一个民族所造成的任何困难，都会使另一民族的处境发生恶化”，并宣布它们希望彼此之间建立“经常的诚恳的相互关系和密切的真挚的友谊”。双方不得承认一方因迫于暴力而接受的任何和平条约，并且苏维埃政府还特别预先声明，凡有关土耳其的国际文件，如未经土耳其大国民议会承认，苏维埃政府将不予承认（这个决定是指色佛尔条约而言的）。其次，苏维埃政府完全放弃由领事裁判权制度所产生的各种权利，因为这种制度“与一切国家的自由的民族发展不相符合，并

且与完全实现国家主权也同样地不相容”。苏维埃政府同时免除了土耳其“根据土耳其和沙皇俄国之间先前签订的国际文件所承担的一切金钱义务和其他义务”。

莫斯科条约有关海峡问题的规定（但土耳其并未履行这种规定）是极为重要的。该项规定载称：“为了保证海峡开放和各国自由通过海峡来进行商业联系，缔约国双方同意由沿岸各国代表组成的特别会议来最后拟定黑海和海峡的国际条例，条件是：会议所通过的决议不能损害土耳其的完整的主权和土耳其及其首都君士坦丁堡的安全。”

条约中还包括了双方相互承担的一项义务：不让对缔约国对方政府抱有敌视目的的组织或集团在自己领土上建立或来到自己领土上。

条约指出：“东方各国人民民族解放运动和俄国劳动人民争取新社会制度的斗争之间有共同的利害关系”，同时又指出：缔约双方“郑重承认东方各国人民的自由和独立权利，并同样地承认他们有根据人民愿望选择政体的权利”，这些规定都具有很大的原则性的意义。

莫斯科条约是巩固新土耳其国际地位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基马尔党人依靠这个意味着在法律上承认大国民议会政府的条约，获得了比以前要高得多的国际地位。从实践观点来看，莫斯科条约使土耳其人有可能指望发展那种在苏维埃政权战胜外国武装干涉者和白匪以后，能以日益扩大的规模提供的援助。

英国政府认为，时间是有利于土耳其人的。所以英国人急忙用武力来解决土耳其问题。伦敦会议失败后，他们立即嗾使希腊人在安纳托利亚采取新的攻势。1921年3月31日，希军又遭失败（仍在一月间发生过战役的伊涅纽村）^①。尽管如此，英国人仍把赌注放在希腊人身上。坦克、大炮和英国教官源源送到了安纳托利亚。希腊又进行了补充的征兵，扩大了应征者的范围（增加了三个役龄）。国王君士坦丁亲自领导希腊军队，他梦想拜占廷的王位^②。

① 这次战役在土耳其历史上称做“第二次伊涅纽”——以区别于1921年1月发生的“第一次伊涅纽”。

② 土耳其旧都伊斯坦布尔，原是拜占廷帝国（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当时叫君士坦丁堡。——译者

1921年夏天，希腊人展开了总攻势，正如君士坦丁的宣言中所说的，以便摧毁企图“推翻色佛尔条约所建立的秩序的安纳托利亚匪帮的反抗”。

土耳其国民军当时的处境非常困难。希军有九万六千士兵，五千六百挺机枪和三百四十五门大炮，而土军只有五万一千士兵，四百四十挺机枪和一百六十二门大炮；只是土耳其的骑兵人数较多一些：土耳其有骑兵四千七百二十七名，希腊只有一千三百名。此外，希军还控制了铁路，并以英希舰队所主宰的爱琴海沿岸为根据地。黑海也为英希军舰所控制。土耳其人只好主要通过遥远的高加索边境来和唯一的朋友——苏维埃国家保持联系。

希军拥有人数和技术上的优势，进展很显著。爱斯克舍希尔和阿菲昂-卡拉希萨先后失守。8月初，土军撤到萨卡里亚河右岸。战线几乎逼近安卡拉城。政府机关曾准备撤退，而一部分则已迁到了开塞利。1921年8月15日，希腊国王君士坦丁颁布了一道军令，结语是：“向安卡拉前进！”

希腊人的胜利看来是有把握了。劳合·乔治甚至在下议院宣称：“希腊在其获得胜利之后是不

能满足于色佛尔条约的；它应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获得满足。”罗马尼亚政府为了想发一笔唾手可得的横财，因而正式宣布，如果罗马尼亚得到协约国相应的委托的话，它也准备去对付土耳其人。

所有这些打算原来都是错误的。充满着民族热情 and 争取独立的正义战争意识的土耳其人民，是能够抵挡住武装干涉者的强攻的。土耳其人称之为“萨卡里亚大战”的萨卡里亚河上的顽强的战役，延续了二十二天（从1921年8月23日到9月13日）。土耳其人在有才干的最高司令官——穆斯塔法·基马尔的领导下，以昂扬的士气、坚决的战术和灵活的军事领导，对抗希腊人的物质优势。会战以土耳其人的决定性的胜利而告终。希军向安卡拉的进攻失败了。武装干涉者的军队遭到了重大的损失，并撤退到萨卡里亚河左岸。大国民议会因这次胜利而授予基马尔以元帅头衔和“胜利者”（gazi）的称号。 116

萨卡里亚河上的胜利，大大地巩固了大国民议会政府的国际地位。这一胜利向协约国表明，土耳其民族解放运动是一股现实的力量。以前对英国政策就不信任的法国和意大利这时完全确

信，必须同安卡拉谈判。

英国自己也动摇起来了。它不愿承认自己的失败，但又不敢对土耳其采取积极的行动。结果，英国走上了对它极为不利的消极等待的道路，使土耳其人能够团结起自己的力量，从而使希腊人遭受不可避免的灾难。

土耳其人在萨卡里亚河上的胜利的直接后果是法土条约的签订。该条约在1921年10月20日签订于安卡拉。法国政府的特别代表弗兰克林·布翁，代表法方进行了关于签订条约的谈判，所以该约就命名为“弗兰克林·布翁条约”。由于这个条约的签订，法国停止对土耳其进行战争，声明自己在色佛尔条约上的签字无效，并承认了大国民议会政府。

弗兰克林·布翁条约确定了土耳其和叙利亚之间的新的国界线，并把基里基亚划归土耳其，而把亚历山大勒塔区并入叙利亚，但土耳其仍为亚历山大勒塔州保留了某种类似自治的“特别行政制度”。巴格达铁路由巧班比站至奴息本的一段仍留在土耳其境内。土耳其政府同意把这一段铁路以及法国企业家在阿达纳省修建的其他一些铁

路支线的租让权让给法国。而法国也使土耳其人有权沿着从米丹-艾克柏斯至巧班比的一段铁路，即沿着转往叙利亚境内的铁路支线进行自己的军事运输。这给土耳其人造成了重要的战略上的优势。

更重要的是，法国答应立即从基里基亚和叙利亚边界以北的安纳托利亚地区撤兵。这样一来，土耳其就抽调出很大一部分兵力来供西线进行战斗。此外，根据秘密协定，法国把它那时剩余的大量武器和军需品卖给了土耳其人。

显然，佛兰克林·布翁条约对英国是极为不利的。英国政府就此事向法国提出抗议，并谴责法国人破坏了协约国早在1914年所承担的义务：不与敌方签订单独条约。法国人也对英国提出了谴责，说它在近东施行了损害法国利益的单独政策。英法两国之间的关系极端尖锐化了，这便给土耳其造成了额外的优势。

对土耳其人有利的事情是，意大利也在小亚细亚停止了武装干涉。意大利由于深信它既不会得到伊兹密尔，甚至也不会得到贝克尔·萨米贝伊在1921年2、3月间伦敦会议时同意给予的那

些经济特权，于是就宁愿彻底拒绝在安纳托利亚的徒劳无益的开支。1921年秋天，意大利军队撤出了安塔利亚地区，并同安卡拉建立了在表面上非常友好的关系（但是，意大利为了“以防万一”，又在1922年3月和伊斯坦布尔的苏丹政府签订了条约）。

在这个时期，苏土关系大大地巩固起来了。1921年10月13日，土耳其同南高加索各苏维埃共和国，即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在卡斯签订了条约。这个条约基本上重复了莫斯科条约各项规定。1922年1月2日，即在以伏龙芝为首的特别使团到达安卡拉时，土耳其和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签订了同样的条约。伏龙芝这样一位杰出的统帅到达安卡拉这件事情本身，对土军取得进一步的军事胜利具有巨大的意义。土耳其军事统帅部也了解这一点。伏龙芝在苏联人民委员会和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上所作的关于他访问安卡拉的报告中指出：“我有机会了解最重要的军事秘密，我熟悉了土希两国军队的战斗布署，熟悉了两国军队的一切需要，战士的数量，武器的数量和质量，后方的情况等

等。我可以这样说：我对土耳其武装力量的总的了解，几乎和对乌克兰军队的了解一样。”

虽然如此，但土耳其的局势仍旧是紧张的。希腊军队虽然不能发动新的进攻，但毕竟在一些重要的战略阵地上巩固下来了。爱斯克舍希尔和阿菲昂-卡拉希萨仍在他们手中。强大的炮兵阻挡住了土军的道路。基马尔党人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集结兵力和沿着泥泞不堪的道路从远方调运武器和弹药。

作为最高司令官并拥有非常全权的穆斯塔法·基马尔，趁着萨卡里亚河战役后的暂息时机来进行周密的军事准备。但基马尔及其领导的左派，不得不在这个时期屡次击退大国民议会中反动分子的攻讦。“伊斯兰教徒”（教会）曾起来保卫苏丹-哈里法。始终引起他们激愤的是，1921年的《根本组织法》说到了国家的主权，但默口未提苏丹和哈里法问题。伊斯兰教教会的一位代表拿着可兰经在议会的讲坛上大叫道：“我不打算出席除了承认它（即可兰经）以外还承认别的法律的会议。”伊斯兰教教会禁止在学校中设立图画课，他们创办了许多新的教会学校（密德勒塞），并几乎

使整个学校网都受教法部管辖。阿匍和毛拉们在大国民议会中宣称：“宗教就是一切”，“宗教可以征服东方和西方”。“伊斯兰教徒阵线”，使自己同1921年5月组成的名为“护权团”的基马尔议会党团公开地对立起来了。“护权团”内部也产生了反对基马尔的隐秘反对派，他们是由失意将领和前苏丹官僚组成的。当被驱散的伊斯坦布尔议会的议员们，其中包括胡赛因·饶夫贝伊在内，从马耳他岛回到安纳托利亚时（用以交换英国战俘），这个“巴夏反对派”（“将领反对派”）就巩固起来了。他们代表伊斯坦布尔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主张同苏丹妥协。

119 基马尔拥护者本身由于破坏了人民对国民政府的同情，削弱了自己在国内的阵地。他们在安纳托利亚夺取了政权机关以后，丝毫没有满足农民和工人阶级的要求。他们由于害怕共产党的日益增长的影响，便加强了反对共产党人的斗争。还在1921年1月，特拉布松的宪兵就背信弃义地杀害了土耳其共产党人的领导者穆斯塔法·苏布希以及同他在一起的其他十五名著名的党的领导者。安卡拉政府否认自己曾参与这一罪行，声明

这是“群众”的过失。但显而易见，如果不是中央政府，那么至少也是地方当局鼓励了罪犯。萨卡里亚河战役以后，对共产党人的迫害愈益加强了。基马尔党人极力用这种办法，来消除民族资产阶级在争取民族解放运动领导权方面最严重的敌人。从而他们便加强了反动派的势力。

封建教权反对派更为大胆地力求向协约国投降。他们责备穆斯塔法·基马尔“独裁”。伊斯兰教教会提出了挑衅性的要求：或者立即进攻，或者立即媾和。在当时情况下，两者都会使民族解放运动遭受失败。基马尔懂得这一点，因而坚决地拒绝了这两个方案。

将领反对派的头子们采用了更为巧妙的方法进行活动。他们意识到不可能公开地提议同土耳其独立的主要敌人英国妥协。在土耳其人中，从指挥官到不识字的农民，人人都知道：希腊人不过是冒名顶替者，而实际上是英帝国主义在对土耳其进行战争。一位土耳其军官这样判定了情况：“是的，打击我们的是希腊的手套，但里面却是英国的手。”

但在基马尔党人中却有一个派别（当时还很

软弱)，其拥护者证明说：如果不是英国，那么其他西方国家，首先是土耳其人的“传统的友人”——法国以及国际联盟也能给土耳其以全面的支持，但安卡拉和莫斯科之间的过于紧密的联系妨碍了这样做。这个派别的拥护者在当时的政治术语中名为“西方派”。他们中间那时已有阿里·费特希、贝克尔·萨米、萨拉兆格鲁，以及苏土友谊的其他一些隐蔽的（后来是公开的）敌人。

在“西方派”的帮助下，法国人屡次设法使安卡拉政府改变苏土关系的性质。在这方面的顽固企图早在佛兰克林·布翁于安卡拉进行谈判时就开始了。“西方派”当时第一次表明了明确的立场：同佛兰克林·布翁签订的条约必须与苏土莫斯科条约相对立，现在已经是用同西欧列强的亲近来代替同苏维埃俄国友好的时候了。

这些企图的详细情节没有透漏出来，但土耳其和外国的报纸当时都报导说：大国民议会举行了几次激烈的秘密会议，结果，三个部长提出了辞呈，其中包括同苏维埃俄国在莫斯科签订了“友好亲善”条约的尤苏夫·基马尔在内。危机的时间不长。尤苏夫·基马尔和另外两位部长在感到

满意后又收回了辞呈。在佛兰克林·布翁条约公布后，安卡拉政府通过其驻莫斯科大使向苏维埃政府特别声明说：这个条约没有包含任何稍许动摇苏土关系的東西，“总之，土耳其的任何一个条约永远不会与俄国人民友好的政策相抵触”。

穆斯塔法·基马尔是巩固同苏维埃俄国友好关系的始终不渝的支持者。还在1920年夏天，基马尔在回答一个反动议员提的、关于安卡拉政府同“布尔什维克”之间关系的性质这一挑衅性问题时就声称：“这是我们自己去找布尔什维克的，并且我们找到了他们……同苏维埃俄国的关系已正式地建立起来了。”一年以后，基马尔在大国民议会上宣布萨卡里亚河胜利的消息时说道：“我们同俄国是朋友。因为俄国承认和尊重我们的民族权利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早。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今天、明天以至将来，俄国始终都能坚信土耳其的友谊。”

虽然如此，但法国人继续企图使土耳其同苏维埃俄国疏远。法土条约签订后，很多各色各样的官方的和非官方的法国代表到达了安卡拉，力图使基马尔党人的土耳其放弃同苏维埃俄国的友

谊。在这些法国代表中，有一个名叫穆仁的上校很有点名气。他在安卡拉住了很长时间，并受到了土耳其领导人的接见，包括基马尔在内。正象后来所查明的那样，他曾建议基马尔缔结法土军事同盟条约，条件是：同英国订立妥协性的和约，土耳其同苏维埃俄国疏远。

121 穆仁上校没有达到法国所预期的结果。穆斯塔法·基马尔在报刊上声明说：只有在法国承认国民公约的条件下，土耳其与法国的关系才能发生作用。换句话说，基马尔拒绝了关于使民族斗争陷于妥协结局的建议。当时，基马尔党人中的激进派没有被法国“朋友”的真正意图所欺骗。安卡拉《新日报》向穆仁上校发表了以下一番值得注意的话，不过没有举出他的名字，该报载称：“外国人！我知道你的才学渊博，我知道你的语言是如此悦耳动听，暴风雨的呼号在你的语言中能表现为温柔的情调，而急流则能变成静静的湖上的涟漪。但在你的话中我也听到了帝国主义的钟声……我要用自己的钢镰刀割掉这座钟的舌头，我要用自己的铁锤打碎钟壁，我要用自己的铁犁把它的碎片埋葬到地里。”

英国人要土耳其人妥协地解决问题的企图也是没有成效的。英国政府宣布它在希土战争中保持“中立”，建议土耳其人同希腊人签订停战协定，但在进行关于缔结最后和约的谈判时希军所占领的领土仍归希腊人保有。对此，安卡拉政府提出占领军在停战之前立即撤出安纳托利亚作为先决条件。结果协议没有达成。

希腊的处境是最为困难的。希腊人在萨卡里亚河战役后，立刻就想退出危险的冒险事业。但英国不准希腊停止武装干涉。劳合·乔治继续以小亚细亚的资源，甚至以圣索非亚大教堂来愚弄君士坦丁及其大臣们。国王君士坦丁也怕希腊军队退出安纳托利亚会彻底地破坏他在希腊的威信，这种威信本来就因萨卡里亚河上的失败而大大地动摇了。在希腊国王君士坦丁及其首相古纳利斯看来，唯一能使希腊体面地退出小亚细亚的办法，就是取得伊斯坦布尔。在这种情况下，国王和希腊保皇党人的威望才可恢复，放弃在小亚细亚已经占领的土地（希腊无论如何也不想交出的伊兹密尔除外）才不致在希腊引起不安。

由于国王君士坦丁的这种政策，希腊政府于

122 1922年7月宣布伊兹密尔区为“伊奥尼亚自治保护地”。同月，从安纳托利亚战线调来的几个营补充了驻色雷斯的希腊军队，并开始向通往伊斯坦布尔的方向集结。同时，君士坦丁国王和古纳利斯请求协约国准许希腊军队进入伊斯坦布尔。

不出所料，希腊侵占伊斯坦布尔的意图遭到法国的激烈反对。法国驻伊斯坦布尔高级专员颁布了一道用武力阻止希军挺进的命令。意大利也提出了抗议，并把海军派到了伊斯坦布尔。甚至含糊其词地谈过希腊要求的“客观正义性”的劳合·乔治，也被迫对希腊人声明说：他们进入伊斯坦布尔是不会被允许的。

这是希腊外交面临灾难的最后进程。这时土耳其统帅部已完成了军事准备。希腊人在安纳托利亚的兵力在数量上仍比土耳其多，但各种武器的配备对土耳其人来说，比在1921年要有利得多。希腊人现在共计有十三万支步枪、八千零六十挺机枪、三百四十八门大炮和一千三百把马刀；而土耳其人共计有九万八千六百七十支步枪，二千八百六十四挺机枪，三百二十三门大炮和五千二百八十六把马刀。特别重要的是，编为独立骑

兵军团的土耳其骑兵的优势。土耳其人在武器的数量上几乎和希腊相等，这种情况也很重要。土耳其人如今也有为轰击爱斯克舍希尔和阿菲昂-卡拉希萨要塞所必需的重炮了。最后，希腊人由于把一部分军队调往色雷斯而削弱了自己在安纳托利亚的力量，这是对自己不利的。

土耳其人进攻的准备工作是在极秘密的状态中进行的。前线上笼罩着寂静的气氛，表面上没有一点变化的征兆。为了掩饰起见，穆斯塔法·基马尔甚至在安卡拉的报纸上宣布说：1922年8月25日，他将在安卡拉举行“茶会”招待国会议员和外国的外交官员。实际上，基马尔这时正在前线，而在预定举行“茶会”那天，他已沿着迂回道路到达了前沿阵地。

基马尔所拟订的作战计划的基础是，完全消灭敌人的兵力，解放伊兹密尔和整个安纳托利亚。土军统帅部决定把主要打击放在阿菲昂-卡拉希萨地区。1922年8月25日夜里，最高司令官基马尔、西线指挥官伊斯美特和总参谋长费夫西来到了这里——阿菲昂-卡拉希萨以南十五公里的科詹·捷比高地。黎明时进攻开始了。希军的工

123 事全被猛烈的炮火摧毁了。土耳其步兵从阵地上发起冲锋，而骑兵则从侧翼包抄希军。到傍晚时，希军阵地就被突破了。8月27日，土军占领了阿菲昂-卡拉希萨。同时，希腊人的爱斯克舍希尔兵团也受到了打击。土耳其游击队在希军的后方发动起来了。

希军统帅部束手无策。土军的进攻是出乎希腊人意料之外的。希腊人因处在敌国领土，未能安排好侦察工作。希军总司令哈詹尼斯蒂斯将军，在土耳其进攻开始时甚至还不在于前线。他逍遥自在地在伊兹密尔，而当他知道这一事件时已同部队失掉了联系。希腊政府用电报下令撤去哈詹尼斯蒂斯的职务，并任命占领爱斯克舍希尔阵地的军团司令官特里库皮斯将军为总司令。但特里库皮斯实际上已不可能执行总司令的职务了。土耳其人已截断了他的军团同阿菲昂-卡拉希萨军团的联系。

希腊军队完全处于张惶失措的状态中。士兵不再听从指挥官了。希腊人民不需要同土耳其人作战的这种信念，老早就在希腊士兵中传播着。进攻中的土耳其军队，在车站建筑物上看到了希

腊士兵所写的这样的大字标语：“把我们送到这儿来的那些人真该死！”

8月30日，在多姆鲁-佩纳尔附近发生了最后一次决战，这在土耳其历史上称之为“总司令的战役”。土耳其军队迎头痛击干涉者的残部。希军狼狈逃窜，沿途抢劫和焚烧土耳其的城市和乡村。两天之后，土军占领了爱斯克舍希尔和乌沙克。希军总司令部和特里库皮斯将军都向土耳其人投降了。希腊军队在以后的几天内便逃到了海岸。零星的希军残部也从安纳托利亚沿海城市急忙地撤退了。9月9日，土耳其军队进入了伊兹密尔。穆斯塔法·基马尔发表宣言说：“军队从地中海岸边向全国祝贺”。全安纳托利亚的人民都热烈地庆祝胜利。按照大国民议会的决定，从1920年起放在主席团桌子上作为志哀标记的黑色桌布被取掉了，换上了平常的绿色桌布。

到1922年9月18日，在安纳托利亚的希腊军队完全被肃清了，而9月20日，希腊总参谋部在雅典发表公告说：“小亚细亚的战事已告结束。”

第三章

124

土耳其共和国的建立

一 木达尼亚停战协定

英希武装干涉的可耻破产，对帝国主义国家产生了惊人的印象。十分明显，遭到失败的不仅是希腊军队，而且也是协约国的整个近东政策，首先是英国的政策。色佛尔和约被土耳其的刺刀捣得粉碎。希腊的上层分子不得不首先受到惩罚：军队中爆发了起义，国王君士坦丁放弃了王位，以古纳利斯首相为首的五个大臣以及前总司令哈詹尼斯蒂斯都被交付军事法庭审讯，并被处决了。英国在小亚细亚冒险的破产也有着严重的后果。劳合·乔治大大地破坏了自己的威信（他也由于爱尔兰事件而苦恼着），以致不久以后便离开了首相职位。

现在，英国已经不能再幻想瓜分土耳其了。

英国政府所争取的唯一的東西，就是那怕只是局部地“挽救面子”，不让醉心于军事胜利的土耳其军队冲入盟国军队所占领的海峡地区和伊斯坦布尔。所以，英国政府在希军被击溃以后，立即建议穆斯塔法·基马尔让土耳其军队停留在达达尼尔海峡附近，不要破坏海峡的“中立”区。法国和意大利也了解：在目前这种场合下，问题涉及整个帝国主义西方的利益。它们赞同了英国的要求，虽然它们拒绝对土耳其人使用军事威胁，但仍旧给与英国人以外交上的支持。

基马尔首先答复英国人说：他丝毫不知道土耳其领土上有甚么“中立”区；他看不出还必须把东色雷斯从希腊占领下解放出来的自己的军队有停止前进的可能性。于是，因1921年的谈判而为土耳其人所知名的法国外交家弗兰克林·布翁，便来到伊兹密尔会见了基马尔。他不惜作出很多诺言，大谈法国对土耳其的友好情感，并以协约国中所有国家的全权代表资格向基马尔保证说，土耳其将不经战斗而获得东色雷斯。基马尔同意缔结停战协定，并命令军队停止前进。

1922年10月3日，在马尔马拉海岸的木达

尼亚城召开了缔结停战协定的会议。西线指挥官伊斯美特巴夏代表土耳其，英国、法国和意大利驻伊斯坦布尔的高级专员代表协约国。希腊代表迟到了，实际上他并未参加谈判。但这件事情未使任何人感到惊奇，并且也没有人理会它。协约国已不再掩饰：实质上是它们而不是希腊进行了反对土耳其人的战争。

尽管有弗兰克林·布翁的保证，同盟国还是企图避免立即把东色雷斯交给土耳其人。但军事的和政治的局势对协约国决不是有利的。海峡地区只驻扎一些力量薄弱的英国卫戍部队。英国政府曾向自治领请求军事援助，但得到的却是坚决的拒绝。英国无产阶级展开了广泛的运动，抗议在东方继续进行战争。

法国和意大利也没有表示出给予英国以军事援助的任何意图。伊斯坦布尔城的防卫力量也是很薄弱的。因此，当伊斯美特巴夏为了回答协约国阻碍移交东色雷斯的企图而中断了谈判，土耳其军队向海峡实行示威性的进军时，盟国便让步了。它们同意让土耳其的行政机关和宪兵队进入东色雷斯，并且只是请求把盟国军队撤出伊斯坦

布尔的期限延长到缔结最后和约的时候。

在木达尼亚，盟国代表们同土耳其人谈话时所用的腔调，已经完全不是他们四年以前在摩德洛司说话时那个样子了。英国高级专员哈林顿将军几乎是央求伊斯美特说：“巴夏阁下，我们是要走的，但是我们希望体面地走。”

1922年10月11日，木达尼亚停战协定签订了。根据该协定的条件，希腊军队立即离开了东色雷斯。土耳其的“宪兵队”进入了该地，可是，不论就形式或装备来说，宪兵队和普通的安纳托利亚军队没有丝毫区别。伊斯坦布尔和海峡在缔结和约以前仍然由盟国占领。但就是伊斯坦布尔也大大地改变了自己的面貌。在那里施行了基马尔的行政管理。伊斯坦布尔的买办们急忙使安卡拉相信自己对民族事业的忠诚。甚至显然完全丧失了幽默感的苏丹瓦希德丁，也决定庆祝土耳其的军事胜利，并且为了这个目的，还在前任马耳他总督、英国元帅普罗米尔陪同下（只是在不久以前英国人还向马耳他流放过基马尔党人），前往清真寺。在苏丹去清真寺时担任仪仗队的土耳其军官们，很特别地“欢迎了”自己的君主；他们背向着

苏丹，并大声高呼：“穆斯塔法·基马尔巴夏万岁！”

二 苏丹制度的废除

反对外族侵略者的武装斗争乃是这样一个共同的目的：它把全体土耳其人民团结在一起，使安纳托利亚资产阶级夺取了人民运动的领导权。在希腊军队从安纳托利亚被驱逐以后，共同的目的已经达到了，这时原来参加统一民族阵线的各个阶级的未来道路，开始日益分歧。

劳动群众期望，在争得独立之后，也能取得社会地位的改善。农民的首要任务是希望获得土地，从封建剥削、高利贷者、包税人和富农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工人则希望劳动保护，缩短劳动日，提高工资，有权罢工和组织工会。农民和无产阶级的利益曾要求基马尔革命沿着民主的道路发展。

但是，安纳托利亚资产阶级进行解放土耳其的斗争，并不是为了使劳动群众摆脱剥削，而是力图确立自己的阶级统治。与地主土地所有制有着

千丝万缕联系的土耳其资产阶级，对于最微小的土地革命的尝试和土地改革都是深恶痛绝的。它同样地热中于维持土耳其工人野蛮的劳动条件和政治上的无权地位。劳动日、工资、妇女和儿童的劳动的任何调整，都会给安纳托利亚的工商业者带来直接的物质损失。

而成立阶级性的工会以代替中世纪的行会，尤其是共产党的加强，更威胁到这个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斯大林说：“基马尔式的革命是民族商业资产阶级的上层革命，它是在反外国帝国主义者的斗争中产生的，在其继续发展中实质上是反对农民和工人、阻碍土地革命发生的。”^① 127

民族战争刚一结束时，基马尔党人就不再掩饰自己对共产党的态度了。1922年秋天，在安卡拉召开的土耳其共产党代表大会被驱散了，许多共产党人遭到了迫害。基马尔党人也解散了自己御用的“共产党”，因为现在已不再需要它了。这个假共产党的首领们，不久就占据了政府中的显要职位。

^①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231页。

农民仍然没有从基马尔党人那里获得任何实际的东西。甚至封建的“什一税”和包税制也没有废除。当战争还在进行时，农民自己几乎没有提出他们的阶级要求。个别的孤立的发动并未具有群众性。而到战争结束时，整个政权机关都牢牢地掌握在安纳托利亚资产阶级和农村剥削者上层分子手中。因此，基马尔党人便能拖延土地问题的解决。

但与此同时，安纳托利亚资产阶级需要根本地改组土耳其国家。不废除封建神权的君主政体，就不能在较长的时期内保证维持民族独立。为了资产阶级独立自主的发展，必需建立本国工业，建筑新的铁路，成立民族银行，摧毁伊斯兰教狂信者和极端反动分子的势力，并介绍土耳其去吸取欧洲的文化与文明。以基马尔为首的基马尔党人的基本核心，是安纳托利亚资产阶级的这些趋向的体现者。这些意图，是同以前加入统一的基马尔集团的封建教权派分子的利益有着尖锐矛盾的。反动的伊斯兰教教会、半封建主—地主、库尔德斯坦的部落酋长，则力求完全保持中世纪的关系。他们的目的是恢复苏丹—哈里法的政权。同

外国资本家有密切联系的伊斯坦布尔买办资产阶级同他们联合起来了。这个阶级在安纳托利亚的代理人，是反对基马尔的一些巴夏和前苏丹的官僚所组成的一个集团（“将领反对派”）：卡兹姆·卡拉贝基尔巴夏、阿里·符亚德、胡塞因·饶夫贝伊、列菲特巴夏、阿德南贝伊（后面两个人是伊斯坦布尔基马尔党人的代表）等人。

128

外部威胁的消除，加速了基马尔阵营中这些意见分歧的出现。安纳托利亚资产阶级争取建立世俗的资产阶级国家的斗争，使基马尔及其集团同封建教权派分子的关系更加尖锐了。反对外国资本家专横势力的斗争，加深了同伊斯坦布尔买办分子以及与将领反对派的矛盾。

基马尔党人在改革国家制度道路上的第一个步骤，必然是解决苏丹制度问题。在民族战争时期，基马尔党人故意地维持苏丹制度的虚名，虽然苏丹早已失去了实际的权力和任何道义上的威望。早在1921年，伏龙芝在自己的旅行日记中就已指出：“对待苏丹的态度是很有趣的……人们如同对待去年的雪一样对待苏丹。这不仅是对待现在的苏丹穆罕默德第六，而且是一般地对待苏丹

制度的思想。最近三年，这个国家养成了没有苏丹也能办事的习惯，并且看到世界的基础也不会因为废除苏丹而震撼。”^①

现在，在战争结束以后，这种虚名对于基马尔党人来说不仅是多余的，而且也是危险的。反动分子认为，苏丹是与安卡拉的激进意图相对立的。苏丹政府继续存在于伊斯坦布尔，并把自己说成是所谓土耳其的“合法政府”。宰相正式声明说，安纳托利亚和伊斯坦布尔之间今后不应发生意见分歧，因为“胜利已恢复了统一”。

帝国主义列强也企图利用当时存在的（固然只是在形式上）两个政权。它们召开了缔结最后和约的会议，向安卡拉和伊斯坦布尔——苏丹政府——都发出了邀请。苏丹政府力求组成一个统一的代表团。这种强求是荒唐的，但它也是解决苏丹制度问题的一个推动力量。

129 一批议员把一个法案提交大国民议会讨论，该法案载称：从1920年3月16日（英国占领伊斯坦布尔的日子）起，“苏丹制度永远进入了历史的

^① 《伏龙芝全集》第1卷，莫斯科1929年俄文版，第304页。

范畴”。1922年11月1日审查了这个法案。封建教权派的压力还是如此强大，以致基马尔党人既不敢提议把哈里法制度也同苏丹制度一并废除，也不敢宣布土耳其为共和国。因此法案规定使苏丹制度同哈里法制度分立，并且只是废除苏丹制度，即取消国王的世俗政权。但就是这一提案起初也遭到了反动分子的激烈反对。

大国民议会中的教会代表证明说，世俗政权和教权的分立是同伊斯兰教相抵触的，不能剥夺国王的基本的君主特权。讨论是很激烈的。在辩论中发言的基马尔，首先引证了历史事实，指出哈里法制度是从十六世纪起在土耳其存在的，在此以前只有苏丹制度；他指出，法案并没有损害教法等等。但是，当基马尔看到所有这一切对于教权派都不发生作用的时候，他就引用了更简单的论证。他说，“主权和政权都不能用学院式的讨论而让给任何人。主权是通过实力、威力、甚至是通过暴力获得的。奥斯曼的子孙们通过暴力取得了对整个土耳其民族的统治权，他们在六百年间统治了土耳其民族。现在，这个民族起来反对篡夺者，把他们打回老家去，并且着手实现理应

属于它的主权。这是一个既成事实。假如所有在这里集会的人……都了解这一点的话，那末在我看来，他们就会极其明智地行事。否则，现实反正是会表现自己的。不过到那时可能有些人的脑袋是要分家的。”

然后，基马尔又解释了“问题的神学方面”，但一个最狂热的反对者——阿匈打断了他的话。这个阿匈从自己席位上叫喊道：“请原谅，我们完全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考虑这个问题的。而现在我们全明白了。”

此后，法案再没有遇到公开反对意见了。在当天，即1922年11月1日，法案通过了。苏丹制度的废除也就自然而然地终止了伊斯坦布尔政府的存在。最后一个苏丹——瓦希德丁，被迫乘英国的一艘军舰逃亡国外。大国民议会选举了奥斯曼王朝的另一个亲王——阿布杜尔·美志德为“全体伊斯兰教徒的哈里法”。

三 洛桑会议

安卡拉政府曾准备出席洛桑和会。这个任务

并不是容易完成的。这次会议必须调整土耳其与其历来的压迫者们的一切关系。正如后来基马尔所指出的：“弄清这一笔肮脏的糊涂帐并不是那么简单的。”

洛桑会议于1922年11月20日开幕。参加会议的一方是土耳其，而另一方是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希腊、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美国派遣了自己的“观察员”。此外，苏维埃共和国——俄罗斯、乌克兰和格鲁吉亚——以及保加利亚都被邀请参加海峡问题的讨论。

苏俄政府对于限制苏维埃代表团只参加讨论海峡问题一事，提出了抗议，并且指出，苏维埃诸共和国有权并且应该参加洛桑会议的全部工作。但协约国利用自己的“邀请国”地位，拒绝了苏维埃政府的要求。它们害怕苏维埃代表团影响会议进程。它们力图在其今后对土耳其的外交斗争中孤立自己的敌人。

土耳其人是以胜利者的姿态出席洛桑会议的。色佛尔和约被彻底地和永远地废除了。在洛桑谁也不能再谈论它了。虽然如此，可是土耳其人在外交会议的绿色的桌子上，比起他们在战场

上是要软弱得多的。这主要是因为：在英希干涉土耳其时期被重大的矛盾所分裂的协约国诸国家，到洛桑会议时又重新联合起来了。在洛桑，它们面临着一个根本问题——帝国主义剥削土耳其的问题，即保持土耳其作为半殖民地国家的问题。

骤然看来是很奇怪的：法国自己曾促使英希干涉的失败，现在在洛桑则表现为土耳其的最凶恶的敌人。法国在土耳其的投资最多，是最关心奥斯曼债务的一个国家，比所有其他国家更加力求在土耳其保存领事裁判权制度，这个制度曾赋予居住在土耳其境内的外国人以特殊优惠和特权，使他们不受土耳其法院管辖、免税等等。影响土耳其同法国的关系的还有这样一种情况：法国帝国主义者的政治打算被粉碎了。在希土战争时期，法国人曾给予土耳其人某些援助（或者，更正确些说，曾反对过英国和希腊），但他们决不希望土耳其获得完全的胜利。他们希望土耳其人削弱到这样程度，以致法国能够彻底地使土耳其人服从自己的势力，并因自己的“援助”而从土耳其人那里获得新的租让权和特权，把土耳其变成法国的殖民地，并且使它加入反苏的“防疫线”。

但是，土耳其人对干涉者获得的不是局部的胜利，而是全部的胜利，并且要求不受任何限制的政治独立。所有这一切就打乱了法国的计划，并且同威胁法国物质利益的因素结合起来，使法国人变成了土耳其最凶恶的敌人。

可是，不久以前土耳其的公开敌人英国，却抱着稍微不同的态度来到了洛桑。最使英国感兴趣的领土问题，有很大一部分已被土耳其的武装力量解决了。这些问题的解决是不利于英国的，但现在谈论这些已经为时太晚了^①。而使法国人

① 早在这以前，英国和土耳其的最尖锐的矛盾之一——关于阿拉伯国家的问题已经消除了。侵占阿拉伯国家的意图在英国的帝国主义政策中曾占有显著的位置。这种意图是英国摒弃奥斯曼帝国“完整性和不可侵犯性”原则的重要原因，并且使阿布杜尔·哈米德时代，特别是青年土耳其党人时代的英土关系异常地复杂化了。而基马尔党人对待这个问题却是另一个态度。基马尔党人比较轻易地容许了阿拉伯国家脱离土耳其。基马尔不承认奥斯曼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而是站在土耳其民族主义的立场上，在他看来，阿拉伯人对于土耳其人来说只是一个累赘，是同外部世界发生冲突的源泉，并且是土耳其封建买办反动势力的同盟者。因此，基马尔党人在国民公约中放弃了对阿拉伯领土的要求，并宣称：阿拉伯人应该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

关心的财政和经济问题，对英国来说只具有次要的意义。在英国人看来，海峡和摩苏尔仍然是重要问题；英国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正是放在这些问题上。的确，英国外交当局在洛桑善于这样地利用法土矛盾，以便在与英国有利害关系的问题上从土耳其人那里取得有利于英国的决定，同时迫使法国人必须二者择一：或是面临谈判决裂的威胁，或是向土耳其人让步，后者对法国人来说也同样是不愉快的事情。

132 甚至从纯粹的外交程序方面，英国人也马上利用了自己的优势地位。洛桑会议的主席和协约国所有代表团的“灵魂”，是英国外交大臣寇松勋爵。寇松用灵活的手腕使法国人受到土耳其人的打击。他把这次会议的工作分成三个委员会：第一委员会研究领土和政治问题，特别是关于海峡问题，这是首先使英国人感到兴趣的问题，并且英国人在这个问题上这时并未意料到来自土耳其人方面的不可克服的障碍；在这个委员会中寇松自己担任主席。第二委员会研究外国人在土耳其的地位问题，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委托给意大利的一个代表担任。第三委员会研究当时最尖锐的问

题，即财政和经济问题；这个委员会的主席是委托一个法国人担任的。由此可见，土耳其同协约国之间没有解决的那些最不愉快的难题，被委托给应该由法国代表担任主席的那个委员会了。

寇松把对英国有头等重要意义的问题同英国不太关心的其他问题分开以后，从而就给自己创造了极其有利的形势。他使土耳其人和法国人发生冲突，而他自己则担任仲裁人角色。寇松的希望在一定程度上(但不是全部)实现了。土耳其人确实力求同英国达成协议，并且在他们认为不太重要的问题上对英国作了让步，以便保证土耳其自己同法国在财政和经济问题上，即在最尖锐的问题上发生的争端中，如果得不到英国支持，那末至少也使英国人采取中立态度。

财政和经济问题，从土耳其人的观点看来具有头等的重要意义，这是由于土耳其人把经济独立的意义理解为国家主权的基础。由此应该得出结论：为了保障本地的资本主义免遭外国资本的侵害，必须消除原来土耳其半殖民地的依赖形式：领事裁判权制度、奥斯曼债务委员会的特权和外国承租者的特权等等。其次，基马尔党人考虑到，

133

苏丹-哈里法制度以及伊斯坦布尔的买办资产阶级(按民族说是土耳其的,因为这时外族买办资产阶级已被土耳其人从其原来的阵地上排挤出去了),是外国人在土耳其的代理人。但是,安纳托利亚资产阶级只是在把伊斯坦布尔从外国占领下解放出来以后,才能对付自己的劲敌和政治敌人——伊斯坦布尔的买办。

英帝国主义者考虑到这种情况,同时鉴于在基马尔党人中间有一个有势力的反动派别存在,这一派希望以同英国接近的办法来消除同苏联友好的必要性,因此,英国在洛桑会议上便强迫土耳其向英国作一些重要的政治上的让步。

其中最重要的是在海峡制度问题上的让步。在洛桑会议上,英国人要求土耳其人解除海峡的武装,禁止在那里驻扎武装力量,并且允许任何一个国家的军舰不分昼夜、不受任何限制和不作任何警告而通过海峡。

这个要求反映了英国在黑海方面的侵略计划。苏维埃代表团提出了相反的建议。苏维埃国家在海峡问题上面临着一个基本任务——保障苏维埃国家在黑海海岸的安全,使其免遭外部的威

胁。因此，苏维埃政府甚至没有为苏联的军舰要求某种例外（由于黑海的特殊性，毫无疑问，苏联的军舰是有权要求例外的，黑海不是一个通路，而是一个闭锁性的区域，是一个没有第二个出口的绝路），建议对所有国家的军舰实行海峡封锁，只是土耳其除外，并给土耳其保留在海峡设防和驻扎陆军、海军等权利。

苏维埃政府的这种立场，是同苏联与土耳其之间当时存在的牢固的友好关系有机地联系着的。

在洛桑会议开幕以前，列宁在对《观察家报》和《曼彻斯特卫报》的记者的谈话中，阐述了苏维埃政府对海峡问题的观点。

列宁说：“我们关于海峡的纲领（目前当然还只是大致的）包括下面几点：

第一、满足土耳其的民族愿望。我们认为不只是民族独立的利益要求这样作。五年来我们在一个举世罕见的多民族的国家里解决民族问题的经验，使我们完全相信，在类似的情况下，对待民族利益的唯一正确的态度就是予以最大限度的满足，就是创造条件来排除在这一方面引起冲突

的一切可能。我们的经验使我们坚信，只有对各个民族的利益极其关心，……才能建立语言不同的人们、特别是工人农民的互相信任；没有这种信任，无论各族人民之间的和平关系，或者现代文明中一切珍贵事物的比较顺利的发展，都是绝对不可能的。

第二、我们的纲领包括不论平时和战时都不准任何军舰通过海峡的主张。这是所有的国家，不仅是紧邻海峡的国家，而且是其余一切国家最直接的贸易利益。应该指出，目前全世界发出的和平主义的词句……非常多，而大多数国家，……决心采取实际的、哪怕是最简单的保障和平的措施的却非常少。我们希望在这个以及这类问题上尽可能少来一些一般的声明、庄严的诺言、华丽的口号，而尽可能多来一些真正能够导致和平的最简单最明确的决定和措施，既然现在还谈不到彻底消灭战争的危险。

第三、我们关于海峡的纲领主张商船有充分的航行自由。我认为，讲了上面那一段话以后，再来解释和具体说明这一点完全是多余的。”^①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3卷，第347—348页。

苏联代表团在洛桑的处境是很困难的。在由寇松担任主席的那个委员会的最初几次会议上，就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在海峡问题上，苏联代表团和英国代表团之间实际上面临着一个决斗的局面。土耳其人在这个问题上很快就退出了同英国人的争执。土耳其代表团的团长伊斯美特巴夏起初在口头上赞成苏维埃政府的观点，并且说，苏联的提案对于土耳其最为适合。但他很快地就向英国人示意说：与英国的关系不会由于这个问题而尖锐起来。伊斯美特显然是指望换取英国人在土耳其人认为更为重要的其他问题上支持土耳其。土耳其代表团的这种行为更加肯定了寇松的顽固性，因此英国和苏维埃俄罗斯之间的协议也就未能达成。所有公正的观察家都很清楚，不经苏维埃政府的同意，任何海峡制度都是不能持久的。苏联要求的客观公正性也是很明显的，因为

135

这个要求符合所有黑海国家的利益，其中包括土耳其在内。但土耳其代表团却表现了明显的投降意图，而英国在当时则拥有一个重要的保证：英军仍然留驻在海峡地区和伊斯坦布尔。

苏联代表团与英国人所进行的决斗带来了一

定的好处，因为它揭穿了英国的帝国主义计划。但英国人利用其盟国和附庸国的支持和土耳其人的让步态度，顽固地力求通过自己的草案。在讨论开始后不久，寇松勋爵由于耽心苏联代表团的发言对世界舆论发生进一步的影响，便极力把关于海峡问题的讨论移交到所谓专家小组委员会，苏联代表团事实上已被从这个小组委员会中排除了。换句话说，英国人转而同土耳其人进行了幕后的勾结。

到1923年1月末，土耳其和英国在没有苏联代表参加之下，最后谈妥了海峡问题。土耳其人基本上接受了英国的提案，只是给自己提出了一些次要的，或者甚至是很不重要的改善（在海峡委员会中担任主席，把某些地区从非军事区中划分出来等等）。

然而，土耳其人关心的其他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富产石油和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区摩苏尔的归属问题，就是属于这些问题之列的。土耳其人以摩苏尔区是在1918年10月30日之后，即在摩德洛司停战协定已经签订之后才被英军占领的这一事实作为论据，要求英国人把摩苏尔归

还土耳其，而英国人则断然拒绝归还摩苏尔，并且声明说，摩苏尔应归并给受英国委任统治的伊拉克国家。

英国人和土耳其人之间在摩苏尔问题上的争执拖延下来了。土耳其人同法国人之间在条约草案中最尖锐的问题——如财政经济问题，关于领事裁判权制度，关于外国承租者的地位等等——上的争论，也同样毫无结果地拖延下来了。

1923年2月初，会议陷入了绝境。于是，寇松勋爵部分地为了影响土耳其人，而部分地则为了使法国的国际形势复杂化（这时英国在西欧政治问题上同法国有严重分歧），挑拨了洛桑谈判的破裂。寇松曾假装愤怒，故作姿态，好象土耳其人不肯让步使他异常气愤，并向土耳其代表团提出了最后通牒：或是立即签订由协约国诸代表团所拟就的条约草案，或是他、寇松离开洛桑。在当时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土耳其代表团团长伊斯美特巴夏拒绝了寇松的最后通牒。 136

土耳其人拒绝最后通牒引起了谈判的破裂。1923年2月4日，寇松勋爵离开了洛桑。继他之后，其他代表也离开了。

如果说寇松的目的之一是给法国人造成困难，那末他已达到了这一目的：当时法国的形势被鲁尔事件弄得复杂化了，而洛桑会议的失败使法国政府的处境更加困难。

同时，伊斯美特巴夏在洛桑所遇到的困难，使土耳其国内的反动势力也活跃起来了。反动派责难伊斯美特，说他推行了错误的政策，并且极力设法使他丢掉外交部长的职位。反对基马尔的派别也成长起来了。还在民族战争时期，国会中就形成了一个封建教权派的集团。它自称为“护权协会第二团”，以区别于基马尔的“第一团”。在“第二团”幕后活动的，是以只在形式上留在“第一团”的饶夫和卡拉贝基尔为首的将领反对派。当时担任大国民议会政府首脑职位的胡赛因·饶夫，曾极力设法使自己被任命为出席洛桑会议的土耳其代表团团长。基马尔拒绝了这一提议，并通过大国民议会推选伊斯美特为候选人。但是，土耳其代表团也包括有买办的拥护者：“西方派”哈森贝伊（现在姓萨卡）和里萨·努尔博士（他是“自由与和睦”党的不久以前的党员，参加了基马尔党，但保持着反动的信念）。前青年土耳其党人政府

的大臣、“统一与进步”党委员会的著名活动家查维德贝伊被任命为财政专员。在洛桑谈判中，这些代表之关心伊斯坦布尔买办的利益，因而也就是西方资本家的利益，远甚于关心土耳其独立的利益。留在安卡拉担任总理的胡赛因·饶夫及其在部长和议员中的一些拥护者，也影响了发给洛桑的一些指令的内容。

反对派利用在洛桑的土耳其代表团所遭遇的困难，加强了对基马尔和伊斯美特的攻击。例如，“第二团”曾把载有下述内容的法案提交大国民议会：只有在现今土耳其境内出生的土耳其人，或在同一个选区连续居住五年的土耳其人，才能被选为议员。这个法案是直接反对基马尔的，不过只是采取了稍微隐蔽的形式而已。大家都知道，基马尔是生在萨罗尼加，也就是生于在巴尔干战争以后脱离了土耳其的领土上，并且就其军人的职业来说，他也不可能从1917年至1922年连续不断地住在同一个选区。在讨论这个法案时基马尔发了言，他在自己的讲话中声明说：“虽然我的出生地点是在我国现在的领土疆界以外，但从我自己这方面来说，在这一点上是没有任何恶毒的

预谋或任何的罪责……如果我们的敌人得以完全实现自己的计划，那末就是那些在提案上签字的先生们的出生地也可能会——愿阿拉拯救我们免遭此难——处于我国的疆界之外。”在结束发言时，基马尔愤怒地质问提案的起草人说：“先生们，谁委托你们剥夺我的公民权？我从这个讲台上把这个问题正式告知你们的最高会议，告诉这些先生们的选区的居民，告诉全国，并要求答复。”

不言而喻，法案是被绝大多数票否决了，但法案被提交大国民议会这一事实本身，也说明了反动派日益嚣张的活动。“第二团”并未放下武器。它在“保护哈里法制度”的幌子下，毫无拘束地鼓吹君主政体的复辟。有一个教权派的议员在安卡拉发表了一个小册子，其中证明说，既然“哈里法依赖于国会”，那末“从自己方面来看，国会就应该依赖于哈里法”。因此，在小册子中建议让哈里法领导大国民议会。

青年土耳其党人也活跃起来了。在伊斯坦布尔，尽管有1918年关于自动解散党的决定，“统一与进步”党委员会却恢复了公开的活动。这个委员会甚至在市政选举中还获得了多数票。留在

伊斯坦布尔的协约国占领当局庇护青年土耳其党人，把他们看作基马尔党人的反对者。原来的青年土耳其党人的“三雄”——恩维尔、泰拉特、詹玛尔——已经不在人间了。他们在1918年逃亡国外以后就没有回到土耳其。恩维尔在布哈拉的巴斯马奇分子^①的队伍中，不光采地结束了自己的末日。泰拉特和詹玛尔被恐怖分子达什纳克党人刺杀了。但在土耳其出现了青年土耳其党人的其他一些领导者。在世界大战期间以自己的投机活动而著称的前青年土耳其党人的大臣卡拉·基马尔和查维德等人，表现得特别积极。在青年土耳其党人出版的报纸上，公开地进行宣传，拥护哈里法制度，主张给予西方资本家以广泛的优惠。

133

对于基马尔党人来说，惊惶不安的局面已经造成了。他们决定团结自己的力量。就是抱着这个目的，1923年2月，即在洛桑会议中断时期，在伊兹密尔召开了“经济大会”。基马尔党人为使劳动群众同情自己，在大会召开期间，认真地对社会上进行了笼络人心的宣传。他们号召工人组

^① 巴斯马奇——土耳其文，意思是进行袭击。这里是指1918—1924年间中亚细亚的反革命匪徒。——译者

织工会，把农民称为“国家的主人”。基马尔在自己的演说中声明说：“犁就是著述土耳其历史的笔。”

伊兹密尔经济大会只限于说出一些冠冕堂皇的词句，并没有给农民和工人阶级带来任何东西。但是，在伊兹密尔通过的实际决议，完全符合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大会规定，国民经济方面最近的任务，是从简单的手工工场和小生产过渡到大工厂；最快地建立那些国内有原料供应的工业部门，特别是纺织和食品工业部门；提高民族工业同西方资本的竞争能力，为此必需广泛地采用国家的保获关税政策；创办国家银行。

大会通过了一项所谓“经济公约”。就基马尔党人的意图和这一名称本身来说，这个文件应该是1920年国民公约的补充。国民公约是为争取真正的独立而斗争的旗帜，与此相同，经济公约所负的使命是团结土耳其人的力量，以便为争取经济上的独立而斗争。很明显，事实上经济公约没有反映而且也不能反映全民族的愿望。在经济方面，各种不同阶级的利益无论如何是不能一致的。基马尔党人实质上企图用经济公约，强迫土

耳其劳动人民接受自己的“民族统一”的主张，阻碍阶级斗争的发展。由于这个缘故，经济公约有着不大的和暂时的意义。它不很明确地反映了基马尔党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基本特征，表示对伊斯兰教徒的宗教情感的尊敬，并且只是模糊地拟定了争取建立民族工业和巩固国家经济的未来斗争的路线。

139

经济公约是以别具特色的风格写成的，它充满了基马尔党人所固有的关于土耳其人的高尚品质的词句。在公约中宣称：“土耳其在自己的疆界以内有着纯洁的独立性，是世界和平与进步的基石之一”，“土耳其人民决不从他们以生命和鲜血为代价而争得的民权中让出任何东西”，同时宣告说，“土耳其人民……正在做很多工作，他们的原则是为保证国民收入而日日夜夜地工作。”公约中有一条天真地断定说：“由于多次战争和苦难的结果，人口减少了，因此土耳其人渴望增加人口，他们将经常预防细菌、污浊空气、传染病和污秽。”但是，基马尔党人在经济公约中没有忘记强调自己的基本思想，那就是“土耳其人不分阶级和信仰，彼此真心相爱。”

伊兹密尔经济大会提高了基马尔党人在安纳托利亚资产阶级中的威信。基马尔及其拥护者巩固了自己在大国民议会中的阵地。1923年4月1日，基马尔争取通过了关于规定新选举的法律。这样就创造了摆脱“第二团”攻击的可能性。同样的，基马尔和伊斯美特，现在也能更坚决地击退将领反对派在关于同协约国在洛桑会议上发生意见分歧问题上的攻击。协约国本来指望借助饶夫以及基马尔的其他反对者就能使土耳其人作进一步让步，现在它们也丧失了这种可能性。

不久，基马尔正式宣布成立真正的政党，以代替护权协会。除了实际任务——领导国会改选工作——之外，这个政党的建立有着比较一般的目的：从组织上巩固基马尔党人的威信。这个政党采取了“人民党”的称号。基马尔公布了九项“原则”以代替纲领。九项原则不是很明确的。其中谈到民族主权，整个权力集中于大国民议会，但也谈到哈里法制度是全体伊斯兰教徒的最高体制。对于资产阶级则允许颁布一项“关于奖励个人首创精神”的法律。关于什一税只是这样说了一下：“引起民怨”的什一税的征收方法将“彻底地

加以改进”。

人民党变成了基马尔党人手中的最强有力的组织武器。大国民议会的改选使人民党占了绝大多数。“第二团”连一个议席都没有得到。 140

同时，协约国由于没有可能利用基马尔党人阵营内部的意见分歧，并了解到对土耳其施加军事压力也不可能，因而便得出结论说，必须恢复谈判。况且，基马尔党人在洛桑会议休会期间又展开了积极的外交活动。他们十分顺利地同英国人进行了秘密谈判，又很成功地吓唬了法国人。正好在这个时候，基马尔到土耳其的南方，即到叙利亚边境作了一次示威性的旅行。在这里，与土耳其毗邻的叙利亚地区，有一个居民代表团向他提出了“保护”他们的请求。这真正地吓坏了法国人，尤其是因为他们在叙利亚的地位是极不巩固的。

此外，基马尔党人在这个时期还采取了灵活的外交手腕，它不仅影响了法国人，而且也影响了英国人。这就是1923年4月初，他们给予美国人捷斯特和加拿大人肯尼迪以建筑铁路、港口和开发矿藏等广泛的租让权。按照租让条件，捷斯

特获得了建筑铁路的权利，特别是在1914—1918年大战以前法国资本家的租让权所扩及到的那些地区。摩苏尔地区也包括在捷斯特的租让权之内。土耳其人仿佛是对法国人和英国人说：“你们不愿意同我们达成协议，那就根本甚么也得不到；我们现在不考虑任何旧的租让权，不考虑你们的任何利益，把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租让给美国人。”捷斯特的租让权实际上是不能实现的，因为捷斯特没有必要的资本。大概就是土耳其人自己也怀疑能从这件事情上得到什么东西，但从外交的观点看来，这一步骤是很成功的^①。

1923年4月末，洛桑会议重新开会了。这一次协约国力求排斥苏联代表团参加会议，借口是关于海峡问题不再提出讨论了。这时正是英国保守党人对苏联实行极其敌对的政策时期，是寇松提出的几次最后通牒和诸如此类的反苏发动的时期。来到洛桑的苏联代表沃罗夫斯基同志之被刺杀，正好着重指出了会议组织者的横霸行为和协约国政策的整个的反苏方针。

^① 在洛桑条约缔结后，土耳其政府取消了捷斯特的租让权。

在洛桑会议的第二届会议上已经没有寇松勋爵出席了。协约国的其他国家也派遣了次要的代表。同土耳其人的谈判是以比较和平的腔调进行的，但会议还是拖延下来了，这主要是由于在财政经济问题上的意见分歧。

法国人不得不一步一步地退出自己原先的阵地。一个以前在希土战争时期经常支持土耳其人反对英国人的法国记者，这时对土耳其人怀着穷凶极恶的态度写道：“法国永远不能设想，可以依靠牺牲它的利益来缔结这个和约。”

最后，在长期的讨价还价和令人厌倦的讨论之后，谈判结束了。1923年7月24日签订了洛桑和约以及该和约的一系列附件。这些文件中主要的是：（一）主要和约，（二）海峡公约，（三）关于土希两国交换居民公约。

洛桑和约共有一百四十三条，分为五编。第一编——“政治条款”——确定了土耳其的疆界，土国与战后其他条约的关系以及公民权利；第二编——“财政条款”——解释了奥斯曼国债问题以及某些与财政有关的其他问题；第三编——“经济条款”——它涉及到外国承租者在土耳其境内的

财产利益，关于契约、合同、私人债务、工业、文学、艺术所有权等问题，规定了民事案件三审程序等等；第四编包含了交通道路和卫生问题的规定，第五编是各种次要的规定（关于战俘、战死军人之坟墓等等），以及条约批准程序的规定。

洛桑和约并没有解决土耳其发展的一些重要问题。例如，摩苏尔问题就是属于这些问题之列的。和约中说，这个问题依然是悬而未决，并且说，以后土耳其和英国将在国联参加下以双方谈判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这就预先决定了土耳其要失去摩苏尔。

142 关于奥斯曼债务问题，在洛桑和约中仍然是一个悬案。对这个问题最为关心的法国人，不得不确认土耳其人有权把奥斯曼债务的一部分转嫁给从奥斯曼帝国中分离出来的一些国家（叙利亚、伊拉克、巴勒斯坦），以及在巴尔干战争以后脱离了土耳其的一些地区。但土耳其在原则上同意偿还奥斯曼债务的主要部分。关于这个问题的规定都被载入了条约。虽然如此，但仍旧没有规定用什么货币偿还：用黄金还是用纸币法郎。法国人坚持要求用黄金支付，而土耳其人则要求用纸币

法郎支付。在后一种情况下，有利于土耳其人的差别每年约为一亿法郎。土耳其人在使关于支付货币问题成为悬案之后，就有可能把开始偿债的期限无定期地拖延下去。虽然如此，但同意偿还苏丹债务，乃是土耳其方面对西欧资本主义集团的重要让步。

在洛桑和约的其他部分，土耳其人也做了某些让步，但是这些让步并没有重大的意义。例如，固定了五年的关税率，不很明确的关于聘请外国法律顾问的条款（土耳其人并没有履行这一项），保留外国人在两年半之内在沿海航行的权利等，这些都是属于让步之列的。

而洛桑和约中最重要之点，首先是土耳其在自己的民族和人文疆界内保持了统一。国民公约所要求的领土，除摩苏尔和亚历山大勒塔以外，都归土耳其人所有。在洛桑已经没有谈到什么划分一些自治区、“国际地带”或“势力范围”的话了。

土耳其的很重要的成就是，所有领事裁判权条款——法律的、财政的、经济的及所有其他的，即外国人在土耳其的整个特殊的制度——都被完全地和无条件地废除了。以前外国人对土耳其所

实行的财政监督也被取消了。在土耳其的外国承租者们失去了自己的政治权利。洛桑和约没有给外国提供干涉土耳其内政的任何借口。

从这个观点来看，洛桑和约标志着土耳其的独立得到了国际上的承认。

可是，在由一个单独的公约所载明的海峡问题上，如上所述，土耳其外交当局对英国人做了143 过于重大的让步，并且这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在洛桑的解决是不利于土耳其的。与主约同时签订（1923年7月24日）的海峡公约，规定了这样一些通过军舰的规则，它们给所有的黑海国家，其中也包括给土耳其本身，造成了严重的威胁；特别是公约规定：设立“国际海峡委员会”，虽然这个委员会不象色佛尔条约规定那样拥有广泛的职权，并且也不是由外国代表，而是由土耳其代表担任主席，但它毕竟还有监督土耳其政府运用军舰通过海峡的规则的职责；完全解除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两岸以及马尔马拉海一定地区和岛屿的武装；限制伊斯坦布尔卫戍部队的人数为一万二千人；外国军舰在平时与战时都可日夜地、没有任何限制地并且不用预先通知即可自

由通过海峡，而不管它悬挂甚么旗子和吨位大小如何；只有在土耳其本身参战的情况下，它才可以不允许敌人的军舰通过，但中立（就其对土耳其的关系来说）国家的军舰反正还保留有通过海峡的自由。由于海峡必须解除武装，并且土耳其也不能在那里驻扎炮兵和其他兵种，所以，土耳其实际上也不能够实现这种“权利”——不让敌人的军舰通过。

这些规定破坏了土耳其的主权，并且使土耳其在某一外国进行侵犯或作海上示威时，在军事方面易受攻击。

洛桑公约给苏联造成了直接的、严重的威胁，因为它使外国有可能在任何时候把自己的海军开入黑海。固然，公约对外国军舰驶入黑海预先规定了某些限制。公约中规定，“任何一国通过海峡开往黑海方面的最大限度的海军力量，不得超过黑海沿岸国家一个最强大的舰队。”可是，这里也附加了许多保留条件，它们使得这种“限制”几乎化为乌有。

第一，公约规定了一个保留条件说，在任何情况下，各国可以把“不超过三艘军舰而且其中任

141 何一艘也不超过一万吨的舰队驶入黑海”。可见，不管黑海国家“最强大的舰队”（即苏联的黑海舰队）怎样，即使这个舰队是很小的，“各国”反正一样可以向黑海派遣三艘重巡洋舰。很可能，英国在对非黑海国家的舰队驶入黑海时提出这种“限制”，只是力图限制自己在协约国中的同盟者（法国和意大利）。

第二，公约又规定了保留条件说，一旦发生战争时，在土耳其保持中立的情况下，对于列强不能采用任何限制“来损害它们作为黑海上的交战国的权利”。这就意味着，如果苏联遭到某些强国侵犯的时候，那么甚至都不能使用公约对非黑海国家军舰进入黑海所规定的那些宽大的限制“来损害它们作为交战国的权利”。

最后还应该注意，对军舰进入黑海的限制是单独涉及到每一个国家的。因此，每一个国家可以把在力量上与苏联舰队相等的舰队驶入黑海，而协约国诸国在联合起来之后，就可以开动比苏联舰队强两倍或三倍的舰队。而在这个时期，两个、三个或更多的国家联合起来反对苏俄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

总之，在洛桑规定的海峡制度，很显然用来反对苏联的利益。因此，苏联没有批准洛桑公约。

在洛桑签订的另一个单独的公约，就是土耳其与希腊之间关于交换居民的公约。关于希土两国交换居民的建议早在1913年，即在巴尔干战争之后就被提出来了，但在那时这个建议并未得到发展。在土耳其进行争取独立的战争时期，生活本身全面地提出了关于小亚细亚的希腊和土耳其居民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住在小亚细亚的希腊人是相当多的——约二百五十万人。就出身、宗教和语言来说，他们属于希腊人，但同时又有土耳其国籍。由希腊统帅部和希腊政府所煽起的沙文主义，引起了小亚细亚的很大一部分希腊人积极地反对土耳其人，而土耳其当局也煽动土耳其人对希腊人的仇视。因此，本来就存在的希腊与土耳其的民族纠纷，在战争时期达到了异常紧张的局面。在军事行动时期，很多希腊人牺牲了，而由于军事当局的迫害，牺牲的人则更多。到战争结束时，彻底解决关于住在土耳其的希腊和平居民问题已成为绝对必要了。这种解决办法就是希

145 土两国之间交换居民。关于交换居民的公约，早在 1923 年 1 月 30 日洛桑会议第一次会议时，即由伊斯美特巴夏代表土耳其和维尼塞洛斯（他在君士坦丁国王退位以后重新执政）代表希腊签订了。

对于“被交换的”居民来说，这是非常痛苦的。必须把一百五十万属于土耳其国籍的希腊人，从小亚细亚迁往希腊。约有五十万属于希腊国籍的土耳其人，必须迁往土耳其。只有那些在摩德洛司停战协定签订以前就住在伊斯坦布的希腊人和居住在西色雷斯的土耳其人，才不需要交换。

迁移这样多的人口自然会引起巨大的苦难。家家户户离开了已经住惯了的地方，实际上也就是离开了故乡，失去了所有的不动产，而有时也失去了大部分动产；人们被迫迁移到别国，他们既不了解那里的生活条件，甚至也常常不懂那里的语言，这对于两国居民来说，乃是一场真正的灾难。

而关于交换居民公约的政治意义，在于它废除了土希关系中旧有矛盾的主要之点，并打开了土希两国接近的道路（后来，帝国主义列强为了自

己的目的而利用了这一点)。

洛桑和约中一些重要的规定就是如此。洛桑和约尽管有一些让步和妥协之处，但一般说来它还是意味着新土耳其的胜利，土耳其的独立已取得国际承认了。

四 共和国的宣告成立和 哈里法制度的废除

1923年8月间，第二届大国民议会开幕了。穆斯塔法·基马尔又被一致地选为大国民议会的主席。新国会的第一个措施，就是对“变色佛尔为洛桑”的军队表示感谢。大国民议会几乎未经讨论就批准了洛桑条约。在这之后，正如条约所规定的那样，协约国就开始从伊斯坦布尔和海峡地区撤退自己的军队。

1923年10月6日，土军进入了伊斯坦布尔。土耳其已从干涉者手中解放出来了。教权派和买办分子极力设法使前苏丹和现在仍旧存在的哈里法的所在地——伊斯坦布尔重新成为政府的中心。基马尔党人决定杜绝在这一方面的任何企图。

146 1923年10月13日，大国民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根据这项法律，安卡拉被宣布为土耳其首都。随后，基马尔党人终于决定把土耳其称做共和国，而实际上土耳其从召开西发斯代表大会时起就已经是共和国了。

尽管国会中基马尔的反对派被大大地削减了，但就是在这一次也并不是没有一些斗争的。当基马尔企图宣布成立共和国的最初的消息传出以后，右派的首领们便在幕后谈论说：这一措施“为时过早”，并顺便进行有利于哈里法的宣传鼓动。在宣告共和国成立之前不久，发生了这样一件值得注意的事件。被迫辞职的前内阁首相胡赛因·饶夫对基马尔说：“当我辞去内阁首相职务的时候，我坚决地请求您加强并巩固国家的最高职位”。饶夫在这里所说的“最高职位”，当然是指哈里法而言的。但这时基马尔已决定宣告成立共和国了，因此他很注意即将进行的“国家最高职位”——总统的选举；他平心静气地向饶夫“保证”说：“请您相信，我将做到您所说的这件事情。”

可是，在大国民议会上没有任何一个反对派公开地发言。1923年10月29日，土耳其被宣告

为共和国。大国民议会选举了胜利者穆斯塔法·基马尔为总统。伊斯美特巴夏组成了第一届共和国内阁。

现在剩下来的事情，只是消灭奥斯曼帝国国家制度的最后一个标志——哈里法制度了。哈里法制度，在相当一部分土耳其资产阶级中间培植了土耳其哈里法对整个伊斯兰教世界享有最高权力的思想，至于在教士和残余的封建主当中就更不用说了；因而在阿布杜尔·哈密德和青年土耳其党人时代，便产生了泛伊斯兰主义的倾向。但哈里法制度之所以更加危险，还因为国内的一切反动势力都纠集在它的周围。反对改革的教士把哈里法制度看作自己的靠山；企图镇压民族解放运动并使土耳其回到苏丹统治时代那种半殖民地地位的西方帝国主义，也利用了哈里法制度；它联合了力图用合法的和非法的手段来推翻共和制度并恢复苏丹制度的土耳其买办和半封建主分子。

哈里法阿布杜尔·美志德，逐渐与土耳其国内和国外的不满基马尔政权的分子建立了联系。这时以印度、埃及和其他国家伊斯兰教组织名义发表的“保护哈里法”的宣言公布出来了。前苏丹

的某些大臣和将军们向阿布杜尔·美志德上书表示忠诚，称阿布杜尔为“陛下”，而自称为“忠实的士兵”。列菲特巴夏赠送哈里法一匹马作礼物，并且在附去的密码电报中也没有忘记补充说，他“怀着恭顺而诚恳的忠心吻陛下的手”。大国民议会中的右派首领们证明说，如果土耳其没有哈里法，那它将失去作为一个主导的伊斯兰教国家的作用，因而也就大大地降低自己在国际上的地位。其中有些人（例如饶夫）甚至访问了伊斯坦布尔的哈里法，并且和他进行了政治会谈。

所有这一切都造成了君主政体复辟的直接威胁，并且不能不引起基马尔党人的忧虑。当饶夫访问哈里法这个问题被查清了的时候，伊斯美特在大国民议会人民党党团会议上说明了基马尔党人对哈里法制度的看法。伊斯美特宣称：“作为国务活动家，我们永远也不能忘记哈里法的军队曾把我们整个国家变成了废墟。我们永远也不能忽视建立新的哈里法军队的可能性还没消除……我们的国家再也不能容忍这种情况了。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哈里法的‘费特瓦’曾使我们遭受世界大战的惨祸。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当民族希望举

行起义的时候，哈里法的‘费特瓦’曾引起了比来自敌人方面更为可恶的对民族的诽谤言论。”伊斯美特接着十分明确地警告说：“如果一旦某一个哈里法突然想企图影响我们国家的命运，那么我可以斩钉截铁地说，我们将把他的脑袋拿下来。”

阿布杜尔·美志德也象最后一个苏丹瓦希德丁一样，被迫离开了土耳其。1924年3月2日和3月3日，人民党党团和大国民议会先后决定废除哈里法制度，并把奥斯曼王朝的一切成员从土耳其驱逐出境。在当天夜里，最后一个哈里法阿布杜尔·美志德爱芬吉带着自己的妻妾、男女公子和很多奴仆被押送出国境。

由此可见，在十六个月里所采取的三个政治措施——消灭苏丹制度、宣告共和国成立和废除哈里法制度——彻底地解决了土耳其的国家制度问题。土耳其从原先的封建神权的君主政体变成了资产阶级民族共和国。 148

1924年4月20日，大国民议会通过了土耳其共和国宪法。新宪法彻底地废除了《米德哈特宪法》和1921年的《基本组织法》，并在国内巩固了共和制。

第 四 章

1.19

基马尔党人为争取国内的政治垄断地位而斗争

一 文化和生活方面的改革。 反动分子的反抗

安纳托利亚资产阶级掌握政权以后，力图在封建神权的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上，建立一个世俗的、新的土耳其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封建主和教权派分子阻挠这样做。伊斯兰教的传统、教会的物质和精神影响，是反动分子手中的有效武器。基马尔党人的目的，是要剥夺反动派这个主要的武器。在这条道路上的第一个步骤便是宪政改革：废除苏丹制度，宣告成立共和国，取消哈里法制度。但这还不够。基马尔党人制定了一系列的改革计划，旨在废除国家制度和生活方面的中世纪残余。

在废除哈里法制度以后，基马尔党人便立即开始实行自己的改革计划。与废除哈里法制度的同时，1924年3月，又撤销了宗教与教会地产事务部，封闭了伊斯兰教教会学校，即所谓“密德勒塞”。一个月以后，政府废除了根据教法而生效的宗教审判法规。施行按欧洲形式制订的新民法典的准备工作也开始了。全国各地都展开了摒弃中世纪的风俗习惯、争取妇女解放和欧化的运动。

反动分子不经斗争是不放弃自己阵地的。他们在土耳其的势力当时还很大。在这方面，下述事实即可为例证。在1924年宪法中包含了这样一条：“伊斯兰教是土耳其的国教”。1924年秋天，一个新政党成立了。参加该党的有以卡拉贝基尔、阿里·符亚德和饶夫等人为首的、脱离了人民党和反对基马尔的将领与官僚集团，也有“护权第二团”的成员。新政党从笼络人心方面考虑，自称进步共和党^①。事实上它既反对进步，也反对共和。进步党人要求降低进口货物的关税，放弃建立民族工业，给予外国资本以“一切必要的保障”；

^① 由于这个缘故，基马尔的人民党也改名为人民共和党。

他们坚持还都伊斯坦布尔^①，并扬言“拯救土耳其之道是伊斯兰教”，让妇女参加社会生活是“淫乱”。而进步党人的真正目的则是推翻基马尔，恢复青年土耳其党人和苏丹的政权。

进步党人主要是代表港口城市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但他们和封建教权派分子也有密切的联系。

前青年土耳其党——“统一与进步”委员会的首领们，在进步党人背后进行活动，期望重新掌握政权。1924年11月，进步党用各种手腕使伊斯美特辞职。阿里·费特希担任了总理职位，他也是人民党党员，但以其“温和”和明显的同情西方资本家而著称。费特希给予反动分子以实际上是完全的行动自由。后者广泛地展开了反对基马尔的宣传鼓动，特别是在伊斯坦布尔和落后的安纳托利亚东部各省。结果很快地就表现出来了。

1925年2月，东南地区爆发了以酋长赛义德

^① 进步党人在其要把首都迁回伊斯坦布尔的强求中，获得了几乎所有一切所谓大国外交代表的强有力的支持。在多年之中，这些国家的大使馆和公使馆都一直留在伊斯坦布尔，不愿迁移到安卡拉，事实上抵制共和国的首都。

为首的库尔德人部落的叛乱。基马尔党人无能解决土地和民族问题，使反动分子得以利用库尔德斯坦的农民和牧民自发的不满情绪，并赋予运动以反对共和国的性质。叛乱者提出了“恢复教法”和放弃基马尔党人所实行的革新等要求。同时还有恢复苏丹制度和哈里法制度的计划。

与此同时，英国帝国主义者的代理人也在这里进行活动。英国极端热衷于鼓励反对基马尔的叛乱，因为英土两国由于摩苏尔问题而发生的冲突这时正进入尖锐的阶段。如前所述，洛桑和约使这个富产石油和从战略观点来看也很重要的地区的归属问题悬而未决。以后英土之间的双边谈判也没有达成协议。土耳其坚持要把摩苏尔归还给它，因为它宣称，摩苏尔是英军在摩德洛司停战协定签订以后占领的，因而也是不合法的。英国则拒绝归还摩苏尔，它指出，摩苏尔属于伊拉克版图。结果问题被交由国际联盟审查。 151

在这个时候，赛义德酋长的叛乱，给安卡拉政府造成了严重的威胁。赛义德的胜利就会导致反动政府的建立，在土耳其恢复旧制度，随之也就会恢复土耳其以前对西方列强那种半殖民地的

依赖地位。但是，即使在失败的情况下，赛义德的叛乱也给在国联里否决土耳其的要求造成了方便的借口。英国外交当局指出，库尔德人对安卡拉不满，因此不能把很大部分也为库尔德人所居住的摩苏尔区交由安卡拉政府统治。

由于这些原因，库尔德人的叛乱获得了英国人的积极支持，后者既灵活地利用库尔德人的宗教成见和落后性来进行投机，又狡猾地利用基马尔党人忽视少数民族合法利益的情况来玩弄手腕。英国的奸细和赛义德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供应他武器和金钱。库尔德人和埃索尔的队伍从伊拉克开到了土耳其领土。

基马尔党人唯恐备受压迫的土耳其农民也参加叛乱，因而终于决定实行人们久已等待的税制改革。1925年2月17日，大国民议会废除了实物的封建什一税——阿沙尔。代替什一税的货币税也是很重的，但包税制度的废除至少是减少了贪污舞弊的可能性。此外，停止征收实物税，一般地也便利了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与废除什一税的同时，安卡拉政府又取缔了法国人的烟草专卖权，后者的存在曾给土耳其的民族利益带来了

损害。这两个措施巩固了安卡拉政府的威信。安纳托利亚的农民没有支持反动的叛乱。

尽管如此，叛乱在库尔德人地区还是扩大了。赛义德酋长占领了大城市哈尔普特（今天的厄拉西格），包围了东部各省的中心狄雅巴基尔。

于是基马尔党人便转而采取更为坚决的行动。1925年3月3日，即废除哈里法制度一周年时，伊斯美特巴夏又受命担任总理。大国民议会恢复了民族战争结束时撤销的非常法庭（独立法庭）。在伊斯坦布尔和其他若干地方，反动分子受到了审讯。正规军也出动对付库尔德人。 152

1925年4月，库尔德人的叛乱被镇压下去了。独立法庭判处赛义德酋长及其同谋者死刑。由于法庭的侦讯揭露了赛义德酋长与进步党人的联系，政府遂宣布解散进步共和党，并封闭了它在各地的所有分部。很多支持进步党人的伊斯坦布尔的报纸也被查封了，而教权派的记者则被交付独立法庭审讯^①。

^① 在受到独立法庭审判的伊斯坦布尔的反动记者中，也有胡赛因·查希德（雅尔琴）。他当时被判终身流放，但在1927年获得了赦免。

尽管镇压了库尔德人的叛乱，土耳其在摩苏尔问题上却不能捍卫自己的立场。一方面，已经显著加强了“西方派”（哈森贝伊、萨拉兆格鲁、秀科留·凯伊等）的影响，在这里表现出来了。他们夸大参加开发摩苏尔石油将能获得的利润的规模，保证解决与英国的争端将能使外资流入土国，并能为土耳其进入国联扫清道路，而获得贷款的希望也是和国联相联系的。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列强对土耳其政府施加强大的压力。在英国唆使下的法西斯意大利露骨地威胁土耳其人，打算利用英土冲突在安纳托利亚进行抢夺。如所意料，审查摩苏尔问题的国联是站在英国一边的。法国也协助英国人。

只有苏联在道义上支持土耳其，于1925年12月17日，即在英土冲突的危急关头，与土耳其签订了友好中立条约。可是土耳其认为，它不能为了摩苏尔而对英国进行战争。

冲突以1926年6月5日英土条约的签订而告终，条约规定，摩苏尔最后地归属伊拉克。土耳其人所得的补偿是微不足道的，总共只占伊拉克政府将从摩苏尔石油中所得收入的10%。英国

不仅使自己控制了摩苏尔，而且由于消除了英土关系中这个最后的争端，便能指望逐渐与土耳其接近，继之而来的就是土耳其摒弃民族政策和与苏联的友谊。

1926年，基马尔党人又制止了买办分子一个反动的政治运动的爆发。1926年夏天，在伊兹密尔组织了一个谋杀基马尔的阴谋。阴谋者的首领，是前“统一与进步”委员会的委员们以及与他们有联系的前进步党的活动家们。阴谋被揭发了。伊兹密尔和安卡拉的独立法庭先后判处了几个人的死刑。“统一与进步”委员会的几个有名的活动家被处决了；其中有前苏丹政府财政大臣查维德，前青年土耳其党人政府粮食大臣卡拉·基马尔等人。

这样一来，封建主、教权派和买办分子便遭到了政治失败。这就使得基马尔党人能更为大胆地进行改革，以便把土耳其变成一个世俗国家。早在1925年夏天，即在镇压了塞义德酋长的叛乱以后，基马尔就立刻开始作改革的准备。基马尔作了一次全国旅行，在旅行期间他进行宣传鼓动，要人们摒弃过去的残余。下面这个事实即已引起

了强烈的印象：当基马尔停留在一个城市（卡斯塔蒙努）里时，他手拿礼帽走出了汽车。礼帽在旧土耳其是“异教徒”的象征，人人都可以用石子和泥土投掷一个头戴欧式礼帽的伊斯兰教徒。出门不戴帽子也同样算是侮辱宗教的行为。基马尔以身作则，发出信号来反对这些成见。在其旅行期间的谈话中，他指出必须放弃带礼拜帽——以前它使土耳其人和欧洲人有所区别，摒弃各式各样的为东方所特有的衣服。除了一般的理由以外，为了宣传采用欧式的服装，基马尔还引用了这样的论据：礼拜帽是进口货，为此土耳其必须付出外汇，而欧式帽子和欧式衣服可以完全用本地的材料制成。

土耳其全国各地立刻开始采用欧式服装和欧式帽子。在欢迎基马尔的游行时，人们当众烧毁礼拜帽。有的地方警察则强迫地从公民头上摘下礼拜帽。几天之内商人们便卖完了礼帽和便帽的全部存货。工场都来不及完成定货。有些善于营利的伊斯坦布尔商人，从国外运回了两车厢礼帽。

不久以后土耳其政府颁布了一项法令，禁止

带礼拜帽；所有的国家职员必须带礼帽，在办公室里应该脱帽，应按欧洲人那样相互打招呼等。¹⁵⁴这个法令还禁止非正式的教士穿着教士服装。这样一来，教长和托钵僧在居民的心目中便失去了自己的特殊性，而变成了普通公民。

随后，托钵僧团和它们的寺院也被取消了，这就更加破坏了反动分子的势力。这些僧团以前在土耳其的国内生活中起过很大的作用。它们的数目很多。有“舞蹈僧”、“咆哮僧”、“旋转僧”和其他等等托钵僧。每一个僧团都有自己的“圣者”——教长，全体托钵僧都盲目地服从他。教长们由于利用居民中落后分子的盲目信仰，因而拥有很大的势力，特别是在中央政权没有足够的支柱的那些边远地区。在有些地方，教长的命令远比政府的指示执行得迅速、切实。教长掌管寺院这种情况也很重要。宗教的“神圣性”使寺院对当局来说是不可侵犯的。尤其是在大多数场合下，寺院就是这个或那个教长的私有财产。所有这一切都使反动分子易于利用托钵僧和寺院来进行反对政府的活动。寺院常常变成反动阴谋的基地。例如，在塞义德酋长的叛乱时就是这样。取消托钵

僧团和寺院，使反动分子也失去了这个影响群众的工具。

1926年，按欧洲形式制订的新民法典的施行，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它废除了以前的伊斯兰教教法规范，特别是禁止了为教法所允许的多妻制。法典规定必须实行普通婚姻以代替宗教婚姻。

1928年，大国民议会把“伊斯兰教是土耳其的国教”一语从宪法中删去了。同时，共和国总统和议员所行的宗教宣誓仪式也为普通仪式所代替。这样，教会与国家就完全分立了。

155 基马尔党人这种反对教会势力的全部斗争，决不是反对宗教本身的斗争。基马尔党人自己曾努力地着重指出了这个区别。在1928年关于修改宪法若干条款的法案的说明中曾特地指出，“毋须使教会与国家分立的原则具有不信宗教的意思”。民族资产阶级变成了土耳其的统治阶级以后，它所渴望的不是消灭宗教，而是使宗教服从资产阶级国家。教会本身日益变成“基马尔党人的”教会。可兰经由阿拉伯文翻译成土耳其文。现在从教堂的尖塔上所发出的传统的“埃萨”（号召

穆斯林祈祷)已不是用“圣者的语言”，而是用普通的土耳其语了。最后，1934年政府又规定一切教士非在教堂祈祷时不得穿着教士服装。阿訇、毛拉、牧师、神父都穿着普通服装出现在土耳其城市的街道上。基马尔党人为了便于同外国发生贸易关系，甚至把千百年来奉为神圣的伊斯兰教徒休息日也从星期五改到星期日。

在教育方面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以前的教会学校——密德勒塞——很少促进教育水平的提高。密德勒塞的学生，即所谓“索夫特”^①，所关心的只是逃避兵役。因此，其中很多人都变成了“永久的大学生”，并且在学习了二、三十年以后，出学校时还是一些半文盲。在取消了密德勒塞和封闭了其他的教会学校以后，土耳其便实行完全的普通教育。

字母的改革也是一项很重要的措施。土耳其人在信奉伊斯兰教时得来的阿拉伯字母，使国内读书识字事业的发展异常困难。阿拉伯字母不是土耳其语所固有的，它没有足够数量的母音字母，

^① 讹传的波斯字“Cyxte”——“烧尽的”，“激动的”，意思是“为求知欲所激发的人”。

书写不便，使商业账目的管理感到麻烦（字母从右向左写，而数字则从左向右写）。关于改用拉丁化字母的建议，在土耳其曾有人屡次提出过，特别是在苏联的几个共和国所进行的字母改革的影响下。伊斯兰教的教士长期反对改革。为绝大多数居民所不懂的旧字母，使教士和一小撮知识分子能把读书识字的垄断权保持在自己手中。可是，基马尔党人既在其他问题上摧毁了教权派的反抗，便也能实现这项改革。基马尔拥护拉丁字母的言论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其就这件事情所发表的一篇演说中，基马尔说：“公民们，我们必须为我们美丽的语言采用新字母。千百年来我们的脑筋一直在这些难以了解的符号的铁钳中遭受折磨，现在我们必须从这些符号中解放出来……请你们立刻学会这些新的土耳其字母。教导全体人民，农民、牧民、搬运工人、船夫学会它们。请把这件事情看作爱国的和民族的职责。”

1928年11月1日，大国民议会通过了关于改革字母的法律，而从第二年起，新的拉丁化字母便牢固地进入土耳其人的文化生活中。

字母的改革以及学校的改造，使居民识字水

平提高了^①。学校增多了，并开办了一些新的高等学校。在字母改革以后，基马尔党人便为土耳其语的“土耳其化”、清除其中的阿拉伯字和波斯字而斗争。同时，创造民族的造型艺术——绘画、音乐、雕塑等等——的任务也提到日程上来了。

土耳其迅速地改变了自己的面貌。在学校里实行男女同校教育。土耳其女子去掉了面纱。女律师、女医生、女法官出现了。1930年，妇女获得了选举市政机关的权利，而1934年则获得了国会的选举权。

1934年，土耳其国会还通过了关于采用姓氏（以前土耳其人只有名字）的法律。这项法律取消了头衔和旧式称号：巴夏、贝伊和爱芬吉。基马尔获得了国会授予的姓氏——阿塔丘尔克（“土耳其人之父”），伊斯美特把他在那儿战胜了希腊人的

^① 可是，直到今天土耳其绝大多数居民还是文盲。根据1935年的官方统计，甚至在伊斯坦布尔这样的大城市里，在男子中识字的只占63.5%，在妇女中占46.3%。1940年，在土耳其学校里读书的只占学龄儿童的28%。根据1943年7月30日《晚报》的报道，在土耳其，识字的男子平均只占20%，妇女占8.2%。在边远地区，识字的人更少得惊人：例如，在雪尔特，识字的男子占6.8%，在麦希，识字的妇女占0.7%。

那个村庄的名字——伊涅纽——作为自己的姓。

土耳其人赋予所有这些改革以政治意义。伊斯坦布尔的《共和报》在采用拉丁字母时期写道：“如果把民族斗争仅仅了解为安纳托利亚的军事行动，那是不正确的……洛桑和约，废除苏丹制度和哈里法制度，宣布成立共和国，司法改革，取消托钵僧团和教会学校，禁戴礼拜帽，制订民法典，——所有这些现象都是民族斗争的不同的后继阶段。”

157 毫无疑问，基马尔党人在国家体制、文化和生活方面所实行的改革，是具有进步意义的。这些改革促进了土耳其民族的巩固，有助于它从封建的社会生活方式过渡到资产阶级方式。可是，改革不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而是在资产阶级领导下进行的，这种情况便使改革具有上层的和不彻底的性质。改革丝毫没有触动生产关系，并且，就是在基马尔党人真正摧毁中世纪结构的那个有限的领域内，也表现出不坚决和不彻底。

基马尔党人由于维护自己阶级的利益，所以，对于人民群众只给予最低限度的、首先是有利于资产阶级本身的文化福利。这就是关于普及读书

识字，一般地关于启蒙运动，关于改变风俗习惯等。需要吸收熟练的劳动力(其中包括妇女)参加新企业，力图扩大国内市场，树立资产阶级的法权规范，——这就是基马尔改革的基础。而关于使人民受到广泛教育的事情，基马尔党人是决不关心的。他们甚至认为这是对自己统治的威胁。

因此，基马尔党人的改革也和整个基马尔党人运动一样，带有资产阶级民族的性质，而不是资产阶级民主的性质。人民群众没有参与文化生活。基马尔党人建立的所谓“人民宫”(它们代替了以前的“土耳其发祥地”)，是处在执政党的严格监督下；它们变成了资产阶级和官吏的俱乐部，变成了沙文主义宣传中心。同时，在自己作品里描写劳动人民艰苦生活的民主作家，则遭到警察和法庭的迫害。

土耳其的妇女也没有得到完全平等的地位。基马尔党人使妇女摆脱了隐居生活和面纱以后，便以法律保持甚至巩固了她们在家庭关系中，在继承、工资等问题上的不平等的法律地位。

甚至土耳其资产阶级本身从基马尔党人改革中所得到的东西，也远不是它客观上所需要的。国

家的欧化主要是盲目地仿效西欧文化和生活习惯的形式。这样做的结果，往往学到的不是资产阶级文化好的方面，而是坏的方面。要知道，土耳其进入自己的“1789年”^①是很迟的，——已在帝国主义时代，这时西欧和美国的资产阶级文化已大为衰落了。基马尔党人在执政以后取作榜样的，正是这种堕落的、颓废的文化。所以，土耳其的资产阶级文化在其以后的发展中，未及繁荣便迅速雕敝，这就不足为奇了。

二 基马尔党人与买办分子的接近。 人民共和党垄断地位的确立

在1925年粉碎了进步共和党和1926年粉碎了青年土耳其党——“统一与进步”委员会的残余之后，基马尔党人便在国内确立了自己的领导地位。伊斯坦布尔的弗隆代^②沉寂了。封建主和

① 1789年是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开始的年代。——译者

② 弗隆代（原出法文，“Fronde”，直意为儿童玩具投石器。），十七世纪法国贵族和资产阶级反对专制制度的运动，此处系指基马尔党人的反对派。——译者

买办分子不敢再来反对基马尔了。安卡拉的政权巩固了。可是，基马尔党人本身在粉碎了反动分子的政治反抗之后，对于买办分子却有了显著的经济上的依赖关系。安纳托利亚的商人在民族战争结束后，首先就渴望参加对外贸易。但在对外贸易方面，伊斯坦布尔资产阶级的势力要强得多：它与西方有悠久的联系，有贸易经验和积累起来的资本。这一切使得安纳托利亚资产阶级在排挤买办分子，在与外界联系中接替他们的地位的同时，在社会关系上也就和买办分子融合在一起，并且在政治上也同他们接近起来了。

早在1927年，安纳托利亚的资产阶级和买办分子接近的最初一些征候就表现出来了。这首先是撤销了独立法庭；残存的进步党人、将领反对派的成员、反动的伊斯坦布尔的记者，都逐渐获得了大赦。失宠的首都——伊斯坦布尔——本身好象也获得了大赦似的。1927年，穆斯塔法·基马尔在民族运动期间破天荒第一次来到了伊斯坦布尔，并且从这时起每年都访问旧都。部长和议员们都效法他的榜样。

后来，基马尔党人同买办资产阶级更加接近

起来。这种接近的表现之一，是土耳其政府对西方资本家所作的让步。1928年，土耳其驻巴黎大使阿里·费特希（这是由于谈判的结果，谈判是由秀科留·萨拉兆格鲁为此而特地前往巴黎进行的）与奥斯曼债券持有人签订了关于以黄金偿债的协定。土耳其承担了力不胜任的重负：债务总数确定为八千六百万金里拉^①，每年支付二百万金里拉，逐年增加；并且必须用外汇支付。土耳其政府在同样苛刻的条件下，重新开始偿还苏丹时期的若干其他财政债务。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恢复欧洲的信任”，以期获得新的贷款而做的。但是，贷款给土耳其时所提出的条件，是与它的民族独立不相容的。同时，偿还奥斯曼债务，使土耳其的货币和国家预算处于极端艰难的境地。1929年，在施行新的（提高了的）关税的前夕，伊斯坦布尔的买办分子又以投机的办法运入外国货物（主要是布匹），加深了这种艰难的处境。贸易逆差达到了一亿里拉（纸币），这又引起了土耳其

^① 按 1914 年的等值，一个金里拉等于八卢布五十四戈比。现今的货币单位——纸币里拉——在 1928 年约值八分之一金里拉。

支付差额赤字。

世界经济危机到来了。危机异常严重地影响了土耳其，破坏了它的农业，显著地削弱了人民群众本来就很微弱的购买力。土耳其的里拉急剧下跌。货币崩溃的实际威胁形成了，而对西方资本发生新的奴役性的依赖关系的实际威胁也随之产生了。这一切使得基马尔党人中的一部分爱国人士为之震惊。穆斯塔法·基马尔提出了依靠本国资源的口号。政府成立了银行团以保护里拉，停止偿付奥斯曼债务，禁止外汇出口，大大地减少了各种货物的进口。结果货币崩溃被防止了。

买办分子以及同他们接近的一部分安纳托利亚的商业资产阶级，由于不敢反对基马尔本人，遂掀起了一个反对伊斯美特政府的运动来报复。人们散布谣言说，伊斯美特正“因病”在辞职。伊斯美特公开地辟谣，他声明他的健康情况“颇好”，并且他努力使自己的朋友以及那些“希望他神经疲乏的人”知道这一点。

1930年8月，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反对派集团形成了。阿里·费特希领导了这个集团。他刚从

160

巴黎回国。经基马尔同意^①，他宣布成立一个新党——自由共和党。“自由党人”在很多方面都和以前几个反对基马尔的资产阶级政党不同。他们不是共和制的敌人，没有反对过世俗的改革，没有亲自反对过基马尔。虽然如此，但他们却是些反动分子。费特希要求放弃用土耳其本国的基金建设铁路和工业企业，要求对西方资本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停止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在对外政策方面，他主张“与西方多多的接近”。

新政党博得了帝国主义列强和土耳其一切反动势力的同情。当费特希为了进行鼓动宣传而到

① 基马尔不仅同意成立新党，而且亲自在幕后积极地参加组织新党：他命令几个接近自己的人（他的妹妹马克布勒女士，阿赫美德·阿加耶夫等）加入这个就是反对他的政党，分配该党的领导职位，就有关它的纲领性的言论发出指示，并甚至用自己私人的金钱资助它。现在还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动机支配着基马尔：希望用使反对派合法化的办法来暴露秘密的敌人，或者是真正想创造“两党制”的经验，以便借助“自由党人”来吸引外国的资本。但无论如何，这个手腕证明了国内经济和财政状况的紧张程度已很尖锐，证明了在这个时期甚至基马尔在推行政治方针方面也有动摇的表现。

一当基马尔发现他处在一个放出了很多难以对付的妖魔的魔术师地位时，他便很快地取消了整个这一没有成功的计谋。

达伊兹密尔时，那儿有一群人捣毁了几家政府报纸的编辑部，并有人员的牺牲。自由党人自己焦急起来了。他们完全没有估计到要发生街头斗争。另一方面，伊斯美特在国会里又把绝大多数议员争取到了自己一边。基马尔终究也不支持费特希。结果在1930年秋天，总共只存在了三个月的自由党自动解散了。费特希又回到外交界。

可是，自由党人的失败并不表示买办分子的完全失败。他们继续参加政府的领导，不过只是用别的较为隐蔽的方法罢了。大多数自由党人都回到了基马尔的人民共和党的怀抱。这大概使基马尔党人也就更加易于和买办分子接近起来。固然，接近的过程是进行得很慢的，它延续了好几年。在这个时期，基马尔党人还实现了某些客观上进步的措施。

在消灭了“自由主义的”反对派以后，基马尔的人民共和党又成为土耳其的唯一合法政党了。1931年，该党代表大会通过了一个全面而详尽的党纲和党章。党徽——六个箭头——概述了党纲的主要各点。第一个箭头——“共和制”——表示

101 共和国是土耳其唯一适当的政体形式；第二个箭头——“民族主义”——宣布为争取土耳其的民族独立和提高民族地位而斗争的决心；第三个箭头——“人民性”——宣布人民的主权，同时否认土耳其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第四个箭头——“国家主义”——象征着在国家的帮助和监督之下建立民族工业的意图；第五个箭头——“还俗主义”——标志着世俗的普通国家的原则；第六个箭头——“革命性”——意味着对基马尔革命思想的忠诚。

国家主义在基马尔党人的政策中起过特别重大的作用。它的基础首先是保护政策，即保护新兴的脆弱的土耳其工业，使其免遭西方列强雄厚资本的打击。国家主义是土耳其落后的结果；土耳其的工业开始发展是很晚的，没有国家的支持它就不能巩固起来。

国家主义政策反映了安纳托利亚资产阶级的利益，后者力图在国家预算和国家机关的帮助下建立民族工业，并以此来摧毁外国资本在土耳其市场上的阵地，同时对伊斯坦布尔的买办分子给予最后的打击。因此，国家主义也就引起了帝国

主义列强和它们的代理人——港口城市的资产阶级——的反对。

进步党人和自由党人都反对国家主义。基马尔党人的激进核心对反对派的胜利，以及国家主义原则列入党纲之中（后来国家主义原则与其余几个“箭头”也被列入土耳其共和国宪法中），消除了公开反对这一政策的可能性。但是国家主义的敌人仍继续用迂回的办法进行斗争。

虽然如此，土耳其政府依靠国家主义在经济方面还是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在这个问题上世界经济危机也影响了土耳其。土耳其农产品的出口价值急剧下跌了。因此还必须在更大的比例上削减外国工业品的进口，否则贸易逆差就会导致货币崩溃。1931年，土耳其政府特地规定一份货物清单，限制外货进口。结果，进口从1930年的一亿四千八百万里拉，降到了1933年的七千五百万里拉。这就削弱了国内市场上的外国竞争，提高了对土耳其国货的需求。

苏联所给予的支援，对于发展土耳其的民族工业具有最大的意义。土耳其无论是在争取独立的武装斗争年代，或是在经济斗争时期，都获得

162 了苏维埃国家友好的大公无私的援助。1932年，苏联政府给予土耳其八百万美元的工业贷款，使其得到各种最新式的苏联的生产设备。除了设备以外，苏联的工业还供给土耳其以安装设备所必需的熟练的工程技术人员，各种设计方案和图纸；苏联还培养过土耳其的技术干部。偿还贷款的条件是异常优惠的：贷款应在二十年内以土币里拉偿清，不收利息；这样，土耳其就不要花费外汇来偿还苏联的贷款。

国家主义有助于土耳其民族独立的巩固。一些新的较大的企业，以及甚至前所未有的新工业部门建立起来了。特别是在苏联贷款的基础上曾建设了两个巨大的联合纺织厂——在开塞利和那吉里。土耳其工业的范围扩大了^①。它开始以很多从前都是由国外进口的商品供应国内市场：如砂糖、棉织品、建筑材料、纸张等。连接安纳托利亚东西两部、以及连接黑海和地中海的新铁路，也用国家资金建筑起来了。政府又从外国承租者

^① 1927年，注册工业产品的价值总共是五千八百万里拉，1931年是一亿零五百万里拉，而1939年则已达到三亿三千一百万里拉。

手中赎回了旧有的铁路。其他一些重要的租让企业也被赎回了：如煤矿、港口、公用事业等。

外国承租者对基马尔党人的经济措施，表现出很大的不满。为他们撑腰的帝国主义列强政府和帝国主义报纸都威胁土耳其，预告它会有各种灾难。有些承租者则死抓着自己的“法律”权利，顽固地阻挠土耳其政府赎回他们的企业，而同时也阻碍了土耳其的工业发展和技术进步。外国承租者所经营的铁路日趋衰落，机车车辆没有补充，车站和路道也不修理。直到三十年代初期，在伊兹密尔的主要街道上还继续行驶旧式马车，因为早在十九世纪就获得了这个租让权的外国承租者，坚决不让市政当局在这里采用早在市郊行驶的电车。只是在市政当局找到了一些形式上的借口来控告承租者违反租让条约的某些规定以后，法院才宣告租让权无效。

尽管有国内反动派及其外国鼓舞者的强烈反抗，土耳其政府在巩固国家财政独立方面还是争得了若干成就。当时创办了一个共和国中央银行和其他一些民族银行。根据 1933 年签订的协定，土耳其政府达到了大大减少奥斯曼债务以及——

这是更重要的——确定债务总数和每年支付额的目的，并且不用黄金而用纸币法郎支付。由于以后法郎牌价下跌，土耳其供应了数量不多的商品就偿清了奥斯曼债务^①。

保卫民族独立的意图也表现在土耳其的对外政策上。在这个时期，土耳其政府大体上是遵循和平政策并关心巩固苏土友谊的。

1929年，在安卡拉签订了苏土两国关于延长1925年友好中立条约的议定书，并且双方又承担了一个重要的补充义务，即“未经通知对方，不得开始进行旨在与对方直接毗邻（在陆上或在海上）的国家缔结政治协定的谈判，只有经过后者的同意才能缔结这样的协定”。1930年，土耳其外交部长泰菲克·刘施图贝伊（阿拉斯）赴莫斯科作正式访问。由于这次访问而发表的公报指出，“苏土两国的友谊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是最强大的和平因素”，双方“的任务便是使这种关系愈臻亲密

^① 1933年协定确定奥斯曼债务总数约为十亿法郎，它按这一年的牌价只值七百万金里拉（根据1928年的协定是八千六百万金里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纸币法郎又贬值62.2%。1944年，土耳其最后偿清了奥斯曼债务。

与诚恳”。1931年，李维诺夫赴安卡拉作了回访，在这期间签订了苏土两国关于进一步延长友好中立条约的新议定书。1932年，土耳其政府代表团在伊斯美特巴夏率领下赴莫斯科参加了“五一”节庆祝大会（在这次访问期间，苏联政府同意给予土耳其政府以工业贷款）。1933年，以伏罗希洛夫为首的苏联代表团访问了土耳其。1935年，苏联同土耳其签订了关于把1925年友好中立条约延长十年的议定书。

164

虽然如此，但在阿塔丘尔克领导下推行的土耳其对外政策的这个总方针，早在那时就时常遭到某些政客和盘据在政府里（特别是在外交部里）的官吏的怠工。土耳其反动分子的破坏活动，在土耳其于1932年加入国联以后更特别有所表现。这些分子屡次制造各种外交阴谋，目的在使土耳其背弃与苏联的友谊，使土耳其的政策服从帝国主义列强的利益^①。

^① 在这个时期，阴谋大多是围绕着1934年形成的巴尔干协约国（四国——土耳其、希腊、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集团）制造出来的。由于法意竞争而产生的巴尔干协约国，主要是执行法国和英国的任务，两者都力图把巴尔干吸引到自己的势力范围中，从巴尔干事务中排斥苏联。

三 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状况

基马尔党人由于自己在国内的政治领导地位已巩固起来，于是便加强了对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压迫。早在1925年，即在镇压库尔德斯坦叛乱时期，土耳其当局就利用施行非常制度和恢复独立法庭的办法（虽然所有这些都是用来对付反动派的），来反对工人组织和工人运动。伊斯坦布尔的工会被解散了。在这以前伊斯坦布尔曾出版过半合法的共产党的机关刊物，但它们也被查封了。共产党被迫转入极端秘密的状态。凡有共产党党籍的人以及一般地稍有共产主义活动的人，都受到严厉的监禁惩罚。甚至阅读在土耳其书店里公开出卖的合法的马克思主义书籍的人，也要交付法庭审讯。当时成立了处在人民共和党和警察严格监督下的所谓“基马尔工会”，以代替被解散的阶级工会。

至于农民，基马尔党则宣传“超阶级性”的思想，实际上它集中了自己的一切努力，以便镇压土耳其农民运动的最微弱的表现。上层的剥削阶

层：地主、农村小店主和土耳其的富农（富农与其说是采取资本主义的剥削形式，倒不如说是在互分制的基础上，利用出租土地的办法对农民采取半封建的剥削形式），都变成了人民共和党在农村的支柱。富农的经济地位在民族战争时期大大地巩固了，特别是由于没收了原来属于从土耳其被驱逐出去或迁移出去的希腊人的土地。农民的基本群众则照旧受各种捐税的压榨，受高利贷者和富农的盘剥；他们的状况与革命以前时期相比较，改变的大概只是废除了封建的什一税——阿沙尔。 165

在土耳其的农村里，仍保持资本主义以前的剥削方式：互分制，高利贷者的横霸势力，甚至劳役地租的残余。虽然播种面积稍有扩大，但已耕种的土地（包括菜园、葡萄园、休耕地和饲料作物用地）总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总共只有一千一百六十万公顷，或为土耳其领土的15.2%。并且最宜于耕种的土地都落在地主、富农和国家手中。

执政的基马尔党人长期否认土耳其有土地问题存在。他们证明说，农民不是苦于无地和少地，

而只是苦于高贷者的横霸势力，苦于缺乏农具和国家以及合作社的信贷事业不发达。可是，由于农业商品粮食的减少和农民群众的贫困，国内市场急剧地缩小了，这就迫使这些人不得不承认：不把土地分配给农民，甚至就不可能着手根除农村中资本主义以前的关系，因而也就既不可能指望增加农产品，也不可能提高居民基本群众的购买力。因此，伊斯美特·伊涅组内阁，遂在1936年通过了关于赎回地主土地以分给无地和少地农民的决定。为了这个目的，1937年，在宪法中对关于征用财产必须给予补偿的条款作了一项补充，规定“将以专门的法律确定经费的数目，以及为了支付征用土地和森林的价格而动用这笔经费的办法；征用这些土地和森林的目的，是为了把土地分给农民和建立国家管理森林的制度”。

上述土地改革的结果是微不足道的。按行政手续分配的土地总共只有十三万公顷，即约占适于耕种的土地的0.5%左右。1939年，在安卡拉召开了农业大会。大会应采取措施以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但大会的决议只是有利于富农上层分子和地主。大会所规定的优惠，主要是照顾大土

地占有者。会议决定给他们贷款，以购买拖拉机和收割机。并且，为了这些土地占有者的利益，还预先决定降低石油产品的价格和关税。在其他方面，大会只限于一般地空谈从速制订关于分配土地给农民的法律，许下一些诺言^①。

甚至根据土耳其半官方报纸的材料，基本农民群众仍然还是没有土地。从国会的发言中就可以知道，在很多地区，特别是在东部和南部，无地的农民占 50—75%。

除了无地的现象以外，缺乏农具的情况也严重地影响了土耳其农民。根据农业调查^②，1927年土耳其有一百七十五万一千个农户，它们共有三百三十一万五千头牵引牲畜和一百四十一万四千件农具。根据这些统计材料来看，每一农户平均约有两头大牲畜和不到一件农具（由于企图掩盖农民的财产和阶级分化，土耳其的统计学一般地只利用平均的算术材料）。事实上，大农户拥有大量的牲畜和农具，而基本农民群众则既无牲畜，也无农具。还必须指出，根据同一个调查材料，

① 但是大会的一切决议一般地都没有实行。

② 1927年是第一次、并且暂时还是唯一的一次农业调查。

99%的农具（上述总数一百四十一万四千件中的一百三十九万八千件）都不是别的，只是木犁（按土耳其文为“卡拉撒撒”）和最简单的铁犁（普鲁格）。其余被土耳其统计学算作机器的一万六千件农具——播种机、风车、打谷机和少数的拖拉机，都集中在大地主和国家的庄园里。

以后在土耳其公布的统计中，这种情况很少改变。例如，根据土耳其官方的材料，1936年土耳其有四十一万部铁犁，六万七千张耙，九百六十一部拖拉机和附属拖拉机的一千三百零八部铁犁。在这些材料中完全没有提到木犁的数目。

信贷事业对于农民群众来说是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早在苏丹时期就创办了的农业银行，在187 1924年改组为股份公司，国家资本在其中占优势。政府给它提出了一个主要任务——反对高利贷。事实上无论就信贷的规模或方向来说，农业银行的活动并没减轻土耳其农民的负担。例如，1939年，银行共发放贷款四千五百万里拉。其中一千五百万里拉是有抵押品作保证而发放的，而其余的三千万里拉也有各种保障，并且只是放给那些完全“有支付能力的”顾客。可见，正如一般

的惯例那样，农业银行的贷款是给予地主和土耳其农村其他剥削者的。

根据土耳其政府声称，1929年创办的农业信贷合作社，应当成为给予农民信贷援助的另一手段和反对高利贷的工具。但是，它的活动也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固然，合作社的数目和股东的人数是显著增加了。1930年，土耳其有九十一个合作社，社员二万人；而1939年则有五百九十九个合作社，社员十三万一千人。可是，合作社的自有资本是微不足道的（四、五百万里拉），它们主要是靠农业银行的贷款（1939年是一千八百七十万里拉）和股东的特别存款维持的。同时，严格的规章要求，特别是获得贷款时的连环保，使信贷合作社事实上只为农村里富裕的上层分子服务。1939年，农业信贷合作社给予自己社员的贷款数目是二千二百万里拉。

除信贷合作社以外，土耳其还有农业销售和生产品合作社。在几乎全为国外市场工作的销售合作社（最大的是亚伊丁无花果干制造者合作社）里，与外国资本家有联系的商人势力占优势。

土耳其五分之四的农民都不得不听任高利贷

者摆布。年利 150—200% 在土耳其农村里算是“普通的”利息。而根据土耳其的史料证明，高利贷者自己则力图每天“一个古鲁斯只得一个帕拉”^①。翻译成商业语言，土耳其高利贷者这个“微薄的”要求，正意味着年利 900%。

因此，土耳其屡次发生农民暴动就不足为奇了。这些暴动由于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所以都失败了。有时，自发的农民暴动则被国内外的反动分子用来反对安卡拉政府。例如，在独立战争时期和 1925 年库尔德斯坦赛义德酋长叛乱时就是这样的。但是，这些暴动虽然是反动的，它们却证明了土耳其农民的广泛不满情绪，以及土地和民族问题的没有解决。以后又发生了同样的现象。

1930 年底，迈涅曼地区（距伊兹密尔不远）发生了农民暴动。暴动的发起人是反动分子，但他们却把郊区的农民吸引到了自己一边。叛乱者的头目是以前的托钵僧。在他们的领导下暴动者占领了迈涅曼城。一个年轻的预备军官、地方上的教师企图使群众安静下来。托钵僧割下了他的脑

① 一个古鲁斯（或皮亚斯特）等于四十个帕拉。

袋，把它穿在竿子上，拿着这个“旗帜”在迈涅曼大街上游行。暴动很快就被镇压下去了。它在土耳其农民中没有得到认真的响应。虽然如此，它还是证明了土耳其农村里有明显的不安现象。

1931—1932年，在土耳其东部几省暴发了库尔德人的大暴动。在基尔区（在阿拉拉特山的斜坡上），事情弄到库尔德人同政府军队进行真正战争的地步。一直到伊朗政府允许土耳其军队通过伊朗领土，以便从后方进攻库尔德人以后，暴动才被镇压下去。

1937年，在桐哲里省（从前的德尔西姆省，在爱尔辛詹以南），又暴发了库尔德人新的暴动。据后来土耳其报纸报道，暴动包括了六个库尔德人部落；暴动者超过了五千人；派去对付他们的拥有各种武器的军队达二万五千人。当局费了很大的力量才扑灭了暴动。据官方报道，暴动的原因是库尔德人不满意土耳其政府所开始实行的改革。有些土耳其报纸则暗示说，暴动受到了来自叙利亚的鼓舞，暴动者希望获得“一个外国”的援助（意思是指法国，这时它由于亚历山大勒塔州问题正与土耳其发生冲突）。但报纸上也提到了库尔

德人提出的关于“保持以前的征税方式”的要求，这就明确地指出了税收负担是不堪胜任的。

土耳其无产阶级的状况也是同样艰苦的。在共和制度的年代里，土耳其产业工人的数量显著地增加了。土耳其资产阶级以其“国家主义的”政策促进了土耳其无产阶级人数的增加和集中在大企业里，不管资产阶级愿意或是不愿意。1935年，在享受《奖励工业法》优惠的工业部门里，计有六万五千人，而1939年就有将近九万人^①。

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这个时期里，土耳其工人阶级不仅在量的方面，而且在质

① 根据土耳其报纸上发表的最近材料，所谓“大中”工业企业（每个企业的工人数目不少于十人）的工人数量约有三十万人，而土耳其工人总数则为七十万——七十五万人。例如，《民族报》在1947年10月底就公布了下面这个表：

工人数目（以千为单位）

大中工业	二七五
小工业	二〇
手工业作坊	一〇〇
农业	二〇〇
家庭工业	一〇〇
铁路和海上运输	五一
总共	七四六

的方面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紧接着民族战争以后的年代里，基马尔党人还能部分地把工人的不满情绪引向只反对外国承租者的轨道上去，从而使土耳其的民族企业免于罢工运动。例如，1925至1928年席卷全国的罢工浪潮，几乎只触及属于外资的铁路、公用事业等。在这些场合下，以省长或人民共和党省委会主席出面的土耳其当局，总是担负着罢工者与企业主之间“公正的”调停人的职能。但这种“调停”通常所产生的结果，不是有利于资本家的拖延时间，就是当局直接出来反对工人。

尤其是1928年电车工人罢工时伊斯坦布尔省长的“调停”就是这样。外国承租者利用这种“调停”，以便借助工贼和警察来或多或少整顿一下运动，然后“慷慨地”告诉省长同意雇用一部分罢工者，但只根据个人申请，并且“主谋者”除外。1927年，阿达纳—奴息本路（法国的租让企业）的铁路工人罢工时，土耳其当局的“调停”结束得更为悲惨。罢工延续了三星期，参加者约有一千工人；铁路完全停运两天。而当管理处借助工贼开车时，工人们便携带家小卧在铁轨上，以阻挠火车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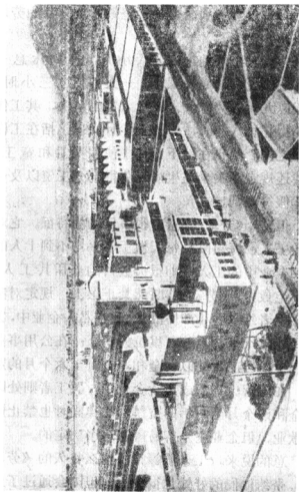
进。这时当局派来的军队出现了，并向手无寸铁的人群开枪。结果罢工被镇压下去了。

在以后的年代里，罢工运动已不限于外国租让企业，而是扩大到属于土耳其私人资本甚至国家资本的企业中去。虽然土耳其资产阶级报刊就是以前在罢工还没有受到如此残酷迫害的时候也很少报道工人运动，但仍旧可以记载一些大规模的罢工和多次小型的罢工。罢工运动席卷制烟工人、装卸工人、伊斯坦布尔的“西尔凯特公司”（从博斯普鲁斯到黄金角的轮船运输公司）的海员等等。

随着土耳其民族资本的增长以及大多数外国租让企业转入国家手中，土耳其当局加强了对付罢工运动的措施。罢工开始受到警察的镇压，罢工者则受到严厉的惩罚^①。

1936年，在各种委员会和小组委员会中经过十年“研究”的《劳动法》为国会通过了。它于1937

^① 虽然如此，但罢工斗争并没有停止。在1936—1940年曾先后发生了多次大罢工：伊斯坦布尔制烟工人和纺织工人的罢工，伊兹密尔装卸工人的罢工，费特希矿山矿工的罢工，桑古尔达克煤矿工人的罢工等。



在苏联贷款和苏联工程技术人员帮助下建造的开塞利联合纺织厂

年开始生效。这项法律稍稍整顿了土耳其的劳动条件。

劳动日一般地规定为八小时，每周休息一次。它仍允许做额外工作，一天不超过三小时，一年以九十天为限。未满十六岁的童工，其工作日不得超过八小时，并且上学时间也包括在工作时间之内。禁止在地下工作中使用女工和童工。法律还规定了关于在生病时获得部分工资以及孕妇休假等规则。

但是，《劳动法》里有很多反动的特征。它对农业工人、海员以及每天做工者平均不到十人的一切企业中的工人，即很大数目的土耳其工人，都不生效力。《劳动法》断然禁止罢工，规定对参加罢工者给以各种严厉的惩罚；在私人企业中，罢工者处以十里拉至一百里拉的罚金；在公用事业企业中，罢工者处以罚金和一个月至六个月的监禁；在国营、省营或市营企业中，罢工者则处以罚金和两个月至两年的监禁。法律同时也禁止同盟歇业，但企业主是容易规避这个决定的。

172

总的说来，工人们等待得这么长久的《劳动法》，带给他们的好处是很少的。但国会通过了土

土耳其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劳动条件的规定，毕竟标志着无产阶级的作用提高了。土耳其资产阶级现在已不能不估计到工人阶级的比重了。

第五章

173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和 战时的土耳其

一 蒙特罗会议

在1926—1927年表现出来的、基马尔党人的领导方面和反动买办分子的接近，给土耳其的对外政策也打上了烙印。但在将近十年之中，土耳其政府对外政策的基础，仍旧是维护和平和采取巩固与苏联友谊的方针。当然，就是在这个时期土耳其对外政策中也已表现出危险的动摇现象，但它不具有决定的性质。土耳其的领导人物，特别是基马尔·阿塔丘尔克了解，在土耳其人民处于历史危急关头时，是苏联给予他们援助和支持，苏联友谊是年轻土耳其共和国独立的唯一现实的保障。甚至在土耳其成立的反动党派，当时也不敢公开要求改变安卡拉对外政策的原则，无论它

们怎样在事实上力求达到这一点。在“自由”党成立时(1930年),有影响的土耳其报纸《民族主义报》写道:“我们的对外政策有着民族的性质。任何一个执政党都必须坚持这个民族政策……正如我们一再声明的那样,我们对外政策最重要的基础之一是与苏联的友谊。谁不赋予这种友谊以最重要的意义,他就不是土耳其公民。”

从1935年年底起,人们第一次感到土耳其对外政策的基础本身发生了急剧的变化。1935年秋天,意大利侵犯阿比西尼亚^①。地中海地区的局势变得使人惊惶不安。“许多国家和民族,都象是不知不觉地陷进了第二次帝国主义大战的漩涡”。^②在土耳其也增长了不安情绪,尤其是因为意大利露骨地加强接近小亚细亚的多得坎尼群岛的兵力,特别是勒乐斯岛,并且还在罗得岛上建立强大的军事基地。土耳其之参加对意大利的制裁,加深了意土矛盾。在这种局势下,英国政府利用土耳其人惧怕可能发生的意大利侵略的恐

① 即埃塞俄比亚。——译者

② 《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442—443页。

惧心情，使土耳其参加了关于一旦意大利进攻英国在地中海的舰队时互相援助的“君子”协定（参加这个协定的还有希腊和南斯拉夫）。这样一来，英国就不仅获得了土耳其的军事支持以对付意大利，并且还把土耳其完全吸引到英国对外政策的漩涡中。

从这时起，英土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接近阶段，而后来则为同盟阶段。看来英国外交当局那时就已开始暗示安卡拉政府说，只有英国——最强大的海军国家——才能使土耳其免于意大利的威胁，特别是只有英国才能解决关于修改洛桑海峡制度问题。

的确，这个制度没有保障土耳其的安全。关于海峡不设防一款对于土耳其来说特别严重。土耳其丧失了巩固海峡地区阵地和在那里驻兵的权利，并且根据洛桑公约的条件，必须允许外国无限制的海军力量通过海峡，这样土耳其随时都可能处于敌军出其不意的侵入伊斯坦布尔的威胁中，即处于遭受出乎意料的、有不可挽救的后果的灾难威胁中。从1933年起，土耳其政府就一再声明，必须修改洛桑公约有关海峡不设防的部分。

但是英国外交当局对土耳其人的这个要求，采取了否定的立场。现在英国取消了自己的反对意见。

在这个时期，英国政府本身需要土耳其的支持。在1936年的伦敦会议失败后，各国的海军军备迅速增长。在地中海上，英意武装冲突的可能性变得愈益明显。在这种情况下，意大利是可以指靠德国的支持，而那时法国的主力就会牵制在德国的边境上。在这种局势下，土耳其对于英国说来便具有很大的意义，因为它在地中海东部和海峡都拥有其战略基地，在巴尔干协约国中又很有影响。 175

这样一来，在英国鼓舞下的土耳其政府，便十分具体地提出了海峡问题。土耳其在其1936年4月11日致曾经参加洛桑谈判的各国的照会中，建议召开新的会议以修改洛桑制度。顺便说一下，土耳其的照会包含了下列的论据。

土耳其的照会说：“1923年，土耳其同意在洛桑签订有关海峡制度的公约，规定了海峡的出入自由和不设防。那时欧洲的一般局势从政治和军事观点来看都和现在迥然不同。那时欧洲是裁减军备，它的政治组织唯有建立在为国际义务所

固定的不容破坏的法律原则上。陆海空军的力量远没有现在这么可怕，并且它们都表现出减少的趋势……从那时起，黑海上的局势具有在各方面令人安心的协调性质，而地中海上则逐渐形成了互不信任。海军会议表明了有重整军备的趋势存在，而海军造船厂最近期间将使具有空前威力的军舰下水。在空军力量发展方面，曲线令人头昏目眩地上升着，大陆和岛屿上的军事工事不断增加。在很多条件完全发生了变化，应当维护海峡安全的唯一保障^①亦已消失，而最有利害关系的国家都声明有燃起普遍战火的威胁时，土耳其在其要害之处却受到严重的危险，没有任何手段对付这种令人惊惶不安的无保障的情况……同时，政治危机显著地表明，目前的集体保障机构发生效力过于缓慢，迟缓的决定在大多数场合下能使国际行动丧失其优点……海峡安全保障者对国联的态度，

① 这里是指洛桑公约第十八条，该条规定：“如有违背关于出入自由的规定，出其不意的进攻或任何军事行动或战争威胁使海峡航行自由或不设防区的安全受到威胁时，上述缔约各方，至少法国、英国、意大利和日本即共同采用国联行政院为此目的而规定的一切手段加以干涉之。”

这些保障者在执行他们面临的任務时所遇到的、至少使他們的軍事合作和有效合作發生疑問的那些特殊情況，乃是推翻1923年公約整個結構的因素。”

土耳其政府闡明了自己的意見以後，在結語中指出，它認為有必要“通知曾經參加討論海峽公約的國家，它準備開始進行談判，以期在短時間內締結這樣一些協定，這些協定應在為土耳其領土不可侵犯所必需的安全條件下，並按照就經常發展地中海與黑海之間的貿易航行的意義說最具自由主義的精神來調整海峽制度。”

蘇聯是有關國家中首先同意土耳其建議的。蘇聯政府在1936年4月16日發出的照會中宣稱，它“認為土耳其政府對於目前普遍和平沒有保障並有爆發戰爭的嚴重威脅的憂慮，是完全有根據的，因此它認為，在目前的局勢下，土耳其共和國渴望用相應地修改海峽制度的辦法來保障自己領土安全是很自然的。”

不久以後，土耳其政府也從其他有關國家獲得對自己照會的復文。所有這些國家都同意召開會議來重新審查洛桑公約，不過有的國家是附

有保留条件，有的则无条件地同意。

就这一问题而召集的会议，是1936年6月22日在瑞士的城市蒙特罗开幕的。出席会议的有曾经参加1922—1923年洛桑谈判的九个国家的代表。只有意大利没有派遣自己的代表到蒙特罗去。在会议开幕时，意大利以会议参加者对意大利实行经济制裁（国联由于意阿战争而采取的制裁）作为自己拒绝出席会议的理由。在会议进行期间，这些制裁被取消了（从1936年7月15日起），但那时意大利政府又提出了另一个论据，它指出，地中海国家旨在反对意大利的互助协定还没有废除。当然，意大利并不是由于这些原因而拒绝参加关于海峡的会议。真正的动机是它走上了与希特勒德国相亲近的道路。希特勒提供了单方面破坏国际条约的先例。因此，法西斯意大利也不愿参加合法地重新审查洛桑公约的工作。

蒙特罗会议的工作是在非常复杂而困难的局势下进行的。关于海峡重新设防问题没有引起任何一方的反对；各国同意召开会议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它们是承认土耳其这个要求的合理性的。可是，围绕着两个主要问题却产生了很大的争

论，即关于黑海国家军舰通过海峡问题，关于允许非黑海国家舰队进入黑海问题。

这两个问题对于所有的黑海国家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苏联政府是它们利益的保护者。苏联代表团没有坚持完全禁止非黑海国家的军舰进入黑海，它只要求对于这类舰只的进入规定必要的限制。另一方面，苏联代表团指出，对于黑海国家来说，海峡是与地中海联系的唯一道路（而对于苏联来说，海峡更是处在各个海上的苏联领土之间互相联系的道路），黑海国家当然应处在特殊的地位，并应获得使自己的任何船只通过海峡的权利。

英国代表团反对这些合法而毫无强求的建议。在最初几次开会时即已表明，英国代表团准备满足土耳其关于海峡重新设防的要求，但无意考虑苏联和其他黑海国家的利益。英国代表坚持主张承认黑海为国际公海，并因此而反对对非黑海国家的军舰进入黑海作任何限制。他宣称，黑海国家和非黑海国家在它们的军舰通过海峡时均应受绝对相同的限制。由于海峡设防和为了土耳其的安全起见，外国军舰通过海峡可以受到吨位

的限制。但英国代表团同时又声明，军舰进入黑海的总的限额不应规定。此外，苏联的军舰在通过海峡时应与非黑海国家的军舰一样，服从完全相同的限制。换句话说，苏联的军舰，其吨位大于将为非黑海国家军舰通过海峡时所规定的吨位，就要失去从黑海进入地中海和从波罗的海或远东进入黑海的权利。

英国政府的立场从各种观点来看都是站不住脚的。黑海的“国际”性从来就无人承认。本来甚至洛桑公约也不得不对外国军舰进入黑海规定某些限制(虽然在实践上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而黑海国家的军舰通过海峡则完全不受阻挠。在蒙特罗会议上，英国代表团为了论证自己的“论点”，提出了一些完全不能令人信服的解释：必须把军舰派入黑海，以便警察可以追查擅自易地捕鱼的英国渔人，或者干脆希望“在那儿显示一下自己的旗帜”。

英国代表团也不能论证自己的第二个“论点”——黑海国家与非黑海国家的军舰通过海峡的条件一样。它所能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限于一般地空谈“互惠原则”。可是日本代表团却热烈地支

持英国人。日本人甚至比英国人更前进了一步：他们宣称，他们准备接受关于非黑海国的军舰通过海峡的任何最严格的限制，只要黑海国家也服从同样的条件而不能有任何例外的权利。

在这种情况下，土耳其代表团的行为是令人奇怪的。在它从安卡拉带来的预备方案中就已包含有破坏苏联利益的一款：限制黑海国家军舰通过海峡的吨位。后来土耳其政策中的新趋势更多地表现出来了。土耳其代表团公开地反对苏联关于黑海国家军舰自由通过海峡这个自然的合法的要求。在会议的后半期里，土耳其代表团甚至放弃了自己的公约方案，而接受英国代表所制订的方案作为讨论基础。这一步骤在土耳其本国引起了不满。伊斯坦布尔的《共和报》写道：“这个方案（英国的）含有能使会议导致失败的意图。在既成的形势下，首先应当尖锐地批评英国在以自己方案对抗土耳其方案时所表现的无礼态度，批评同意讨论英国方案的土耳其代表团的客气。” 179

但是，问题决不在于土耳其的“客气”。从土耳其代表的一些发言中就可以看出，土耳其以允许海峡重新设防为满足，而关于黑海制度和黑海

国家的权利问题它就不再和英国争论了。在有一次开会时，当谈到非黑海国家军舰进入黑海的限额时，土耳其代表团团长阿拉斯十分明确地宣称：“土耳其既是黑海国家，也同样是地中海国家。因此，我最关心海峡问题。至于其他问题，我希望黑海国家与地中海国家达成协议。”

在另一次开会时表明，土耳其代表团在与英国代表团的幕后谈判中，担负了反对苏联建议的义务。会议审查了关于非黑海国家大吨位军舰通过海峡的权利条款方案。土耳其代表团对提出的方案的措辞加上“自己现有的舰队”几个字。这几个字只能有这样的意思，即非黑海国家的权利被在公约签订时现有的舰队限制了，就是说，这种权利不扩大到将来将要建造的舰只。土耳其代表由于了解这类建议令人反感，于是在会上又拙劣地企图掩饰自己措辞的真正意思。他说：“我应当指出，我不是说‘目前的舰队’，而是说‘现有的舰队’。”而当有人向他提出问题，问他如何了解这种“区别”时，他回答说，他指的是“在通过海峡时将有的”舰队。在这样的“解释”以后，措辞就变得完全荒唐可笑了，而土耳其代表也被迫放弃了

它。但紧接着英国代表（不知是故意地还是单纯不了解讨论进程）就暴露了问题的幕后一面。他提醒自己的土耳其同僚说，就这件事情他和土耳其代表曾进行过“非正式的谈判”，所谈的正是关于限制非黑海国家权利的问题。土耳其代表被迫承认了这个事实。

土耳其代表团的行为，使谈判进程显著地复杂起来。当时很明显，土耳其自己虽是一个黑海国家，但它却不愿保护黑海国家的利益，并且为了追随英国帝国主义的政策方针，不惜牺牲自己本国的民族利益。为了与英国接近，土耳其破坏了对它本身也是同样可贵的与苏联的友谊。不仅如此，当时造成了这样一种印象：土耳其代表团在蒙特罗想利用修改海峡公约的办法，企图阻挠苏联舰队的发展和苏联舰队调入黑海的自由。 180

希望打开僵局的苏联政府的爱和平的态度挽救了会议，使其免于破裂。会议的破裂就会是法西斯国家的胜利，因为它们热烈希望这种合法修改国际条约的尝试失败，怂恿土耳其去单方面地破坏海峡制度。同时，因德国在欧洲加强侵略活动（正当蒙特罗会议处在最紧张的时候，希特勒驻

维也纳大使冯·巴本迫使奥地利签订了预先决定德国以后占领奥地利的协定)而感到不安的英国政府了解,如无苏联签字,任何关于海峡的公约都是一纸空文,于是它作了某些让步。土耳其代表团也从安卡拉得到训令,接受苏联关于黑海国家大吨位军舰有权通过海峡的要求。由于出席蒙特罗会议的其他国家在决定性问题上不起独立作用,协议终于达成了。

1936年7月20日,《关于海峡制度公约》在蒙特罗签订了,它代替了洛桑公约。新公约的主要条款归结如下:

一、本公约承认,海峡制度应在“土耳其的安全和黑海沿岸各国的安全范围内”规定之。

二、商船的航行无论在平时或战时均保持完全的自由。

三、军舰通过海峡时应遵守下列条件:

1. 非黑海国家平时只能从海峡中通过轻型的水面舰艇^①(以及小的军舰和辅助船舶),其总排水量不得超过一万五千吨;非黑海国家同时停

^① 即装有口径在八英吋以下的大炮的巡洋舰和水雷艇。

泊在黑海的所有军事船舶不得超过三万吨；每一非黑海国家的分舰队停留在黑海的期限不得超过三星期；但是，黑海国家不仅能从海峡通过轻型的水面舰艇，而且可以通过每艘排水量一万五千吨以上的主力舰，但主力舰应逐一通过，其护航舰队不得超过两艘水雷艇。此外，黑海国家还有权使在其他地方建造的潜水艇开入黑海，在需要时也有权把潜水艇开出黑海进行修理。 182

2. 在战时，如土耳其为非交战一方时，采用同样的规定，但交战国的军舰禁止通过海峡^①。

3. 如土耳其为交战一方时，是否允许军舰通过海峡由土耳其政府斟酌决定；土耳其政府如遇本国处于直接的战争威胁时，也有权使用这一条款。

四、在一定的条件下，允许民用（但不是军用的）飞机在地中海与黑海之间和在欧洲与亚洲之间飞过土耳其领土。

五、海峡委员会撤销；其职权由土耳其政府履行之。

^① 公约也包含有取自国联规章中的若干规定。国联可耻的破产使这些规定丧失了任何意义。

六、土耳其有权立刻在海峡设防。

七、公约缔结期限为二十年。公约临时从1936年8月15日生效，在签字国中有六国批准后即最后生效^①。公约的个别条款，尤其是吨位的限额，每五年可重新审查一次。公约随时让意大利参加。

二 土耳其政策的转变

在蒙特罗签订的公约，远不是完全符合黑海国家利益的。固然，在条约中黑海国家与非黑海国家比较，它们所占的特殊地位得到了承认，非黑海国家的军舰进入海峡和黑海受到了限制（按吨位和停留期间），而黑海国家则能使自己的任何船只通过海峡。可是，公约有很多严重的缺点，其中有这样一个重大的缺陷，它减低了公约中一切优点的价值。事实上，公约给予土耳其以特殊的权利按照自己单独的考虑来解释和施行公约，特别是在战时（即使土耳其自己不是交战一方）。

^① 公约于1936年11月9日最后生效。

公约赋予土耳其政府这么广泛的权利，如果要它不损害黑海沿岸各国——包括苏联在内——的利益，那只有在这样一个条件下才有可能，即土耳其始终不变地坚决地坚持和平政策。但是，正是蒙特罗会议是土耳其对外政策中早先就已表现出来的那些危险趋势发展中的转折点。 183

在蒙特罗会议以后的若干时期里，土耳其报刊和土耳其领导人在公开的言论中仍继续宣称，土耳其的政策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苏土两国在蒙特罗会议上的分歧只是误会的结果，土耳其政府依旧认为与苏联的友谊是自己政策的不变原则。就在1936年，基马尔·阿塔丘尔克在国会开幕式的演说中指出，根据蒙特罗公约，“现在任何交战国的舰艇都禁止通过海峡”，然后他强调说，“因此，我应当异常满意地提到，我们与我们伟大的海上和陆上邻邦苏联的友谊，十五年来已经证明了它的好处，这种友谊正像其产生最初几天那样有力地诚恳地在继续正常地发展着”。1937年6月，当时担任总理职务的伊斯美特·伊涅纽，也在国会里发表了类似的声明。

他说：“土苏友谊将作为两国政策中的一个牢

固的因素而存在。我认为，我这个声明将消除人们思想中过去和现在对两国的良好关系和诚挚友谊可能产生的一切怀疑。”

过了一个月，即1937年7月，当时土耳其的两个部长——阿拉斯和秀克留·凯伊访问了莫斯科。关于他们访问苏联和与苏联政府委员谈话的正式公报也指出，“在这么漫长的时期里经受了国际生活中各个阶段考验的”苏土友好关系，“无疑地证明了它对两国利益的全部价值”，“这些利益要求完全保持现存的关系作为未来两国对外政策的一个不变的、牢固的因素”。

但是，在土耳其负责人发表这些声明的时候，事实证明了土耳其对外政策中相反的趋势的加强。力求使土耳其同苏联疏远的土耳其资产阶级中反动分子的势力不断巩固。在这方面，法西斯国家以及英法的外交活动，都影响了土耳其的政策，因为这时英法两国的外交都转而采取“不干涉”立场，而事实上是直接鼓励侵略者的立场。

例如，在1936—1938年时期，英国力求保证自己对土耳其的影响，实质上既不阻挠德国的经济扩张，也不阻挠意大利在巴尔干的积极外交活

动。在英国帝国主义者看来，德国与土耳其的接近在这个时期应促使土耳其同苏联疏远，加深苏德矛盾。意大利在巴尔干势力的加强，也符合英国“慕尼黑分子”的“不干涉”政策。

正因为如此，所以，在从蒙特罗会议（当时土耳其对外政策急剧变化的征兆第一次表现出来了）到欧洲战争爆发的三年中，土耳其的外交活动就充满了许多危险的勾当。

1937年，土耳其在英国获得了第一次贷款，为数三百万英镑。1938年，接着又获得第二次、较多的一次贷款——一千六百万英镑。在土耳其出现了英国经济学家、工程师、专家等各种委员会。英土接近获得了经济基础。同时，这种接近在外交方面也带来了自己的成果。1937年7月8日，所谓萨阿德巴德公约^①在德黑兰签订了，它形成了近东四国——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和阿富汗——集团。关于这个公约，早在1935年就在原则上达成了协议，但由于伊朗和伊拉克因沙特-阿拉伯地区的疆界发生了边界纠纷，结果使条约

^① 萨阿德巴德是德黑兰的伊朗王宫，公约就在这里签订的。

的签订拖延了两年。萨阿德巴德公约规定互不侵犯，尊重现存的国界和互相协商。公约本身并不含有旨在反对和平利益的规定。可是，近东协约国——人们开始这样称呼这个集团——事实上变成了英国政策的工具。在近东协约国中起领导作用的土耳其，因而也就变成了英国在近东影响的传播者。

在土耳其的帮助下，英国也加强了自己在巴尔干协约国中的影响。土耳其的外交殷勤地按照“不干涉”和鼓励侵略的精神，在巴尔干协约国中推行各种决议。

土耳其由于顺从地追随英国，甚至同自己在地中海上的主要敌人——意大利也接近起来了。185 1936年7月，意大利政府表面上向土耳其和希腊担保说，它对它们不怀敌意。这一点就足以使地中海国家的“君子”协定在同月停止生效了。1936年8月，土耳其外交使团离开了埃塞俄比亚的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继后土耳其政府就承认了意大利占领埃塞俄比亚。1937年2月，土耳其外交部长阿拉斯与其意大利的同僚齐亚诺在米兰会晤。这次会晤是土耳其外交当局为了迎合意大利利益

而在巴尔干所干的一系列外交勾当的开端。在意大利和德国两国武装干涉西班牙时期，土耳其也是按照“不干涉”的精神行事的。1938年，意大利参加了蒙特罗海峡公约，作为对这些效劳的酬报。

同时，德国对土耳其的影响也加强了，特别是在经济方面。德国借助自己旧有的联系，并利用土耳其在工业设备和技术援助方面的需要，在1936年把土耳其全部对外贸易的一半集中在自己手里。德国在土耳其的几种主要输出品——棉花、羊毛、烟叶、水果等——的市场上，变成了操纵价格的主要因素。德国在土耳其工业建设中的作用特别地增长了。德国的各种公司向土耳其供售机器设备、铁路材料、海船和武器。许多德国专家钻进了土耳其的经济机关中，这样就很容易于排除非德国公司方面的竞争。有些德国顾问被聘请到土耳其政府的各部、科学研究所、普通学校和军事学校等。

土耳其一部分资产阶级，对于德国如此急速地控制土耳其的经济命脉表示不满。例如，有些土耳其报纸指出，从对德贸易的迅速发展中得到好处是不可靠的。这些报纸指出，实际上，德国

186 以其对土耳其商品规定的高价政策使过去用外汇支付的旧主顾离开了土耳其市场，而它自己则根据非现款结算的清算制度，按高价用自己的劣质货物支付；不仅如此，德国还把土耳其货物再出口到其他国家，使土耳其失去了外汇；最后，德国向土耳其提供大量的外贸资金，事实上迫使土耳其商人“冻结”大宗的德国马克，就是说，实际上从土耳其得到了无息贷款。伊斯坦布尔的《曙光报》1937年就这件事情写道：“勒索殖民地的德国，把土耳其和巴尔干国家弄到这种地步，以致一个工业国通常力求从殖民地方面取得的所有那些垄断条件都正在实现着。自从我们与外界的一切联系降低为与德国一国的联系时起，我国就开始丧失自己的经济独立，并变为德国的附属物。”

土耳其商人对于德国扩张所抱的不满情绪，激起土耳其政府采取措施，以稍稍削减对德贸易额和加紧寻找土耳其商品的其他主顾。从1937年起，德国在土耳其对外贸易额中的比重稍有下降。可是，在绝对数字上土德贸易仍处于很高的水平。1938年，德国国民经济部部长丰克访问了安卡拉。由于这次访问期间所进行的谈判，德国

给予土耳其一亿五千万马克的贷款(可是,由于土耳其在1939年与英国和法国缔结同盟,这笔贷款没有实现)。

三 亚历山大勒塔州问题

在土耳其对外政策发生转变的这些年代里(1936—1939),关于亚历山大勒塔州问题,在土耳其选择方针方面起了显著的作用。这个问题的实质如下。

亚历山大勒塔州^①,是英国军队于1918年在摩德洛司停战协定签订以后占领的。后来英国把这一地区以及基里基亚让给法国人占领。根据1921年缔结的条约(弗兰克林·布翁条约),土耳其收回了基里基亚,但亚历山大勒塔州仍为法国所有,法国负责在州内施行“专门的行政制度”,承认土耳其语为那里的正式语言,主要从土耳其人中任命官吏,给予该州以拥有自己旗帜(它包括土耳其国旗)的权利。1921年条约的这一部分,为

^① 州(“Санджак”)是奥斯曼帝国的行政单位,就大小来说,它处于省和县之间。

1923年的洛桑条约和1926年的法土条约所确认了。

187 在从1921年到1936年这十五年间，虽然法国没有经常遵守关于该州行政自治的协定，土耳其并未正式提到这个问题，但州内居民则几次起义反对法国殖民当局。可是，1936年，亚历山大勒塔州问题又变成了现实问题。

1936年9月9日，法叙条约进行了草签^①，该条约规定三年以后停止法国的委任统治和叙利亚进入国联。1936年11月13日，法国与黎巴嫩缔结了同样的条约。根据法叙条约规定，亚历山大勒塔州列入了叙利亚版图，后者承担了由法国以叙利亚名义和为它的利益而签订的各种协定所产生的一切权利和义务。

在法叙条约草签以后，土耳其报刊和土耳其领导人立刻展开了强烈的反法运动，谴责法国把亚历山大勒塔州转交给“叙利亚委任统治”。他们要求该州也像叙利亚和黎巴嫩一样，获得独立自

^① 草签(“парафировать”，源出法文“parapher”)——意指参加制定条约的人，签署姓名的字首于条约之上，以确认初步达成协议。——译者

主，要求法国与该州签订类似的协定。1936年10月，土耳其政府同法国政府开始进行正式谈判和外交文书的往还。土耳其提出了下列论据：一、1921年条约不是土耳其人与当时并不存在的叙利亚签订的，而是土耳其人与法国签订的，并且亚历山大勒塔州不是无条件地而是有条件地让出的；二、如果现在法国放弃在这个地区的权力，那主权应转交给该州居民自己；三、法国无权不经条约当事人（即土耳其）同意把条约转让给第三国，就像用票据背签的办法转让支票那样；四、法国破坏1921年和1926年两条约的这一部分，将使该两条约的其他条款——包括规定土叙边界的条款在内——无效。

法国在它的复照中也宣称，它不能同意亚历山大勒塔州独立，因为：一、法国在1921年缔结条约时，只是以拥有委任统治权的国家的资格出面的，就是说，是为了叙利亚的利益；二、从国联获得的委任统治的条件只规定两个国家——叙利亚和黎巴嫩，因此，建立第三个独立国家——亚历山大勒塔——就会是分裂委任统治区和破坏委任统治条件；三、1921年条约赋予该州以自治

的行政制度，而不是特殊的政治地位；专门的行政制度就是在法国对叙利亚的委任统治取消以后也将保持。

188 在这些复杂的法律公式后面，隐藏着双方的现实利益。土耳其力求亚历山大勒塔州独立，以期使它服从自己的影响，意思是要在或迟或早的最近将来兼并这个州。

土耳其人之所以选择这个时机来使这一问题尖锐化起来，原因如下：首先是他们确信法国的软弱，其次是确信列强宁愿用合法的途径来满足土耳其的要求，就像在海峡问题上所做的那样，以便不致面对“既成事实”。

法国不愿加深与土耳其的冲突，因为它同土耳其保持友好关系在政治上是有利的（巴尔干协约国，海峡）。但法国却不愿同意亚历山大勒塔州完全独立。不用说，在这种情况下，法国就会失去地中海东部有利的海军基地，亚历山大勒塔正式脱离已经丧失了黎巴嫩诸港（贝鲁特和的黎波里，两地都并入1920年建立的大黎巴嫩国家）的叙利亚，就会使法国人与阿拉伯人的关系极端尖锐化，并且还不仅是与叙利亚的阿拉伯人，而且

与构成法国主要军事后备力量的北非洲阿拉伯人的关系极端尖锐化。

其他强国为了自己的利益，都鼓励争论双方不要让步。例如，英国的报刊就说服法国人相信土耳其的法律论证没有根据。德国和意大利则极力暗示土耳其人说，必须坚决地、“毅然决然地”行动。

冲突因州内发生的风潮而尖锐化起来。土耳其居民拒绝参加叙利亚议会选举，当时发生了与当局的冲突，并有人员的牺牲。于是土耳其和法国都同意把问题交由国联解决。根据国联行政院1936年12月通过的决议，中立的“观察员”被派到该州。至于争论的实质，国联建议土耳其和法国政府在调停人——瑞典的部长森德列尔——的参加下，继续进行双边谈判。

可是，土耳其报刊对法国的攻击并没有减少。报纸威胁说，如果土耳其得不到满足，它就离开国联。在土耳其大国民议会一次开会时，一个议
189

员明确地主张采用军事手段。他说：“如果我国政府不能借助白皮书解决问题，那么，土耳其人民就给它随便多少红墨水来发表红皮书。”

1937年1月初，即当土法谈判没有结果而中断时，土耳其的气氛如此紧张，基马尔甚至召集了有总参谋长参加的会议，而后来，则去南方作示威性的旅行。当时传出谣言说，土耳其军队集结在叙利亚边境上。这些谣言受到了官方的驳斥，但土耳其报纸则明显地暗示说，边境居民有“自发地”起来援助亚历山大勒塔土耳其人的可能。

就在1937年1月，双边谈判又恢复了，而在一月底召开的国联行政院的一届会议上则取得了妥协。决议规定，亚历山大勒塔州在对外政策、货币制度和关税等问题上与叙利亚联系在一起，在其内政方面它将获得完全的独立自主；该州将由国联监督，后者将把自己的代表（法国出身的人）派到那里；该州不设防，法国和土耳其共同保障它的领土完整；该州的宪法和法规将由国联行政院批准；土耳其在利用亚历山大勒塔港进行直达运输方面将得到专有的特权。

1937年5月，国联行政院批准了专家委员会制定的亚历山大勒塔州的宪法和法规。同时在日内瓦也签订了相应的法土协定。

但在1937—38年的冬天，冲突又起，并且更

为激烈。看来，该州的议会选举不会使土耳其人得到他们所期待的多数票。土耳其政府把这件事情归咎于法国当局和国联派去的“观察员”委员会，它宣称，该州的土耳其居民受到暴力威胁，有人强迫他们放弃土耳其族的民族属性等。

法国人也谴责该州的土耳其人，说他们故意地煽动风潮和攻击其他民族团体的代表。叙利亚的阿拉伯人也表现出很大的不满情绪。到这时事实已经表明，法国是故意在拖延批准它 1936 年与叙利亚签订的条约，打算否认已向叙利亚人发出的关于取消委任统治制度的诺言。这个条约虽是促使亚历山大勒塔州脱离叙利亚的直接导火线，190但对于阿拉伯人来说它仍有肯定的方面^①。现在它在阿拉伯人心目中已失去了任何价值。割让该州显著地违反阿拉伯人的物质和民族利益。由于所有这些原因，该州的局势异常紧张。到 1938 年春天时，该州的街头冲突，变成了土耳其人和非

^① 1936 年条约没有规定叙利亚的真正独立（它是按 1936 年同年签订的英埃条约的榜样制定的），但在那个时期，它仍旧是叙利亚人的一定的成就。法国拖延批准以后，1939 年最后放弃了这个条约。

土耳其人之间真正的内战。法国殖民当局自己的挑衅行为只是在火上加油。国联的委员会表现出可耻的无能为力。

这一次法国也让步了。法国政府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交出亚历山大勒塔州，比在地中海上一旦发生战争时丧失土耳其的支持要好。英国外交当局也用尽各种办法使法国相信这一点。对英国来说，当时形成了一个非常有利的远景：土耳其在获得亚历山大勒塔州以后，将加入英法集团，并更加依赖英国，而法国让出该州以后，将使自己同阿拉伯人的关系复杂化，使叙利亚脱离自己，因而也使英国从里凡特(Левант)国家排挤法国势力的任务易于实现。

由于各种公开和秘密的谈判的结果，法国政府终于同意延期选举亚历山大勒塔州议会。后来在1938年6月初，法国从该州召回了曾使土耳其人怨声载道的自己的代表(加罗)，并任命了另外一个代表(柯勒)，训令他满足土耳其人在组织议会选举问题上的要求。国联的委员会在失去任何支持以后也回到了日内瓦。

1938年7月3日，法国同土耳其总参谋部在

安塔基亚(安提阿)签订了一项协定。协定规定土耳其军队进入亚历山大勒塔州,其人数与法军相等(二千五百人)。1938年7月4日,法土友好条约在安卡拉进行草签:法国和土耳其不得参加旨在反对一方的政治或经济联盟,在第三方进攻缔约一方时不得援助第三方,如果地中海东部的和平遭到破坏时彼此进行协商。表面上,总参谋部的协定和友好条约是两个互不联系的单独文件。¹⁹¹而实际上,允许土耳其军队进入亚历山大勒塔州,乃是对土耳其同意签订安卡拉条约而给的报酬。

土耳其军队立刻进入了亚历山大勒塔州领土。此后就举行了州议会选举。很明显,由于有土耳其军队在场,选举使土耳其人获得了全胜。土耳其大国民议会的一个议员被选为该州总统。参加州政府的都是土耳其人。新国家以土耳其的名字——“哈泰”自称。它以土耳其国旗为自己的国旗,以土耳其国歌——《独立进行曲》——为自己的国歌。哈泰议会和总统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向土耳其共和国总统和大国民议会发出致谢的电报。

从这时起,亚历山大勒塔州事实上已变成了

土耳其的。但土耳其人力图彻底兼并它。这又费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同以前一样，关于亚历山大勒塔州的谈判，是和关于土耳其与英国以及法国的政治关系的谈判同时（当然也是联系的）进行的。德国和意大利缔结正式的同盟，对土耳其产生了强烈的印象，而法西斯国家在中欧（德国侵占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和巴尔干（1939年4月意大利侵占阿尔巴尼亚）转而采取直接的武装侵略行动所产生的印象，则更为强烈。侵略势力的这种纠集，特别是法西斯意大利的接近土耳其边界，使土耳其人大为吃惊。这种惊慌被英国利用了，英国坚决地提示土耳其政府说，它应完全采取依靠英法集团的方针。土耳其之热中于兼并亚历山大勒塔州，也是英国外交家手中用来对土耳其政府施加压力的工具。而法国在“慕尼黑”政策以及纠集近东军事集团等问题上都追随英国，所以就不再反对得到英国人支持的土耳其关于兼并亚历山大勒塔州的要求了，——不过条件是土耳其要参加英法集团。

1939年5月12日，在安卡拉和伦敦两地同时发表了英土声明。其中载称，土耳其和英国政

府进行了“密切的协商”和谈判，“谈判目前仍在继续进行”；可是，双方没有等到缔结最后的协定就宣称，“一旦发生足以导致地中海地区战争的侵略行动时，它们将准备进行有效合作和互相给予全面的援助”。在这个声明发表以后，土耳其政府取消了已在德国订购好的飞机，解除了与在土耳其农业部、安卡拉农业研究所等机关工作的德国专家所订的合同。与英国进行的关于新贷款的谈判开始了。土耳其军事使团动身前往伦敦。 192

不久以后，法土谈判也结束了。1939年6月23日，在安卡拉和巴黎两地同时签订了两个单独的文件。安卡拉协定载称，哈泰（亚历山大勒塔州）最后地并入土耳其。巴黎协定采取了互助声明的形式；法土声明的原文与前面的英土声明相符。

哈泰变成了土耳其一个普通的省。安塔基亚（安提阿）是它的首府。亚历山大勒塔港——一个同名的县的中心——变成土耳其在地中海的主要港口。

可是，叙利亚政府坚决不承认亚历山大勒塔州转让给土耳其。因此，从国际观点来看，关于

亚历山大勒塔州问题还不能算是解决了。

四 基马尔党内部的斗争。 阿塔丘尔克之死

在蒙特罗会议以后土耳其所处的危急年代里，当权的基马尔党受到了反动分子日益增长的影响。这个政党并不是单纯的。实质上，它是土耳其工商业资产阶级、一部分地主和富农的联盟的政党。工商业资产阶级是这个联盟中的决定因素。以前在民族战争时期，土耳其资产阶级曾分为两个敌对的阵营——安纳托利亚阵营和伊斯坦布尔阵营。但在战争结束后的十五年间，安纳托利亚资产阶级与伊斯坦布尔以及其他港口中心以前的买办分子相融合的过程完成了。“买办”这个名词本身应用到土耳其身上已不合时宜了。

因此，不久以前引起安纳托利亚资产阶级与买办分子之间尖锐冲突的一些问题的实质也改变了。例如，国家主义的产生，是由于软弱的安纳托利亚资产阶级渴望用国家资金建立民族工业，并以此来巩固国家独立，它当时曾受到买办

分子及其思想代表——进步党人和自由党人——的攻讦，这些人所持的立场是：对土耳其资本提倡“私人首创精神”，对外国资本主张“门户开放”。由于安纳托利亚资产阶级与买办资产阶级打成一片，结果就产生了不同的力量配置。

拥护以前经济政策方针的，现在只有这样一部分土耳其资产阶级，他们不善于或者还没有来得及在对外贸易和银行业务方面占据巩固的阵地（或者是丧失了这种地位），因此他们认为，发展国家主义的工业是扩大国内市场和防御外国资本的手段。此外，在土耳其资产阶级中又形成了一个人数很多的阶层，它与国家主义的企业有直接联系，并从中得到物质利益（承包商、代售人、商人、管理和资助这些企业的机关和银行的领导人等）。最后，爱国的知识分子仍继续把国家主义看成土耳其经济独立的基础，因而也是政治独立的基础。阿塔丘尔克也赞成这种观点。无论基马尔怎么动摇（特别是表现在自由共和党活动时期），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政治眼光，也正如在其他很多问题上一样，远比不能超出狭隘阶级利益范围的土耳其资产阶级其他领袖为广阔。

反对国家主义的，首先是占据了买办地位并承受了买办利益的大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把国家干预经济和给予国家主义工业以优惠，看成是“自由的”发财致富和更强烈的吸引外资道路上的障碍。很多大地主也不满意国家主义，他们因国家主义可能扩大到农业方面而惊惶不安。企图与帝国主义国家进一步接近的当权的上层分子中的反动派，由于政治上的考虑，力求改变以前的经济方针。

拥护和反对国家主义的斗争，并不具有公开的性质。它是隐蔽地、秘密地、小声小气地进行着，但是大资产阶级反动分子日益增强的积极性，却明显地影响到这一斗争的未来结局。

在土耳其对内和对外政策的其他问题上，力量对比也发生了有利于反动派的变化。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当权的土耳其上层分子内部这个暗地里的斗争的天平盘，显然倾向于反动派一边。

在反动分子的影响下，总理伊斯美特·伊涅纽明显地开始脱离基马尔·阿塔丘尔克在民族解放运动初期所提出的那些原则。以前伊涅纽自己

在其各种公开的言论中，曾要求国家主要采取依靠本国资源的方针，而在对外政策方面，他曾算是一个拥护与苏联友好的人。同时，他一度还是赞成进行某些土地改革的人。他所提出的方案具有非常温和的性质，并且与其说是照顾农民本身的利益，倒不如说是照顾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例如，伊涅纽由于力图扩大国内市场，便建议赋予政府以权利，以便有报酬地征收地主土地分给无地农民^①，成立所谓“农业联合企业”等。但是，伊涅纽所有这些进步的（虽然也是温和的）方案，以及他对本国民族独立的关怀，都已成为过去了。

很难说是否由于这个原因或其他原因，但伊涅纽和阿塔丘尔克之间却表现出疏远的现象。很可能，幕后的阴谋诡计以及流传于总统周围和政府人物之中的各种流言蜚语，也起过不小的作用。当时很多人谈论说，伊涅纽只给总统留下了虚名，而把全部实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这里是有部分真理的。阿塔丘尔克在最后几年里确实是逐渐脱离了国家的管理工作。旧有的肝脏和肾脏病加

^① 这个改革部分地也是由于政府和工业家想获得地段以兴建企业的热望所引起的。

重了，并且常有总统实际上是长期不问事情的时候。但他既不愿承认自己病入膏肓，更不愿放弃自己的特权。因此，关于总理实行未与总统商妥而独自做主的政策的谈论，一传到阿塔丘尔克那里，这就只能增加他对伊涅纽的气愤。加之1937年秋天，伊涅纽与外交部长阿拉斯之间又发生了尖锐的意见分歧^①。阿塔丘尔克干预了争论，把伊涅纽召到自己面前，并吩咐他先“休假”而后再辞职（1937年10月25日）。

196 在稍事犹豫（在伊涅纽被迫“休假”到他正式辞职这一时期）之后，阿塔丘尔克任命了一个不是军人而是文官担任总理职务，后者与其说是因为参加民族斗争而闻名，不如说是以其著有成效的商业与银行业务活动而著称。

这个人就是詹拉尔·巴雅尔，他在这以前担任国民经济部长，而在当部长以前曾任实业银行总经理。土耳其大资产阶级对于任命巴雅尔为总理很满意。大资产阶级对他寄予很大的希望，即

^① 这是由于在1937年夏天召开的尼翁国际会议期间，土耳其在关于采取措施以对付法西斯国家潜水艇在地中海的海盗行为问题上所承担的义务而引起的。

寄希望于一个能与西方资本家达成有利于大资产阶级的交易，能够镇压正在成长的工人运动，保证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法西斯国家“信任”的实业界权威代表人物。

的确，在巴雅尔被任命为总理以后，土耳其政府明显地与帝国主义国家亲近起来了。当时缔结了一些新的经济和财政协定，使外国资本易于渗入土耳其。同时，国内反动分子的活动也加强了。大量进行反动宣传的各种报纸都受到当局的奖励，而刊载有利于和平和保卫民主的文章则遭到迫害。政府通过国会施行反动的出版法，规定了为民主报刊所担负不了的各种条件：巨额押金（五千里拉），罚金，出版工作者必须受过高等教育，没有政治罪等。大赦法也通过了：民族运动的敌人、参加过苏丹反对安纳托利亚斗争的人都获得了完全的饶恕，而在这同时大赦却没有普及到共产党人身上。

巴雅尔政府执政一年多。在这个时期里，基马尔·阿塔丘尔克对于国家大事的影响更加减少了。阿塔丘尔克虽身患重病，也没有放弃总统职位，但事实上他已不能领导国家的管理工作了。



土耳其共和国总统基马尔·阿塔丘尔克

实际上是巴雅尔和混入总统“周围”的一些十分愚昧无知的人，代表他办事。

阿塔丘尔克的病是周密地隐瞒着人民的。可是，1938年夏天危机到来了。政府不得不发表诊断公报。其中载称，肝脏病发作引起总统健康的急剧恶化，但由于采取了各种措施，直接的威胁已经过去了。

实际上阿塔丘尔克已经快要死了。按照医生的建议，人们把他运到停泊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游艇上，以便海上的空气和安静的环境好减轻病人的痛苦。恢复健康的希望已经没有了。政府全体人员都来到了伊斯坦布尔，日夜等待着结局。城内传出各种谣言。有的人说，阿塔丘尔克“周围的人”极力要他任命一个继承人，以便当他还活着时，好用他的威望而使政权之正式转入反动分子手中这件事受到尊崇。但也有人说，阿塔丘尔克保持完全的沉着态度，他把部长们召到自己面前，吩咐他们立即回安卡拉去。他好象还补充说，现在他还是总统，用不着制定关于在他死后谁将被选的计划。

1938年11月10日，基马尔·阿塔丘尔克逝

世了。土耳其举国哀悼。全国各地都派代表团去安卡拉，对土耳其共和国这位没有更换过的总统和土耳其人民争取独立斗争的领导人致哀。很多国家——其中包括苏联——都派遣了专门的代表团去参加葬礼。

在阿塔丘尔克死后第二天，即1938年11月11日，举行了总统选举。伊斯美特·伊涅组当选。土耳其有势力的反动人士都同意他为候选人，因为他虽然将近一年没有问事，但仍旧是国内最有声望的人物；广大人民群众不知道他与阿塔丘尔克之间有意见分歧。因此，最好是用伊涅组来推行反动政策，而不用没有名望的活动家，更不能用阿塔丘尔克任何公开的敌人。

不久以后，人民共和党召开了非常代表大会。伊涅组也象以前阿塔丘尔克一样，被选为该党的常任主席。

起初，伊涅组是慎重行事的。他只限于对政府成员作了比较不大的更动：免去了阿拉斯外交部长职务（同时也免去了因与法西斯分子亲近而过于败坏了自己名誉的内政部长秀克留·凯伊）；后来过了几个月，他任命了自己最亲密的同事——

列费克·赛达姆代替巴雅尔担任总理。但由于国会先期改选，其中选进了很多完全听命于他的新议员，伊涅纽依靠先期改选的国会，无论在对内和对外政策上，都逐渐远比以前大胆地奉行有利于反动分子的路线。

反动分子和投降分子获得了公开开展其活动的机会。土耳其的劳动群众，要求建立保卫和平和民主的人民阵线。土耳其的统治集团没有响应这个呼吁。土耳其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处境没有得到任何改善。反动的出版法没有废除。政府甚至198加强了对民主保卫者的镇压。共产党仍处于极端秘密的状态中。

不但如此，伊涅纽还走上了与反动人物结成联盟的道路，这些人是以前反基马尔的政党：青年土耳其党、进步共和党、自由共和党的领导人。卡兹姆·卡拉贝基尔、胡赛因·查希德·雅尔琴、胡赛因·饶夫·奥尔柏、阿里·符亚德·詹比索、阿里·费特希·奥克雅尔，以及其他反动分子，都获得了国会和政府的职位。

随着土耳其反动势力的加强，外国资本也在一些部门里恢复起来，它的阵地巩固了。土耳其

大资产阶级承受了买办的意图，要求放弃国家主义，给予西欧和美国资本家以广泛的特权，主要借助外债来建设工业企业。政府和人民共和党甘心乐意地执行这些要求。政府的纲领虽以基马尔党的“六个箭头”为掩饰，实质上是包括了进步党人、自由党人以及基马尔其他敌人的基本愿望的。那些在不久以前还庄重地号召保护国家经济独立的土耳其领导人，现在在基马尔死后都极力使土耳其服从帝国主义国家的利益。伊斯美特·伊涅纽在1928年秋天，即在费特希·奥克雅尔与奥斯曼债券持有人签订协定后不久，曾明确地谴责买办分子的要求。当时伊斯美特·伊涅纽在对马拉蒂选民的演说中说，“我们大家常听到一个老调：没有外债就不可能有国家的经济发展。但我们难道不应该考虑到我们过去的教训和经验以至其他国家的经验吗？过去教育我们，外债是以异常苛刻的、与民族存在不相容的条件为特征的，并且是沉重的负担。”可是，1936年，就是那个仍旧担任总理职位的伊涅纽却把这个“沉重的负担”加到土耳其身上，接受了英国关于贷款修建卡拉布克联合冶金企业的建议。后来他当了共和国总

统以后，在这条道路上走得更远。土耳其除了接受英国的贷款建议以外，还接受了德国的贷款建议；在土耳其国民经济的很多部门里都出现了外国“顾问”和“专家”，外资在工商业中的作用加强了。

在对外政策上，伊斯美特·伊涅纽也表现出不坚定和犹疑不决。土耳其政府通过新任外交部长秀克留·萨拉兆格鲁的一张嘴巴，在口头上声明说，它将坚决为保证国家独立而斗争，并强调指出其保持和发展苏土友谊的意图。但在事实上，土耳其的对外政策却是另外一回事。代替阿塔丘尔克以前推行的独立自主政策的，是反民族的趋势在土耳其统治集团中占优势。以前对土耳其来说，与苏联的友谊是一个支点，这时土耳其丧失了这个支点，脱离民族原则，走上了选择帝国主义集团的危险道路，并准备把自己的命运付托给这些集团去“保护”。

总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土耳其的政治领导实际上已完全落在反动分子手中。这使国家和人民处于艰苦的境地，并使土耳其变成法西斯侵略者及其“慕尼黑保护者”的工具。

五 土耳其与第二次世界大战

1939年春天和夏天，当希特勒疯狂地准备在欧洲发动战争，而以张伯伦和达拉第为代表的他的“慕尼黑保护者”极力使德国的侵略矛头指向苏联时，土耳其无论在德国或在英法集团的打算中都占有显著的地位。1939年4月到达安卡拉的德国大使冯·巴本^①，图谋使土耳其参加法西斯“轴心”。巴本在向伊涅纽呈递了国书以后致词说，“德国将最密切地与土耳其合作”。同时，以阿里·符亚德·詹比索为首的代表团（其成员中还有副总参谋长——阿瑟姆·顾杜斯和几个名记者——胡赛因·查希德·雅尔琴、尤努斯·纳地、尼志美丁·萨达克、发里希·李夫基·阿泰），在希特勒生日的时候曾到柏林向他祝贺，并听到了法西

^① 希特勒早在1938年就打算派遣冯·巴本去安卡拉，当时阿塔丘尔克还在世。可是阿塔丘尔克知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巴本在叙利亚的挑衅活动，那时巴本是冯·法尔肯汉因司令部的谍报官。因此阿塔丘尔克拒绝了任命巴本为驻安卡拉大使。在阿塔丘尔克死后，土耳其政府取消了自己的反对意见。

斯元首宽厚而善意的答词：“土耳其是我们的榜样”。

另一方面，热中于利用土耳其港口和土耳其领土的英国和法国，与土耳其进行复杂的谈判，不仅力求使它加入英法集团，而且力求土耳其政府帮助它们实行慕尼黑政策。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有1939年5月12日的英法声明^①，为什么亚历山大勒塔州让给了土耳其人，为什么有1939年6月23日的法土协定。

1939年9月1日，希特勒德国进攻波兰。过了两天，英国和法国向德国宣战。但就在那时，英法外交当局仍希望危机按照慕尼黑方案发展下去。张伯伦和达拉第依旧力图使德国的侵略矛头指向苏联，决定利用土耳其来达到这些目的。9月下旬，土耳其外交部长萨拉兆格鲁到达了莫斯科，以便进行关于缔结土苏互助条约的谈判。正如后来所表明的那样，萨拉兆格鲁企图利用平行的条约体系（苏土条约和英法土条约），以便帮助慕尼黑分子实现他们所策划的目的在于引起苏联同德

^① 原文如此。但这里应是英土声明，见本书342页。——译者

国发生武装冲突的阴谋。萨拉兆格鲁遭受失败以后便起程回土耳其。当他还在路上时，1939年10月19日，英法土互助条约在安卡拉签订了。这样一来，土耳其便加入英法集团了。

1939年10月19日的英法土条约规定：一、“如果土耳其由于一个欧洲国家对土国进行侵略而被卷入与该国的军事行动中时”，英国和法国将给予土耳其援助；二、“一旦一个欧洲国家发生侵略行为并导致地中海地区的战争，而英国和法国又被卷入这一战争中时”，土耳其将给予援助，同时，“一旦一个欧洲国家发生侵略行为并导致地中海地区的战争，而土耳其又被卷入这一战争中时”，法国和英国将给予援助；三、如果英国和法国由于它们给予希腊和罗马尼亚的保障而被卷入战争中时，土耳其将给予希腊和罗马尼亚以援助；四、如果英国和法国或者是曾得到英、法或土耳其的有关保障的国家被卷入地中海地区的军事行动中时，立即互相协商。条约期限规定为十五年。它的各项规定不仅作为三边的义务应被认为有效，而且作为双边的义务——土耳其与其余两个缔约国中的每一国——也应被认为有效（因此，在

1940年法国投降以后，该条约作为英土条约仍保持其效力)。附加在条约后面的第二号议定书是条约的一个组成部分，它载称：“土耳其由于上述条约而承担的义务，不得迫使土耳其采取这样的行动：其结果或后果将使土耳其卷入与苏联的武装冲突中。”

英法土条约实质上是军事同盟。因此它引起了德国的激怒。冯·巴本并不掩饰自己的不满情绪，他以离开土耳其相威胁，而希特勒的半官方刊物《人民观察家》则宣称，不能把土耳其当作中立国，而它一定要“痛苦地后悔”。土耳其人自己这时强调说，土耳其不是中立国，而只是“非交战一方”。

尽管如此，土耳其政府实际上是很不愿意参加反对法西斯侵略者的斗争的。与英国和法国缔结条约的目的，是捞取物质利益（在条约签订以后，英国和法国便立刻给予土耳其以大宗借款和贷款，总数为四千三百五十万英镑），此外它也是慕尼黑政策的继续。伊斯美特·伊涅组在1939年11月1日大国民议会应届会议的开幕式上发表演说时宣称，条约并不针对任何一个国家，它为

“与我们(即土耳其)利害相关的地区的和平事业”服务，它的目的是“反对战争悲剧的蔓延和扩大，在欧洲建立安全地区”。如果抛去伊涅纽这些口头上的漂亮话，那他的演说的意思就是：土耳其毫不反对法西斯侵略矛头指向英法的保证和义务所没有扩大到的那些“地区”，即仍然针对着苏联。并且，就是附加在条约后面的第二号议定书，与其说是表明土耳其力图拒绝对苏联采取敌对行动，不如说强调指出苏土关系的急剧恶化。甚至土耳其报刊对德国的抨击，当时也不是由于一般地对法西斯侵略的愤怒所引起的，而是由于侵略不是在慕尼黑分子希望看到的地方开始的。

202 第二号议定书并未妨碍土耳其统治集团在苏芬战争时期对苏联采取敌对的立场。领导当时驻叙利亚的法国军队的魏刚将军曾赴安卡拉，并与土耳其军事领导人进行了关于共同反对苏联的秘密谈判。正如在1948年2月苏联情报局公布的历史事实考证《揭破历史捏造者》中所指出的，魏刚将军在苏芬战争时吹牛皮说：“只要有点增援部队，加上二百架飞机，那他就可以夺取高加索，并向俄国长驱直入，就象‘疾风扫落叶’一样。”法国

驻土耳其大使马西格里向本国政府报告说，在土耳其的军事人物中“越来越多地谈论着高加索和巴库的伊斯兰教徒”。马西格里曾与萨拉兆格鲁讨论过从土耳其对巴统和巴库进行空袭的计划，而然后他向总理达拉第报告说，土耳其政府“预料对苏联进行防御战争的可能性至迟在夏末”，土耳其“会满意地通过伊朗领土参加盟国对巴库的进攻”。

苏联和芬兰在1940年3月缔结和约粉碎了这些打算。继后希特勒的侵略行动于4月扩大到挪威和丹麦，5月又扩大到比利时和荷兰，这便改变了战争性质，并且甚至使土耳其的政治家也明显地看到，希特勒是决不想怜惜西欧的民主的。在这样的局势下，如果1939年10月19日的条约真正抱着互相援助、反对法西斯侵略的目的，那么，看来土耳其就应当更加与自己的盟国接近才是。但结果适得其反。土耳其正是在这个时候与希特勒德国及其仆从亲近起来。德国武装力量的胜利明显地影响了土耳其的统治集团，他们这时不愿把自己的命运与当时较弱的一方联系在一起。

意大利进攻法国(1940年6月10日)造成了英法土条约所规定的形势——军事行动扩大到了地中海地区。土耳其政府从英国和法国方面收到了关于应用条约中有关条款——即给予援助——的建议。但土耳其总理列费克·赛达姆在国会中宣称(1940年6月26日),土耳其政府决定拒绝援助自己的盟国。同时赛达姆以第二号议定书为借口,尽管苏联与地中海中的军事行动没有任何关系。

203 在法国失败以后,土耳其对外政策有了进一步的改变。1940年7月,土耳其同德国缔结了贸易协定。它规定了很大的贸易额:每方为二千一百万土耳其里拉。尤努斯·纳地主编的《共和报》为此登载了一系列的文章,指出必须改善与德国的政治关系。根据土耳其政府的命令,1939年被查封的德国法西斯报纸《土耳其邮报》又允许出版。土耳其的活动家们在自己的公开言论中避免确切地说明土耳其的立场:“中立”这个词还没有出现,但“非交战一方”一语已经不通用了,而当意大利进攻希腊时(1940年10月28日),土耳其又拒绝给予援助。赛达姆在这一天发表广播演说

时，只限于作这样一些傲慢的声明，“土耳其是和平之岛”，“我们的武器就是团结和对独立与荣誉的热爱”。当时已很明显，土耳其领导人准备与希特勒德国密切接近。正如在上述的苏联情报局的历史考证中所指出的，1940年秋天，希特勒自己是把土耳其看成他当时的盟友，或至少是将来的盟友，因而苏联政府当时便给自己作出了一个结论：“土耳其或已经同希特勒德国有了密切联系，或希图同它发生此种联系。”

在这年的冬季里，“非交战的”土耳其从纵容法西斯侵略者过渡到直接帮助他们。土耳其与德国的贸易关系扩大了：1941年1月，德土贸易额比英土贸易额超出八十万里拉，而在1940年1月则相反，英土贸易价值几乎比德土贸易价值多二百万里拉。土耳其开始以羊毛、皮革、粮食产品供应德国人（而稍后则以其他更为贵重的原料供应德国，其中包括德国军事工业特别需要的铬矿石）。1941年2月17日发表了土保宣言。这个宣言在保证友谊和“放弃任何侵略”意图的幌子下，给予保加利亚的法西斯分子以行动自由，促使保加利亚加入“轴心”体系。1941年3月1日，保加

利亚加入了法西斯国家的“三国公约”，而第二天，德国军队（早从1940年秋天就占领了罗马尼亚）便进入了保加利亚领土。土耳其没有反对这一点。现在它采取了“中立”的立场，事实上是“非交战的一方”，不过已是支持德国了。

1941年3月4日，冯·巴本把希特勒鼓励土耳其立场的私人信件交给了伊斯美特·伊涅纽。此后双方又进行了一系列的私人通信。艾登与萨拉兆格鲁在这时所进行的谈判（在安卡拉和塞浦路斯岛），只导致这样的结果：英国确信，指望在巴尔干获得土耳其方面的援助是没有希望的^①。的确，1941年4月6日，德国进攻希腊和南斯拉夫以及保加利亚军队反对这些国家的行动，并没有使土耳其退出它的“中立”，虽然不仅由于1939年与英国签订的同盟条约，而且由于巴尔干协约国的公约以及土希和土南双边条约，土耳其都必须援助巴尔干地区侵略的牺牲者。

^① 还有理由认为，早在这些谈判时萨拉兆格鲁就已试探过关于英国对土德可能缔结条约所抱的态度问题。大概艾登鉴于土德条约将必然引起苏联与德国的磨擦的增强，加速希特勒进攻苏联，因而并没有特别反对土耳其政策作这样的转变。

最后，1941年6月18日，即在德国进攻苏联前四天，土德“友好互不侵犯”条约在安卡拉签订了。对希特勒来说，这个保证法西斯军队在巴尔干侧翼安全的条约，是反苏战争准备工作中的最后一环。而对土耳其来说，条约意味着土国公开地加入了希特勒德国的反苏政策。不用说，土耳其由于与德国缔结了这样的条约，从而就破坏了1929年12月17日的苏土议定书^①，土德条约的性质本身证明土耳其选择了依靠德国的方针。双方必须避免互相侵犯，在相互关系中必须遵循友好政策。并且还作出保证说，报刊和广播将按照条约行事。换句话说，土耳其甚至必须避免在报纸和广播电台上批评法西斯政策。某些误解起初曾引起这样一个问题：土耳其如何能使德土条约的义务同仍然有效的1939年英土同盟条约的义务并行不悖呢？土耳其活动家们关于土耳其同德国的友谊决不违背与英国的同盟这类声明，显然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可是，土耳其的行为很快地就使问题容易理解得多了。

^① 这个议定书的条件见本书第296页。

土耳其当权的反动集团以几乎是毫不隐蔽的喜悦心情欢迎希特勒进攻苏联。这些人希望，借助土耳其的外交活动德国将能说服英国保持中立，德国将“闪电般地”战胜苏联，依靠牺牲苏联利益而缔结的和约，将给土耳其带来领土上的和其他的好处。1941年6月22日晚间，丘吉尔的演说使土耳其的政治家们感到失望，但他们并未放弃对希特勒的胜利所抱的希望。土耳其宣布了形式上的“中立”，但实际上是尽量地帮助德国人。土耳其同德国签订了（1941年10月9日）新的贸易协定，规定贸易额为一亿土耳其里拉，并且土耳其为了换取德国供给的军事物资，必须以铜供应德国，而从1943年起又供应铬矿。土耳其的报刊变成了恬不知耻的戈培尔宣传的传声筒。对苏联的诽谤，关于希特勒“成就”的吹牛的谎言，对苏联土地抱着卑鄙的泛突厥主义的野心，——所有这些在1941年和1942年间充满了土耳其报纸的篇幅，直到德国人在斯大林格勒失败时。关于所谓有人“谋刺”冯·巴本案件的挑衅性的安卡拉审讯也是发生在这个时期，这次审讯演成可笑的司法丑剧，结果控告了两个毫无罪过的苏联公民

——巴甫洛夫和柯尔尼洛夫。在这个时期，土耳其的将领和记者们还拜访过希特勒的大本营，与希特勒进行过关于土耳其出兵反对苏联、以期“统一所有的土耳其人”的谈话。土耳其政府允许泛突厥主义的刊物《灰狼》和《在筱悬树下》^①出版。这些以及诸如此类的杂志和报纸露骨地号召对苏联进行战争。它们刊载类如描写恩维尔巴夏在土耳其斯坦的“功勋”这些挑衅性的文章，并且写道：“战争就是进步”，“战争是普及文化的最重要的手段”，“今天土耳其的国界远在高加索山那边，远在里海那边”，“伏尔加河是我们祖先世代代饮马的河”。

土耳其最为负责的人士也对苏联采取了虽较隐蔽但很敌对的立场。从后来在击溃德国时缴获的德国外交部的文件中可以看出，土耳其总理秀克留·萨拉兆格鲁（1942年代替了死去的列费克·赛达姆）曾与巴本交谈过自己隐秘的梦想。他对巴本说，“作为一个土耳其人”，他“热烈地希望消灭俄国”，“消灭俄国将是元首千载难逢的功勋……”

^① 筱悬树，即法国梧桐。——译者

206 只要把俄国的俄罗斯人至少杀去一半，那德国就能解决俄罗斯问题”。从那些文件中可以看出，土耳其外交部长努曼·门尼曼兆格鲁扮演了德国人的报信人的角色。他告诉德国人苏联正在做什么，开导德国人说，“俄罗斯问题的解决就在于从斯大林格勒向北推进，截断库贝舍夫——莫斯科铁路”，此后接着就“击溃苏联军队”。甚至伊斯美特·伊涅纽，虽然他作为共和国总统必须保持特别慎重，还是忍耐不住而对巴本说：“土耳其最关心消灭俄国巨人。”据冯·巴本说，在那次“内容异常丰富的谈话中”，伊涅纽对德国大使说，“英美方面的任何宣传和任何压力”，都不能促使土耳其“采取哪怕是最小的步骤”来损害德国的利益。伊涅纽强调说，相反的，“土耳其的中立立场在目前对‘轴心’国就已经比对英国有利得多”。^①

1942年秋天，土耳其把大量的军队集结在高加索边境，等待着斯大林格勒的陷落。土耳其报

^① 当然，关于希特勒代理人的情报应当谨慎对待；单是这些情报本身并不能成为唯一的和可靠的史料。但这里引用的冯·巴本的笔记的可靠性，已为土耳其政府在战时的实际行动绰绰有余地证实了：对德国的援助，对苏联的仇视行为。

刊上的反苏运动这时达到了顶点。1942年年底，德国给予土耳其一亿马克的贷款，以便使它取得军事物资和武器。

当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进程发生了转变以后，即在苏军于斯大林格勒城下击溃了德国人以后，土耳其政府是更为周密地掩饰自己对德国人的帮助。事实上它是继续给予援助。就在这个时期，土耳其也供应德国铬矿和其他战略物资，土耳其政府为了德国和意大利的利益，破坏了海峡公约，土耳其的报纸殷勤地传播希特勒的宣传，但所有这些都做得更为谨慎，并且同时又说保证忠于与英国的同盟。1943年初，伊涅纽与丘吉尔会晤于阿达纳，同年年底与丘吉尔和罗斯福会晤于开罗。土耳其开始从英美方面得到武器，而土耳其的报刊也暗示土耳其有参加对德战争的可能。

可是，土耳其虽然拥有装备就绪的百万大军，但就是没有参战。因此，1944年年初，土耳其报刊同英国报刊发生了一次尖锐的争论：土耳其人责备英国说，它供应土耳其的武器很少，而英国人则回答说，既然土耳其人不运用武器，他们对于已经给予土耳其人的武器也感到可惜。1944年

3月，丘吉尔说，“不要把武器给土耳其人，他们不愿利用武器来进行斗争，不会运用它，并且甚至产生了这样的问题：他们是否会擦武器。”但所有这些“气愤的”斥责都是幌子。丘吉尔这时决不愿土耳其参加战争。实际上，在英国人自己没有出现于巴尔干之前，他希望保持土耳其军队不动。他打算在巴尔干而不是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借助土耳其人赶在苏联军队的前面，并在整个巴尔干半岛上建立一种在他看来是适当的、即反动的“秩序”。这大概也就说明了下面这个事实：土耳其甚至在苏军决定性的胜利已预定了希特勒必遭灭亡的1944年时，还继续保持其“中立”，不愿使德国的溃灭加速一天。后来意大利的《前进报》并非没有根据地写道：“在土耳其的中立里面，有一种与英国利益相符合的东西。”

只是在1944年4月，土耳其——就这也是在盟国的压力下——才停止供应德国铬矿。6月里，土耳其政府根据英国人的要求，被迫撤去了外交部长努曼·门尼曼兆格鲁，后者因与德国联系而过于声名狼藉，并且是一直为了德国人的利益而保护土耳其破坏海峡公约的“权利”。1944年8月

2日，土耳其与德国断绝外交关系。按外国报纸的说法，绝裂具有“友好的性质”：法西斯外交官获得了广泛的机会以建立自己留在土耳其的谍报网；土耳其人隆重地献花为他们送行；土耳其报纸刊载很多同情德国的文章。就在这个时期，泛突厥主义者在安卡拉、伊斯坦布尔和其他城市举行法西斯的游行示威，政府虽也被迫制止这些行动，但以后进行的法庭审讯都变成了滑稽剧。

1944年8、9月里巴尔干地区的事变，苏军解放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在这些国家——正如在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一样——建立民主制度以及希腊的民主斗争等，所有这些都土耳其的统治集团中引起了明显的惊惶不安。土耳其的参战是完全多余的。但正是在这时土耳其政府才“敢于采取”这个步骤，大概是希望这一步骤将得到英美反动分子的好评。1945年2月23日，土耳其对德国和日本宣战。土耳其外交部长哈森·萨卡在说明这一行动的理由时，十分直率地在国会里宣称，英国大使告诉他，土耳其在1945年3月1日以前宣战，将使土耳其政府能参加旧金山联合国会议。除此以外，——关于这一点哈森·萨卡

没有说，——土耳其政府唯恐土耳其与法西斯侵略者的人所共知的合作，将使它在战后陷于国际孤立，就像佛朗哥西班牙所处的那种境地一样。由此可见，土耳其是以“象征性的”宣战获得了进入联合国的机会，这正是它(土耳其)的保护者——英国和美国——所希望的。

土耳其政府在很大的程度上还指望它能扮演巴尔干宪兵的角色。难怪土耳其的报纸在好几个月里一直向盟国保证说，如果土耳其受托“去整顿”巴尔干半岛的“秩序”，“阻止混乱现象和内战的发生”，那“西方的民主”将有收益。发里希·里夫基·阿泰在半官方的《人民报》上刊载了一系列的文章，证明必须同从希特勒占领下解放出来的国家里的“无政府状态”作斗争。胡赛因·查希德·雅尔琴在其《回声报》上，公开号召击溃希腊的民主派，并表明土耳其可以参加对希腊的武装干涉。

土耳其反动分子的暗示在英美某些人士中得到了响应。《华盛顿邮报》在土耳其宣战后第二天写道，土耳其政府的这一行动，“不是对战争而是对和平具有意义”。相反的，在各国的民主和进步人士中，土耳其的参战没有引起任何同情。土耳

其是在战线距离土耳其国境达一千公里之外以后，土耳其军队在实际上不可能出现于欧洲战场的任何地方的情况下向德国人宣战的。当时希腊、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和匈牙利都已解放了。很明显，土耳其这时也完全用不着对相距更远的日本宣战。

在整个进步人类对法西斯侵略者进行残酷的坚决的斗争时期，土耳其的这种立场决没有给土耳其政府在世界民主舆论中造成好声望。土耳其统治集团对苏联的敌对态度，特别是在伟大卫国战争时期，也不能不受责备地就过去了。在这种情况下，保持事实上已屡遭土耳其破坏的1925年苏土友好中立条约已成为不可能了。1945年3月19日，苏联政府宣布这个条约及其所属一切议定书和文件无效，认为它已失去了自己的意义并需作重大修改。到规定期限——同年11月7日——满期时，它停止发生效力。 209

土耳其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对外政策就是如此。法国记者克洛德·魏维尔在苏联政府废除了1925年条约以后立即在《秩序报》上指出：“五年之中一直玩火的土耳其，看来似乎是很

灵活的。今天看出，它当时所推行的是失去了机会的政策。”

甚至在土耳其资产阶级中也开始发出抗议的呼声。前外交部长阿拉斯在伊斯坦布尔的报纸上批评政府的对外政策。1945年4月，议员希克梅特·巴尤尔从国会讲坛上宣称：“政府在五年之中不仅没有促进对苏联关系的改善，而且反使这种关系趋于恶化。在整个战争期间，报纸一直对德国表示同情，而对苏联则经常以不愉快的精神发表议论。现任的土耳其政府无能力调整好与苏联的良好关系，它应当辞职。”

在对内政策方面，土耳其政府也同样完全摒弃了民主和进步原则。

如上所述，就是在以前，土耳其资产阶级利用民族解放运动夺取了政权以后，也是反对劳动群众利益的。但在共和制度的最初十至十二年间，即大致在1934—1935年以前，土耳其统治阶级还是做了若干进步性的建设工作：如旨在消灭国家制度、文化和生活方面的中世纪残余的改革，从外国资本过去强占的阵地中排挤外资，有助于保卫国家经济独立的国家主义措施，反对封建和买

办分子的斗争等；固然，后一斗争很快地就停止了，但尽管如此，它在一定时期还是限制了反动分子在政治上的嚣张。

基马尔党人对内政策这个肯定的一面，虽然没有补偿它的各个否定的方面，但结合着当时保持的基本上进步的土耳其对外政策来看，至少是使民主舆论对土耳其——作为一个刚刚争得独立因此遭到很多困难的年青国家——的总的评价温和一些。可是，从1935年起，土耳其就已没有实行一项进步的改革了。它的对外政策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最后，在阿塔丘尔克死后，他的露骨的敌人掌握了政权，在土耳其公开地建立了反动制度。这样一来，土耳其政府的整个对内政策这时已经只针对着一个目标了：巩固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的反动专政，他们为了无情地镇压劳动群众和居民中一切民主阶层而团结起来了。

人民共和党也彻底地破坏了自己的威信。它在以前也就有一些反民主的特征。没有个人党员，地方当局有时使整个乡村“登记”入党；既没有定期的会议，也没有报告工作的制度，也没有由选举产生的领导。人民共和党在实际上、并且在很

大的程度上也在形式上与国家机关融合在一起。1935年通过的党章中有一节载称，“党把由党的努力而建立的国家机关和自己本身的机关，看作一个彼此互相补充的统一的整体。”一个不大的领导集团被确认拥有很多不受监督的权利：确定国会议员的候选人，向所有的党员发出应当无条件执行的指令，领导国会和政府的全部活动。更不用说，党的领袖不是选举的而是不更换的总主席（阿塔丘尔克，在他死后是伊涅纽），党的整个组织结构使普通党员不能稍许认真地影响领导^①。

① 人民共和党在多年中形成的、现在基本上保持着的党章条例归结如下。党的最高领导权属于总主席会议，后者由三人组成：一、总主席本人，二、由他任命的副总主席，通常是总理担任，三、总书记，他也由总主席任命（1936—1939年，总书记就职位说是外交部长；后来这些职能被分开了）。党的总主席会议不向代表大会报告工作，也不服从它。在代表大会上选出由十六人组成的党的主管处，它管理党的日常事务（监督地方党组织的工作，领导人民宫和党的监察员，准备指示和决议），并完全服从总主席会议。党的总主席算是主管处的主席，实际上是总书记代表他担任主席。党在国会的党团也服从党的总主席会议，国会党团主席是党的总主席，而根据他的委托可以是副主席或总书记。此外还有一个所谓党委员会，它拥有谏议的职能，就其结构说与意大利过去存在的法西斯党的“大委员会”相近似。参加党委员会的有：党的总主席会议和主管处，国会议长和全体部长。

可是，在阿塔丘尔克活着时，他那无可辩驳的政治和道德威信与党章所赋予他的特权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在他死后，人民共和党的领导走上了直接地、粗暴地压制普通党员意志的道路，并通过党压制议员、选民、全体土耳其人民的意志。1939年，人民共和党的领导人，企图恢复人民意识中对土耳其国家制度的民主性已经发生动摇的信心，决定在国会里再成立一个与党团平行的机构——“独立团”，它受托“批评”政府和国会的各个委员会。加入“独立团”的人民共和党的党员议员则不加入国会党团，并且在形式上也不受党纪约束。“独立团”的批评实际上是打算欺骗群众的一种笨拙的把戏。这个“独立团”即使在形式上也决没有“独立性”，因为按党章规定，党的总主席就是它的主席。

211

根据1943年召开的人民共和党应届代表大会^①的成分，就可推断该党党内关系的反民主性。

^① 这是人民共和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1919年的西发斯大会算第一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于1927年，第三次在1931年，第四次在1935年，第五次在1939年。此外，1938年年底又召开了人民共和党的非常代表大会，由于阿塔丘尔克逝世，伊涅组在会上被选为党的不更换的主席。

在八百名代表中，只有二百七十八人是来自各省，并且就是这些人绝大多数也不是党的代表会议选出的，而是省委会指定的。代表大会其余三分之二的代表是由国会议员和党的领导干部组成的，他们按党章规定算是代表大会拥有表决权的成员。

212 人民共和党的党员也减少了。关于人民共和党党员人数的官方材料没有公布过，但一些间接标志证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它的党员显著地减少了，特别是在各省。例如，在选举第六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时，代表的数目在很多场合下都不是以这个或那个省的党员人数多少决定的，而是以该地区的人口总数为转移。

在土耳其的工人和一般劳动群众中，人民共和党的党员只占微不足道的比重。根据在一个工人和职员总数将近二千五百人的较大的工业企业里的统计，人民共和党党员按社会地位和所任职务分配如下：这个企业的高级技术人员和行政管理人员共为五人，他们全体即 100% 都是人民共和党党员；在十个中级技术和行政管理人员中，入党的八人，即 80%；在工长和中级职员中百分比

降低到 60；在低级职员中它降到 40；在副工长中为 20，而在二千个工人中，只有四十人参加了人民共和党，即 2%。并且，党组织领导人采用的经济强制措施——解雇威胁，建议调任报酬很高或较为轻便的工作等等——是吸收入党和保持党员留在党的队伍中的惯常方法。

人民共和党在农村地区的组织，主要是由国家官吏、地主和一部分富农组成的。

土耳其国会的成分和活动，是人民共和党的阶级成分和政治路线的直接反映。土耳其表面上存在着普选权（可是，甚至根据宪法也规定有很多降低选民数目的严格限制）^①，事实上各种各样的选举法、训令，而主要的是行政当局的恐怖和暴力手段，使国会选举归结为人民共和党的领导指

^① 积极的特别是消极的选举权受到很高的年龄资格的限制；选举人是二十二岁，被选举人是三十岁；军人（在战时和现在土耳其军队里有一百万以上的人）、仆役和雇农都完全被剥夺了积极选举权；要求一年的居住期限（这便剥夺了季节工人的选举权）；只有能用土耳其文看书和写字的人才能当议员（就是说，很少数民族以及直到今天还是文盲的大多数土耳其居民实际上都被剥夺了选举权）；军人只有在预先辞职的条件下才能被选（这实际上只有高级军官和将领能做到）。

定义员。

1943年选出的国会(选举是按两级制进行的;复选人的数目不超过五万人,他们全都是人民共和党党员)议员成分如下:人民共和党的干部(党的省组织领导人、人民宫主席)是三十五个议员;高级国家官员是三十一;律师、法官、检察官是四十四;将领和高级军官是三十二;大商人和银行家五十六;工业家三十六;地主是六十三;医生(其中包括军医)是四十二;教授和教师是二十三;记者和文学家是十六。

从1942年起(在列费克·赛达姆死后)由秀克留·萨拉兆格鲁领导的内阁,其成员中没有一个是进步人物。这个内阁在对内政策方面的一切努力都集中在一个目标上:把日益增长的国家开支的负担转嫁到劳动人民身上,使大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处境轻松,制止想使国家民主化的任何微弱的尝试。

关于分配土地给农民的法案,继续在国会的无数委员会和小组委员会中进行讨论。1941年3月,当时在土耳其出版的为数不多的民主报纸之一——《曙光报》刊载了伊里哲克村农民的一封信

信，老老实实在地描绘出土耳其农村的悲惨状况：“我们，伊里哲克村的农民，已在哈哲·伯克塔施·齐列比的庄园上千活五十年了。我们没有一寸土地。安纳托利亚中部这片肥沃的土地对我们来说只是悲伤和痛苦。我们双手耕种的几千公顷良田什么也没有给我们。我们全部劳动和血汗的成果都给主人了。我们甚至无法形容我们的痛苦生活。只有受苦者才能体会这一点。我们听说国家准备分配土地给农民。如果国家想施行这个正义的决定，那就把我们村子放在第一位吧！”

这些呼声没有人听见。在战争年代里农民的处境更加恶化了。1943年，政府除了以前的直接税和间接税以及加在农民身上的各种可能的义务以外，又施行一种新的收获税，责成农民把各种农作物收获量的10—12%用实物交纳给国家。这不是意味着别的，而是意味着恢复封建的什一税。²¹⁴农业在战争期间衰落了。谷物的收获从1939年的八百十五万八千吨，降到1943年的六百九十八万六千吨和1944年的五百九十万零七千吨，而到1945年战争结束时，它只有四百零六万三千吨，比战前少一半以上。土耳其以前是输出小麦的，

但在战时则实行配给制。面包里掺有大量的混合杂面，它的价格急剧地上涨了。

生活费用增加了四、五倍。即使根据无疑是故意缩减了的官方材料，1943年10月安卡拉的谷物和面粉制品的价格指数也是三六八·〇（以1938年的价格为一〇〇·〇）。价格涨得更多的有其他食品（1943年平均指数为三八四·一），还有服装（指数为五四六·三）、鞋子（指数为五六七·〇）、衬衣（指数为六一二·九）等。工人和职员的工资基本上则仍旧停留在以前的水平上^①。

土耳其无产阶级在战争期间被弄到真正灾难的地步。1940年政府停止“劳动法”生效。劳动日正式延长到十一——十二小时，而事实上则达十四——十六小时。在煤矿井里允许采用儿童和妇女的劳动。所有的企业里都取消了每星期的假日。工人必须把自己本来就少得可怜的工资的32%，以普通和非常的捐税形式交纳给国家。根据土耳其报刊的报导，仅伊斯坦布尔一地就有五万五千

^① 土耳其工人的最高工资（在厚纸版工业中）每天平均是一个半到两个里拉，而最低的工资（在纺织工业中）是六十六皮亚斯特。

正式登记的饥民。政府给工人唯一的一种“救助”，就是在国营企业里实行免费午餐制，即所谓“伊涅纽午餐”，它总共只值十一——十二皮亚斯特（这些钱只能买四十公分肉或二十公分黄油）。

1945年《曙光报》写道：“我国有一个可怕的社会灾难，它在毁灭今天的一代和威胁着明天的一代。这个灾难就是由饥饿和贫困所产生的肺结核。我们现有的关于肺结核病和它已带来的损害的统计材料很贫乏。可是，仅从统计局的数字中即可看出，养活一个人每月需要三百二十里拉；可以想像，在我们这个即使在和平时期大多数居民的收入也不超过三十——七十里拉的国家里，疾病和死亡率可以提高到什么程度。现在没有一个家庭不产生肺结核问题，即使在一些最富裕的人家也是如此。因等待进医院而死亡的人不可胜数。”

215

关于土耳其矿工的生活，这家报纸又报道说：“在厄里格利煤矿里，现在大多数人都是农民中来的服强制劳役的工人。他们在矿井里工作四十五天，在自己的地上工作四十五天……因患肺结核而无劳动能力的病人，得不到任何救济。所谓‘工人

联合会’只在一两个月里发给最重的病人少得可怜的几个古鲁斯(皮亚斯特)的施舍物。这点施舍物也是从他们自己身上征收来的。儿童是处在艰苦的境地中。在最沉重的工作中采用体力衰弱的人的劳动。七万多矿工及其子女，只有一个设有二百五十张病床的医院。医院里没有专门的肺结核科。”

“二千个家族”——大资产阶级的上层分子、贪图私利者、投机分子——利用人民破产、广大阶层饥饿和吃不饱而大发横财。他们的利润规模不可能确定。只是银行存款的增长提供了关于这方面的微弱的概念，存款在1945年为五亿二千八百万里拉，而1939年只为二亿六千一百万里拉。国家本身也从事投机活动。土耳其借助各种勾当，其中包括向德国人收买黄金的办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使自己的黄金储备从三千六百八十万里拉增加到三亿里拉。可是，这丝毫也没有停止通货膨胀：1938年年底，货币流通额为一亿九千四百万里拉，而到1944年年底时，它则达到九亿六千万里拉。因此，在战前一个金里拉只值十一个纸币里拉，到1944年年底时已等于三十八个纸

币里拉了。国债的增长也没有停止。1944年，土耳其内债和外债总数为十四亿六千七百万里拉，而1933年只有四亿六千八百万里拉。根据1945年批准的预算，支付这笔债务占去整个国家支出的25%。

政府在口头上谴责投机活动。早在1942年，伊斯美特·伊涅纽在国会开幕式上发表演说时就说：“我们应当怀着痛苦的心情指出，两年以来政府在整顿粮食供应方面所作的努力，没有得到社会上一部分人的任何帮助……旧有的高利贷者、骗子和坏蛋正在利用艰难时期，商人——这个投机分子——如果可能，他会买卖空气的，还有一些政客，他们把一切困难看作发财致富的最方便的机会，关于这些人不能说他们是依靠那一个外国生活和进行活动，——所有这些人都企图侵害广大人民的生命。”

继这些笼络人心的辞句之后，没有采取任何的实际措施。自私自利和各种可能的投机倒把行为，到战争结束时达到了这样庞大的规模，以致引起某些大资产阶级分子的不满。一部分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国家管理和追求利润方面被“暴发

户”排挤出来了，因而具有不满情绪，展开了一个反对政府的运动。例如，1945年在讨论国家预算时，议员希克梅特·巴尤尔曾对萨拉兆格鲁内阁的财政和经济政策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说：“在我们的经济生活中，我们发现投机倒把、盗窃资财和贪赃受贿。为了反对这种现象，在我们这里除空谈以外就没有别的东西……城乡居民遭受掠夺，而政府即使在战争的第六个年头里也还不能采取什么措施……不满情绪正在增长。所有这些不能仅以我们所处的环境和时代来解释。主要原因在于政府毫无作为。在一些参加了战争的国家里，价格上涨了20—30%，而在我国则上涨到500%。”

统治集团也加强了对工人阶级的政治压迫。在1940年，甚至“基马尔工会”也被取消了，虽然它的领导权完全掌握在人民共和党手中。当时政府又通过国会施行关于在西部各省和海峡地区宣布戒严的法律，其主要目的是迫害民主活动家和左翼报纸。成千上万的被怀疑同情共产主义和同情苏联的人，遭到逮捕和监禁。很多秘密进行的法庭审讯，证明了土耳其人民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当

权的上层分子在全国舆论面前感到恐惧。

例如，1945年春天，在安卡拉曾对很大一批民主人士在极端秘密的条件下进行审讯，他们只是因为反对法西斯反动派和为人民争取民主权利而被控信仰共产主义。三个民主人士在预审时经不住拷打自杀了。很多人以后都死在狱中。

在战争结束时，人民共和党内部已形成了一个公开的反对派，这时某些资产阶级右翼报纸也开始表现出不满情绪。例如，伊斯坦布尔的《祖国报》写道：“恐怖气氛笼罩着全国，民主分子处在公开的和秘密的威胁之下。”

结 束 语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土耳其政府的政策陷入了绝境。尽管土耳其丝毫没有参加军事行动，但它保持了全副武装的一百多万的军队，这就非常有害地影响了国家预算和农业。它的经济和财政处于混乱状态。备受压迫的农民、工人阶级、一切劳动者感受到沉重的负担，对政府的行为表示愤怒。甚至一部分因当权的上层分子投机倒把和贪图私利而不满的资产阶级，也表现出反对的情绪。土耳其对外政策遭到了完全的破产。一个基本的打算——指望希特勒能使反法西斯联盟中发生纠纷，即使是在最后关头也好，因而将获得最后胜利——落空了。想在战争进程中削弱苏联的希望也破灭了。相反的，苏联的威力增长了，它的政治地位无比地巩固了，它的影响和支持保证了人民民主制度在很多国家——其中包括巴尔干国家——顺利地发展。苏联政府宣布 1925

年条约无效，极其明显地表明，土耳其对外政策彻底破产了。

当然，土耳其统治集团是不能坚决地改变自己的对外和对内政策的。它顽固地死抓住政权不放，继续加深那条把它和人民分开的鸿沟，使得同苏联以及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关系尖锐起来，变土耳其为帝国主义国家的军事和政治基地。

土耳其统治集团对于反法西斯联盟战胜希特勒德国的反应，是很有特色的。土耳其由于参加了联合国，表面上也庆祝胜利日。当时悬挂旗帜，政府举行了隆重的外交招待会。但在这同时，受政府管辖的报纸发表了纪念法西斯战犯的长篇讣闻，而在政治评论中则极力证明，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与苏联之间的“矛盾的不可解决”，它们之间的“冲突的不可避免”。伊斯坦布尔《曙光报》编辑塞凯里雅·赛尔泰尔在他发表的文章中抗议这个运动，愤慨地质问反动的记者们说：“戈培尔是死了还是就在土耳其呢？” 218

以后，土耳其反动报刊的挑衅言论加强了。它们经常刊载反对巴尔干民主运动、宣传民族仇恨的文章，号召对希腊的保皇法西斯分子给予武

装支持。土耳其外交当局极力在英美帝国主义集团中寻找对土耳其反动制度的支持。在英国人还没有把帝国主义在近东政策中的主导角色让给美国以前，土耳其人认为，必须把自己对英土同盟所抱的“忠诚”提到第一位。在土耳其国务活动家的公开言论中，在报刊上的煽动性的文章中，都坚决地贯彻这样一种思想：土耳其在战时曾为自己的同盟者——英国人——效过劳，在今后也是能有利于他们的。1945年11月1日，伊斯美特·伊涅纽在应国会开幕式上发言时说：“我们只要求在那延续了好几年的恶梦时期，即在我们宣战以前，我们的行动路线帮助我们盟国的胜利。（高呼“好啊”，长时间的鼓掌。）我们只是应盟国的请求才参加了反对德国人和日本人的战争。因此，既然他们请求我们这样做，参战对他们来说就有一定的意义。”（“好啊”，鼓掌。）

土耳其的外交为了迎合英国人，与伊拉克和约旦达成了协议，支持英国的“大叙利亚”计划，纠集了一个侵略性的“近东集团”。随着日趋衰弱的英帝国主义转到了美国的“小伙伴”的地位，并把地中海地区和近东的主导角色让给了美国，土

土耳其开始把与美国的“友谊”提到第一位。由于英国和美国帝国主义者在其反苏政策中是协调一致地行动，土耳其反动分子便有可能一方面使自己的国家主要从属美国资本，同时也保持与英国的亲近关系。

土耳其战后的对外政策，实质上是战时所推行的政策的直接继续，不过只是现在为适应当前的环境采取了另外的形式而已。它的基础仍然是土耳其当权的上层分子所具有的下列特征：始终不变地同情法西斯主义；反对身受战争之苦的各国人民的民主趋向；仇视苏联；崇拜外国的黄金；央求小恩小惠和决心为帝国主义国家服务。英美帝国主义之代替希特勒德国，并没有给这一公式带来什么原则性的新东西。 219

在土耳其从属于英美帝国主义的过程中，国内阶级矛盾也加深了。1945年夏天，在废除实物的收获税的同时，最后终于通过了《土地改革法》。但是，农民长期等待的这个法律，给他们带来了完全的失望。它规定只分配面积在五百公顷（只在个别的场合下为二百公顷）以上的地主土地，并且还必须付钱。这事实上使土地仍保留在地主手

中。尤其是在这个法律通过以后，过了一年半时间，人民共和党（在其于 1947 年 12 月召开的代表大会上）作出决议，禁止有任何征收地主地产（即使是在五百公顷以上）的事情。结果，大部分农民仍旧处于受地主奴役的从属地位和经常对国家负债。甚至根据 1945 年的官方统计，因未纳税而被扣押财产的事件就有九万起；1946 年这类事件增加到十三万五千起。

无论在民族问题或工人阶级状况方面，都没有发生任何好的变化，土耳其统治集团仍旧拒绝承认有民族问题存在，工人阶级的物质负担在战争结束后也没有减轻，而它在政治上的无权地位则加剧了。政府和地方当局加强了对劳动群众的迫害。1945 年 12 月初，企图（完全在法律范围以内）保护劳动者利益和和平事业的伊斯坦布尔《曙光报》，被一群法西斯——泛突厥主义者匪徒捣毁了^①。这次法西斯示威是伊斯坦布尔当局自己组织的，以便对付这家不利于它的报纸，因为当局

^① 他们中间有泛突厥主义者的首领，这些人在 1945 年 3 月因进行法西斯活动而被安卡拉法院判处监禁，但他们在刑期未滿很久以前就被释放了。

不愿寻找“合法的”借口以封闭这家报纸来麻烦自己。这次逞凶事件的后果是《曙光报》的编辑和工作人员被交付法庭审讯，而逞凶者则逍遥法外。当这个对土耳其司法制度说来是可耻的案件在伊斯坦布尔法院里开庭审判时，受害报纸的编辑塞凯里雅·赛尔泰尔说：“我因自己的国家而感到耻辱，因为当全世界改变了自己的面貌，各国人民力图获得更广泛的自由和民主，千百万人之为之流血的这种自由和民主争得了胜利的时期，在这个时候，审判一个因争取国内——根据现有的各种断言，在这个国家里，是存在着民主制度的，——的自由和民主而受迫害的公民，是一个可耻的事件。”法院判决赛尔泰尔有罪，但在土耳其广大社会阶层的心目中，这是破坏了最起码的司法规范的土耳其司法制度在给自己判罪。

220

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增长了。一切证明了严重的政府危机已经成熟。人民共和党的领导惧怕人民不满情绪的爆发可能引起政权的彻底改变，于是为了保全整体便决定作局部的让步：使大资产阶级和地主集团的统治完全有效，但用“两党制”的面纱来掩盖反动的政权。正好，由“一党制”向

“两党制”过渡完全适合美国帝国主义者虚伪的民主辞句。

于是在土耳其就形成了一个新的政党，它自称“民主党”。领导该党的是以詹拉尔·巴雅尔为首的一批国会议员，他们在1945年秋天脱离了人民共和党。1946年初，民主党正式成立，它发表了政纲，着手出版自己的机关报。执政的人民共和党没有反对反对派的合法化。在1946年5月召开的非常代表大会上，它宣布放弃自己以前是国内唯一合法政党的垄断地位，顺便又作了某些有名无实的民主作风的姿态：实行党的总主席报告工作的原则，在国会选举时改用直接投票制，取消国会的“独立团”。

民主党就其阶级成分来说，几乎同人民共和党没有什么区别。民主党的领袖詹拉尔·巴雅尔很早就以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闻名。他在领导民主党方面的最亲近的助手符亚德·柯普鲁组属于土耳其教授中的极右派。新党在各省成立的发起小组，主要也是由大商人、银行家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上层组成的。据土耳其报纸报道，伊兹密尔的民主党发起小组是两个大出口商人、一

个实业银行经理、一个工程师和一个医生组成的。亚伊丁的发起小组是两个地主、一个商人、一个律师和一个医生建立的。领导安卡拉民主党组织的是一批工程师—承包商。1946年夏天国会选举时，在民主党提出的二百四十三个国会议员候选人中，大商人、银行家和工程师—承包商六十五人，地主和富农四十二人，律师五十二人，教授和教师十九人，将领和军官十五人，新闻工作者（主要是报纸老板）八人。

两个资产阶级地主政党的政纲也没有重大的区别。民主党的纲领充满着关于自由选举、权利平等、人的尊严等民主辞句，实际上则含有很多反动的论点和要求。它用自己的话重复了人民共和党的“六个箭头”，声明必须保护“这样一些劳动者，如农民、工人、商人、工业家、律师、官吏”的利益。新党的纲领只字未提分配土地给农民的事情。同时它十分明确地表示，应当彻底抛弃阿塔丘尔克所推行的那种国家主义政策。纲领载称：“国家主义是国家从事经济活动的义务，也是国家力求迅速发展私人主动精神和资本的义务。”在纲领的另一个地方指出：“私人主动精神”是土耳其经

济生活的基础，“如果国家建立的企业在私人手中经营能更为有利，那就应在必要的条件下把它们转让给私人。”民主党的纲领同样地号召“在农业劳动中利用资本和私人主动精神”，这“在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增加国民收入方面将起很大的作用”。

外国资本家，首先是美国资本家的利益也没有被忘记。民主党的纲领请政府借长期的外债，并“使我们的货币价值适合于自由市场上的外汇价值”，就是说，要里拉对美元实行币价贬值，以便为美国人收买土耳其的货物造成更有利的条件。“民主党人”与执政党完全一致，在自己的纲领中要求使共产党处于“非法”地位，不过纲领没点共产党的名字，而是说“与国外政治组织有联系的团体和党派”。

由此可见，两党的社会政治本质是一样的。分歧发生在其他的原因上：第一，“民主党人”不满意掌握大权的部长、国家企业和银行的领导人、管理人员等把他们排挤出“国家的肥缺”之外^①；

^① 《每晚邮报》在1946年2月评论民主党的活动时提出了值得注意的意见：“入党的都是在最近几年被暴发户排挤出去的人”。

第二，他们认为，政府以其粗暴的方式没有削弱，相反地却煽起了人民的不满情绪，而“民主的”策略将能巩固资产阶级地主的专政；最后，第三，如上所述，由“一党”制过渡到“两党”制适合美国帝国主义者的计划，因而“民主党人”的首领们认为（虽然也没有充分的根据），美国的黄金将流入他们的腰包，而不是流入人民共和党的首领们的腰包。

在民主党活动初期，政府与反对派之间的冲突具有非常尖锐的性质。人民共和党虽然也同意使反对派合法化，但无论如何不愿让它参加政权。1946年5月举行市政选举时，行政当局是如此专横，以致民主党竟抵制选举。继后在7月举行的国会选举，也是在警察的恐怖环境下进行的^①，但民主党仍然获得了将近15%的国会议员席位。

在1946年8月新国会开幕时，“民主党人”激烈地抨击政府。于是人民共和党的领导便决定以“强硬手腕”的内阁来对抗反对派。秀克留·萨拉兆格鲁由于在战时与德国法西斯分子过于密切的

^① 根据报纸报道，新国会收到了将近十万封抗议选举时的非法行为的信件。

223 联系遭到揭露，反正是要离开总理职位的。伊涅
组建议他辞职，并委托过去担任过外交部长和人民
共和党总书记的列詹布·皮凯尔组织新内阁。

国会顺从地同意了这项任命，表决结果是人民
共和党三百四十八个党员议员对五十三个“民主
党人”。

皮凯尔执政引起了“民主党人”更大的愤怒。
皮凯尔的政治路线与萨拉兆格鲁所奉行的路线毫
无区别，但皮凯尔比他的前任粗暴，并且在很多
方面比较不易接受意见。“民主党人”原来期望
在国会开幕以后，人民共和党的领导将更加重视
合法的国会反对派。皮凯尔的任命使这些幻想破
灭了。

民主党与人民共和党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尖
锐。“民主党人”常在国会的会议上和报刊上抨击
政府，谴责它反对民主和专横。行政、警察和宪
兵当局，根据政府的指示也百般阻挠民主党的活
动。在社会舆论看来，这些冲突好象是原则性的，
因为民主党违背自己的意志和愿望，帮助揭露了
土耳其建立的反动政权，引起很多真诚的民主人
士对该党的同情。甚至有些工人和农民，由于相

信民主党是真的反对政府，也开始加入新党^①。

人民共和党与民主党的相互关系的真象是另外一回事。“民主党人”尽管对皮凯尔不满，尽管渴望把政权夺到自己手中，但在两个根本问题上他们是乐于和政府一致的：即关于对待共产党以及一般地对待土耳其的真正民主组织的态度问题和关于土耳其加入帝国主义阵营问题。这两个问题是相互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土耳其共产党人虽在艰苦的地下活动的条件下，对于广大劳动者阶层具有越来越大的影响，领导了争取民主的斗争，因为只有民主制度才能维护民族独立。土耳其统治集团争取相反的东西：它认为土耳其从属英美帝国主义是挽救其资产阶级地主专政的唯一手段。因此，旨在尽快使土耳其加入帝国主义阵营（以丧失国家独立为代价）的土耳其政府的对外政策，是

224

① 当时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反动分子也迷惑了。有一次，执政党的某一个国会议员竟说詹拉尔·巴雅尔信仰“共产主义”。巴雅尔认为自己“受了侮辱”，并控告“欺凌者”。正如人们对土耳其法庭所预料的那样，这个可笑的诉讼使双方都平安无事地过去了。巴雅尔被判“无罪”，没有信仰妄加在他身上的“共产主义”，而被告则被判“象征性的”处分：一里拉的罚金和一天的监禁，并且还缓刑。

同对真正民主的拥护者、首先是对共产党人和有共产主义嫌疑的人所进行的极其残酷的镇压，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的。在这个基础上便产生了人民共和党和民主党首领之间的接近。这种接近是谨慎地、秘密地进行的。“民主党人”的头子詹拉尔·巴雅尔、符亚德·柯普鲁纽之流，为了欺骗舆论和本党的普通党员，时常批评政府，但只针对一些次要的问题。而主要的问题，其中包括对外政策问题，则由执政党和在野党的首领进行幕后勾结来解决。

“民主党人”对土耳其政府的反苏政策的支持，是这种勾结的明显表现。1946年8月，苏联根据三大国首脑波茨坦决议^①，建议土耳其重新修改1936年在蒙特罗签订的海峡公约，因为它不能保证黑海安全的利益。苏联政府关于最好的海峡制度的建议包含五个主要条款：一、海峡应经常允许各国商船通过；二、海峡应经常允许黑海

^① 在1945年的波茨坦会议上，苏联、英国和美国政府承认，在蒙特罗签订的海峡公约作为一个不符合于目前条件的公约应予重新修改，下一步骤是，本问题将为三国中每一国家与土耳其政府进行直接谈判的议题。

国家的军舰通过；三、非黑海国家的军舰不得通过海峡，特殊规定的情况例外；四、作为驶出黑海和进入黑海的唯一海上通路的海峡制度之建立，应为土耳其和其他黑海国家的权限；五、土耳其和苏联作为最有利害关系和最能保障贸易通航自由和海峡安全的国家，采取共同措施来组织海峡的防御工作，以防止其他国家利用海峡来达到敌视黑海国家之目的。

苏联的建议完全是以关于海峡问题的整个长期的历史教训，特别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教训为论据的。正如苏联照会所指出的，在过去了的战争时期所发生的事件清楚地表明，蒙特罗公约不能保证防止其他国家利用海峡来达到敌视黑海国家之目的。照会中引用了法西斯国家利用海峡危害苏联及其盟国的具体事实。例如，1941年7月9日，德国指挥部使德国巡逻艇“西法尔克号”通过海峡进入黑海，这是粗暴地破坏海峡公海，并曾引起苏联方面向土耳其政府提出照会。1941年8月，土耳其当局允许意大利的辅助军事船舶“塔尔维西奥号”通过海峡进入黑海，这同样曾引起苏联政府方面提出照会，提请土耳其政府注意，意

大利辅助军事船舶进入黑海是对海峡公约的破坏。1942年11月4日，苏联政府再次提请土耳其政府注意，德国打算把总排水量十四万吨的辅助军事船舶假装成商船通过海峡驶入黑海。这些船舶是用来把轴心国的军队和军事物资调运到黑海的。苏联政府在其照会中着重指出，“允许上面指出的船舶通过海峡进入黑海，将是明显地破坏在蒙特罗签订的关于海峡制度的公约，因为这些船舶由德国政府掌握，并且实质上是辅助军事船舶。”1944年6月，苏联政府声明对下列事情表示抗议：1944年5月底和6月初，曾经参加过黑海上战斗的各种不同吨位的“埃姆斯”型（八艘）和“克里格特兰斯波特”型（五艘）的德国军舰和军事辅助船舶，曾几次从黑海经过海峡进入爱琴海。

因此苏联照会确认，“在已经结束的对德国及其盟国的战争时期，海峡公约没有妨碍敌国为了军事目的利用海峡来反对苏联和其他盟国，并且土耳其政府不能不对这种情况负责。”

226 苏联的建议丝毫没有损害到土耳其的主权。虽然如此，土耳其政府在其复照中带有一些保留条件同意了苏联建议的前三点以后，对于从黑海

国家利益观点看来最为重要的其余两点提出了反对意见。同时，土耳其政府由于没有可能驳倒苏联照会中引证的关于法西斯国家为了军事目的利用海峡反对盟国的确凿事实，因而便引用了一些完全不能令人信服的解释来为自己辩护，诸如被允许通过海峡的敌船“没有列入海军年鉴中”，并作出结论说，敌船通过海峡“没有使苏联的安全受到威胁”。

1946年9月，苏联政府向土耳其政府提出了一个新的照会，对土耳其政府的理由作了详细的分析，证明它没有根据。但就在这一次问题也没有得到肯定的解决。

土耳其政府之拒绝苏联的建议发展为一个敌视苏联的运动。受土耳其政府管辖的报纸，发出诽谤性的反苏捏造。民主党的报纸随声附和，而“民主党人”的首领则在国会里声称，他们完全拥护政府的立场。

“民主党人”在政府采取各种措施反对劳动人民的政治组织和工会组织方面，也给予政府不小的支持。如上所述，土耳其统治集团在放弃“一党制”时，决不希望让真正的民主组织参加政治活

动。但是，关于允许成立除人民共和党以外的其他政党和各种团体的法律毕竟是颁布了。根据这项法律，不仅成立了反动的政党，如巴雅尔的党或半法西斯的“民族复兴党”（以百万富翁努里·德米拉格为首的），而且也成立了提出关于保护劳动人民利益的要求的政党，——社会党和社会工农党。有阶级性的工会组织也建立起来了；到1946年秋天时，工会组织在土耳其全国共有几百个。土耳其全国总工会在伊斯坦布尔成立了。可能是政府有一个事先制定好的挑衅计划：暴露出民主分子，以便以后一举消灭他们。1946年12月，军事当局利用伊斯坦布尔、东色雷斯和安纳托利亚西部各省（即民主运动最发达的地区）的戒严状态法，解散了社会党和社会工农党，查封了它们的机关报，逮捕了它们的领导人和积极的工作人员；工会、它们的机关报和积极的工作人员，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

这是全国大逮捕的信号。一切稍有一点民主情绪和普通的正直人士，都被指控为信仰共产主义。甚至实际上距离共产主义和激进主义都很远的费夫西·查克马克元帅，也被加上了“与共产党

人有联系”的罪名，——这只是因为他公开地对政府的反民族政策表示不满。

“民主党人”完全拥护政府这个逞凶活动。当内务部长(1947年1月)在国会里发表关于“共产主义威胁”的猖狂演说时，詹拉尔·巴雅尔立即支持政府，要求毫不留情地对付一切有共产主义嫌疑的人。

政府和国会反对派的观点的一致，也表现在对土耳其说来极其危险的关于接受美国“援助”的决定上。土耳其统治集团绝没有误解这种“援助”的目的和对它所付出的代价的性质。他们了解，美国帝国主义者打算利用土耳其来对苏联实行其讹诈和威胁政策，在土耳其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土耳其政府拒绝接受苏联关于海峡问题的建议这件事情，就已不是由土耳其利益、而是由美国利益决定的。美国帝国主义的代言人华特尔·李普曼在1946年9月写道：“位于土耳其境外和附近的地中海东部地区是这样一个地方，从这里美国用建立自己的海军和空军威力的办法，就可以满怀信心地说服和强制克里姆林宫进行关于普遍的调整国际问题的谈判。”

美国“援助”使土耳其有丧失经济和政治独立的危险这一点，也是不能怀疑的。就在1946年9月，美国人从土耳其政府方面以里拉币价贬值^①的方式就得到了第一笔“预支”，这自然而然地就使收购土耳其货物的美国公司的资产增加了一倍以上。

228 1947年3月12日，美国正式宣布了关于“援助”希腊和土耳其的“杜鲁门主义”。这只是稍加隐蔽的关于准备反苏战争的声明。杜鲁门用一些“保卫民主”的一般词句附加在声明上，但这些话用到土耳其身上有什么价值，亨利·华莱士很好地指明了，他在总统致国会的咨文发表后的第二天所作的广播演说里说明了这一点。他说：“土耳其是这样一个国家，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对我们作战，在这次战争中拒绝帮助联合国。土耳其依靠德国人和同盟国大发横财，谁出钱较多它就把自己极其重要的铬矿储备给谁。由于这种买卖的结果，它积累了二亿五千万美元的黄金储备。土耳其的中立使战争拖延了好几个月。战争结束

^① 在币价贬值以前，一美元等于一点三里拉，这时规定为二点八里拉。

时土耳其是纳粹首领的避难所。今天硬说土耳其政府是代议制的或民主的，那是绝对没有意义的。土耳其人士指出，杜鲁门建议给予土耳其的一亿五千万美元将用来供养一百万人的土耳其军队。这支军队在那一方面自由的军队呢？战时盟国的很多师被牵制了，因为我们当时不知道就是这一支土耳其军队准备站在哪一边作战。”

在“杜鲁门主义”宣布时，土耳其事实上已投靠到美国的保护下。1947年7月签订了美土“援助”协定，它已在形式上使土耳其处于依赖美国的地位。协定规定，美国政府将给予土耳其以前者认为需要给予的援助。给予援助的条件不是由土耳其政府规定，而是由美国驻土大使规定。他将监督美国借款和贷款的开支，并进行监视，使“援助”只用于“援助为之而提供的目的”。如援助不再符合美国利益时，美国总统有权随时停止给予援助。

第一笔以“援助”为形式的借款的数目，不是确定为一亿五千万美元，而是一亿美元。其中八千万美元规定用来使土军“现代化”，其办法是以美国军事物资供应土耳其军队。二千万用来建筑

战略道路和港口。

229 土耳其统治集团就是这样把自己的国家出卖给美国帝国主义者。以巴雅尔为首的“民主党人”尽量协助这样做。他们不仅赞成与美国签订的协定，而且还宣称，他们完全同意政府的一切对外政治活动。民主党的报纸以进行反苏诽谤为专长。“民主党人”的首领们则在国会里发表仇视苏联的言论。

这时，人民共和党的领导认为，可以和必须缓和自己对如此忠诚的国会反对派的态度了。1947年8月，不善于了解这种必要性的列詹布·皮凯尔被撤职。在皮凯尔内阁里担任外交部长的哈森·萨卡领导新政府。他与美国垄断组织很早就有密切的关系（特别是与“美孚”石油公司，同它过分亲密的联系在1926年甚至曾引起阿塔丘尔克撤去他财政部长的职务），因此对美国人来说是特别如意的人。哈森·萨卡把外交部长的席位让给了尼志美丁·萨达克，后者以其易于适应环境而著称^①。

哈森·萨卡政府在“民主党人”无条件的支持下，给予美国帝国主义者在土耳其完全的行动自

由。很多美国“专家”着手“调查”土国。根据土耳其本国报纸的报道,仅在1947年下半年,先后就有二十个以上的各种不同的美国委员会、代表团和使团访问过土耳其。它们中间有:四十人组成的军事使团,海军的,空军的,经济的,贸易和铁路的,报纸和广播事业的,财政的,公路问题的,研究情报工作的等等。此外,美国常设的“援助委员会”也来到了土耳其,它有三百个军事和普通专家。美国人在土耳其成立了一个拥有大量工作人员的“情报局”,它直属美国国务院。

美国“顾问”开始监督土耳其的整个军用和民用航空事业,监督国家的铁路和航运以及交通工具。美国人着手制定大规模的修建计划:在土耳

230

① 战时萨达克拜访过希特勒,当德国人在克里米亚时他又到过那里,同时还极力保持与英国人的密切关系。他在属于他的《晚报》上表现出这样令人头昏目眩的陡变,以致使雅尔琴也嘲笑他。1943年12月,当前此称赞盟国的萨达克开始重复戈培尔关于德国法西斯军队“有弹性的防御”的宣传时,雅尔琴在其《回声》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是:《类似有弹性的防御体系的有弹性的推论体系》。在这篇文章里关于萨达克写道:“并不是每个人都有一方面发表有弹性的观点,两边动摇,同时又怜爱牡山羊又怜爱洋白菜的艺术。”

其修建空军基地、飞机场和航空站、海军港口、战略铁路和公路，着手勘探战略原料的新来源，勘探石油等。

所有这一切的目的是十分明显的。正如报纸所报道的，土耳其驻埃及公使阿雅施雷露骨地宣称，土耳其“已开始训练并且在美国和英国的帮助下正在装备自己驻扎在俄国边境的几个军”。土耳其反动的新闻工作者也厚颜无耻地公开扬言：“把原子弹挂在桌上请俄国人来进行开诚布公的谈判的时候已经到了”（雅尔琴），或者战争“是使莫斯科走上正确道路的唯一出路”（阿比丁·达维尔）。

美国人主宰一切使国内的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政治危机进一步加深。土耳其政府保持全副武装的百万大军，因军事开支而使本来就很紧张的预算负担异常沉重。1948年批准的预算，超过了战前预算的三倍，并且军事部门的开支增加得更多——四倍。1948年预算支出总数为十二亿四千三百万里拉，其中拨给国防部的为三亿七千七百万里拉，拨给内政部、保安总署、宪兵总监和司法部的又为一亿二千三百万里拉，而比方说，拨

给保健和社会救济方面的总共只有四千七百七十七万里拉，用于农业的是三千三百万，用于劳动部的是二百万等。

1946年实行的里拉币价贬值，没有降低昂贵的物价。到1947年年底时，物价又上涨了15—20%。纸币的数目大致增加了15%，超过战前四倍。国债几乎达到了二十亿里拉。

土耳其政府指望依靠根据“马歇尔计划”所得的美国借款，来弥补自己的一部分开支。可是1948年初人们知道，美国把土耳其列入了这样一类的国家，这些国家根据“马歇尔计划”应以黄金来支付美国供售的机器价款。这在土耳其统治集团中引起了失望和不安，尤其是因为在1947年里美国人在对土贸易中获得了顺差，已把土耳其的黄金储备榨去了很大一部分^①。伊斯坦布尔的《最后一点钟报》就这件事情写道：“马歇尔计划”变成了海市蜃楼，引起了“普遍的苦恼”。甚至外交部长萨达克的报纸——《晚报》也悲伤地说，“我们白白地醉心于这样的幻想中。” 231

^① 折合美元，土耳其的黄金储备在1946年初为二亿五千二百万，而到1947年底时，它减少到一亿四千五百万。

美国“援助”也和美国同土耳其的整个贸易一样，对不久才开始发展的土耳其工业起了最有危害的影响。1947年，土耳其政府根据美国人的要求，取消了外货进口的一切限制。涌入土耳其市场的美国陈货的洪流，在很短期间便使土耳其的很多工业部门——如制鞋、纺织、纸烟、玻璃等——趋于破产。伊斯坦布尔的《自由祖国报》在指出这个事实时甚至还敢于补充说：“这对我国是最大的危险……敌人不是从边境而是通过海关在占领我们祖国。”

国内失业现象可怕地增长起来。《最新邮报》在1948年初写道，六千个复员军官多月以来一直在徒劳无益地寻求工作，但他们无法找到。伊斯坦布尔的另一家报纸——《共和报》——登载了一篇有趣的小品文，说明一个监狱看守的空额怎样找到了五百个竞争者。

所有这些都是美国“援助”的结果。美国垄断资本抛弃了假面具以后，便露骨地力求土耳其完全放弃经济独立。由于国家主义政策对此造成若干阻挠，美国人便在“机会均等”的借口下，要求土耳其政府也放弃国家主义，从而清除这个变土

土耳其为毫无保护的美货销售市场的最后障碍。土耳其统治集团也准备这样做。据报纸报道，人民共和党的领导在1948年初已讨论了“关于规定国家主义范围”问题，并主张给美国资本进一步的优惠。

土耳其政府时常采取一些目的在使制度“民主化”的有名无实的措施。1947年底，西部六省的戒严状态取消了，因为在战争（而且土耳其也没有参加这个战争）停止后的第三个年头里，保持戒严状态看起来已完全不成体统了。但是解除戒严状态，决没有取消旨在绞杀土耳其民主运动的警察和法庭的恐怖。以前是军事当局根据戒严状态法查禁民主报纸，现在是民政当局根据反动的出版法来做这件事情。军事法庭所开始的对被控信仰“共产主义”的人的审讯，转由民事法庭审理，但在土耳其的现存制度下，未必能希望这种形式上的改变将给被告人带来什么轻松。

232

内阁成员的变化不能改变事情的本质。哈森·萨卡推行列詹布·皮凯尔过去所推行的政策。当一个反动分子离开时，另一个反动分子便来接替他。1948年初，卡兹姆·卡拉贝基尔逝世；

同样反动的分子和同样是阿塔丘尔克的公开的敌人——阿里·符亚德·詹比索接替了他的国会议长席位。

土耳其人民的广大阶层越来越确信现存制度的反动性。人民共和党和民主党首领们的反人民的勾结，也变得很明显。下面这个事实即可为标志：1948年3、4月里，民主党发生了公开的分裂，它的很大一部分党员反对反动的领导，并在同年7月间成立了以费夫西·查克马克元帅为首的新党，取名“民族党”。这再一次证明，即使在土耳其统治阶级中也既没有统一，又没有目前土耳其统治者所不断谈论的“民族团结”。

即使从下面这件事情中，也可以看出土耳其统治集团距离民族革命的原则多么遥远：根据人民共和党的决定，在土耳其的中小学里又教授宗教课程，而在大学里则恢复了神学系。同时，进步的教授和教师都被赶出安卡拉和伊斯坦布尔大学。土耳其的愚昧分子现在甚至说出完全否定世俗教育原则的话来。有一个这样的反动分子——一个国会议员——在从国会讲坛上发表的演说中宣称：“我们既不需要科学院，也不需要教育学，

——这一切都必须抛弃。在学校里应当教授我们祖先所学的东西。我要求在我国青年中培养那种在十六世纪曾发动土耳其人侵略其他国家的道德。”

土耳其建立的反动制度不能使国家摆脱绝境。掌握政权的民主的敌人和帝国主义的奴仆，奉行着反民族的政策，它使土耳其有遭受无穷灾难的危险。

基马尔·阿塔丘尔克当年所如此坚决反对的和如此坚持不懈地提防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他是一个具有远见的政治家。1927年阿塔丘尔克在对土耳其青年讲话时高呼：“土耳其的青年们！永远保持和捍卫民族独立和土耳其共和国是你们的首要义务。这是你们生存和你们未来的唯一基础。这对你们是最珍贵的宝贝。在将来，无论在国内和国外都会有力图夺取你们这件宝贝的心怀恶意的人。你们总有一天将要捍卫独立和共和国，为了履行自己的职责，你们必须估计到你们可能亲身经历的条件。也许这些条件将非常不利。可能那个力图消灭你们独立和你们共和国的敌人，就是地球上自古以来最不可战胜的强国……为了考

虑到更坏的可能性，再假定那些掌握国家大权的人堕入迷途，他们是一些糊涂人或叛徒，最后，这些领导人把私人的和政治的利益与敌人的政治利益联系在一起。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民族陷于极端困乏和一贫如洗的境地，它处在分裂和消耗殆尽的状态中。即使在这样的条件和这样的情况下，未来千百年的土耳其的子孙们，你们的义务就是拯救独立，拯救土耳其共和国。”

阿塔丘尔克未必预料到土耳其的这些黑暗时期，在他死后会这么迅速地到来。但土耳其有新生的力量。这就是土耳其的民主力量。它正遭受反动派和恐怖手段的残酷压迫。虽然如此，它正在成长和巩固。未来将属于它，它应当拯救自己的国家免于奴役。

史料和参考书目录

(一) 原著史料和参考书目

- I. КЛАССИКИ МАРКСИЗМА-ЛЕНИНИЗМА (从略)
- II. ДОКУМЕНТЫ, ОФИЦИАЛЬНЫЕ ПУБЛИКАЦИИ, ВЫСТУПЛЕНИЯ РУКОВОДЯЩИ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ДЕЯТЕЛЕЙ

а) На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

1. Армянский вопрос на Лозаннск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Извлечение из протоколов. Перевод М. Т. Тифлис, 1926; VII, 36 стр.
2.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ССР, тт. I—V. М., 1944—1947.
3.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в период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т. 1—3. М., 1944—1947.
4. Вторая Оранжевая книга.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ая переписка России, предшествовавшая войне с

- Турция. П., 1914; 64 стр.
5. Война с Турцией. (Вторая Белая книга.)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ая переписка Англии, предшествовавшая разрыву с Турцией. П., 1915; 144 стр.
[Из серии «Документы, относящиеся к Великой Европейской войне 1914 г.», № 5.]
 6. Вышинский А. Я. Речь на пленарном заседании Генеральной Ассамблеи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18 сентября 1947 г. Газ. «Правда», 19/IX 1947 г.
 7. Годовой отчет НКВД к VII Съезду Советов РСФСР (1918—1919). М., 1920.
 8. Годовой отчет НКВД к VIII Съезду Советов РСФСР (1919—1920). М., 1921; 75 стр. [К Турции относятся стр. 66—70.]
 9. Годовой отчет НКВД к IX Съезду Советов РСФСР (1920—1921). М., 1921; 192 стр. [К Турции относятся стр. 42—45, 110—115.]
 10. [Годовой] отчет НКВД за 1922 год. М., 1923; 83 стр. [К Турции относятся стр. 17, 26, 56—58.]
 11. Годовой отчет НКВД за 1923 год ко II Съезду Советов СССР. М., 1924.
 12. Годовой отчет НКВД за 1924 год к III Съезду Советов СССР. М., 1925; 116 стр. [К Турции

относятся стр. 103—105.]

13. Договор между Турцией, Францией и Англией. В газ. «Правда», 20 октября 1939 г. [Русский перевод текста договора, заключенного 19 октября 1939 г.]
14.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е Закавказья и Грузии. Тифлис, 1919; 512 стр.
15.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кануна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т. I. Ноябрь 1937—1938 гг. Из Архива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Германии. (М.) 1948; 368 стр.
16. Документы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Германии. Вып. II. Герман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в Турции (1941—1943 гг.). Госполитиздат, 1946; 143 стр.
17. Константинополь и проливы. По секретным документам б.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Под ред. Е. А. Адамова. I—II. М., 1925—1926; 547 стр.
18. Жданов А. 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м положении. (Доклад, сделанный на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м совещании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й некоторых компартий в Польше в конце сентября 1947 г.). Газ. «Правда», 22/X 1947.
19. Литвинов М. М.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ССР.

- Речи и заявления 1927—1937 гг. Изд. 2-е. доп., М., 1937; 432 стр.
20.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новейшего времени в договорах, нотах и декларациях. Ч. I. От Француз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до импер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войны. М., 1925; 441 стр. Ч. II. От импер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войны до снятия блокады с Советской России. М., 1926; V, 464 стр. Ч. III. От снятия блокады с Советской России до десятилетия Октябрь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Выпуск I. Акты советской дипломатии. М., 1928; IV, 430 стр. Выпуск II. Акты дипломатии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государств. М., 1929; 367 стр. См. также продолжение этой сер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в 1928 г. Договоры, декларации и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ая переписка. М., 1929, 278 стр.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в 1929 г. ... М., 1931; 316 стр.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в 1930 г., М., 1932; 414 стр.
21.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эпоху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Документы из архива царского и временног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1878—1917 гг. Серия III (тт. I—X). М.—Л., 1935.
22. Молотов В. М. В борьбе за социализм. Речи и статьи. 3-е доп. изд. [М.] 1935; 587 стр.

23. Молотов В. М. Беседа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СНК СССР товарища В. М. Молотова с главным редактором французской газеты «Тан» г-ном Шастенэ 19 марта 1936 г. [М.] 1936; 14 стр.
24. Молотов В. М. Статьи и речи. 1935—1936. [М.] 1937; 272 стр.
25. Молотов В. М. О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е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Доклад Пред. Сов. Нар. Ком. и Нар. Комиссара иностр. дел товарища В. М. Молотова на внеочередной 5-й сессии Верховного Совета СССР 31 октября 1939 г. [М.] 1939; 32 стр.
26. Молотов В. М.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Доклад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СНК и народного комиссар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на заседании VI сессии Верховного Совета СССР 29 марта 1940 г. [М.], 1940; 16 стр.
27. Молотов В. М. 28-я годовщина Великой Октябрьской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Доклад на торжественном заседании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Совета 6 ноября 1945 г. [М.] 1945; 31 стр.
28. Молотов В. М. Речи на Парижской мирн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Июль-октябрь 1946 г. [М.] 1946; 207 стр.
29. Молотов В. М. Тридцатилетие Великой Октябрьской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 Доклад на торжественном заседании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Совета 6 ноября 1947 г. Газ. «Правда», 7/XI 1947.
30. О конвенции в Монтре по черноморским проливам. (В Министерстве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СССР.) Газ. «Известия», 13 августа 1946 г.
31. О черноморских проливах. (В Министерстве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СССР.) Газ. «Известия», 28 сентября 1946 г.
32. Основной закон Турец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и Закон о турецком гражданстве. [В книге: «Конституции буржуазных стран», т. III. С введением А. Мельника. Стр. 4—26.]
33. Пересмотр Лозаннск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о проливах. Документы. Мировое хозяйство и мировая политика, 1936, №5, стр. 161—163; №9, стр. 143—152.
34. Программа республикан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партии Турции [из газ. «Хакимет-и Миллие» от 15/VI 1931 г.]. 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национально-колониальным проблемам, сб. I. М., 1932, стр. 12—16.
35. Раздел Азиатской Турции. (По секретным документам б.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Под ред. Е. А. Адамова. М., 1924; 383 стр.

(Европейские державы и Турция во время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36. Сборники действующих договоров, соглашения и конвенций, заключенных [СССР] с иностранными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 [НКВД СССР]. Вып. I. Действующие договоры, соглашения и конвенции, вступившие в силу до 1 января 1924 года. М., 1924; 436. IV стр. Вып. II. Действующие договоры, соглашения и конвенции, вступившие в силу между 1 января 1924 года и 1 января 1925 года. М., 1925; 132 стр. Вып. III. Действующие договоры, соглашения и конвенции, вступившие в силу между 1 января 1925 года и 1 мая 1926 года. М., 1926; 279 стр. Вып. IV. Действующие договоры, соглашения и конвенции, вступившие в силу между 1 мая 1926 года и 1 февраля 1928 года. М., 1928; 252 стр. Вып. V. Действующие договоры, соглашения и конвенции, вступившие в силу между 1 февраля 1928 года и 1 июня 1929 года. М., 1930; 215 стр. Вып. VI. Действующие договоры, соглашения и конвенции, вступившие в силу между 1 июня 1929 года и 1 января 1931 года. М., 1931; 202 стр. Вып. VII. Действующие договоры, соглашения и конве-

- нции, вступившие в силу между 1 января 1931 года и 1 января 1933 года. [М.], 1933: 228 стр. Вып. VIII. Действующие договоры, соглашения и конвенции, вступившие в силу после 1 января 1933 года. М., 1935: 356 стр. Вып. IX. Действующие договоры, соглашения и конвенции, вступившие в силу до 1 января 1937 года. М., 1938: 507 стр.
37. Севрский мирный договор и акты, подписанные в Лозанне. Полная перевод с французск. текста. М., 1927: LIV, 303 стр.; т. V из серии «Итоги импер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войны. Серия мирных договоров».
38. Советское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е бюро. Фальсификаторы истории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справка). [М.] 1948: 79 стр.

6) На турецком языке

39. [Atatürk]. Nutuk-Gazi Mustafa Kemal tarafından Cümhuriyet Halk Firkasının 15—20 Teşrinivel 1927 tarihleri arasında toplanan İkinci Büyük Kongresinde söylenmi tir. Cilt I. 1919—1920, 317 s.; Cilt II, 1920—1927, 345 s.; Cilt III. Vesikalar. 348 s. [Речь, произнесенная Гази Мустафой Кемалем на 2-м съезде народно-республиканской

- партии 15—20 октября 1927 г. Ч. I. 1919—1920; ч. II. 1920—1927; ч. III. Документы]. Istanbul, 1934. Русское издание: Мустафа Кемаль. Путь новой Турции, 1919—1927. Т. I. Первые шаг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ого движения. 1919. Литиздат НКВД. М., 1929, LXIV, 480 стр., с иллюстрациями и 4 картами; т. II. Подготовка ангорской базы, 1919—1920. Соцэкгиз, Москва, 1932, VI, 416 стр., с портретами и картой; т. III. Интервенция союзников, греко-турецкая война и консолидац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фронта, 1920—1921. Соцэкгиз, М., 1934, XIV 460 стр., с иллюстрациями и картой; т. IV. Победа новой Турции, 1921—1927. Соцэкгиз, М., 1934, VIII, 571 стр., с иллюстр. и 5 картами.
40. Atatürk'ün söylev ve demeçleri. I. T. B. M. Meclisinde ve C. N. P. Kurultaylarında (1919—1938) [Речи и высказывания Ататюрка, т. I.—В Великом Национальном собрании Турции и на съездах народно-республиканской партии за 1919—1938 гг.] Istanbul, 1945; 398 + III s.
41. Cümhuriyet Halk Partisi. On besinc yıl kitabı. [Народно-республиканская партия. Книга 15-летия.] Ankara, 1930; 611 s.
42. Erkâni harbiyeyi umumiye. Cihan harbında

- osmanlı harekâtı tarihçesi. [Генеральный штаб.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 оттоманских действий в мировой войне.] İstanbul, 1938; арабск. алф., 65 стр., 6 карт.
43. Hariciye vekâletti Muahedat mecmuası.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иностр. дел. Сборник договоров. Многотомное издание.] Ankara.
44. İstatistik Yıllığı.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ежегодник.] № I—XIV.
45. İstanbul Ticaret ve Sanayi Odası Mecmuası. Türkiye'de 10 Yıl Cümhuriyet Hayatı. 1923—1933 [Журнал Стамбульской торгово-промышленной палаты. 10 лет республиканской жизни в Турции. 1923—1933] İstanbul, 1933; 243 s.
46. Kop Kadri Kemal. Millî şefin söylev, demeç ve mesajları. [Коп Кадри Кемаль. Речи, высказывания и послан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вождя.] İstanbul, 1945; 247 s.
47. Matbuat Genel Direktörlüğü. Yabancı gözü ile Cümhuriyet Türkiye'si. [Глав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по делам печати. Иностранцы о республиканской Турции.] Ankara, 1928.
48. Peker Reser. İnkılâp dersleri notları. [Пекер. Реджеб. Записи лекций о революции.] Ankara, 1936; 118 s.

49. Tarih. IV. Türkiye Cumhuriyeti. [История. Т. IV. Турецк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Istanbul, 1933; 374 s. + 132 листа иллюстрация с картами. Французское издание: Histoire de la République Turque. Réd. par la Société pour l'étude de l'histoire turque. Istanbul, Devlet Basimevi, 1935, XXI, 372 p., avec ill., cart.
50. Türkiye Cumhuriyet Merkez Bankası Bültenleri. [Бюллетени Центрального банка Турец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51. Türkiye İş Bankasının on yılı (1924—1934). Devlet Matbaası. [10 лет Делового банка Турци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типография.] 1934; 96 s., с иллюстр. и таблицами.
52. Türkiye Ziraat Bankası bültenleri. [Бюллетени Сельскохозяйственного банка Турции.]

в) На западноевропейских языках

53. Conférence de Lausanne («Livre jaune»). Т. 1—2. Paris, 1923. (France.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Documents diplomatiques).
54. Conférence de Montreux, 1936. Actes de la Conférence concernant le régime des Détroits, 22 juin—20 juillet 1936. Compte-rendu des Séances plénières et procès-verbal des débats du Comité

- technique... (Liège, 1936). 310 p.
55. Contrat entre le Gouvernement de la République Turque et les Représentants des Porteurs de la Dette publique Ottomane. Ed. Rizzo. Constantinople, 1929; 104 p.
56. Direction générale de la presse au Ministère de l'intérieur.—La guerre de l'indépendance turque. Imprimerie d'Etat, 128 p. cart. et ill.
57. Direction générale de la presse au Ministère de l'intérieur.—La Turquie Contemporaine. Ankara, 1935. 304 p., ill. et cartes.
58. Direction générale de la presse au Ministère de l'intérieur.—La Turquie en chiffres. Ankara, 1937, 108 p.
59. 10 ans de la République Turque. Résumé du guide publié par le Parti républicain du peuple à l'occasion du X anniversaire de la République, 1923—1933. Ankara, 1933; 172 p.
60. La documentation internationale: La Paix de Versailles, vol. I—XII. Paris, 1920—1939.
61. La Turquie devant le tribunal mondial. Publication du Congrès national, 1919.
62. Législation Turque. Ed. Rizzo, vol. I—XVII. Istanbul, 1923—1939.
63. Loi N 3008 sur le Travail. Date d'approbation

- 8/VI 1936. Publié dans le Resmi Gazete N 30330 du 15/VI 1936; 49 p.
64.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United States. 1919. The Paris Peace Conferenc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42—1945, vol. I, II, III, IV, XI.
65. Parti républicain du Peuple. Statuts (Adoptés par le IV Grand Congrès du Parti). Ankara, 1935; 40 p.
66. Parti républicain du Peuple. Quinzième anniversaire de la proclamation de la République Turque. Ankara, 1938; 83 p., ill.
67. Permanent delegation accredited to the League of Nations. Question of Alexandretta and Antioch. Letter from the Permanent delegation of Turkey accredited to the League of Nations with six annexes. Geneva, 1936; 19 p.
68. Question de Mossoul à la 35-me Session du Conseil de la Société des Nations (Genève). Lausanne, 1935; 124 p.
69. The Greek campaign in Asia Minor at 1921. Telegrams of correspondents of the world press., Athens, 1921. 52 p. (Greec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70. The Treaties of Peace 1919—1923. In two vols

(1098 p.). New York, 1924. With maps compiled by Lt.-Col. Lawrence Martin.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 к Турции относятся т. 2-я. договоры: Treaty of Sèvres, Treaty of Lausanne, the Convention respecting the regime of the Straits and other instruments signed at Lausanne.]

71. *Traité de Lausanne. Conférence sur les affaires du Proche-Orient (1922—1923). Lettres et accords du 24 juillet 1923. Suppl. Paris, 1923.*

III. ПРОЧ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а) На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

72. Аболтин В.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состав послелозаннской Турции. *Новый Восток*. М., 1925, № 7, стр. 115—129.
73. Алимов Аб. Турция (стр. 3—92). Глава в книге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Востока в эпоху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М.—Л., 1934; 432 стр.
74. Белинков С. Турция во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е. *Новое время*, 1945, № 11(21), стр. 6—10.
75. Библиография Востока. Вып. 1. История (1917—1925). Под общей редакцией проф. Д. Н. Егорова. М., 1928; 300 стр. [К истории Турции относятся стр. 96—105.]

76. Васильев И. Анкара и Амман. «Известия», 1947, 24 января.
77. Васильев И. Сирия, Турция и Александреттский санджак. «Известия», 1946, 22 марта.
78. Васильев И. Турецкий бум. «Известия», 1946, 17 апреля.
79. Генин И. Промышленное развитие Турции и ее «пятилетка». Мировое хозяйство и мировая политика, 1934, № 10, стр. 117—133.
80. Гирс А. Австро-Венгрия, Балканы и Турция. Задачи войны и мира. П., 1917; 75 стр.
81. Голобородько И. И. Турция. Изд. 2-е. М., 306 стр., с планом и рисунками.
82. Грабарь В. Вопрос о проливах на Лозаннск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Внешняя торговля. М., 1923, № 2.
83. Гурко-Кряжин В. А. Ближний Восток и державы. М., 1925; 243 стр., с картами.
84. Гурко-Кряжин В. А. Возникновение национально-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ого движения в Турции. Обзор источников 1919—1928. Новый Восток, 1928, № 23—24, стр. 268—275.
85. Гурко-Кряжин В. А. История революции в Турции. М., 1923; 196 стр., с илл., карт.
86. Д. Г. Иностранный капитал в Турции. Новый

- Восток, М., 1929, № 26—27, стр. 326—339.
87. Данциг Б. Аграрная реформа в Турции. Мировое хозяйство и мировая политика, 1945, № 12, стр. 60—68.
88. Данциг Б. Внутри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положение Турции. Мировое хозяйство и мировая политика, 1946, № 4—5, стр. 60—70.
89. Данциг Б. Турция. [Полит.-эконом. очерк.] М., 1940; 159 стр., с илл. и 2 картами.
90. Данциг Б. М. Финансово-налоговое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ство и бюджет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Турции. Новый Восток, М., 1926, № 15, стр. 142—152.
91. Данциг Б. Финансы Турции. Новая Восток, М., 1928, № 23—24, стр. 139—154.
92. Джанашиа С. и Бердзенишвили Н. Письмо в редакцию газеты «Коммунисти». О наших законных требованиях к Турции. [Перепечатано в газ. «Известия», 1946, 20 декабря.]
93. Джемаль паша Ахмед. Записки 1913—1919 г. Тифлис, 1923; 239 стр.
94. Дживелегов А. К., чл.-корр. АН Армянской ССР, проф. Армения и Турция. Стенограмма публичной лекции, прочитанной 20 февраля 1946 г. в Лекционном зале в Москве. М., 1946; 16 стр.

95.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Главная редакция А. Я. Вышинского и С. А. Лозовского. Т. I (А—К). М., 1948, XXXII, 856 стр.
96. Жуковский П. М. Земледельческая Турция. (Азиатская часть-Анатолия.) М.—Л., 1933; XXVII, 971 стр., с илл. и карт.
97. Завриев Д. С. Восточная Анатоли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очерки. Тифлис, 1936; 315 стр.
98. Завриев Д. С., д-р истор. наук. К новейшей истории северо-восточных вилайетов Турции. Тбилиси, 1947; 367 стр.
99. Завриев Д. С. Экономика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Турции. Тифлис, 1934; 194 стр.
100. Зубок Л. И., проф., Захаров С. В., Миллер А. Ф., проф.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18—1923 гг.). Стенограмма лекция, прочитанных в Высшей парт. школе при ЦК ВКП(б). Москва, 1946; 372 стр. [Турции посвящены стр. 229—259.]
101. Зубок Л. И., проф., Захаров С. В., Миллер А. Ф., проф.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24—1929 гг.). Стенограмма лекция, прочитанных в Высшей парт. школе при ЦК ВКП(б). М., 1946; 503 стр. [Турции посвящены стр. 284—321.]
102. Иванов Л. Турция и режим проливов. Мировое хозяйство и мировая политика, 1936, № 6,

- стр. 79—87.
103. История дипломатии. Под ред. академика В. П. Потемкина, т. II (423 стр.) и т. III (883 стр.), М., 1945.
104. Иолджу. Борьба вокруг алфавита. (Письмо из Константинополя). Новый Восток, М., 1926, № 15, стр. 293—301.
105. Иолджу. От революции к контрреволюции. Новый Восток, М., 1927, № 16—17, стр. 117—133.
106. К вопросу о черноморских проливах. Статья в газ. «Известия», 1946, 18 августа.
107. Коленковский А., комбриг. Дарданелльская операция. М., 1938; 136 стр., изд. 2-е, со схемами.
108. Колюбакин Б. На малоазиатском театре всемирной войны 1914—1916 гг. П., 1917; 81 стр.
109. Колядко Л. С.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жизнь Анатолии. Новый Восток, М., 1923, № 4; стр. 230—249
110. Королькова. Латинский алфавит в Турции. Новый Восток, М., 1926, № 13—14, стр. 457—458.
111. Корсун Н. Г., комдив, проф. Алашкертская и Хамаданская операции на Кавказском фронте

-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в 1915 г. М., 1940; 200 стр., 7 отд. л. карт.
112. Корсун Н. Г., комдив, проф. Балканский фронт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1914—1918 гг. М., 1939; 124 стр., со схемами.
113. Корсун Н. Г., проф. Греко-турецкая война 1919—1922 гг. Оперативно-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 М., 1940; 55 стр., с картами.
114. Корсун Н. Г., д-р военн. наук, проф., ген.-лейт. Первая мировая война на Кавказском фронте. Оперативно-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 М., 1946; 99 стр.; 21 отд. сброшюр. л. схем.
115. Корсун Н. Г., комбриг. Сарыкамышская операция на Кавказском фронте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в 1914—1915 гг. М., 1937; 161 [3] стр., 5 отд. л. схем и карт.
116. Корсун Н. Г. Турция. Курс лекций по военной географии, читанных в Военной академии РККА. М., 1923; 66 стр., с 5 л. схем.
117. Корсун Н. Г., комбриг. Эрзерумская операция на Кавказском фронте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в 1915—1916 гг. М., 1938; 180 стр., с илл.; 8 вкл. л. схем.
118. Крымский В. Пантюркисты-фашистская агентура в Турции. Большевик, 1944, № 10—11, стр.

- 79—85.
119. Крымский В. Провокаторы под маской журналистов. Газ. «Правда», 16. VIII, 1945.
120. Крымский В. Турция на службе у 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империалистов. Газ. «Правда», 25. II, 1948.
121. Кряжин В. Ближневосточный вопрос, Черное море и СССР. Новый Восток, М., 1924, № 5, стр. 44—50.
122. Кряжин В. (Гурко). Борьба за проливы. Новый Восток, М., 1922, № 2, стр. 83—125, с 1 схем. картой.
123. Кряжин В. (Гурко).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группировки в Турции. Новый Восток, М., 1923, № 3, стр. 35—66.
124. Кряжин В. (Гурко). Раздел Турции во время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Новый Восток, М., 1923, № 4, стр. 49—57.
125. Кузьмин Д. Рабочее движение в Турции. Новый Восток, М., 1922, № 2, стр. 154—159.
126. Лемин И. М.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и от Версаля до Локарно. 1919—1925. М., 1947; 488 стр. [В частности: гл. 4-я «Севрский мир» и гл. 8-я «Греко-турецкая война и ближневосточ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Англии».]
127. Лирау Вальтер. Новая Турция, е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 состояние и виды на будущее. Пер. с немецк.
С прилож. карты. М.—Л., 1924; 78 стр.
128. Лудшувейт Е. Современное положение турецких проливов. Новый Восток. М., 1928, № 23—24, стр. 292—303.
129. Мандельштам А. Н. Младотурецкая держава. Историк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 М., 1915, стр. 68.
130. Матвеев С. Н. Турция (Азиатская часть—Анатолия). Физико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е описание. М.—Л., 1946; 215 стр., с картой.
131. Мельник А. Греко-турецкие разногласи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1929, № 8, стр. 55—67.
132. Мельник А. Новая партия в Турц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1930, № 9—10, стр. 3—19.
133. Мельник А. Пять лет республиканской Турц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1928, № 11, стр. 3—11.
134. Мельник А. Республиканская Турция. М.—Л., 1927; 56 стр., с рис. и схем. картой.
135. Мельник А. Турция. М., 1929; 175 стр., с фотоснимками.
136. Мельник А. Турция. М., Соцэкгиз, 1937; 218 стр., с рисунками и 5 картами. [Из серии «Капиталистический мир в очерках».]

137. Мельник А.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кризис в Турц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1930, № 1, стр. 37—56.
138. Миллер А. Ф. Ближний Восток после перв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1918—1923 гг.). Севр и Лозанна. М., 1945. Высшая школа партийных организаторов при ЦК ВКП(б); 52 стр.
139. Миллер А. Ф. Вступление Турции в первую мировую войну. Известия АН СССР, сер. истории и философии, т. III, № 4, 1946, стр. 321—340.
140. Миллер А. Ф.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турецких отношения.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журнал, 1941, № 10—11, стр. 100—109.
141. Миллер А. Ф. Турция в 1918—1923 гг. М., 1944. Высшая парт. школа при ЦК ВКП(б); 32 стр.
142. Миллер А. Ф. Турция в 1924—1944 гг. М., 1945. Высшая парт. школа при ЦК ВКП(б); 40 стр.
143. Миллер А. Ф. Турция и Германия в годы перв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М., 1944. Лекционное бюро при Комитете по делам высшей школы при СНК СССР; 24 стр.
144. Миллер А. Ф. Турция и проблема проливов.

- М., 1947. Всесоюзное лекционное бюро при Министерстве высшего образования СССР: 24 стр.
145. Миллер А. Ф. Турция под гнетом германского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в годы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1914—1918).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журнал, 1942, № 12, стр. 12—23.
146. Миллер А. Ф. Оттоманская империя (Султанская Турция). М., 1946. Высшая парт. школа при ЦК ВКП(б): 54 стр.
147. Мирный С. К вопросу об определении стоимости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для Турции. Новый Восток, М., 1923, № 3, стр. 470—474.
148. Мирный С. Школьный вопрос в Константинополе. (Письмо из Константинополя.) Новый Восток, М., 1924, № 5, стр. 378—387.
149. Могилевич А. А. и Айрапетян М. Э. На путях к мировой войне 1914—1918. [Л.], 1940: 293 стр.
150. Муратов Нурулла. Импери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экспансия под флагом «помощи». Газ. «Труд», 20/III 1948.
151. Мусалл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в Смирне. Новый Восток, М., 1923, № 3, стр. 78—89, с фотоснимком.

152. Неджибэ-Ханум. Рабочее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ство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Турции. Новый Восток, М., 1927, № 19, стр. 80—98.
153. Никулин Л. Стамбул, Анкара, Измир. М., 1935; 184 стр.
154. Новичев А. Д. Очерки экономики Турции до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М.—Л., 1937; 312 стр., с илл.
155. Новичев А. Д. Экономика Турции в период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М.—Л., 1935; 143 стр.
156. Нотович Ф. И.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ая борьба в годы перв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Т. I. Потеря союзниками Балканского полуострова. М.—Л., 1947; 747 стр.
157. Павлович М. Борьба за Азию и Африку. М., 1923; 229 стр., с карт.
158. Павлович Мих. Лозаннск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Новый Восток, М., 1923, № 3, стр. 3—34.
159. Павлович М. О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м движении в Турции. Журн. «Комм.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 1921, стр. 4225—4231.
160. Павлович М. П. (М. Вельтман). 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Турция. Величие и падение Оттоманской империи (старая Турция). Турция Энвер-Бея и Ахмед-Ризы. Турция Кемал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Турции. М., 1921; 127 стр., 5 карт.
161. Павлович М., Гурко-Кряжин В. и др. Турция в

- борьбе за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ь. М., 1925; 152 стр.
162. Петров Н. Турция после разрыва отношения с Германией. Большевик, 1944, № 16, стр. 53—60.
163. Попов А. Турец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1908—1909 гг. Вступительная статья и обширная документация в журн. «Красный архив», 1931, т. 43, стр. 3—54; т. 44, стр. 3—39, и т. 45, стр. 27—52.
164. С. Ш. Реформа алфавита в Турции. Новый Восток, М., 1929, № 25, стр. 249—257, с картой.
165. Сокольский Н. Очерки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Турции. Тифлис, 1923; IV, 207 стр., с картой.
166. Сперанский А. Ф. Турецкий вопрос н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конференциях после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Новый Восток, М., 1922, № 2, стр. 126—146.
167. Ставровский А. Закавказье после Октября. Взаимоотношения с Турцией в первой половине 1918 г. М.—Л., 1925; 120 стр.
168. Страны Ближнего и Сред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Под ред. П. И. Лебедева-Полянского, Ф. Н. Петрова, Ф. А. Ротштейна, О. Ю. Шмидта. М., 1944; 336 стр. [Из серии справочников по зарубежному Востоку. Турции посвящены стр. 1—99.]

169. Субхи М. Новый турецкий кабинет. Жизнь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ей, 1919, № 41 (49), стр. 1—2.
170. Субхи М. Федерализм в Турции или политика раздела. Жизнь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ей, 1919, № 13 (21), стр. 1.
171. Тарле Е. В. Англия и Турция.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корни и развитие конфликта. Статья в «Анналах». Журн. Всеобщей истории. Изд. Российской Акад. Наук. 1923. № 3, стр. 21—71.
172. Тарле Е. В. Европа в эпоху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1871—1919 гг. Изд. 2-е, доп., М.—Л., 1928; 511 стр.
173. Тверитинова А. Каталог книг по истории на турецком языке, находящихся в библиотеках Ленинграда. Библиография Востока, вып. 10, М.—Л., 1936; стр. 201—226 [с предметным указателем].
174. Токаржевский Е. А. Бакинские большевики—организаторы борьбы против германо-турецких интервентов в Азербайджане в 1918 году. Труды Азербайджанского филиала ИМЭЛ. т. VI. Баку, 1947.
175. Турци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информационный справочник. Вып. 3. Тифлис, 1934; 106 стр., с картой.

176. Тыркова Ариадна. Старая Турция и младотурки. Год в Константинополе. П., 1916; VIII, 180 стр.
177. Французские интересы в Турции. Новый Восток. М., 1923. № 3, стр. 475—478. [Перевод статьи из газ. «Clarté», 15/X 1922.]
178. Фрунзе М. В. Собр. соч., том I.
179. Шнуров А. Турецкий пролетариат. М.—Л., 1929; 88 стр., с иллюстр.
180. Юст К. Анатолийская печать. Тифлис, 1922; 2+213 стр., с илл.
181. Юст К. Жен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Турции. (Письмо из Ангоры.) Красная новь, М.—Л., 1926. № 8, стр. 194—196.
182. Юст Константин. Кемализм (Письма из Турции.) Красная новь, М.—Л., 1926, № 9, стр. 165—177.
183. Юст Константин. Письма из Турции. Красная новь, М.—Л., 1926. № 5, стр. 174—186.

6) На турецком языке

184. Ađar Ömer Kemal. İnkılâp Tarihi. [История революции.] İstanbul, 1937.
185. Alâettin İbrahim. Meşhur Adamlar. [Знаменитые люди.] Тт. I—IV. İstanbul, 1933—1936. [Турецкий биографическо-справочный словарь.]

186. Ali Saip. Kilikiya faciaları ve Urfanın kurtuluş mücadelesi [Али Саиб. Киликийская трагедия и борьба за освобождение Урфы.] Арабск. алф. Ankara, 1340 хиджры, 272 s.
187. Atatürk, 1880—1938. Ankara, 1939; 64 s.
188. Aykut Şeref. Kamâлизм [Аякут Шереф. Кемализм.] Istanbul, 1936; 83 s.
189. Bayur Yusuf Hikmet. Türkiye Devletinin dış siyasası [Баюр Юсуф Хикмет.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Турец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Istanbul, 1938.
190. Bayur Yusuf Hikmet. Türk inkılabı Tarihi. Cilt II. Kısım II. [Баюр Юсуф Хикмет. История турец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т. II, ч. II.] Ankara, 1943; XII, 504 s., с картами.
191. Cahit Burhan. Gazi Mustafa Kemal. Istanbul, 1930; 77 s.
192. Cahit Burhan. Mudanya, Lozan. Ankara, 1933; 88 s.
193. Duran Faik Sabri. Büyük Atlas. [Дуран Фаик Сабри. Большой Атлас.] Istanbul, 1937; 71 стр. карт и 16 стр. индекса.
194. Duran Faik Sabri. Türkiye Coğrafyası. [Дуран Фаик Сабри. География Турции.] Istanbul, 1929; 480 s., с илл. и картами.
195. Engin Saffet. Kemalizm İnkılabının prensipleri,

- [Энгин Савфет. Принципы кемалист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Istanbul, 1938.
196. Hamit Sadi. İktisadi coğrafya. [Хамид Сад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география.] Istanbul, 1928; арабск. алф., 327 стр.
197. Hamit Sadi. İktisadî Türkiye. [Хамид Сад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Турция.] Istanbul, 1932; III, 198 s.
198. İsmail Hüsrev. Türkiye köy iktisadiyatı. [Исмаил Хюсрев. Сельское хозяйство Турции.] Ankara, 1934.
199. İsmail Hüsrev. Türkiyede ziraat kooperatif harekâtı. [Исмаил Хюсрев. Сельскохозяйственное кооператив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Турции.] Istanbul, 1932; 70 s.
200. İzzeddin Y. Ferik. İstiklâl harbı hâtirâtı. İkinci İnönü muharebesinde 61 fırka. [Иззеддин Ю., ген.-лейт.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о войне за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ь. 61-я дивизия в битве при Иненю.] Ankara, 1932; 62 s.
201. Kâni İrtem Süleyman. В şazlar meselesi. [Кяни Иртем Сулейман. Вопрос о проливах.] Istanbul, 1936.
202. Karabekir Kâzım. Cihan harbine neden girdik, nasıl idare etdik? [Карабекир Кязым. Почему

- мы вступили в первую мировую войну и как ее провели?] Istanbul, 1937.
203. Neşet Halil. Büyük Meclis ve İnkılâp. [Нешет Халил. Великое собрание и революция.] Ankara, 1933; 193 s., с иллюстрациями.
204. Osmanlı imparatorluğundan Türkiye cümhuriyetine. Nasıldı? Nasıl oldu? [От Оттоман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к Турец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е. Как это было? Как стало?] Istanbul, 1933; 48 s
205. Ruşen Eşref. Anafartalar Kumandanı Mustafa Kemal ile mülâkat. [Рушен Эшреф. Беседа с командующим войсками у Анафарты Мустафой Кемалем.] Istanbul, 1930.
206. Sertel Iskander F. Dünya ağlıyor Atatürk. [Сертель Искандер Ф. Мир оплакивает Ататюрка.] Istanbul, 1939.
207. Süreyya Şevket. İnkılâp ve kadro (İnkılâbın ideolojisi). [Сюреяя Шевкет. Революция и кадры (Идеология революции).] Ankara, 1932; 173 s.
208. Süreyya Şevket. Cihan İktisadiyatında Türkiye. [Сюреяя Шевкет. Турция в мировой экономике.] Ankara, 1931; 169 s.
209. Şakir ziya. K. Atatürk. — Doğumundan ölümüne kadar, hususî—askerî—siyasî hayatı [Шакир Зия. К. Ататюрк от рождения до смерти. личная,

- военная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жизнь]. Istanbul, 1938.
210. Tahsin Suat. Türkiye Cümhuriyeti devleti ve haliki Gazi Mustafa Kemal. [Тахсин Суад. Турецкое республикан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и его создатель Гази Мустафа Кемаль.] Istanbul, 1933; XVI. 424 э. (+ два портрета).
211. Türkiye Bibliyo ğrafyası. 1940. I. [Библиография по Турции.] Istanbul, 1940, 99 s.
212. Uluğ İğdemir. Atatürk. Ankara, 1939.
213. Unaydın Ruşen Eşref. Türk Dili Tetkik Cemiyetinin kuruluşundan ilk kurultaya kadar hâtıralar. [Унайдын Рушен Эшреф.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о создании Турецкого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до I конгресса.] Ankara, 1943; 80 s., с илл.

в) На западноевропейских языках

214. Abelous Frédéric. L'Evolution de la Turquie dans ses rapports avec les étrangers. Paris, 1928; 297 p.
215. Allen Henry Elisha. The Turkish Transformation. A study in social and religious development. Chicago, 1935. IX, 251 p.
216. Alp Tekin (pseud. d'Albert Cohen). Le Kemalisme. Paris, 1937. (Турецкое издание: Alp Tekin

- Kemalizm. Istanbul, 1936; 347 + 10 s.).
217. Ancel J. Manuel historique de la question d'Orient (1792—1925). Paris, 1926; 346 p.
218. Armstrong Harold C. Turkey in Travail. The birth of a new nation. London, 1925; 280 p.
219. Armstrong Harold Courtney. Grey Wolf. Mustafa Kemal. An Intimate Study of a Dictator. 9th ed., London, 1939; 352 p. (французский перевод: Armstrong H. C. Capitaine. Mustafa Kemal. Paris, 1933).
220. Bassi Ugo. L'Italia e la nuova Turchia. Modena, 1932; 55 p.
221. Bello C. G. Notes et reflexions sur la Turquie. L'Angleterre, la France et le problème de Constantinople. Paris, 1920; 4 + IV + 122 p.
222. Bischoff Norbert de. La Turquie dans le monde. L'empire Ottoman. La république turque. Trad. de M. Bénouville. Préf. de J. Deny. Paris, 1936; 247 p., avec carte.
223. Bischoff Norbert von. Ankara. Eine Deutung des neuen Werdens in der Türkei. Wien, 1935; 226 S., III.
224. Bourgoïn M. La Turquie d'Ataturk. Paris, 1936.
225. Buchanan Sir George. My Mission to Russia. Vol.

- 1—2. Boston. 1923. (Переводы: Бьюкенен. Мемуары дипломата. Пер. с англ. С. А. Алексеева и А. И. Рубена. Предисл. В. Гурко-Кряжина. Изд. 2-е. М. (6. г.); 311 стр. Бьюкенен. сэр Джордж. Моя миссия в России.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дипломата. Т. I—183 стр.; т. II—189 стр. Берлин. 1924).
226. Carte de la République Turque. 1:800 000. 8 feuilles en couleurs. Istanbul—Ankara—Sivas—Erzurum—Musul—Malatya—Konya—Izmir. Ankara, 1932—1934.
227. Conker Orhan. Les Chemins de fer en Turquie et la politique ferroviaire turque, Paris, 1935.
228. Conker Orhan et Witmeur Emile. Redressement économique et industrialisation de la Nouvelle Turquie. Paris, 1937.
229. Cumming Henry Harford. Franco-British rivalry in the postwar Near East. The decline of French influence. London, 1938; 229 p., with a map.
230. Deny J. et Marchand R. Petit manuel de la Turquie nouvelle. Paris, 1933.
231. Djonker M. C. Bosphore et les Dardanelles. Les conventions des détroits de Lausanne (1923) et Montreux (1936). Thèse...Lausanne, 1938; 164 p.
232. Dourmoussis E. La vérité sur un drame historique.

- La catastrophe de Smyrne. Paris. 1928; 160 p.
233. Driault Eduard et Lhéritier Michel. Histoire diplomatique de la Grèce de 1821 à nos jours. T. 5. La Grèce et la grande guerre; de la révolution turque au traité de Lausanne (1908—1923). Paris. 1926.
234. Emin Ahmed. Turkey in the world war. New Haven, 1930.
235. [Eversley George John Shaw-Lefevre, Lord, and Chirol, Sir Valentine]. The Turkish Empire, from 1288 to 1914, by Lord Eversley, and from 1914 to 1924, by Sir Valentine Chirol. London, 1924; 478 p., with three maps.
236. Farrère Claude. Les quatre dames d'Angora. Roman. Paris. 1933; 283 p.
237. Fuad Ali (Préface de René Pinon) La question des détroits. Son origine, son évolution, sa solution à la conférence de Lausanne. Paris, 1928; 191 p.
238. Gentizon P. Constantinople—Angora. La Revue de France, 1924, № 3, Paris.
239. Gentizon Paul. Mustapha Kemal ou L'Orient en marche. Paris, 1929; VIII, 350 p.
240. Georges-Gaulis Berthe. Le nationalisme turque. Paris, 1922; 145 p.

-
241. Georges-Gaulis Berthe. Dix jours à Angora. La Revue de Paris. 1921, № 15.
242. Georges-Gaulis Berthe. Angora. Constantinople, Londres. Moustafa Kémal et la politique anglaise en Orient. Paris: 259 p.
243. Georges-Gaulis Berthe. La question turque. Une page d'histoire turque et d'erreurs européennes 1919—1931. Paris. 1931; 373 p.
244. Georges-Gaulis Berthe. La nouvelle Turquie. Paris. 1924; 283 p.
245. Gerando F. La Turquie nouvelle. La politique étrangère. Le progrès intérieur. Paris. 1927; 33 p.
246. Giannini A. I documenti diplomatici della pace orientale. Raccolta completa dei testi ufficiali del trattato di Londra all'armistizio di Mudania Roma [1922]. 260 p. (Quaderni di «Politica», N 5).
247. Gontaut-Biron R. et Le Révérend L. D'Angora à Lausanne. Les étapes d'une déchéance. Préf. de E. Soulier. Paris. 1924; IX. 230 p., avec trois cartes.
248. Grousset René. Le Réveil de l'Asie. L'impérialisme britannique et la révolte des peuples. Paris, 1924; III. 251 p.

249. [Halid^é Edib]. *Memoirs of Halid^é Edib.* London, 1926; 472 p., with ill.
250. Halid^é Edib. *The Turkish ordeal. Being the further memoirs of Halid^é Edib.* London, 1928; 10 + 407 p. ill., map.
251. Halid^é Edib. *Turkey faces West. A Turkish view of recent changes and their origin...* With a pref. by E. M. Earle. London, 1930; XIV, 273 p., with ill.
252. Hindenburg P. von. *Aus meinem Leben.* Leipzig, 1927, XII, 409 S., mit Karten. [Русский перевод: Гинденбург.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Сокращ. пер. с нем., П., 1922; 120 стр.]
253. Howard Harry N. *The partition of Turkey. A diplomatic history 1913—1923.* Oklahoma, 1931; 486 p.
254. Hudson G. F. *Turkey, Greece and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Oxford, 1940; 32 p.
255. İnönü İsmet. *Kemal Atatürk, the Creator of the Turkish Republic.* *The Financial Times, Republic of Turkey Supplement*, N 149. February, 1937.
256. İzzet Pascha. *Denkwürdigkeiten.* Leipzig, 1927; 309 S., Ill.
257. Jarman T. L. *Turkey.* 1935; 132 p.
258. Jäschke Gotthard und Pritsch Erich. *Die Türkei*

- seit dem Weltkriege. Geschichtskalender 1918—1928. Berlin, 1929; 154 S.
259. Jäschke Gotthard. Die Türkei in den Jahren 1929, 1930, 1931—1932, 1933—1934. Geschichtskalender mit Personen-und Sachregister. Leipzig.
260. Jäschke Gotthard. Die Türkei in den Jahren 1934—1935. Leipzig.
261. Jäschke Gotthard. Die Türkei in den Jahren 1935—1941. Geschichtskalender mit Personen-und Sachregister. Leipzig, 1943; X, 194 S.
262. Kabbara S. Le régime des Détroits avant et depuis le Traité de Lausanne. Lyon, 1929; 172 p.
263. Kayser Jacques. L'Europe et la Turquie nouvelle. Paris, 1922. [Русский перевод: Кайзер Ж. Европа и Новая Турция. М., 1925; 79 стр.]
264. Klinghardt Karl. Angora. Konstantinopel. Ringende Gewalten. Frankfurt a. M. 1925; 265 S.
265. Kowalski Tadeusz. Turcja powojenna. Warszawa, 1925; XII, 192 стр.
266. Kral August von. Das Land Kamal Atatürks. Der Werdegang der modernen Türkei... Leipzig, 1935; XI, 181 S., 111. [Английский перевод: Kamal Atatürk's Land. The Evolution of Modern Turkey. Translated by Kenneth Benton, Wien.,

- 1938: XII, 284 p.]
267. Krüger K., Dr. *Kemalist Turkey and the Middle East*. London, 1932; 223 p.
268. Lamouche Léon, colonel. *Histoire de la Turquie depuis les origines jusqu'à nos jours*. Paris, 1934; 427 p., ill. [Турецкий перевод в двух томах с примечаниями переводчика Г. К. Сёялемез-оглу: *Türkiye tarihi: Yazan: Kolonel Lamouche, dilimize çeviren: Galip Kemali Söylemezoğlu, İstanbul, 1932*].
269. Larcher M., commandant. *La guerre turque dans la guerre mondiale*. Préface de Franchet d'Espérey. Paris, 1926; 4 + 681 p., avec cartes.
270. Lawrence T. E. *The Seven Pillars of Wisdom*. London, 1935; 672 p., 4th ed., with ill.
271. Leon und Friedrich. *Angora*, 1923.
272. Lepsius Johannes. *Bericht über die Lage des armenischen Volkes in der Türkei*. Potsdam, 1916.
273. Lepsius Dr. *Le rapport secret sur les massacres d'Arménie*. 1919.
274. Liman von Sanders O., General der Kavallerie. *Fünf Jahre Türkei*. Berlin, 1919; 408 S. Mit zahlreichen Textskizzen und Kartenbeilagen. [Турецкий перевод: *Türkiyede beş sene*. İstanbul,

- 1337: 331 s. Арабск. алфавит.]
275. Linke Lile. Allah dethroned. A journey through modern Turkey. London, 1937; 337 p.
276. Lloyd H. I., Major. The Geography of the Mosul Boundary. Статья с картой в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London, 1926. August. pp. 104—117.
277. Lloyd George David. The Truth about the Peace Treaties, vol. I—II. London, 1938.
278. Lloyd George David. War memoirs, vol. I—VI. Boston, 1934—1938. [Русский перевод: Ллойд Джордж Д. Военные мемуары, т. I—VI. Пер. с англ. И. Звавича, с предисл. Ф. А. Ротштейна. М., 1934—1938 (особенно тт. IV—VI).]
279. Lorey Hermann. Der Krieg zur See 1914—1918. Der Krieg in den türkischen Gewässern. Die Mittelmeer - Division, Berlin, 1928. [Русский перевод: Лорей Г. Операции германо-турецких морских сил в 1914—1918 гг. Пер. с нем. Е. Шведе, с предисл. И. Лудри и примеч. Н. Новикова. С картами и схемами. М., 1934; 320 стр.]
280. Luke, Sir Harry. The making of modern Turkey. From Byzantium to Angora. London, 1936; 246 p.
281. Mandelstam André. Le sort de l'empire Ottoman.

- Paris, 1917; XII, 631 p.
282. Mandelstam A. N. La Société des nations et les puissances devant le problème arménien. Paris, 1926; VIII, 355 p.
283. Marchand René. Le réveil d'une race. Dans la Turquie de Mustapha Kemal. Paris, 1927; 229 + 3 p., ill., cartes.
284. Mears Eliot Grinnell. Modern Turkey. A politico-economic interpretation 1908—1923. New York, 1924; XIV, 779 p., with ill. and 6 maps.
285. Mélia Jean. Mustapha Kémal ou la rénovation de la Turquie. Paris, 1929; 240 p.
286. Melzig Herb. Kemal Atatürk. Untergang und Aufstieg der Türkei. Frankfurt, 1937; 293 S.
287. Mikusch Dagobert von. Gasi Mustafa Kemal. Zwischen Europa und Asien. Eine Lebensgeschichte. Leipzig, 1929; VI, 335 S., ill., Kart.
288. Miller William. The Ottoman empire and its successors, 1801—1927. With an appendix, 1927—1936. 4th ed., Cambridge, 1936; XV, 644 p., With ill.
289. [Morgenthau Henry]. Secrets of the Bosphorus, by Ambassador Henry Morgenthau. Constantinople, 1913—1916. With illustrations. London, 1918; XI, 275 p. [Французский перевод:

- Morgenthau Henri. Mémoires de l'ambassadeur Morgenthau. Vingt-six mois en Turquie. Paris, 1919; 348 p.]
290. Moukhtar Pasha. La Turquie, l'Allemagne et l'Europe. Paris, 1924.
291. Mühlmann Carl. Deutschland und die Türkei (1913—1914). Berlin, 1929; 104 S.
292. Nicolas de Grèce. La campagne d'Asie Mineure. Revue de Paris, 1927, № 15.
293. Nielsen Fred. K. American-Turkish claims Settlement under the agreement of December 24, 1923; and supplemental agreement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urkey. Opinions and report. Prepared by F. K. Nielse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ct of March 22, 1935, 49 stat., 67. Washington, 1937; IV. 817 p.
294. Paléologue M. La Russie des tsars pendant la grande guerre, vol. 1—3. Paris, 1926. [Переводы: Палеолог М. Царская Россия во время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Пер. с франц. Предисл. М. П. Павловича. М.—П., 1923; 314 стр.; Палеолог М. Царская Россия накануне революции. Пер. с франц. Д. Протопопова и Ф. Ге. М.—П., 1923; 471 стр.]
295. General Papoulas's Report on Sakariah Battle.

- Current History. 1921. X. XI. New York.
296. Pech Edgard. Les alliés et la Turquie. Paris, 1925.
297. Pernot Maurice. La Nouvelle Turquie. Revue des deux Mondes. Paris. 1924. № № 15 janvier, 1 février, 1 mars.
298. Pernot Maurice. La question turque. Paris, 1923; X. 322 p.
299. Pétrovitch S. L'Union et la conférence balkanique. Paris, 1934; 319 p.
300. Poincaré R. Au service de la France. Neuf années de souvenirs, vol. 1—10. Paris, 1926—1933. [Русский перевод тт. 4—10; Пуанкаре Р. На службе Франции.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1914—1918, 1—2. М., 1936.]
301. Pomiankowski J. Der Zusammenbruch des Ottomanischen Reiches. Berlin, 1928.
302. Price Clair. The rebirth of Turkey. New York, 1923; XII, 234 p., with ill.
303. Raghieb Hussein. Le Mouvement national turc et Mustafa Kemal pacha. Paris, 1922.
304. Rallis A. A. Greece's Anatolian Venture and After (1915—1920). London, 1937.
305. Schäfer Carl Anton. Ziele und Wege für die jungtürkische Wirtschafts Politik. Karlsruhe, 1913;

VIII. 182 S.

306. Schlicklin Jean. Angora... L'Aube de la Turquie Nouvelle (1919—1922). Paris. 1922; XIV. 349 p.
307. Sherril Ch. H. A year's embassy to Mustafa Kemal. New York, 1934; 277 p. [Французский перевод: Sherril Charles Hitchcock, général. Mustafa Kemal. L'homme. L'oeuvre. Le pays. Trad. de l'angl. par Pierre Carolet. Paris, 1934; VI. 241 p.]
308. Shotwell James T. and Deak Francis. Turkey at the Straits. A Short history. New York, 1941; XII. 196 p.
309. Speduti Giuseppe. Aspetti giuridici della questione del Sangiaccato di Alessandretta. Milano, 1939; XI. 368 p.
310. Stürmer Harry, Dr. Zwei Kriegsjahre in Konstantinopel. [Французское издание: Stuermer Harry, Dr. Deux ans de guerre à Constantinople. Paris, 1917.]
311. Suche J. Der Meerengenvertrag von Montreux und seine Vorgeschichte (seit 1918). München, 1936; 73 S.
312. [Talaat Pasha]. Posthumous memoirs of Talaat Pasha. Current History, XV, N 2 (XI/1921), 298 pp.

313. Temperley H. A History of the Peace Conference of Paris, vol. I—VI. London, 1920—1924; with maps.
314. The opposition in Turkey. *Fortnightly Review*, 1925. June.
315. Tobin Chester M. Turkey. Key to the East. New York, 1944; 170 p.
316. Tongas Gerard. Atatürk et le vrai visage de la Turquie moderne. Paris, 1937. [Английский перевод: Tongas G. Atatürk and the true nature of modern Turkey. Transl. from the French by F. F. Rynd, London, 1939; 79 p., with ill.]
317. Toynbee Arnold J. The western question in Greece and Turkey. A study in the contact of civilizations. 2-nd ed., London, 1923; XXXIV 408 p., with maps.
318. Toynbee Arnold J. and Kirkwood Kenneth P. Turkey. London, 1926; XV, 2, 329 p., with 2 maps.
319. Turkey in Europe. London, 1920; 4 + I + 150 p. [Из серии Gr. Britain. Foreign Office. Historical Section.]
320. Waugh Sir Telford. Turkey yesterday, to-day and to-morrow. London, 1920; XII, 305 p., ill.
321. Webster Donald E. The Turkey of Atatürk.

- Social process in the Turkish Reformation. Philadelphia, 1939; 337 p.
322. White Wilbur Wallace. The process of change in the Ottoman empire. Chicago, 1937; IX. 314 p. [Период истории Турции с 1774 по 1937 г.]
323. Wortham H. E. Mustapha Kemal of Turkey. London, 1930; X. 216 p.
324. Zara Philippe de. Mustapha Kemal, dictateur. Paris, 1936; 370 p.
325. Ziemke Kurt. Die neue Türkei. Politische Entwicklung 1914—1929. Stuttgart, 1930; 550 S.
326. Zihni Burhan. La balance des comptes de la Banque Ottomane. Paris, 1932.
327. Ziyaeddin Fahri. Ziya Gökalp. Sa vie et sa sociologie. Essai sur l'influence de la sociologie française en Turquie. Paris, 1936; XV. 243 p., ill.

(二) 原著史料和参考书目译文

234

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

列宁：《世界政治中的引火物》，《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156—162页。

列宁：《巴尔干和波斯的事变》，《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5

- 卷，第 194—204 页。
- 列宁：《世界历史的新的篇章》，《列宁全集》中文版第 18 卷，第 363—364 页。
- 列宁：《战争的惨状》，《列宁全集》中文版第 18 卷，第 367—368 页。
- 列宁：《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胜利的社会意义》，《列宁全集》中文版第 18 卷，第 392—394 页。
- 列宁：《巴尔干战争和资产阶级沙文主义》，《列宁全集》中文版第 19 卷，第 19—20 页。
- 列宁：《论民族自决权》，《列宁全集》中文版第 20 卷，第 395—401 页。
- 列宁：《反战宣言》，《列宁全集》中文版第 21 卷，第 346—348 页。
-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中文版第 22 卷，第 179—297 页。
- 列宁：《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列宁全集》中文版第 22 卷，第 298—313 页。
- 列宁：《论单独讲和》，《列宁全集》中文版第 23 卷，第 124—132 页。
- 列宁：《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与社会党人的和平主义》，《列宁全集》中文版第 23 卷，第 177—196 页。
- 列宁：《对外政策的秘密》，《列宁全集》中文版第 24 卷，第 346—348 页。
- 列宁：《秘密条约之一》，《列宁全集》中文版第 24 卷，第

349—350 页。

列宁：《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莫斯科苏维埃联席会议上关于对外政策的报告（1918年5月14日）》，《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7卷，第346—350页。

列宁：《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工厂委员会和工会联席会议上的演说（1918年7月29日）》，《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8卷，第1—8页。

列宁：《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1920年12月22日—29日）》。《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报告（12月22日）》，《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1卷，第441页。

列宁：《在莫斯科工农代表苏维埃全会会议上的演说（1921年2月28日）》，《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2卷，第138—139页。

列宁：《在俄共（布）莫斯科市和莫斯科省支部书记及支部负责代表会议上关于粮食税的报告（1921年4月9日）》，《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2卷，第278页。

列宁：《答〈观察家报〉和〈曼彻斯特卫报〉记者法尔勃曼提出的问题》，《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3卷，第347—348页。

列宁：《在莫斯科苏维埃全会上的演说（1922年11月20日）》，《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3卷，第394页。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民族殖民地问题》，论文和演说选集，1936年莫斯科版，第232页。 235

斯大林：《关于高加索的局势（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通

- 报)》，《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91—92页(论土耳其在第91—92页)。
- 斯大林：《关于顿河区域和北高加索(事实和诡计)》，《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93—103页(论土耳其在第93、97、100—103页)。
- 斯大林：《无产阶级专政的三年(1920年11月6日在巴库苏维埃庆祝大会上的报告)》，《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336—346页(论土耳其在第340和345页)。
- 斯大林：《高加索的局势(和〈真理报〉记者的谈话)》，《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360—363页。
- 斯大林：《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1921年3月8日至16日)》。《关于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当前任务的报告(3月10日)》，《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25—39页(论土耳其在第30、35页)。
- 斯大林：《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民族政策》，《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91—94页(论土耳其在第93页)。
- 斯大林：《前途》，《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95—103页(论土耳其在第97页)。
- 斯大林：《党和国家建设中的民族问题(提交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讨论并经党中央批准的提纲)》，《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149—158页(论土耳其在第150页)。
- 斯大林：《有各民族共和国和各民族地区负责工作人员

参加的俄共(布)中央第四次会议(1923年6月9日至12日)》,《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237—278页(论土耳其在第244、248页)。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的讲演)》,《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87页(论土耳其在第6页)。

斯大林:《论国际形势》,《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244—260页(论土耳其在第260页)。

斯大林:《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1926年12月7—13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的报告和结论)》,参阅《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5—135页。

斯大林:《和中山大学学生的谈话(1927年5月13日)》,《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217—241页(论土耳其在第231、232、233页)。

斯大林:《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1927年7月29日至8月9日)》。《国际形势和保卫苏联(8月1日的演说)》,《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5—55页(论土耳其在第16页)。

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六次党代表大会上关于中央委员会政治工作的总结报告。报告和结束语(1930年6月27日至7月2日)》,《列宁主义问题》,俄文第10版,第345—438页(论土耳其在第361页)。

斯大林:《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

央工作的总结报告(1934年1月26日)》，《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507—576页。

斯大林：《论恩格斯的一篇论文——沙俄的对外政策》，《布尔什维克》杂志，1941年第9期，第1—5页(论土耳其在第3、4页)。

斯大林：《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二十五周年纪念(1942年11月6日国防委员长在莫斯科劳动者代表苏维埃与莫斯科城党组织及社会团体庆祝大会上的报告)》，《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54—67页。

- 236 斯大林、基洛夫、日丹诺夫关于《苏联历史》和《近代史》教科书提纲的意见(载1936年1月27日《真理报》)。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486页。

二、文件、官方文献和担任领导 职务的政治活动家的言论

甲 俄文的

- 1.《洛桑会议上的亚美尼亚问题》(会议记录摘要)，M. T. 译，1926年梯比里斯版，VII，36页。
- 2.《苏联对外政策》，第1—5卷，1944—1947年莫斯科版。

- 3.《卫国战争时期的苏联对外政策》，第1—3卷，1944—1947年莫斯科版。
- 4.《第二棕皮书》（与土耳其发生战争前俄国的外交文书），1914年彼得堡版，64页。
- 5.《与土耳其的战争》（第二白皮书）（与土耳其破裂以前的英国外交文书），1915年彼得堡版，144页，引自《有关1914年欧洲大战的文件集》，第5号。
- 6.维辛斯基：《1947年9月18日在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上的发言》，见1947年9月19日《真理报》。
- 7.《外交人民委员向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第七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年度报告（1918—1919年）》，1920年莫斯科版。
- 8.《外交人民委员向苏俄第八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年度报告（1919—1920年）》，1921年莫斯科版，75页（关于土耳其部分在第66—70页）。
- 9.《外交人民委员向苏俄第九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年度报告（1920—1921年）》，1921年莫斯科版，192页（关于土耳其部分在第42—45页、110—115页）。
- 10.《1922年外交人民委员的（年度）报告》，1923年莫斯科版，83页（关于土耳其部分在第17，26，56—58页）。
- 11.《外交人民委员向苏联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所作的1923年年度报告》，1924年莫斯科版。
- 12.《外交人民委员向苏联第三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所作

- 的1924年年度报告》，1925年莫斯科版，116页（关于土耳其部分在第103—105页）。
- 13.《土耳其、法国、英国之间的条约》，见1939年10月20日《真理报》（1939年10月19日签订的条约原文的俄文译本）。
- 14.《南高加索和格鲁吉亚对外政策的文件和材料》，1919年梯比里斯版，512页。
- 15.《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的文件和材料》，第1卷（1937年11月—1938年）（引自德国外交部档案），1948年莫斯科版，368页。
- 16.《德国外交部文件》第2分册，德国对土政策（1941—1943年），1946年苏联政治书籍出版社版，143页。
- 17.《君士坦丁堡和海峡》（根据外交部乙类秘密文件），E. A. 亚达莫夫编辑，第1—2卷，1925—1926年莫斯科版，547页。
- 18.日丹诺夫：《论国际形势（1947年9月底在波兰几国共产党情报局代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见1947年10月22日《真理报》。
19. M. M. 李维诺夫：《苏联对外政策》（1927—1937年的演说和声明集），1937年莫斯科，第2版增订本，432页。
- 237 20.《现代国际政治》（条约、照会和声明），第1编，《从法国革命到帝国主义战争》，1925年莫斯科版，441页；第2编，《从帝国主义战争到取消对苏俄的封

- 锁》，1926年莫斯科版，V，464页；第3编，《从取消对苏俄的封锁到十月革命十周年》。第1分册，《苏维埃的外交文件》，1928年莫斯科版，IV，430页。第2分册，《外国的外交文件》，1929年莫斯科版，367页。参见本丛书续编：《1928年的国际政治》（条约、声明和外交文书），1929年莫斯科版，278页；《1929年的国际政治》（条约、声明和外交文书），1931年莫斯科版，316页；《1930年的国际政治》（条约、声明和外交文书），1932年莫斯科版，414页。
21. 《帝国主义时代的国际关系》。沙俄和临时政府档案文件(1878—1917年)。第三部丛书，第1—10卷，1935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
22. 莫洛托夫：《为社会主义而斗争》（演说、论文集），1935年莫斯科增订第3版，587页。
23. 莫洛托夫：《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维·米·莫洛托夫同志与法国〈时代〉报主编沙斯顿奈先生的谈话（1936年3月19日）》，1936年莫斯科版，14页。
24. 莫洛托夫：《演说、论文集（1935—1936年）》，1937年莫斯科版，272页。
25. 莫洛托夫：《论苏联对外政策（1939年10月31日人民委员会主席兼外交人民委员维·米·莫洛托夫同志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五次非常会议上的报告）》，1939年莫斯科版，32页。
26. 莫洛托夫：《政府的对外政策（1940年3月29日人

- 民委员会主席兼外交人民委员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第六次会议上的报告)》，1940年莫斯科版，16页。
27. 莫洛托夫：《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二十八周年(1945年11月6日在莫斯科苏维埃庆祝大会上的报告)》，1945年莫斯科版，31页。
 28. 莫洛托夫：《在巴黎和会上的演说(1946年7月—10月)》，1946年莫斯科版，207页。
 29. 莫洛托夫：《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三十周年(1947年11月6日在莫斯科苏维埃庆祝大会上的报告)》，见1947年11月7日《真理报》。
 30. 《关于黑海海峡的蒙特罗会议》(苏联外交部)，1946年8月13日《消息报》。
 31. 《论黑海海峡》(苏联外交部)，1946年9月28日《消息报》。
 32. 《土耳其共和国的根本法和土耳其民法》(见《资产阶级国家的宪法》，第3卷，附有A. 梅里尼克的序言，第4—26页)。
 33. 《关于海峡问题的洛桑会议的重新审查》(文件)，《世界经济与世界政治》，1936年第5期，第161—163页；第9期，第143—152页。
 34. 《土耳其人民共和党的纲领》，引自1931年6月15日《民族主权报》(《民族殖民地问题材料》，第1集，1932年莫斯科版，第12—16页)。
 35. 《瓜分土耳其的亚洲部分》(根据外交部乙类秘密文

件), E. A. 亚达莫夫编, 1924 年莫斯科版, 383 页(世界大战时期欧洲列强与土耳其)。

36.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与外国签订的现行条约、协定、公约汇编》, 第 1 分册, 在 1924 年 1 月 1 日以前生效的条约、协定、公约汇编, 1924 年莫斯科版, 436, IV 页; 第 2 分册, 在 1924 年 1 月 1 日至 1925 年 1 月 1 日期间生效的条约、协定、公约, 1925 年莫斯科版, 132 页; 第 3 分册, 在 1925 年 1 月 1 日至 1926 年 5 月 1 日期间生效的条约、协定、公约, 1926 年莫斯科版, 279 页; 第 4 分册, 1926 年 5 月 1 日至 1928 年 2 月 1 日生效的条约、协定、公约, 1928 年莫斯科版, 252 页; 第 5 分册, 1928 年 2 月 1 日至 1929 年 6 月 1 日生效的条约、协定、公约, 1930 年莫斯科版, 215 页; 第 6 分册, 1929 年 6 月 1 日至 1931 年 1 月 1 日生效的条约、协定、公约, 1931 年莫斯科版, 202 页; 第 7 分册, 1931 年 1 月 1 日至 1933 年 1 月 1 日生效的条约、协定、公约, 1933 年莫斯科版, 228 页; 第 8 分册, 1933 年 1 月 1 日以后有效的条约、协定、公约, 1935 年莫斯科版, 356 页; 第 9 分册, 1937 年 1 月 1 日以前有效的条约、协定、公约, 1938 年莫斯科版, 507 页。 238
37. 《色佛尔和约和在洛桑签订的文件》(全文译自法文原本), 1927 年莫斯科版, LIV, 303 页; 第 5 卷引自《帝国主义战争总结。和约丛书》。

38. 苏联情报局:《揭破历史捏造者(历史事实考证)》, 1948年莫斯科版,第79页。

乙 土耳其文著作

- 39.《胜利者穆斯塔法·基马尔1927年10月15—20日
在人民共和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第1编,
1919—1920;第2编,1920—1927;第3编,文件,
1934年伊斯坦布尔版。俄译本:《穆斯塔法·基马
尔》。《新土耳其之路(1919—1927)》,第1卷,民族
解放运动的初步,1919。1929年莫斯科外交人民委
员部书籍出版社版,LXIV,480页,附有插图和四
幅地图;第2卷,安卡拉基地的准备,1919—1920。
1932年莫斯科社会经济书籍出版社版,VI,416页,
附有像片和一幅地图;第3卷,盟国的武装干涉,
希土战争和民族战线的团结,1920—1921。1934年
莫斯科社会经济书籍出版社版,XIV,460页,附有
插图和地图一幅;第4卷,新土耳其的胜利,1921—
1927。1934年莫斯科社会经济书籍出版社版,VIII,
571页,附有插图和五幅地图。
- 40.《阿塔丘尔克的演说和言论集》,第1卷(1919—1938
年在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和人民共和党的历届代表大
会上),1945年伊斯坦布尔版,398+III。
- 41.《人民共和党。十五年史话》,1930年安卡拉版,
611页。

42. 总参谋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奥斯曼行动史纲》, 1938年伊斯坦布尔版,阿拉伯字母印刷的,65页,附有六幅地图。
43. 外交部:《条约汇编》,多卷版,安卡拉。
- 44.《统计年鉴》,第1—14号。
45. 伊斯坦布尔工商联合会杂志。《土耳其共和生活十年(1923—1933)》,1933年伊斯坦布尔版,243页。
46. 柯普·卡德里·基马尔:《民族领袖的演说、言论和书信集》,1945年伊斯坦布尔版,247页。
47. 出版事业总署:《外国人论共和土耳其》,1928年安卡拉版。 239
48. 皮凯尔,列詹布:《关于革命的讲演录》,1936年安卡拉版,118页。
- 49.《历史》,第4卷,《土耳其共和国》,1933年伊斯坦布尔版,374页,附插图、地图132页。
- 50.《土耳其共和国中央银行公报》。
- 51.《土耳其实业银行的十年》,1934年国家印刷局版,96页,附有插图和表格。
- 52.《土耳其农业银行公报》。

丙 西欧文字著作

- 53.《洛桑会议》(《黄皮书》),第1—2卷,1923年巴黎法文版(法国外交部,外交文件)。
- 54.蒙特罗会议,1936年。关于海峡制度的会议的文

- 件, 1936年6月22日—7月20日, 技术委员会全体会议的报告和记录……(1936年, 列日法文版), 310页。
55. 《土耳其共和国政府与奥斯曼公债持有者的协定》, 1929年君士坦丁堡利佐出版社法文版, 104页。
56. 内务部新闻处: 《土耳其独立战争》, 国家印刷局法文版, 128页, 附有地图与插图。
57. 内务部新闻处: 《现代土耳其》, 1935年安卡拉法文版, 304页, 附有插图及地图。
58. 内务部新闻处: 《从统计数字看土耳其》, 1937年安卡拉法文版, 108页。
59. 《土耳其共和国十年》(人民共和党在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纪念日出版的简要指南), 1923—1933年安卡拉法文版, 172页。
60. 国际参考资料: 《凡尔赛条约》, 第1—12卷, 巴黎法文版, 1920—1939年。
61. 《土耳其在国际法庭上》, 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出版, 法文, 1919年。
62. 《土耳其的法制》, 利佐出版社, 第1—17卷, 伊斯坦布尔法文版, 1923—1939年。
63. 《劳动法令 3008号》(通过日期: 1936年6月8日), 《勒斯米日报》出版, 30330号, 1936年6月15日, 49页。
64. 《美国对欧关系文件。1919年。巴黎和会》, 美国政

- 府出版署，1942—1945年华盛顿英文版，第1、2、3、4、11卷。
- 65.《人民共和党党章（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1935年安卡拉法文版，40页。
- 66.《人民共和党。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十五周年纪念日》，1938年安卡拉法文版，83页，附有插图。
67. 常驻国联的代表团。亚历山大勒塔和安塔基亚问题。土耳其常驻国联的代表团的来信及六个附件，1936年日内瓦英文版，19页。
- 68.《在国联议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上的摩苏尔问题》（日内瓦），1935年洛桑法文版，124页。 240
- 69.《1921年希腊在小亚细亚的远征》（世界报纸记者的电讯），1921年雅典英文版，52页（希腊外交部）。
- 70.《1919—1923年诸和约》，两卷集（1098页），1924年纽约英文版，附有劳伦斯·马丁中校所编的地图（第2卷直接与土耳其有关，有色佛尔条约、洛桑条约、海峡制度公约以及在洛桑签订的其他文件）。
- 71.《洛桑条约，近东事务会议（1922—1923）》（1923年7月24日的信件和协定），1923年巴黎法文补编版。

三、其他参考书

甲 俄文著作

72. B. 阿鲍尔金：《洛桑以后的土耳其的民族成分》，

- 《新东方》杂志，莫斯科版，1925年第7期，第115—129页。
73. A. 阿里莫夫：《土耳其》(第3—92页)，《帝国主义时代东方史大纲》一书中的一章，1934年莫斯科版，432页。
74. C. 别林可夫：《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土耳其》，《新时代》，1945年第11(21)期，第6—10页。
75. 《东方书报评述》，第1分册，历史(1917—1925年)，总编辑为Д.Н. 叶戈罗夫教授，1928年莫斯科版，300页(关于土耳其历史部分在第96—105页)。
76. И. 华西列也夫：《安卡拉与阿曼》，见1947年1月24日《消息报》。
77. И. 华西列也夫：《叙利亚、土耳其与亚历山大亚勒塔州》，见1946年3月22日《消息报》。
78. И. 华西列也夫：《土耳其的喧嚣》，见1946年4月17日《消息报》。
79. И. 甘宁：《土耳其的工业发展及其五年计划》，《世界经济与世界政治》杂志，1934年第10期，第117—133页。
80. A. 格尔斯：《奥匈帝国、巴尔干与土耳其。战争与和平的任务》，1917年彼得堡版，75页。
81. И.И. 高洛波罗吉柯：《土耳其》，莫斯科第2版，306页，附有大纲和图画。
82. B. 格拉巴里：《洛桑会议上的海峡问题》，《对外贸

- 易》杂志，莫斯科版，1923年第2期。
83. B. A. 古尔柯-克仰仁：《近东与列强》，1925年莫斯科版，243页附有地图。
84. B. A. 古尔柯-克仰仁：《土耳其民族解放运动的产生》(1919—1928年史料概述)，《新东方》杂志，1928年第23—24期，第268—275页。
85. B. A. 古尔柯-克仰仁：《土耳其革命史》，1923年莫斯科版，196页，附有插图和地图。
86. Д. Г.：《土耳其的外国资本》，《新东方》杂志，莫斯科版，1929年第26—27期，第326—339页。
87. Б. 丹泽格：《土耳其的土地改革》，《世界经济与世界政治》杂志，1945年第12期，第60—68页。
88. Б. 丹泽格：《土耳其的国内政治状况》，《世界经济与世界政治》杂志，1946年第4—5期，第60—70页。
89. Б. 丹泽格：《土耳其》(政治经济史纲)，1940年莫斯科版，159页，附插图和两张地图。
90. Б. М. 丹泽格：《现代土耳其的财政税收法与预算》，241
《新东方》杂志，莫斯科版，1926年第15期，第142—152页。
91. Б. 丹泽格：《土耳其的财政》，《新东方》杂志，莫斯科版，1928年第23—24期，第139—154页。
92. С. 扎拿辛、H. 比尔采尼许维里合著：《致〈共产党人〉报编辑部的信》(论我们对土耳其的合法要求)

- (1946年12月20日《消息报》转载)。
93. 詹玛尔巴夏、阿赫美德：《1913—1919年的礼记》，1923年梯比里斯版，239页。
 94. 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科学院通讯院士 A.K. 基费里柯夫教授：《亚美尼亚与土耳其》（1946年2月20日在莫斯科演讲大厅所作的公开演说的速记录），1946年莫斯科版，16页。
 95. А. Я. 维辛斯基、С. А. 洛佐夫斯基主编《外交大辞典》，第1卷(A—K) 1948年莫斯科版，XXXII, 856页。
 96. П. М. 茹科夫斯基：《农业的土耳其》（亚洲部分——安纳托利亚），1933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XXVII 971页，附插图和地图。
 97. Д. С. 扎夫利也夫：《安纳托利亚东部》（经济概论），1936年梯比里斯版，315页。
 98. 史学博士 Д. С. 扎夫利也夫：《关于土耳其东北各省的现代史》，梯比里斯1947年版，367页。
 99. 《现代土耳其的经济》，梯比里斯1934年版，194页。
 100. Л. И. 祖波克教授、С. В. 查哈罗夫、А. Ф. 米列尔教授合著：《世界现代史(1918—1923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高级党校讲课速记录），1946年莫斯科版，372页（有关土耳其部分在第229—259页）。
 101. Л. И. 祖波克教授、С. В. 查哈罗夫、А. Ф. 米列尔教授合著：《世界现代史(1924—1929年)》（联共(布)

中央委员会高级党校讲课速记录), 1946年莫斯科版, 503页(有关土耳其部分在第284—321页)。

102. Д. 伊凡诺夫:《土耳其与海峡制度》,《世界经济与世界政治》杂志,1936年第6期,第79—87页。
103. 鲍爵姆金院士主编:《世界外交史》第2卷,423页,第3卷,883页,1945年莫斯科版。
104. 约尔卓:《在字母问题上的斗争》(君士坦丁堡来信),《新东方》杂志,莫斯科版,1926年第15期,第293—301页。
105. 约尔卓:《从革命到反革命》,《新东方》杂志,莫斯科版,1927年第16—17期,第117—133页。
106. 《论黑海海峡问题》,《消息报》上的论文(1946年8月18日)。
107. А. 柯林可夫斯基旅长:《达达尼尔海峡战役》,1938年莫斯科版,136页,第2版,附图表。
108. Б. 高留巴金:《世界大战中的小亚细亚战场》(1914—1916年),1917年彼得堡版,81页。
109. Л. С. 高连德柯:《安纳托利亚的经济生活》,《新东方》杂志,莫斯科版,1923年第4期,第230—249页。
110. 柯罗里科娃:《土耳其的拉丁字母》,《新东方》杂志,莫斯科版,1926年第13—14期,第457—458页。
111. Н. Г. 柯尔松师长、教授:《世界大战中高加索战线上1915年的阿拉什开尔和哈马丹战役》,1940年莫

斯科版，200页，另有七幅地图。

112. H. Г. 柯尔松师长、教授：《1914—1918年世界大战中的巴尔干战线》，1939年莫斯科版，124页，附图表。

113. H. Г. 柯尔松教授：《1919—1922年的希土战争》（战役战略纪要），1940年莫斯科版，55页，附地图。

212 114. H. Г. 柯尔松教授、军事学博士、中將：《巴尔干战线上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役战略纪要），1946年莫斯科版，99页，另有21页图表。

115. H. Г. 柯尔松：《世界大战中高加索战线上1914—1915年的萨雷卡麦什战役》，1937年莫斯科版，161（3）页，附图表和地图5页。

116. H. Г. 柯尔松：《土耳其》（在工农红军军事学院所讲的军事地理课的讲义），1923年莫斯科版，66页，附图表5页。

117. H. Г. 柯尔松：《世界大战中高加索战线上1915—1916年的埃尔祖鲁姆战役》，1938年莫斯科版，180页，附插图和图表。

118. B. 克雷姆斯基：《泛突厥主义者是土耳其的法西斯代理人》，《布尔什维克》杂志，1944年，第10—11期，第79—85页。

119. B. 克雷姆斯基：《带着记者面具的奸细》，1945年8月16日《真理报》。

120. B. 克雷姆斯基：《为美帝国主义者服务的土耳其》，见 1948 年 2 月 25 日《真理报》。
121. B. 克仰仁：《近东问题。黑海与苏联》，《新东方》杂志，莫斯科版，1924 年第 5 期，第 44—50 页。
122. B. 克仰仁(古尔柯)：《争夺海峡的斗争》，《新东方》杂志，莫斯科版，1922 年第 2 期，第 83—125 页，附地图、图表各一幅。
123. B. 克仰仁(古尔柯)：《土耳其的政治集团》，《新东方》杂志，莫斯科版，1923 年第 3 期，第 35—66 页。
124. B. 克仰仁(古尔柯)：《世界大战时期瓜分土耳其》，《新东方》杂志。莫斯科版，1923 年第 4 期，第 49—57 页。
125. Д. 库兹明：《土耳其的工人运动》，《新东方》杂志，莫斯科版，1922 年第 2 期，第 154—159 页。
126. И. М. 列明：《英国从凡尔赛到罗加诺时期的对外政策》(1919—1925 年)，1947 年莫斯科版，488 页(其中第 4 章是《色佛尔和约》，第 8 章是《希土战争与英国在近东的政策》)。
127. 李劳·华特尔：《新土耳其、它的经济状况和未来的远景》，译自德文，有附录和地图，1924 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78 页。
128. E. 鲁德树威特：《土耳其海峡的现状》，《新东方》杂志，莫斯科版，1928 年第 23—24 期，第 292—303

- 页。
129. A. H. 曼杰里斯坦：《青年土耳其党人国家历史政治概要》，1915年莫斯科版，68页。
130. C. H. 马特维也夫：《土耳其（亚洲部分——安纳托利亚）》（自然地理概述），1946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215页，附地图。
131. A. 梅里尼克：《希土的分歧》，《国际生活》杂志，1929年第8期，第55—67页。
132. A. 梅里尼克：《土耳其的一个新党》，《国际生活》杂志，1930年第9—10期，第3—19页。
133. A. 梅里尼克：《共和土耳其的五年》，《国际生活》杂志，1928年第11期，第3—11页。
134. A. 梅里尼克：《共和土耳其》，1927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56页，附图画、插图和地图。
135. A. 梅里尼克：《土耳其》，1929年莫斯科版，175页，附照片。
136. A. 梅里尼克：《土耳其》，1937年莫斯科社会经济书籍出版社版，218页，附图画和五张地图（《资本主义世界概况》丛书之一）。
137. A. 梅里尼克：《土耳其的经济危机》，《国际生活》杂志，1930年第1期，第37—56页。
138. A. Ф. 米列尔：《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近东（1918—1923年）》，色佛尔与洛桑，1945年莫斯科联共（布）中央高级党校出版，52页。

139. A. Ф. 米列尔:《土耳其之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苏联科学院通报》(历史与哲学),第3卷,1946年第4期,第321—340页。
140. A. Ф. 米列尔:《苏土关系史》,《历史杂志》,1941年第10—11期,第100—109页。 243
141. A. Ф. 米列尔:《1918—1923年时期的土耳其》,1944年莫斯科联共(布)中央高级党校出版,第32页。
142. A. Ф. 米列尔:《1924—1944年时期的土耳其》,1945年莫斯科联共(布)中央高级党校出版,40页。
143. A. Ф. 米列尔:《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土耳其与德国》,1944年莫斯科苏联人民委员会高等学校事务委员会讲座局出版,24页。
144. A. Ф. 米列尔:《土耳其与海峡问题》,1947年莫斯科苏联高等教育部全国讲座局出版,24页。
145. A. Ф. 米列尔:《第一次世界大战年代中受德帝国主义压迫的土耳其(1914—1918年)》,《历史杂志》,1942年第12期,第12—23页。
146. A. Ф. 米列尔:《奥斯曼帝国(苏丹土耳其)》,1946年莫斯科联共(布)高级党校出版,54页。
147. C. 密尔纳:《论世界大战对土耳其的代价问题》,《新东方》杂志,莫斯科版,1923年第3期,第470—474页。
148. C. 密尔纳:《君士坦丁堡的学校问题》(君士坦丁堡来信),《新东方》杂志,莫斯科版,1924年第5期,

- 第 378—387 页。
149. А. А. 摩格列维奇、М. Э. 爱拉别加合著：《走上 1914—1918 年世界大战的道路》，1940 年列宁格勒版，293 页。
150. 穆拉托夫·努鲁拉：《在“援助”幌子下的帝国主义扩张》，1948 年 3 月 20 日《劳动报》。
151. 穆萨里：《士麦拿经济会议》，《新东方》杂志，莫斯科版，1923 年第 3 期，第 78—89 页，附照片。
152. 聂哲贝·哈努姆：《现代土耳其的劳工立法》，《新东方》杂志，莫斯科版，1927 年第 19 期，第 80—98 页。
153. Л. 尼库林：《伊斯坦布尔、安卡拉、伊兹密尔》，1935 年莫斯科版，184 页。
154. А. Д. 诺维切夫：《世界大战前土耳其经济概论》，1937 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312 页，附插图。
155. А. Д. 诺维切夫：《世界大战时期的土耳其经济》，1935 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143 页。
156. Ф. И. 诺托维奇：《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外交斗争》，第 1 卷（协约国之丧失巴尔干半岛），1947 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747 页。
157. М. 巴甫洛维奇：《争夺亚洲和非洲的斗争》，1923 年莫斯科版，229 页，附地图。
158. М. 巴甫洛维奇：《洛桑会议》，《新东方》杂志，莫斯科版，1923 年第 3 期，第 3—34 页。
159. М. 巴甫洛维奇：《论土耳其的共产主义运动》，《共

- 产国际》杂志，1921年，第4225—4231页。
160. М. П. 巴甫洛维奇(М. 维利特曼)：《革命的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兴衰(旧土耳其)。恩维尔贝伊与阿赫美德·里萨的土耳其。基马尔的土耳其。土耳其的共产主义运动》，1921年莫斯科版，127页，附五张地图。
161. М. 巴甫洛维奇、B. 古尔柯-克仰仁等著：《争取独立的土耳其》，1925年莫斯科版，152页。
162. Н. 彼得罗夫：《与德国关系破裂后的土耳其》，《布尔什维克》杂志，1944年第16期，第53—60页。
163. А. 波波夫：《1908—1909年的土耳其革命》，《红色档案》杂志社论与大量文件，1931年第43卷，第3—54页；第44卷，第3—39页；第45卷，第27—52页。
164. С. И.：《土耳其的字母改革》，《新东方》杂志，莫斯科版，1929年第25期，第249—257页，附地图一幅。
165. Н. 索科里斯基：《现代土耳其概略》，1923年梯比里斯版，IV，207页，附地图一幅。
166. А. Ф. 斯彼兰斯基：《世界大战后国际会议上的土耳其问题》，《新东方》杂志，莫斯科版，1922年第2期，第126—146页。
167. А. 斯塔夫罗夫斯基：《十月革命后的外高加索》(1918年上半年与土耳其的相互关系)，1925年莫

- 斯科-列宁格勒版，120页。
- 168.《近东和中东的国家》，由П. И. 列别节夫-巴良斯基、Ф. Н. 彼得罗夫、Ф. А. 罗特施坦、О. Ю. 什密特等编，1944年莫斯科版，366页（东方各国参考丛书之一，土耳其部分在1—99页）。
169. М. 苏布希：《土耳其的新内阁》，《民族生活》杂志，1919年第41(49)期，第1—2页。
170. М. 苏布希：《土耳其联邦制还是瓜分政策》，《民族生活》杂志，1919年第13(21)期，第1页。
171. E. B. 达尔列：《英国与土耳其》（冲突的历史根源与发展），载《编年纪事》，《世界通史》杂志，俄国科学院出版，1923年第3期，第21—71页。
172. E. B. 达尔列：《帝国主义时代的欧洲（1871—1919年）》，第二次修订版，1928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511页。
173. А. 特威里金诺娃：《列宁格勒各图书馆收藏的土耳其文的历史图书目录》，《东方书报评述》，第10分册，1936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第201—226页（附索引目录）。
174. E. A. 塔卡尔热夫斯基：《巴库的布尔什维克——1918年反对土德武装干涉阿塞拜疆的组织者》，马恩列学院阿塞拜疆分校著，第6卷，1947年巴库版。
- 175.《土耳其。经济情报参考手册》，第3分册，1934年

- 梯比里斯版，106页，附地图一幅。
176. 蒂尔科娃·阿里亚特娜：《旧土耳其与青年土耳其党人》（君士坦丁堡的一年），1916年，彼得堡版，VIII，180页。
177. 《法国在土耳其的利益》，《新东方》杂志，莫斯科版，1923年第3期，第475—478页（译自1922年10月15日《光明报》上的论文）。
178. 《M. B. 伏龙芝文集》，第1卷。
179. A. 什努罗夫：《土耳其的无产阶级》，1929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88页，附插图。
180. K. 尤斯特：《安纳托利亚的报刊》，1922年梯比里斯版，2 + 213页，附插图。
181. K. 尤斯特：《土耳其的妇女运动（安哥拉来信）》，《红色处女地》杂志，莫斯科—列宁格勒版，1926年第8期，第194—196页。
182. 尤斯特·康斯坦丁：《基马尔主义（土耳其来信）》，《红色处女地》杂志，莫斯科—列宁格勒版，1926年第9期，第165—177页。
183. 尤斯特·康斯坦丁：《土耳其来信》，《红色处女地》杂志，莫斯科—列宁格勒版，1926年第5期，第174—186页。

乙 土耳其文著作

184. 阿加尔，奥麦尔·基马尔：《革命史》，1937年伊斯

坦布尔版。

185. 阿拉耶琴, 伊卜拉欣:《土耳其名人录》, 第1—4卷, 1933—1936年伊斯坦布尔版。
186. 阿里·萨伊布:《基里基亚惨剧和争取解放土耳其的斗争》, 阿拉伯字母印刷的, 伊斯兰教纪元1340年安卡拉版, 272页。
- 187.《阿塔丘尔克(1880—1938)》, 1939年安卡拉版, 64页。
188. 阿伊库特, 谢列夫:《基马尔主义》, 1936年伊斯坦布尔版, 83页。
189. 巴尤尔, 尤苏夫·希克梅特:《土耳其国家的对外政策》, 1938年伊斯坦布尔版。
- 245 190. 巴尤尔, 尤苏夫·希克梅特:《土耳其革命史》, 第2卷, 第2册, 1943年安卡拉版, XII, 504页, 附有地图。
191. 卡希特, 布尔汉:《胜利者穆斯塔法·基马尔》, 1930年伊斯坦布尔版, 77页。
192. 卡希特, 布尔汉:《木达尼亚、洛桑、安卡拉》, 1930年伊斯坦布尔版, 77页。
193. 杜兰, 法伊克·萨布里:《大地图》, 1937年伊斯坦布尔版, 71页地图和16页索引。
194. 杜兰, 法伊克·萨布里:《土耳其地理》, 1929年伊斯坦布尔版, 480页, 附有插图和地图。
195. 恩金·萨费特:《基马尔革命的原则》, 1938年伊斯

坦布尔版。

196. 哈密德·萨地：《经济地理》，1928年伊斯坦布尔版，阿拉伯字母印刷的，327页。
197. 哈密德·萨地：《土耳其经济》，1932年伊斯坦布尔版，III，198页。
198. 伊斯迈尔·胡斯列夫：《土耳其的农业》，1934年安卡拉版。
199. 伊斯迈尔·胡斯列夫：《土耳其的农业合作运动》，1932年伊斯坦布尔版，70页。
200. Y. 费里克·伊塞金中将：《独立战争回忆录》（伊涅纽战役中的六十一师），1932年安卡拉版，62页。
201. 卡尼，伊尔泰姆·苏里曼：《海峡问题》，1936年伊斯坦布尔版。
202. 卡拉贝基尔，卡兹姆：《我们为什么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如何进行战争的？》，1937年伊斯坦布尔版。
203. 纳舍特·哈里尔：《大国民议会与革命》，1933年安卡拉版，193页，附有插图。
204. 《从奥斯曼帝国到土耳其共和国。过去是怎么样的？以后变得怎么样？》，1933年伊斯坦布尔版，48页。
205. 罗辛·艾施列夫：《在安那法尔塔与军队指挥官穆斯塔法·基马尔的谈话》，1930年伊斯坦布尔版。
206. 塞尔特尔·伊斯堪德尔：《全世界哀悼阿塔丘尔克之死》，1939年伊斯坦布尔版。

207. 徐列亚·谢夫凯特：《革命与干部(革命的思想体系)》，1932年安卡拉版，173页。
208. 徐列亚·谢夫凯特：《世界经济中的土耳其》，1931年安卡拉版，169页。
209. 沙克尔·西雅：《基·阿塔丘尔克的一生，私人的、军事的和政治的生活》，1938年伊斯坦布尔版。
210. 塔赫辛·苏德：《土耳其共和国及其创始人胜利者穆斯塔法·基马尔》，1933年伊斯坦布尔版，XVI，424页，附像片两幅。
211. 《关于土耳其的书刊目录》，1940年伊斯坦布尔版，99页。
212. 乌鲁格·伊格底密尔：《阿塔丘尔克》，1939年安卡拉版。
213. 乌纳伊丁，罗辛·艾施列夫：《成立土耳其语言学会的回忆录，到第一次大会以前》，1943年安卡拉版，80页，附有插图。

丙 西欧文字著作

214. 阿伯鲁斯，弗列德里克：《土耳其对外关系的发展》，1928年巴黎法文版，297页。
215. 阿伦，亨利·伊里霞：《土耳其的变化。社会宗教发展研究》，1935年芝加哥英文版，IX，251页。
216. 阿尔伯，泰金(假名艾伯特·柯恩)：《基马尔主义》，1937年巴黎法文版(土耳其文版：1936年伊斯坦布

- 尔版, 347 + 10 页)。
217. J. 安塞尔:《东方问题史读本(1792—1925)》, 1926 年巴黎法文版, 346 页。
218. 阿姆斯特朗, 哈诺德·C.:《在分娩中的土耳其。一个新国家的诞生》, 1925 年伦敦英文版, 280 页。
219. 阿姆斯特朗, 哈诺德·柯尔泰尼:《灰狼。穆斯塔法·基马尔。对一个独裁者个人的研究》, 1939 年伦敦英文第九版, 352 页。(法文译本: 阿姆斯特朗·哈·柯:《统帅。穆斯塔法·基马尔》, 1933 年巴黎版。)
220. 巴希, 乌果:《意大利与新土耳其》, 1932 年摩登那版, 55 页。
221. 拜洛, C. G.:《土耳其回忆录》,《英国、法国与君士坦丁堡问题》, 1920 年巴黎法文版, 4 + IV + 122 页。
222. 比萧夫, 诺伯特:《土耳其在世界上。奥斯曼帝国。土耳其共和国》, 白脑维尔译, J. 德尼绪言, 1936 年巴黎法文版, 247 页, 附有地图。
223. 比萧夫, 诺伯特·冯:《安卡拉。对土耳其新情况的认识》, 1935 年维也纳德文版, 226 页, 附有插图。
224. 布尔袞, M.:《阿塔丘尔克的土耳其》, 1936 年巴黎法文版。
225. 布肯南爵士, 乔治:《我赴俄国的使命》(两卷), 1923 年波士顿英文版(俄文译本: 布肯南:《一个外交家的回忆录》, С.А. 阿列克塞也夫和А.И. 鲁宾译自

- 英文，B. 古尔柯·克仰仁序，莫斯科第2版，311页。乔治·布肯南爵士：《我赴俄国的使命（一个外交家的回忆录）》，第1卷，183页；第2卷189页，1924年柏林俄文版）。
226. 《土耳其共和国地图》（1:800 000 八页带色图，伊斯坦布尔-安卡拉-西发斯-埃尔祖鲁姆-摩苏尔-马拉底亚-科尼亚-伊兹密尔），1932—1934年安卡拉版。
227. 康克尔，奥兰：《土耳其的铁路与土耳其的铁路政策》，1935年巴黎法文版。
228. 康克尔，奥兰和维特墨尔·爱米尔：《新土耳其的经济复兴和工业化》，1937年巴黎法文版。
229. 康明，亨利·哈福德：《战后英法在近东的竞争》（法国势力的衰落），1938年伦敦英文版，229页，附地图一幅。
230. J. 德尼和R. 马尔尚：《新土耳其手册》，1933年巴黎法文版。
231. 宗克尔，M.C.：《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海峡，洛桑（1923）和蒙特罗（1936）的海峡公约，论文……》，1938年洛桑法文版，164页。
232. E. 杜尔木希斯：《士麦拿事件的真相》，1928年巴黎法文版，160页。
233. 利阿，爱德华及莱利蒂，米舍尔：《1821年到今天的希腊外交史》，第5卷，《希腊和第一次世界大

- 战》；《从土耳其革命到洛桑条约（1908—1923）》，1926年巴黎法文版。
234. 艾明，阿赫美德：《世界大战中的土耳其》，1930年纽哈芬英文版。
235. 艾物斯莱，乔治·约翰·萧-列夫尔勋爵和齐罗尔·瓦伦丁爵士：《土耳其帝国史》，从1288到1914年是艾物斯莱勋爵著的，从1914到1924年是齐罗尔·瓦伦丁爵士著的，1924年伦敦英文版，478页，附地图三幅。
236. 法莱尔，克洛德：《安哥拉的四位太太》，小说，1933年巴黎法文版，283页。 247
237. 符亚德，阿里（勒尼·比龙绪言）：《海峡问题、海峡问题的来源、发展和在洛桑会议上的处理》，1928年巴黎法文版，191页。
238. P. 让蒂宗：《君士坦丁堡-安卡拉》，《法兰西》杂志，1924年第3号，巴黎。
239. 让蒂宗，保罗：《穆斯塔法·基马尔或前进中的近东》，1929年巴黎版，VIII，350页。
240. 乔治·葛利，贝尔特：《土耳其的国家主义》，1922年巴黎法文版，145页。
241. 乔治·葛利，贝尔特：《在安卡拉的十天》，《巴黎》杂志，1921年第15号。
242. 乔治·葛利，贝尔特：《安卡拉、君士坦丁堡、伦敦。穆斯塔法·基马尔与英国在东方的政策》，巴黎

- 法文版，259页。
243. 乔治·葛利，贝尔特：《土耳其问题》（1919—1931年的土耳其一段历史和欧洲人的错误），1931年巴黎法文版，373页。
244. 乔治·葛利，贝尔特：《新土耳其》，1924年巴黎法文版，283页。
245. F. 日朗多：《新土耳其外交政策、内部的发展》，1927年巴黎法文版，33页。
246. 日尼尼，A.：《东方和平的外交文件》（伦敦条约和木达尼亚停战协定全文汇编），罗马意大利文版（1922），269页（见《政治》杂志，第5期）。
247. 刚托·比龙、列维朗：《从安哥拉到洛桑。失势的过程》，E. 苏烈绪言，1924年巴黎法文版，IX，230页，附有地图三幅。
248. 格鲁赛，雷内：《亚洲的醒觉》（英国的帝国主义政策与人民的反抗），1924年巴黎法文版，III，251页。
249. 哈里德·艾迪布：《哈里德·艾迪布的回忆录》，1926年伦敦英文版，472页，附有插图。
250. 哈里德·艾迪布：《土耳其的痛苦经验》（哈里德·艾迪布续写的回忆录），1928年伦敦英文版，10+407页，附有插图和地图。
251. 哈里德·艾迪布：《土耳其面向西方》（土耳其近年的变化及其过去的一瞥……），E. M. 艾尔勒绪言，

- 1930年伦敦英文版, XIV, 273页, 附有插图。
252. P. 冯·兴登堡:《我的一生》, 1927年莱比锡德文版, XII, 409页, 附有地图(俄文译本:兴登堡:《回忆录》。节译本。1922年彼得格勒版, 120页)。
253. 霍华德·哈利·N.:《瓜分土耳其》(1913—1923年的外交史), 1931年俄克拉荷马英文版, 486页。
254. 胡德逊, G.F.:《土耳其、希腊与地中海东部》, 1940年牛津英文版, 32页。
255. 伊涅纽, 伊斯美特:《基马尔·阿塔丘尔克是土耳其共和国的伟人》,《金融时报》,土耳其共和国增刊, 1937年2月149号。
256. 伊塞特巴夏:《回忆录》, 1927年莱比锡德文版, 309页, 附有插图。
257. 贾尔曼, T.L.:《土耳其》, 1935年英文版, 132页。
258. 伊克斯, 戈达尔德和普利特希·爱利克:《世界大战后的土耳其》(1918—1928年的历史日记), 1929年柏林德文版, 154页。
259. 伊克斯, 戈达尔德:《数世纪以来的土耳其(1929, 1930, 1931—1932, 1933—1934)》, 历史日记, 附人名和目录, 莱比锡德文版。
260. 伊克斯, 戈达尔德:《数世纪以来的土耳其(1934—1935)》, 莱比锡德文版。
261. 伊克斯, 戈达尔德:《数世纪以来的土耳其(1935—1941)》, 历史日记, 附人名和目录, 1943年莱比锡

- 德文版，X，194页。
262. S. 卡巴拉：《洛桑条约前后的海峡制度》，1929年里昂法文版，172页。
263. 凯赛尔，杰克：《欧洲与新土耳其》，1922年巴黎法文版（俄文译本：凯赛尔，杰克：《欧洲与新土耳其》，1925年莫斯科版，79页）。
264. 克林哈特，卡尔：《安卡拉。君士坦丁堡。武装斗争》，1925年美茵河上法兰克福德文版，265页。
265. 柯瓦爾斯基，塔杜施：《战后的土耳其》，1925年华沙波兰文版，192页。
266. 克拉尔，奥古斯都·冯：《基马尔·阿塔丘尔克的国家》（现代土耳其的进展……），1935年莱比锡德文版，XI，181页，又111页（英文译本：《基马尔·阿塔丘尔克的国家》（现代土耳其的进展……），译者肯奈斯·本顿，1938年维也纳版，XII，284页）。
267. 克鲁格，K.：《基马尔博士的土耳其与中东》，1932年伦敦英文版，223页。
268. 拉穆斯，莱翁上校：《土耳其古今史》，1934年巴黎法文版，427页，附有插图（土耳其文译本：两卷，附有译者Г. К. 萧伊列米斯-奥格卢的注释，1932年伊斯坦布尔版）。
269. M. 拉舍尔少校：《世界大战中的土耳其战争》，佛兰舍·爱斯佩雷绪言，1926年巴黎法文版，IV，681页，附有地图。

270. 劳伦斯·T.E.:《七个智慧的支柱》，1935年伦敦英文第4版，672页，附有插图。
271. 莱翁和弗利德利克:《安卡拉》，1923年法文版。
272. 莱普修斯，约哈纳斯:《生活在土耳其的亚美尼亚人》，1916年波茨坦德文版。
273. 莱普修斯博士:《关于亚美尼亚大屠杀的秘密报告》，1919年法文版。
274. 李曼·冯·散德斯:《骑兵部队司令》(五年间的土耳其)，1919年柏林德文版，408页，附有很多见闻录和地图(土耳其文译本，1937年伊斯坦布尔版，331页，阿拉伯字母印刷的)。
275. 林凯，里勒:《阿拉逊位了》(现代土耳其旅行记)，1937年伦敦英文版，337页。
276. H.I. 劳埃德少校:《摩苏尔境界的地理》，一篇附有地图的论文，原载伦敦《地理杂志》，1926年8月号，第104—117页。
277. 劳合·乔治·达维:《和约真相》，两卷，1938年伦敦英文版。
278. 劳合·乔治·达维:《战争回忆录》，6卷，1934—1938年波士顿英文版(俄文译本:И. 斯瓦维奇译自英文，Ф.А. 罗特施坦作序，1934—1938年莫斯科版，特别是4—6卷)。
279. 洛莱，海尔曼:《1914—1918年的海上战争。土耳其领海上的战争。地中海师团》，1928年柏林德

- 文版(俄文译本:洛莱·Г.:《1914—1918年德土海军的战事》,Е.施维德译,И.鲁德里作序,Н.诺维柯夫注释,附有地图和图表,1934年莫斯科版,320页)。
280. 鲁克,哈利爵士:《现代土耳其的成就》(从拜占廷到安卡拉),1936年伦敦英文版,246页。
281. 曼德尔斯坦,安德列:《奥斯曼帝国的命运》,1917年巴黎法文版,XII,631页。
282. A.N. 曼德尔斯坦:《国联和列强面前的亚美尼亚问题》,1926年巴黎法文版,VIII,355页。
283. 马尔尚,雷内:《一个民族的觉醒》(在穆斯塔法·基马尔的土耳其),1927年巴黎法文版,229+3页;附有插图和地图。
- 249 284. 密尔斯,伊里奥特·格里纳尔:《现代土耳其》(1908—1923年政治经济评述),1924年纽约英文版,XIV,779页,附有插图和六幅地图。
285. 麦利亚,让:《穆斯塔法·基马尔或土耳其的复兴》,1929年巴黎法文版,240页。
286. 麦尔齐希,海尔勃:《基马尔·阿塔丘尔克》(土耳其的兴衰),1937年法兰克福德文版,293页。
287. 米库希,达哥伯特·冯:《胜利者穆斯塔法·基马尔。欧亚之间。传记》,1929年菜比锡德文版,VI,335页,附有插图和地图。
288. 米列尔,威廉:《奥斯曼帝国及其继承者(1801—

- 1927)》，1927—1936年各版都有一个附录，1936年剑桥英文第4版，XV，644页，附有插图。
289. (亨利·摩根索)《波斯普鲁斯的秘密》，亨利·摩根索大使著，1913—1936年君士坦丁堡版，附有插图；1918年伦敦英文版，XI，275页（法文译本：亨利·摩根索：《摩根索大使回忆录（二十六个月在土耳其）》，1919年巴黎版，348页）。
290. 穆克塔尔巴夏：《土耳其、德国与欧洲》，1924年巴黎法文版。
291. 米尔曼，卡尔：《德国与土耳其(1913—1914)》，1929年柏林德文版，104页。
292. 尼柯拉·德·格雷格：《中东的远征》，《巴黎》杂志，1927年第15号。
293. 尼尔生，弗莱德·K.：《根据1923年12月24日的协定美土要求的解决；以及美土补充协定》（意见和报告），F.K. 尼尔生起草，按1935年3月22日法令，第49款，67，1937年华盛顿版，IV，817页。
294. 巴列奥洛格·M.：《世界大战中的沙皇俄国》，三卷集，1926年巴黎法文版（俄文译本：巴列奥洛格·M.：《战时的沙俄》，译自法文，M.П. 巴甫洛维奇作序，1923年莫斯科版，314页；巴列奥洛格·M.：《革命前夕的沙俄》，Д. 普罗托波波夫和Ф. 盖译自法文，1923年莫斯科版，471页）。
295. 《巴波拉斯将军关于萨卡里亚河战役的报告》，《现代

- 历史》杂志，1921年第10、11号，纽约版。
296. 波希，埃德加：《同盟国与土耳其》，1925年巴黎法文版。
297. 帕诺，摩里斯：《新土耳其》，《东西评论》，巴黎，1924年1月15日、2月1日、3月1日等号。
298. 帕诺，摩里斯：《土耳其问题》，1923年巴黎法文版，X，322页。
299. S. 彼特罗维奇：《巴尔干联盟与巴尔干会议》，1934年巴黎法文版，319页。
300. R. 普恩加费：《为法兰西服务》（回忆录），十卷集，1926—1933年巴黎法文版（俄文译本，4—10卷；普恩加费：《为法兰西服务》（1914—1918年的回忆录），1936年莫斯科版）。
301. J. 波米安柯夫斯基：《奥斯曼帝国的衰落》，1928年柏林德文版。
302. 普里斯，克莱尔：《土耳其的再生》，1923年纽约英文版，XII，234页，附有插图。
303. 拉吉布，于赛尼：《土耳其民族运动与穆斯塔法·基马尔巴夏》，1922年巴黎法文版。
304. 拉利斯，A.A.：《希腊在安纳托利亚的冒险和后果（1915—1920）》，1937年伦敦英文版。
305. 沙菲尔，卡尔·安东：《青年土耳其党人经济政策的目标与路线》，1913年卡尔斯鲁厄德文版，VIII，182页。

306. 施利克兰·让：《安卡拉……新土耳其的黎明（1919—1922）》，1922年巴黎法文版，XIV，349页。
307. 谢里尔，查里士·H.：《到穆斯塔法·基马尔那儿出使一年》，1934年纽约英文版，277页（法文译本：谢里尔·查里士·希特柯克将军：《穆斯塔法·基马尔。人。事业。国家》，帕里·加罗列译自英文，1934年巴黎版，VI，241页）。
308. 萧特威尔，詹姆斯·T.和戴克，弗兰西斯：《海峡旁边的土耳其》（简史），1941年纽约英文版，XII，241页。
309. 斯派德蒂，玖塞帕：《亚历山大勒塔州问题真相》，1939年米兰意大利文版，XI，368页。
310. 施杜麦尔博士，哈利：《战时在君士坦丁堡的两年》，德文版（法文译本：1917年巴黎版）。
311. J. 苏海：《蒙特罗海峡条约的签订及其前因（从1918年起）》，1936年慕尼黑德文版，73页。
312. (泰拉特巴夏)《泰拉特巴夏遗下的回忆录》，《现代历史》杂志，第15卷，第2期（1921年11月），第298页。
313. 泰姆帕莱，H.：《巴黎和会史》，四卷集，1920—1924年伦敦英文版，附有地图。
314. 《土耳其的反对派》，《双周评论》杂志（英文），1925年6月号。
315. 托宾，恰斯脱·M.：《土耳其。东方的钥匙》，1944

- 年纽约英文版，170页。
316. 敦加斯，热拉尔：《阿塔丘尔克与现代土耳其的真相》，1937年巴黎法文版（英文译本：F.F. 云德译自法文，1939年伦敦英文版，79页，附有插图）。
317. 汤因比，阿诺德·J.：《希腊和土耳其的西方问题》（关于文明接近的研究），1923年伦敦英文第2版，XXXIV，408页，附有地图。
318. 汤因比，阿诺德·J.和柯克伍德，坎纳斯·P.：《土耳其》，1926年伦敦英文版，XV，2，329页，附有地图两幅。
319. 《土耳其在欧洲》，1920年伦敦英文版，155页（大不列颠丛书。外交部。历史科）。
320. 瓦乌爵士，泰福德：《土耳其的昨天、今天和明天》，1930年伦敦英文版，XII，305页，附有插图。
321. 韦伯斯特，唐纳德·E.：《阿塔丘尔克的土耳其》（土耳其改革中的社会进程），1939年费拉德尔斐亚英文版，337页。
322. 怀特，韦伯·华莱士：《奥斯曼帝国变化的进程》，1937年芝加哥英文版，IX，314页（俄文译本：《1774到1937年时期的土耳其历史》）。
323. 沃尔萨姆，H.E.：《土耳其的穆斯塔法·基马尔》，1930年伦敦英文版，X，216页。
324. 菲利普·德扎拉：《独裁者，穆斯塔法·基马尔》，1936年巴黎法文版，370页。

-
325. 齐姆凯，库尔特：《新土耳其》（1914—1929年时期的政治发展），1930年斯图加特德文版，550页。
326. 基尼，勃兰：《奥斯曼银行的收支情况》，1932年巴黎法文版。
327. 基雅爱·法利：《基雅·哥卡尔帕，他的生活与社会学，法兰西社会学在土耳其的影响》，1936年巴黎法文版，XV，243页，附有插图。



大事年表

251

1914年8月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

1914年8月2日：德国与土耳其在伊斯坦布尔签订秘密的军事同盟协定。

土耳其宣布中立。

1914年8月3日：奥斯曼帝国宣布全国处于战争状态。

1914年8月10日：德国“戈本”号和“布勒斯鲁”号两艘巡洋舰开入达达尼尔海峡。

1914年8月28日：盟国发表关于土耳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保持中立的条件下不破坏土耳其不可侵犯性的宣言。

1914年9月8日：苏丹颁布关于从1914年10月1日起废除外国在土耳其的领事裁判权制度的敕令。

1914年9月13日：英国政府从土耳其召回海军上将李普斯领导的海军使团。

1914年9月28日：土耳其政府完全封锁了海峡。

1914年10月29日：德土舰队炮击俄国黑海沿岸。土耳其事实上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4年11月3日：俄国正式对土宣战。黑山国对土耳其宣战。

1914年11月5日：英国对土宣战。

英国国王关于英国兼并塞浦路斯岛的命令。

1914年11月6日：法国对土宣战。

1914年11月11日：在伊斯坦布尔的法奇希清真寺宣读了关于对协约国进行“圣战”的伊斯兰教教主的“费特瓦”和颁布了苏丹关于对协约国宣战的敕令。

1914年12月18日：英国宣布埃及为其保护国。

1915年1月8日：塞尔维亚对土宣战。

1915年2月19日：盟国炮击达达尼尔海峡。

1915年3月4日—4月10日：英法俄关于战争胜利结束后把伊斯坦布尔和海峡归并给俄国的秘密协定。

1915年3月8日：英法对土的达达尼尔海峡战役的开始。

252 1915年4月26日：俄英法一方与意大利签订了关于因意大利站在协约国一边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给予意国以领土补偿的秘密条约。

1915年4月28日：英法陆战队在达达尼尔海峡登陆。

1915年5月27日：颁布了“遣散”（即驱逐）法。开始残杀土耳其的亚美尼亚人民。

1915年8月21日：意大利对土宣战。

1915年9月6日：保土同盟条约（土耳其把色雷斯边境上的马里查河右岸地区让给保加利亚）。保加利亚加

入奥德土集团。

1915年10月4—5日：盟国陆战队在萨罗尼加登陆。

1915年10月24日：英国驻埃及的最高专员亨利·麦克·马洪与麦加统治者胡赛因·伊本·阿里就阿拉伯人对土实行武装进攻问题所进行的通信结束了；英国允许承认以胡赛因为首的统一的独立的阿拉伯国家（《麦克·马洪—胡赛因协定》）。

1916年1月9日：盟国在达达尼尔海峡的战役结束。盟国从加里波利半岛撤退。

1916年2月2日：土耳其皇太子尤苏夫·伊塞丁（恩维尔巴夏的反对者）死了。

1916年2月16日：俄军占领埃尔祖鲁姆。

1916年4月18日：俄军占领特拉布松。

1916年4月26日—9月1日：英法俄三国关于瓜分土耳其小亚细亚领土问题的秘密协定（《萨伊克斯—皮柯协定》）。

1916年4月29日：英国陶斯亨特将军的军队在被土军所包围的城市库特-艾马赖城投降了。

1916年6月5日：汉志的阿拉伯人在麦加统治者胡赛因·伊本·阿里领导下举行起义。

1916年9月28日：德土关于不签订单独和约的协定。

1916年11月19日：意大利参加了英法俄关于瓜分土耳其小亚细亚领土的协定。

1917年3月11日：英军占领了巴格达。

- 1917年3月12日：俄国专制政体被推翻了。
- 1917年4月4日：美国对德国宣战。
- 1917年4月13日：美国与土耳其断绝外交关系。
- 1917年4月19—21日：英法意三国(劳合·乔治、索尼诺、里保)在圣让德莫廉车站的火车厢里开会，讨论意大利参加《萨伊克斯—皮柯》协定以换取在安塔利亚和伊兹密尔两地的附加补偿问题。
- 1917年7月2日：希腊与土耳其断绝外交关系。
- 1917年8月18—22日：意大利一方与英法一方在伦敦和巴黎两地就小亚细亚问题(意大利在取得小亚细亚的“绿区”的基础上参加《萨伊克斯—皮柯协定》)签订了秘密协定。
- 1917年8月29日：土耳其对罗马尼亚宣战。
- 1917年10月15—28日：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正式访问伊斯坦布尔。
- 253 1917年11月7日：俄国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 1917年11月8日：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了和平法令。
- 1917年12月3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发出了由列宁和斯大林签署的《告俄罗斯和东方全体伊斯兰教劳动人民书》。
- 1917年12月11日：英军占领了耶路撒冷。
- 1917年12月15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一方与德、奥匈、保、土一方在布列斯特-利托夫斯

克签订了停战协定。

1917年12月18日：“南高加索委员会”与土耳其在爱尔兰辛詹签订了停战协定。

1918年1月8日：威尔逊在致国会咨文中提出的关于和约的“威尔逊十四点计划”。

1918年1月11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发出由列宁和斯大林签署的关于“土属亚美尼亚”的法令。

1918年3月3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一方与德、奥匈、土、保一方在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签订了和约。

1918年5月7日：德、奥匈、土一方与罗马尼亚一方签订布加勒斯特和约。

1918年6月1日：《真理报》上发表了斯大林论德土在顿河和北高加索地区侵略政策的一篇论文。

1918年6月4日：土耳其与孟什维克的格鲁吉亚在巴统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未被批准）。

1918年7月3日：苏丹穆罕默德五世（列沙德）逝世。王子瓦希德丁继任奥斯曼的王位，称苏丹穆罕默德六世。

1918年7月31日：土耳其与达什纳克党人的亚美尼亚在伊斯坦布尔签订和约。

1918年8月15日：苏丹发布把卡斯、巴统和亚达汉等地并入奥斯曼帝国的敕令。

1918年9月15日：弗兰士·戴斯帕列的军队在马其顿突破了保土战线。盟国在西色雷斯的进攻。

土军占领巴库。

1918年9月19日：英军在阿林比将军指挥下在巴勒斯坦突破了土耳其阵线。

1918年9月20日：苏维埃政府向奥斯曼政府提出了关于废除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与土耳其的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条约的照会。

1918年10月1日：英军与阿拉伯人的起义队伍占领了大马士革。

1918年10月5日：奥斯曼政府向美国总统威尔逊发出请求停战的照会。

1918年10月7日：泰拉特巴夏内阁辞职。泰拉特、恩维尔、詹玛尔退出政府。伊塞特巴夏内阁组成。

1918年10月30日：协约国与奥斯曼帝国在梭诺斯岛的摩德洛司港口的英国军舰“阿加梅隆”号上签订了停战协议。

1918年11月2日：恩维尔、泰拉特、詹玛尔与青年土耳其党人的其他头子逃往德国。

1918年11月3—8日：英国占领了摩苏尔和摩苏尔地区。

1918年11月10日—1919年3月3日：阿赫美德、泰腓克巴夏内阁在伊斯坦布尔执政。

254 1918年11月11日：德国与协约国签订了康边停战协

- 定。
- 1918年11月13日：盟国第一批军舰开到了伊斯坦布尔。
- 1918年11月23日：盟国军队在法国将军弗兰士·戴斯帕列指挥下开入伊斯坦布尔。
- 1918年11月26日：弗兰士·戴斯帕列离开伊斯坦布尔。
- 1918年12月20日：英法军队占领阿达纳。
- 1918年12月21日：在盟国压力下奥斯曼众议院解散了。
- 1919年1月21日：在美西纳、泰尔苏斯、奥斯梅尼等地的郊区开始建立的土耳其游击战线，反对法国占领者。
- 1919年3月3日：在埃尔祖鲁姆成立了东部各省“护权”协会。
- 1919年3月5日—10月2日：达马德·费里特巴夏内阁(第一届)在伊斯坦布尔执政。
- 1919年4月29日：意军在安塔利亚登陆。
- 1919年4月30日：穆斯塔法·基马尔巴夏被任命为安纳托利亚东部的军队检查官。
- 1919年5月15日：希军在伊兹密尔登陆。
- 1919年5月19日：穆斯塔法·基马尔巴夏来到了安纳托利亚。
- 1919年5月21日：盟国最高委员会作出关于把摩苏尔

转给英国的决定。

1919年5月28日：土希两国在阿瓦来克的第一次战斗。

1919年6月28日：协约国与德国签订凡尔赛和约。

安纳托利亚西部各“护权”民族委员会代表大会在巴利克西尔开幕。

1919年7月1日：穆斯塔法·基马尔来到埃尔祖鲁姆并在该地得到苏丹召他回伊斯坦布尔的命令。

1919年7月8日：穆斯塔法·基马尔辞职。

1919年7月23日：东部各省“护权”协会代表大会在埃尔祖鲁姆开幕。穆斯塔法·基马尔被选为会议的主席。

1919年7月29日：意大利与希腊就巴尔干和土耳其问题，特别是意大利拒绝把南斯拉夫群岛(罗得岛除外)让给希腊问题，在巴黎签订了秘密协定。

1919年8月6日：东部各省“护权”协会埃尔祖鲁姆代表大会闭幕，并选出以基马尔为首的代表委员会。

1919年9月4日：在西发斯召开以穆斯塔法·基马尔为主席的土耳其全国“护权”协会代表大会。

1919年9月10日：奥国与协约国签订了圣日耳曼和约。

西发斯大会向苏丹要求撤去达马德·费里特巴夏的职务并组成享有国民信任的政府。

1919年9月11日：西发斯代表大会闭幕。成立了以穆斯塔法·基马尔为首的代表委员会。

1919年9月13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

外交人民委员向土耳其工农发出宣言。

1919年10月2日—1920年3月4日：阿里·里萨巴夏的内阁在伊斯坦布尔执政。

1919年10月7日：规定奥斯曼国会的选举。

255

1919年11月27日：协约国与保加利亚在纳伊签订和约。

1919年12月27日：以穆斯塔法·基马尔为首的代表委员会从西发斯迁到安卡拉。

1920年1月6日：《民族主权日报》在安卡拉开始出版。

1920年1月12日：奥斯曼国会在伊斯坦布尔开幕。

1920年1月28日：奥斯曼国会通过合乎埃尔祖鲁姆和西发斯大会决议精神的《国民公约》。

1920年2月11日：法军从马拉士撤退。

1920年3月8日—4月5日：萨里希·胡留西巴夏的内阁在伊斯坦布尔执政。

1920年3月16日：盟军在伊斯坦布尔登陆并正式宣布占领伊斯坦布尔。英国人驱散奥斯曼国会。

1920年3月19日：穆斯塔法·基马尔号召各省在安卡拉召开“拥有非常全权的国民议会”。

1920年4月5日：萨里希巴夏辞职，达马德·费里特巴夏的第二届内阁执政。

1920年4月18日：为反对安纳托利亚民族运动在伊斯坦布尔成立“哈里法军”。

1920年4月23日：在穆斯塔法·基马尔主持下新的土耳其国会在安卡拉开幕，它称为大国民议会。

- 1920年4月26日：穆斯塔法·基马尔以大国民议会名义写信给列宁，建议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与土耳其建立外交关系，并请求在土耳其反对帝国主义者们的斗争中给它以援助。
- 1920年4月24—27日：盟国在圣雷莫举行会议，结果英法在瓜分近东石油问题上进行了勾结，并拟定了对土和约的条件。
- 1920年4月29日：大国民议会鉴于反民族骚动的开始而通过了“叛国”法。
- 1920年4月30日：穆斯塔法·基马尔担任大国民议会政府主席的职务。
- 1920年5月3日：选举由十个部长所组成的第一次大国民议会内阁。
- 1920年5月11日：根据苏丹命令在伊斯坦布尔成立的军事法庭因穆斯塔法·基马尔在安纳托利亚的活动而对他作出缺席的死刑判决。
- 1920年5月30日：土耳其人和法国人在基里基亚签订了停战协定。
- 1920年6月1日：美国参议院否决了对亚美尼亚的委任统治。
- 1920年6月2日：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向穆斯塔法·基马尔发出照会，证明在莫斯科收到了基马尔在1920年4月26日发出的信件，表明苏维埃政府同意苏俄与土耳其之间立即建立外交和领事关系。

- 1920年6月4日：协约国和匈牙利签订了脱利亚依和约。
- 1920年6月7日：土耳其大国民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规定从1920年3月16日起伊斯坦布尔政府与任何国家所签订的一切条约——不论是秘密的或者已经发表的——均告无效。
- 1920年6月18日：法军占领了桑古尔达克，这便使法土之间的停战协定自动的破坏了。
- 1920年6月20日：协约国最高委员会责成希腊担任“恢复安纳托利亚秩序”的义务，从而迫使土耳其接受协约国提出的和平条约。 256
- 1920年6月22日：希腊在安纳托利亚和色雷斯发动进攻。
- 1920年6月30日：希军占领巴利克西尔。
- 1920年7月2日：英希军占领了巴提尔马、厄里格利、开尔马斯蒂、卡拉查比、盖宁。
- 1920年7月7日：大国民议会政府向达什纳克党人的亚美尼亚提出最后通牒。
- 1920年7月8日：希军占领布尔萨。
- 1920年7月18日：大国民议会为实现《国民公约》而宣誓。
- 1920年7月20日：希腊陆战队占领了马尔马拉海欧洲海岸上的德基达(罗德斯塔)。
- 1920年7月25日：希军占领了亚得里亚堡(亚得尔那)。

法军在顾罗将军指挥下进入大马士革。法国驱散叙利亚国民政府。

1920年8月10日：奥斯曼帝国与协约国签订了色佛尔和约，同时希腊和意大利签订了条约（关于意大利让出爱琴海上一切岛屿，唯罗得岛除外）；英、法、意、日一方与希腊一方的条约（关于把根据纳伊条约从保加利亚领土割据的色雷斯转交给希腊），以及英、法、意在安纳托利亚划分势力范围的协定。

1920年8月15日：国联行政院决定英国对伊拉克实行委任统治。

1920年8月29日：希军占领乌沙克。

1920年9月24日：达什纳克党人与土军在巴尔吉斯发生冲突。

1920年9月28日：土耳其对达什纳克党人的亚美尼亚开始进攻。

1920年9月30日：土耳其军队占领了萨雷卡麦什。

1920年10月4日：第一次正式的苏维埃外交使团到达安卡拉。

1920年10月22日：达马德·费里特巴夏辞职，泰腓克巴夏第二届内阁在伊斯坦布尔执政。

1920年10月25日：希腊国王亚历山大逝世。

1920年10月30日：土军占领卡斯。

1920年11月7日：土军占领亚历山大堡。

1920年11月10日：伊斯美特贝伊在比列哲克接受西线

指挥的任务。

1920年11月11日：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建议苏俄在亚美尼亚—土耳其谈判中进行调停。

1920年11月15日：达什纳克党人政府向土耳其政府提出了请求开始和平谈判的照会。

1920年11月18日：安卡拉共产党与“人民党”合并，组成土耳其人民共产党（加上“人民”二字以区别于御用的“共产”党）。

1920年11月22日：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关于亚美尼亚疆界的仲裁决定（由于色佛尔条约第八十九款的关系）。

1920年11月29日：穆斯塔法·基马尔电复外交人民委员，证明在安卡拉收到了关于苏俄同意与土耳其建立外交和领事关系的照会。

苏维埃政权在亚美尼亚宣告成立。

1920年12月2日：土耳其与达什纳克党人的亚美尼亚在亚历山大堡（列宁那坎）签订了“和”约，它给亚美尼亚造成了奴役的条件，并确立了土耳其对亚美尼亚的保护。

1920年12月23日：英法就对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和伊拉克进行委任统治一事在巴黎签订了公约。 257

1920年12月25日：希腊国王君士坦丁复位。

1921年1月10日：土耳其人在伊涅纽村对希腊人取得了第一次胜利。

1921年1月20日：大国民议会通过《基本组织法》（宪法）。

1921年1月28日：在特拉布松，宪兵把以穆斯塔法·苏布希为首的十六个土耳其共产党人杀害并抛入海中。

1921年2月8日：法军在围攻土耳其城市安泰布许多个月以后占领了该城。

大国民议会授予安泰布以“胜利者”的称号。

1921年2月21日—3月12日：为了土耳其与希腊媾和，协约国在苏丹与安卡拉政府代表参加下召开了伦敦会议。

1921年3月1日：土耳其与阿富汗在莫斯科签订了友好同盟条约。

1921年3月9日：贝克尔·萨米贝伊与白里安签订了土法政治、军事、经济协定（没有生效）。

1921年3月13日：土意关于意军从安纳托利亚撤退以换取土耳其的经济补偿的伦敦协定（没有生效）。

1921年3月16日：苏俄与土耳其在莫斯科签订了“友好亲善”条约。

达什纳克党人的恐怖分子在柏林刺杀了泰拉特。

1921年3月31日—4月1日：土耳其人在伊涅纽村对希腊人取得了第二次胜利。

1921年6月1日：意军开始从安塔利亚撤退。

- 1921年6月13日：希腊国王君士坦丁到达伊兹密尔。
- 1921年7月13日：希军进入阿菲昂-卡拉希萨。
- 1921年7月17日：希军占领了寇塔希亚与叶尼什希尔。
- 1921年7月19日：希军占领爱斯克舍希尔。
- 1921年7月23日：英国占领当局在伊斯坦布尔袭击俄罗斯—乌克兰贸易代表团的住所并逮捕代表团的工作人员。
- 1921年8月5日：大国民议会决议任命穆斯塔法·基马尔为最高统帅。
- 1921年8月23日—9月13日：希土两国在萨卡里亚河上的决定性的战役。
- 1921年9月19日：大国民议会通过授予穆斯塔法·基马尔以“胜利者”称号的法律。
- 1921年10月13日：在苏俄参加下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格鲁吉亚等苏维埃共和国一方与土耳其一方在卡斯签订了友好条约。
- 1921年10月20日：土法签订了关于法军从基里基亚撤退、在亚历山大勒塔州建立专门制度以及划分土叙国界等问题的安卡拉条约(《弗兰克林—布翁条约》)。
- 1921年12月13日：以M.B. 伏龙芝为首的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特别使团到达安卡拉。
- 1922年1月2日：乌克兰与土耳其在安卡拉签订了“友好亲善”条约。
- 1922年1月21日：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向英、意、德等

国政府建议邀请土耳其大国民议会政府出席热那亚会议。

258 1922年2月22日：土耳其大国民议会政府外交部致电苏俄外交人民委员，感谢苏俄政府主张邀请土耳其出席热那亚会议。

1922年7月21日：达什纳克党人的恐怖分子在梯比利斯刺杀詹玛尔巴夏。

1922年8月4日：恩维尔巴夏所统率的巴斯马奇匪帮被红军部队在巴尔驻安（在斯大林那巴得地区）击溃，他在一次战斗中死亡了。

1922年8月26日：土耳其军队开始总进攻，并在阿菲昂-卡拉希萨西南部突破了希腊阵线。

1922年8月30日：土耳其人在多姆鲁-佩纳尔（“总司令的战役”）会战中击溃希腊军队。

1922年9月2日：土耳其军队在恰尔凯附近俘虏了希军总司令特里库皮斯及其司令部的军官。

1922年9月9日：土军进入伊兹密尔和马尼萨。

1922年9月18日：安纳托利亚完全肃清了希腊军队。

1922年10月3日：为拟定希土停战条件在木达尼亚召开会议。

1922年10月11日：土耳其与英、意、法三国在木达尼亚签订希土停战协定。

1922年10月26日：选举伊斯美特巴夏为外交部长。

1922年11月1日：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决议废除瓦希德

丁(作为苏丹)，废除土耳其的苏丹制度(“认为它已进入历史范畴”)，并由大国民议会从奥斯曼王朝的皇族中选出一个新哈里法。

1922年11月8日：苏俄外交人民委员致电土耳其人民及大国民议会祝贺土耳其推翻了君主政体。

1922年11月18日：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决议废除逃跑的哈里法瓦希德丁，并选举奥斯曼王朝的皇族阿布杜尔·美志德为哈里法。

1922年11月20日：制定协约国与土耳其之间的和约条件的洛桑会议开幕。

1922年12月4日：Г.В. 齐切林在洛桑会议的研究海峡制度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发表的声明。

1922年12月18日：苏维埃代表团在洛桑会议上提出了《船只通过达达尼尔海峡、马尔马拉海、博斯普鲁斯海峡规则草案》。

1922年12月19日：Г. В. 齐切林在洛桑会议上就协约国关于海峡制度草案第三方案发表的声明。

1922年12月20日：苏维埃代表团在洛桑会议上就东方问题提出的备忘录。

1923年4月9日：土耳其大国民议会给予美国海军上将捷斯特在土耳其修筑铁路和开采矿藏的租让权。

1923年5月8日：寇松向苏维埃政府提出最后通牒。

1923年5月10日：出席洛桑会议的苏维埃代表B.В.沃洛夫斯基被刺。

- 1923年7月24日：英、法、意、日、希、罗、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国家等一方与土耳其一方在洛桑签订了和约以及海峡制度公约和其他文件。
- 1923年8月11日：土耳其大国民议会第二届会议开幕。
- ✓1923年10月2日：协约国军队撤出伊斯坦布尔。
- 259 ✓1923年10月6日：土耳其军队进入伊斯坦布尔。
- 1923年10月13日：土耳其大国民议会通过了宣布安卡拉为土耳其首都的法律。
- 1923年10月29日：土耳其宣布为共和国。胜利者穆斯塔法·基马尔被选为共和国总统。
- 1923年10月30日：土耳其大国民议会批准了由伊斯美特巴夏组成的第一届共和国内阁。
- 1924年3月3日：土耳其大国民议会通过了废除哈里法制度和撤销教法事务部和教会地产部的法律。
- 1924年3月4日：最后一个哈里法阿布杜尔·美志德以及奥斯曼王朝的其他一些皇族被逐出土耳其国境。
- 1924年4月8日：土耳其大国民议会撤销了教会法庭和改变了审判制度中的某些规定。
- 1924年4月20日：通过了土耳其共和国宪法。
- 1924年8月26日：安卡拉实业银行开幕。
- 1924年10月29日：国联行政院就土耳其与伊拉克的边界线作出了指示(所谓布鲁塞尔线)。
- 1924年11月9—18日：进步共和党成立。
- 1924年11月20日：伊斯美特巴夏内阁辞职。

- 1924年11月21日：阿里·费特希贝伊组阁。
- 1925年2—4月：库尔德斯坦酋长塞伊德领导的东部各省的库尔德斯坦部落的叛乱。
- 1925年2月17日：土耳其大国民议会通过了废除什一税和以土地税以及出卖农产品税来代替什一税的法律。
- 1925年2月26日：土耳其大国民议会通过了关于取消外国企业“列热”的租让权的法律，这个垄断组织曾享有收买烟草、制造烟产品以及从土耳其输出烟草和烟产品的专卖权。
- 1925年3月2日：人民共和党对阿里·费特希贝伊内阁投不信任票。内阁辞职。
- 1925年3月3日：伊斯美特巴夏受任总理职位并由他组成内阁。
- 1925年4月6日：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决议从教会地产部手中最后没收所有用来供给高等和一般的教会学校需要的房屋和地产。
- 1925年4月8日：土耳其大国民议会通过关于建立糖厂的法律。
- 1925年4月12日：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发布关于矿业企业的法律。
- 1925年6月3日：土耳其内阁决定禁止进步共和党的活动。
- 1925年6月29日：独立法庭在狄雅巴基尔对以塞伊德

酋长为首的四十七名叛乱的主犯判决了死刑。

1925年8月24日：穆斯塔法·基马尔在卡斯塔蒙努发表必须穿着欧式服装和不戴礼拜帽的第一次演说。

1925年11月25日：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关于禁止戴礼拜帽和必须戴欧式帽子的法律。

1925年11月30日：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关于取消托钵僧团和封闭托钵僧寺院的法律。

1925年12月17日：苏联与土耳其在巴黎签订友好中立条约。

1925年12月26日：关于在土耳其实行欧洲的年历和时历的法律。

√1926年4月22日：土耳其与伊朗在德黑兰签订了友好安全条约。

260 1926年5月30日：土耳其与作为对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委任统治者的法国之间签订了友好和睦邻关系的安卡拉公约。

1926年6月5日：英国、伊拉克、土耳其签订了关于土伊边界和睦邻关系的安卡拉条约。摩苏尔最后归并到伊拉克。

1926年6月30日：在伊斯坦布尔交换了苏联与土耳其的1925年友好中立条约的批准书。

1926年9月8日：苏联与土耳其关于最后确定苏土之间的疆界的总议定书，这一疆界是由1921年3月16日莫斯科条约和1921年10月13日的卡斯条约所

规定的。

1926年11月12—14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Г.В. 齐切林与土耳其外交部长、博士泰腓克·刘施图贝伊在敖德萨会晤。

1926年11月24日：Г.В. 齐切林就敖德萨会晤对苏联报刊代表发表谈话。

1927年1月8日：在卡斯签订了关于苏土边界各河流用水问题的苏土公约以及在阿拉斯河上修筑萨达拉巴得大堤的补充议定书。

1927年2月17日：美土关于恢复外交和领事关系的协定。

1927年3月11日：苏土贸易航海条约在安卡拉签订。

1927年5月28日：土耳其大国民议会通过了《奖励工业法》。

1927年5月29日：安卡拉—开塞利铁路通车。

1927年7月1日：在八年的间隔以后，穆斯塔法·基马尔又到达了伊斯坦布尔。

1927年9月9日：萨姆松—哈弗斯铁路通车。

1927年10月15—23日：土耳其人民共和党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穆斯塔法·基马尔在会上发表演说（10月15—20日），他总结了民族斗争。

1927年10月28日：土耳其第一次普遍的人口调查。

1927年11月1日：土耳其大国民议会第三届会议开幕。胜利者穆斯塔法·基马尔再次当选为共和国总统。

- 1927年11月21日：萨姆松—亚马西亚铁路通车。
- 1927年12月26日：女律师第一次出席土耳其法庭。
- 1928年4月9日：土耳其大国民议会从宪法中删去“伊斯兰教是土耳其国教”一语，并以总统和议员的普通宣誓仪式代替宗教仪式。
- 1928年5月25日：阿富汗与土耳其在安卡拉签订了友好合作条约。
- 1928年5月30日：土耳其与意大利在罗马签订了关于中立、调解程序和法庭解决争端的条约。
- 1928年6月13日：土耳其与奥斯曼国债的债券持有人的代表签订了关于重新开始偿付债款的巴黎协定。
- 1928年6月15日：伊朗与土耳其签订关于发展政治经济关系的德黑兰议定书。
- 1928年11月1日：土耳其大国民议会通过土耳其字母改革(由阿拉伯字母改成拉丁字母)法。
- 261 1929年1月28日：土耳其参加了1928年8月27日在巴黎签订的关于禁止把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条约(凯洛格公约)。
- 1929年2月27日：土耳其参加了1929年2月9日在莫斯科签订的关于提前使凯洛格公约生效的议定书。
- 1929年4月9日：土耳其与伊朗签订了关于边界问题的安卡拉公约。
- 1929年6月22日：在安卡拉签订了关于土耳其与叙利亚国界问题的土法协定，同时土法就赎回美尔星—

阿达纳铁路问题互换照会。

1929年8月3日：土耳其与汉志签订了麦加友好条约。

1929年12月17日：苏联与土耳其签订了关于延长1925年友好中立条约生效期限的安卡拉议定书，并且对该条约加入一项关于缔约国一方未经另一方同意不与邻邦缔结协定的附加义务。

1930年2月3日：土耳其与法国关于友好、调解程序和仲裁审理案件的巴黎条约。

1930年5月3日：关于土叙国界的阿勒颇议定书。

1930年6月10日：关于彻底解决由于实行洛桑条约和关于交换土希居民的协定所产生的诸问题的土希安卡拉公约。

1930年8月30日：安卡拉—西发斯铁路通车。

1930年8月：以阿里·费特希贝伊为首的自由共和党成立。

1930年10月3日：因土耳其外交部长泰腓克·刘施图贝伊访问苏联而发表官方公报。

1930年10月30日：土耳其与希腊关于中立、友好、调解程序和仲裁审理案件的安卡拉条约。

1930年11月：土耳其自由共和党自动解散。

1930年12月：迈涅曼地区的反动暴动。

1931年5月4日：土耳其大国民议会第四届会议开幕。

胜利者穆斯塔法·基马尔三度被选为共和国总统。

1931年5月10—14日：土耳其人民共和党召开第三次

代表大会。通过新纲领和党章。

1931年10月27日：李维诺夫在安卡拉对土耳其报界代表就苏土关系发表声明。

1931年10月30日：苏土在安卡拉签订了关于延长1925年友好中立条约期限的议定书。

1931—1932年：在同伊朗接壤的土耳其东部各省的库尔德斯坦人的大规模暴动。

1932年4月27日：土耳其政府赎回阿达纳—费夫西巴夏铁路线。

1932年4—5月：以伊斯美特巴夏为首的土耳其政府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参加五一节庆祝大会。

1932年5月8日：塔斯社声明巩固苏联与土耳其的经济和文化联系。

1932年7月18日：土耳其被接受加入国联。

1933年5月29日：通过关于建筑通往厄里格利煤矿区铁路的法律。

262 1933年6月19日：通过关于修筑通往厄尔加尼铜矿开采区的铁路的法律。

1933年6月29日：开始修筑西发斯—埃尔祖鲁姆铁路。

1933年7月3—4日：土耳其参加关于侵略者定义的伦敦公约。

1933年8月1日：改组伊斯坦布尔大学。

1933年9月2日：乌路开斯拉—开塞利的铁路通车。

1933年10—11月：以卡·叶·伏罗希洛夫为首的苏维

埃政府代表团访问土耳其。

1934年1月9日：土耳其政府通过发展土耳其工业的《五年经济计划》。

1934年2月9日：签订巴尔干协约国（土耳其、希腊、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公约。

1934年5月20日：开塞利联合纺织厂在伊斯美特巴夏和苏联代表参加之下举行奠基典礼。

1934年12月5日：给予土耳其妇女以国会选举权。

1935年3月1日：土耳其大国民议会第五届会议开幕。阿塔丘尔克第四次被选为共和国总统。

1935年4月17日：土耳其外交部长阿拉斯在国联会议上要求重新武装海峡以保障土耳其的安全。

1935年5月1日：缔结了关于土耳其政府赎回亚伊丁铁路的协定。

1935年5月9—14日：土耳其人民共和党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新党纲。

1935年6月14日：在安卡拉开办语言、历史和地理学系（以后改为大学）。

1935年7月15—25日：土耳其国民经济部长詹拉尔·巴雅尔到达莫斯科。

1935年8月22日：那吉里联合纺织厂举行奠基典礼。

1935年9月16日：在苏维埃代表出席之下开塞利联合纺织厂开工。

1935年10月4日：伊朗、土耳其、伊拉克公约在日内

瓦进行草签(以后称为萨阿达巴得公约)。

1935年11月7日：在安卡拉签订了关于延长1925年苏土友好中立条约期限的议定书。

1935年11月20日：阿富汗声明，它同意参加伊朗、土耳其、伊拉克公约。

1936年—1937年：得尔西姆地区的库尔德人叛乱。

1936年4月11日：土耳其政府照会洛桑会议的参加国，建议召开修改海峡制度的会议。

1936年4月16日：苏维埃政府复照土耳其政府同意召开修改海峡制度的会议。

1936年6月22日：在蒙特罗召开关于海峡制度问题的会议。

1936年7月20日：在蒙特罗签订海峡制度公约。

1936年9月9日：签订关于在三年后终止法国对叙利亚的委任统治的法叙条约。

1936年11月16—19日：德意志国家银行经理沙赫特到达安卡拉。

263 1937年2月21日：土耳其政府与克虏伯公司缔结了关于修建七艘船只、造船厂以及波斯普鲁斯海峡煤库的协定。

1937年5月29日：法土在日内瓦签订了关于亚历山大勒塔自治州的制度和宪法的协定。

1937年7月8日：在德黑兰签订了萨阿达巴得协定，它把近东协约国(土耳其、伊朗、伊拉克、阿富汗)固

定起来了。

1937年7月12—16日：土耳其外交部长阿拉斯和内务部长秀克留·凯伊访问莫斯科。

1937年7月15日：在莫斯科签订了关于审查和解决苏土边境事件和冲突的程序的公约。

1937年9月14日：九国反对法西斯潜水艇在地中海的海盗行为的尼翁协定。

1937年10月8日：苏土签订贸易协定。

1937年10月20日：伊斯美特·伊涅纽政府辞职。詹拉尔·巴雅尔内阁组成。

1937年12月31日：在安卡拉签订了关于把1928年的土耳其—阿富汗互助合作条约延期十年的议定书。

1938年3月31日：苏土关于互相减少领事馆的协定。

1938年5月27日：在伦敦签订关于英国给予土耳其一千六百万英镑贷款的协定。

1938年7月4日：土法友好条约在安卡拉举行草签。

1938年7月31日：巴尔干协约国与保加利亚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

1938年11月10日：基马尔·阿塔丘尔克逝世。

1938年11月11日：伊斯美特·伊涅纽当选为土耳其共和国总统。巴雅尔组成土耳其新内阁，以萨拉兆格鲁任外交部长(代替阿拉斯)和列费克·赛伊达姆任内务部长(代替秀克留·凯伊)。

- 1939年1月16日：德土在柏林签订了贷给土耳其一亿五千万马克的协定。
- 1939年1月25日：詹拉尔·巴雅尔内阁辞职和列费克·赛伊达姆组阁。
- 1939年2月21日：土耳其在法律上承认西班牙独裁者弗朗哥政府。
- 1939年4月2日：土耳其大国民议会第六届非常会议开幕；伊斯美特·伊涅纽再次当选为共和国总统；列费克·赛伊达姆新内阁组成。
- 1939年4月12—14日：戈培尔非正式地访问伊斯坦布尔。
- 1939年4月27日：德国大使冯·巴本到达安卡拉。
- 1939年5月12日：英土互助声明。
- 1939年6月1日：土耳其人民共和党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新的党纲和党章。
- 1939年6月23日：法土在安卡拉签订了关于亚历山大勒塔州(哈泰)正式归并土耳其的协定，在巴黎签订法土互助条约。
- 1939年9月11日：卡拉布克的联合冶金工厂第一座熔铁炉开始出铁。
- 1939年9月25日—10月18日：土耳其外交部长秀克留·萨拉兆格鲁访问莫斯科。
- 264 1939年10月19日：英、法、土互助条约在安卡拉签订。

- 1940年2月20日：塔斯社就意大利斯蒂芬尼通讯社报道有关苏联部队越过土耳其国境一事进行辟谣。
- 1940年3月20日：土耳其政府决定把劳动日由九小时延长至十二小时。
- 1940年7月25日：土德签订贸易协定。
- 1941年1月13日：英国陆军和海军使团到达安卡拉。
- 1941年2月17日：保土在安卡拉发表关于放弃侵略和互相信任的声明。
- 1941年2月19日：为了在土耳其建设工业企业而在伊斯坦布尔成立英土股份公司。
- 1941年2月25—28日：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和英帝国总参谋长迪耳将军访问安卡拉。
- 1941年3月1日：保加利亚参加法西斯国家的“三国公约”。德军进入保加利亚。
- 1941年3月4日：冯·巴本把希特勒的保证德国对土耳其没有侵略意图的私人信件递交给伊斯美特·伊涅纽。
- 1941年3月18—19日：艾登与萨拉兆格鲁在塞浦路斯岛上的尼科西亚会见。
- 1941年3月25日：外交人民委员发表声明说，苏土两国政府交换了一个声明：一旦苏联与土耳其两国中任何一方卷入战争时，双方完全互相谅解和中立。
- 1941年4月4日：拉舍特·阿里·加拉尼在伊拉克叛乱。

- 1941年4月6日：德国进攻希腊和南斯拉夫。
- 1941年4月19日：保加利亚军队进入南斯拉夫和希腊。
- 1941年5月2日：英军对拉舍特·阿里·加拉尼展开军事行动。
- 1941年5月31日：英军进入巴格达。拉舍特·阿里·加拉尼叛乱被扑灭。
- 1941年6月8日：英军和戴高乐的军队进入叙利亚。
- 1941年6月18日：土耳其与希特勒德国在安卡拉签订了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
-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德国及其仆从国进犯苏联。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的开始。
- 1941年6月25日：土耳其宣布在苏联同法西斯德国的战争中保持中立。
- 1941年7月9日：德国巡逻艇“西法尔克”号通过海峡进入黑海，这是土耳其粗暴地破坏中立和蒙特罗海峡公约的行动。
- 1941年7月15日：英军和戴高乐的军队占领了贝鲁特，维希政府驻叙利亚和黎巴嫩的最高专员邓茨将军投降。
- 1941年8月10日：苏英两国政府就海峡问题和土耳其一旦遭受某一欧洲国家侵犯时援助土耳其问题向土耳其政府发表了声明。
- 1941年9月29日：土英之间签订贸易协定。
- 1941年10月9日：土德之间在安卡拉签订了到1943年

- 3月31日满期的贸易协定。
- 1941年11月4日：伊斯美特·伊涅纽在国会开幕式上 265
宣称，土耳其今后仍将继续奉行中立政策。
- 1941年12月4日：罗斯福把供给武器的“租借”法案扩大到土耳其，因为土耳其的国防“对美国的防御极其重要”。
- 1941年12月7日：日本进攻珍珠港和日本对美英的战争的开始。
- 1941年12月17日：土耳其实行粮食配给制。
- 1942年2月24日：法西斯奸细在安卡拉扮演“谋刺”德国驻土耳其大使冯·巴本的丑剧。
- 1942年4月1日—6月17日：就“谋刺”冯·巴本案件在安卡拉进行挑拨性的审判。苏联公民巴甫洛夫和柯尔尼洛夫各被判二十年监禁。
- 1942年7月8日：土耳其总理列费特·赛伊达姆逝世。
- 1942年7月9日：秀克留·萨拉兆格鲁组成土耳其内阁。
- 1942年8月13日：努曼·门涅曼兆格鲁被任命为土耳其外交部长。
- 1942年9月7日：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威尔基到达安卡拉。
- 1942年11月1日：伊斯美特·伊涅纽在国会开幕式上演说时确认，土耳其将坚决奉行中立政策。
- 1942年11月4日：苏联政府向土耳其政府提出关于德

国有破坏蒙特罗公约的意图，准备把总排水量十四万吨的辅助军事船舶假装成商船通过海峡驶入黑海，这些船舶是用来把“轴心”国的军事力量和军事物资调运到黑海。

1942年12月29日：英国国会代表团到达安卡拉，在此以前它曾访问过印度和中国。

1943年1月13日：土耳其的代表团到达伦敦，了解英国企业、造船、海军和空军体制等方面的工作。

1943年1月30—31日：丘吉尔同伊斯美特·伊涅纽在阿达纳会晤。

1943年3月8日：新国会召开第一次会议。萨拉兆格鲁受任组织政府。

1943年3月11日：以英国驻近东空军司令道格拉斯元帅为首的英国使团到达安卡拉。

1943年3月14日：由三个将军和十五个陆空军高级军官组成的土耳其军事使团到达埃及。

1943年4月16日：土耳其军事领导人与到达安卡拉的英国驻近东的武装力量的总司令威尔逊将军开始谈判。

1943年6月9—18日：人民共和党举行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新党纲和新党章。

1943年6月12日：英国驻地中海东部武装力量的总司令凯宁海姆海军上将到达安卡拉。

1943年7月29日：苏联政府通知土耳其，建议中立国

不要给予墨索里尼和其他战争罪犯在自己领土上以庇护权。

1943年12月4—6日：罗斯福、丘吉尔、伊斯美特·伊涅纽的开罗会议。

1944年1月13日：在安卡拉宣布总参谋长费夫西·查克马克辞职并委任卡兹姆·奥尔巴亚担任他的职位。 206

1944年2月12日：塔斯社驳斥加瓦斯-奥菲通讯社从索非亚发出的仿佛在苏土边境上发生了事件的报道。

1944年3月2日：英国报界发表了关于英国停止给予土耳其以军事供应的报道，因为军事谈判已告中断，并且对已供给土耳其的军事物资是否能为土耳其有效地用来反对联合国的敌人发生怀疑。

1944年3月8日：英国报界报道，由于英国与土耳其在军事谈判时期所发生的意见分歧，英国军事使团决定立即离开土耳其。

1944年4月12日：英美向土耳其政府发出联合照会，建议停止把战略物资供应德国。

1944年4月21日：土耳其政府停止把铬矿输往德国。

1944年5月3日：在安卡拉举行泛突厥主义的亲法西斯主义的示威游行。一些泛突厥主义者被捕。

1944年5月18日：伊斯坦布尔宣布戒严。

1944年5月24日：丘吉尔在下院宣称英土谈判失败和停止把军备供给土耳其。

- 1944年6月14日：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在下院宣称，德国当局把军舰从黑海调往爱琴海以及就这事对土耳其政府提出照会。
- 1944年6月15日：土耳其外交部长努曼·门涅曼兆格鲁辞职。总理秀克留·萨拉兆格鲁兼任外交部长职务。
- 1944年6月：土耳其最后偿清奥斯曼帝国的债务。
- 1944年8月2日：总理萨拉兆格鲁声明土耳其与德国断绝外交和经济关系。
- 1944年8月8日：由于所谓“谋刺”冯·巴本案件而被土耳其法庭判刑的苏联公民柯尔尼洛夫和巴甫洛夫从土耳其监狱中获释。
- 1944年8月29日：《真理报》记者从巴统报道，虽然从土耳其声明与德国断绝外交关系之日起迄今几乎有一月之久，但许多德国外交官仍然未离开土耳其并继续进行其反对同盟国的破坏工作。在报道中还列举一系列的关于土耳其当局对希特勒代理人的谄媚态度的事实。
- 1944年9月14日：哈森·萨卡被任命为土耳其外交部长。
- 1944年11月1日：土耳其国会冬季会议开幕。
- 1945年1月3日：土耳其国会按照美国的建议决定断绝与日本的外交和经济关系。
- 1945年2月23日：土耳其对德日宣战。

- 1945年3月19日：莫洛托夫向土耳其驻莫斯科大使萨尔帕声明，苏联政府希望宣布在1925年12月17日签订的苏土友好中立条约无效。
- 1945年5月8日：在柏林签订德国无条件投降书。 267
- 1945年8月9日：苏联开始对日作战。
- 1945年9月2日：签订日本无条件投降书。
- 1945年9月22日：反对派集团被开除出人民共和党。詹拉尔·巴雅尔退出国会和人民共和党，并声明打算建立新政党。
- 1945年9月23日：亚美尼亚人在贝鲁特、大马士革以及叙利亚其他城市举行群众大会，要求把被土耳其强占的亚美尼亚的土地并入苏维埃亚美尼亚。
- 1945年12月2—3日：由于在1945年3月进行法西斯活动和反国家活动而被判罪的二十三个泛突厥主义分子获得了自由。
- 1945年12月4日：在伊斯坦布尔举行具有敌视苏联性质的法西斯游行。捣毁民主的《曙光报》报馆。
- 1945年12月8日：苏联政府就伊斯坦布尔的反苏的法西斯游行而向土耳其政府提出照会。
- 1946年1月20日：由詹拉尔·巴雅尔领导的民主党正式开始活动。
- 1946年2月21日：伊斯坦布尔的民主报刊的一些编辑和记者被捕。
- 1946年3月23日：伊斯坦布尔法庭对民主报刊编辑和

- 记者案件作出有罪的判决。
- 1946年3月30日：土耳其和伊拉克在安卡拉的谈判完成。签订关于协同对付库尔德斯坦部落和双方采取措施促使约旦加入萨阿达巴得集团的协定。
- 1946年4月28日：在纽约的亚美尼亚人举行群众大会，要求把土耳其的几个亚美尼亚省并入苏维埃亚美尼亚。
- 1946年5月10—12日：土耳其人民共和党举行非常代表大会。代表大会作出决议：过渡到国会直接选举制度，党总主席由选举产生，修改关于团体和政党的法律以及取消国会中的“独立团”。
- 1946年5月26日：在民主党的抵制下和少数选民参加之下土耳其进行市政机关的选举。
- 1946年7月21日：在恐怖和警察专横的环境下选举第八届土耳其国会。
- 1946年8月4日：第八届国会开幕，萨拉兆格鲁政府辞职。
- 1946年8月6日：以列詹布·皮凯尔为首的土耳其新政府组成。
- 1946年8月7日：苏联政府照会土耳其政府建议修改蒙特罗黑海海峡制度的公约。
- 1946年8月18日：国会以三百四十八票多数（人民共和党员）对五十三票（民主党党员）通过了对皮凯尔政府的信任案。

- 1946年8月22日：土耳其政府对苏联政府在1946年8月7日发出的关于海峡制度问题的照会给予复照。
- 1946年9月13日：土耳其里拉纸币实行币价贬值(以迎合美国垄断组织的利益)一半以上；在贬值前一美元等于一点三里拉，在贬值后等于二点八里拉。 268
- 1946年9月24日：苏联政府就海峡问题向土耳其政府提出新照会。
- 1946年9月28日：苏联外交部报道苏土两国关于海峡问题所交换的照会。
- 1946年10月21日：美国进出口银行给土耳其二千五百万美元的贷款，“作为工业和铁路现代化之用”。
- 1946年12月16日：宣布处于戒严状态的各省指挥部决定查禁社会党、社会工农党、职工会和所有带有民主倾向的报纸和杂志。在伊斯坦布尔进行广泛的搜查和逮捕被查禁的各党派的人员。
- 1947年1月7日：土耳其民主党在安卡拉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
- 1947年1月8日：约旦国王阿布杜勒为与土耳其政府进行谈判而到达安卡拉。
- 1947年1月11日：土耳其和约旦在安卡拉签订了友好公约。
- 1947年1月29日：内务部长萧克曼秀尔在国会发表退凶的演说，反对土耳其的共产党人和所有的民主人士。

- 1947年3月12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向国会提出咨文，请求拨款四亿美元作为“援助”希腊和土耳其之用；允许政府保证训练“选拔出来的希土人员”，并派遣美国民事和军事人员到希腊和土耳其去（《杜鲁门主义》）。
- 1947年5月22日：杜鲁门签署了关于“援助”希腊和土耳其的法案。
- 1947年5月23日：以奥利维少将为首的 美国军事使团到达安卡拉，以便确定土耳其军事力量所需要的“援助”。
- 1947年5月25日：土耳其财政部长声明 允许外人把在土耳其企业中所剥削到的利润自由的输出国外。
- 1947年7月9日：土耳其内阁批准土美关于“援助”的协定。
- 1947年7月21日：在安卡拉开始审讯 被控信仰共产主义的五十三名社会党和社会工农党的活动家。法庭决定禁止旁听。
- 1947年8月9日：列詹布·皮凯尔内阁辞职。哈森·萨卡组织新政府。
- 1947年9月18日：维辛斯基在联合国大会 全体会议上发表演说，旨在反对战争煽动者（其中也包括土耳其人在内）。
- 1947年10月7日：以总参谋长萨里希·奥穆尔塔克为首的土耳其军事使团到达美国。

- 1947年11月1日：土耳其大国民议会第八届例会开幕。卡兹姆·卡拉贝基尔被选为土耳其大国民议会主席。
- 1947年11月10日：奥穆尔塔克使团到达英国。
- 1947年12月1—16日：人民共和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伊斯美特·伊涅纽被选为党的总主席。
- 1947年12月2日：国会决定解除1940年在伊斯坦布尔和西部其他五省宣布的戒严状态。
- 1948年1月15日：英国考古学院在安卡拉成立。 269
- 1948年1月19日：被当局根据戒严法几次禁止的进步的《呼声日报》复刊。
- 1948年1月26日：美国的公司与土耳其政府签订了关于土耳其把全部开采出来的铬矿的三分之二供给美国的协定(在1949年中以前，美国将从土耳其得到二十万吨铬矿)。
- 1948年1月30日：由于卡兹姆·卡拉贝基尔逝世，阿里·符德·詹比索被选为国会主席。
- 1948年2月5日：伊斯坦布尔的进步报纸《带上枷锁的自由报》复刊。
- 1948年2月9日：在保加利亚领土上打下两架侵犯保加利亚国境的土耳其军用飞机。
- 1948年2月12日：苏联科学院全体会议决定：由于土耳其符得·开普鲁纽教授发表诋毁和仇视苏联的言论，开除他科学院外国通讯院士的资格。

- 1948年2月20日：人民共和党国会党团决定恢复土耳其小学里伊斯兰教的宗教教育和在大学里成立神学系。
- 1948年2月29日：伊斯坦布尔当局重新禁止《带上枷锁的自由报》出版。
- 1948年3月2日：土耳其报纸报道说，美国人发现在狄雅巴基尔区有大量的石油储藏。
- 1948年3月3日：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建议国会拨款二亿七千五百万美元作为继续对希腊和土耳其的军事援助。
- 伊斯坦布尔法庭开始审讯九十六个共产党人。
- 1948年3月18日：保加利亚外交部向驻索非亚的土耳其大使建议设法使土耳其的武官及其助理离开保加利亚，因他们滥用自己外交团成员的地位和进行威胁保加利亚安全的活动（1948年3月19日土耳其武官及其助理离开了保加利亚）。
- 1948年3月20日：根据土耳其政府的建议，保加利亚的武官及随从人员离开了安卡拉。
- 1948年3月25日：美国参议院批准了继续“援助”希土的法案。
- 1948年3月：土耳其民主党分裂；一部分反对反动领导的活动家退出了该党。
- 1948年4月3日：苏联新任大使阿·阿·拉夫里施切夫到达安卡拉。

- 1948年3—4月：土耳其外交部长萨达克到伦敦、巴黎、雅典访问(3月12日与贝文会晤，3月16日与皮杜尔会晤，3月27日—4月5日与查尔达里斯在雅典谈判，4月7日回到安卡拉)。
- 1948年4月16日：土耳其在欧洲十六国的“欧洲经济合作”协定(《马歇尔计划》)上签了字。
- 1948年5月12日：脱离了民主党的议员在国会里组成独立民主派。
- 1948年5月22日：人民共和党国会党团决定成立以雅尔琴为主席的“反对共产主义的委员会”。
- 1948年6月9日：哈森·萨卡内阁辞职，并且又由他组 270
成了成员稍有改变的新政府。
- 1948年6月15日：在安卡拉开始审讯由于“赞美共产主义”而被控告的安卡拉大学教授巴拉塔夫和讲师尼雅西·贝尔开斯及贝希詹·包伦。
- 1948年6月21日：美国国会决定拨款二亿二千五百万美元(马歇尔在1948年3月3日所建议是二亿七千五百万美元)来继续“援助”希腊和土耳其。
- 1948年7月15日：伊斯坦布尔法庭宣判被控进行共产主义活动的社会工农党和民主职工会领导人以徒刑(五十五个被告人被判处了为期不等的监禁)。
- 1948年7月19日：由费夫西·查克马克元帅领导的新政党——“民族党”正式成立。
- 1948年7月25日：民族党公布党纲和党章。

人名索引^①

A

- Абдул-Меджид эфенди—129, 146, 147, 258, 259 阿布杜尔·美志德先生
- Абдул-Хамид II—11, 14, 15, 21, 63, 84, 131, 146 阿布杜尔·哈密德二世
- Абдулла, король Трансиордании—268 阿布杜勒, 外约旦国王
- Агаев (Ага-оглу) Ахмед—159 阿加耶夫(阿加·奥格卢), 阿赫美德
- Аднан бей—128 阿德南贝伊
- Александр, король Греции—256 亚历山大, 希腊国王
- Али Кемаль бей—87 阿里·基马尔贝伊
- Али Риза паша—91, 254 阿利·里萨巴夏
- Али Фетхи бей—см. Окъяр 阿里·费特希贝伊——见奥克雅尔
- Али Фуад паша—см. Джебесоя 阿里·符亚德贝伊——见詹别索伊
- Алленби Э. Г., генерал—47, 67, 253 阿林比将军
- Аманулла хан, эмир Афганистана—102 阿马努拉汗, 阿富汗的艾米尔
- Анзавур—96 安萨乌尔
- Арас Тевфик Рюшту—163, 179, 183, 185, 194, 197, 209, 260—263 阿拉斯, 泰菲克·刘施图
- Армстронг Харольд Кортени—7 阿姆斯特朗, 哈罗德·科特尼

① 人名索引中的页码是原著页码, 检索时请查本书边码。
——译者

Амстронг-Витворт—31 阿姆斯特朗·维特伏尔脱

Атап Фалих·Рыфки—199, 208 阿泰, 发里希·李夫基

Ататюрк Кемаль—4, 6—8, 42, 54, 55, 64—66, 76, 83—93, 94, 96, 102—104, 108, 110, 111, 116, 118—131, 136—146, 150, 153, 155, 156, 158—160, 164, 173, 183, 189, 193—199, 210, 211, 221, 229, 232, 233, 254—257, 259—263 阿塔丘尔克, 基马尔

Ахмед Риза—71 阿赫美德·里萨

Ахмед Эмин—см. Ялман 阿赫美德·艾明——见雅尔曼

Аяшлы—230 阿雅施雷

Б

Баратав—270 巴拉塔夫

Баур Хикмет—9, 209, 216 巴尤尔, 希克梅特

Баяр Джелиль—196, 197, 220, 223, 224, 226—228, 262, 263, 267 巴雅尔, 詹拉尔

Бевин Эрнест—269 贝文, 欧内斯特

Бекир Сами бей—112, 117, 119, 257 贝克尔·萨米贝伊

Беле Рефет—5, 128, 147 别列·列非特

Бенкендорф, граф—36, 49 柏肯道夫伯爵

Беркес Ниязи—270 贝尔开斯, 尼雅西

Берти, лорд—55 伯尔蒂勋爵

Бидо Жорж—269 皮杜尔, 乔治

Бишофф Норберт, фон—6 比萧夫, 诺伯特·冯

Боран Бехидже—270 包伦, 贝希詹

Бриан Аристид—100, 101, 257 白里安, 阿里斯提德

Бронсарт фон Шелендорф, генерал—47 布罗萨特·冯·雪伦道夫将军

Бурхан Джахид—82 布尔汉·查希得

Бьюкенен, сэр Джордж—50—51 布肯南, 乔治爵士

B

Вангенгеям Ганс, барон фон
—26, 27, 28, 43, 44 万
根海姆, 汉斯·冯男爵

Васильев И—4 华西里也夫·И

Вахидедин, турецкий прес-
толонаследник, позже сул-
тан Мехмед VI—66, 84,
85, 90, 110, 126, 128,
129, 147, 253, 258 瓦希
德丁, 土耳其王储, 后为苏
丹穆罕默德六世

Вебстер Дональд—6 韦伯斯
特, 唐纳利德

Вейган—201, 202 魏刚

Венизелос Элефтерия—7, 54,
77, 107, 109, 145, 维尼
塞洛斯, 厄列弗帖里

Вивiani Рене—27 魏维安尼,
烈涅

Вивьер Клод—209 魏维尔, 克
洛德

Вильгельм II—26, 66, 252
威廉二世

Вильсон, генерал—265 威尔
逊将军

Вильсон Вудро—6, 66, 74,

253, 256 威尔逊, 伍德罗

Воровский В.В.—141, 258 沃
罗夫斯基

Ворошилов К. Е.—163, 262
伏罗希洛夫, 克·叶·

Врангель—107 弗兰格尔

Вышинский А. Я.—268 维辛
斯基, 安·扬·

Г

Габсбурги—12 哈布斯堡王朝

Гайлани Рашид Али—264 加
拉尼, 拉舍特·阿里

Гаррингтон, генерал—125 哈
林顿将军

Гарро—190 加罗

Геббельс—218, 263 戈培尔

Гирс М. Н.—33, 35, 37, 45
格尔斯

Гитлер—177, 199, 202—205,
217, 229, 264 希特勒

Гольц паша, Кольмар фон
дер—25, 60 戈尔茨巴夏,
科利马尔·冯·德尔

Гонто-Бирон Р.—5 刚托·比
龙

Грея, сэр Эдуард—32, 36,
40, 49 葛累, 爱德华爵士

Груссе Рене—77 格鲁赛, 雷内
 Гунарис Деметриус—54, 121,
 122, 124 古纳利斯, 迭美
 特里乌斯
 Гурко-Кряжин В. А.—4 古
 尔柯·克仰仁
 Гуро. генерал—256 顾罗将军
 Гюндюз Асым—199 顾杜斯,
 阿瑟姆

Д

Давер Абидин—230 达维尔,
 阿比丁
 Даладьё Эдуард—199, 200,
 202 达拉第, 爱德华
 Дамад Ферид паша—см. Ферид
 паша. Дамад 达马德·费里
 特巴夏——见费里特巴夏,
 达马德
 Даницг Б. М.—4 丹泽格
 Делькассе Теофиль—39 德卡
 赛, 帖奥佛利
 Демираг Нури—226 德米拉
 格, 努里
 Деникин—96 邓尼金
 Дени. генерал—264 邓茨将军
 Джавид бей—22, 23, 33, 36,
 37, 43—45, 70, 71, 136,

138, 153 查维德贝伊
 Джармен Т. Л.—7 贾尔曼
 Жебесоя Али Фуад—128,
 150, 198, 199, 232, 269
 詹别索伊, 阿里·符亚德
 Жемаль паша. Ахмед—20,
 22, 27, 28, 30, 32, 33,
 41, 43, 44, 47, 137, 253,
 258 詹马尔巴夏, 阿赫美德
 Жемиль—см. Якуб Жемиль
 詹米尔——见雅库布·詹米
 尔
 Дилл. генерал—264 迪耳将军
 Дуглас. маршал авиации—
 265 道格拉斯, 空军元帅

Ж

Жантисон Поль—5 让蒂宗·
 保罗
 Жданов А. А.—3 日丹诺夫,
 安·亚·
 Жорж-Голи Берта—5 乔治·
 葛利, 贝尔特
 Жоффер. генерал—56 饶富尔
 将军

И

Ибн-Сауд Абд-аль-Азиз—

- 103 伊本·萨乌德, 阿勃德·阿里·阿集兹
- Иден, сэр Антони—203, 204, 264, 266 艾登, 安东尼爵士
- Извольский А. П.—39 伊兹沃尔斯基, 亚·彼·
- Иззет паша, Ахмед—68, 76, 253 伊塞特巴夏, 阿赫美特
- Инёню Исмет—4, 109, 110, 122, 125, 134, 136, 139, 145—147, 150, 152, 156, 158, 160, 163, 165, 183, 194, 196—199, 201, 203, 206, 210, 211, 214, 215, 218, 256, 258, 259, 261—265, 268 伊涅纽, 伊斯美特
- Исмаил Хаккы—71 伊斯麦尔·哈克
- К**
- Кальторп, адмирал—74, 75 卡尔托普, 海军上将
- Карабекир Кязым—89, 106, 107, 128, 136, 150, 198, 232, 268, 269 卡拉贝基尔, 卡兹姆
- Кара Кемаль—71, 138, 153 卡拉·基马尔
- Кая Шюкрю—152, 183, 197, 263 凯伊, 秀科留
- Келлог—261 凯洛格
- Кемаль—см. Ататюрк 基马尔——见阿塔丘尔克
- Кеннеди—140 肯尼迪
- Кеннингхэм, адмирал—265 凯宁海姆海军上将
- Кёпрюлю Фуад—220, 224, 269 柯普鲁纽, 符亚德
- Керенский—79 克伦斯基
- Керзон Джордж Натанвэль, маркиз—74, 132, 135, 134—140, 141, 258 寇松, 乔治·纳撒尼尔侯爵
- Кёрквуд К.—7 柯克伍德
- Киров С. М.—3 基洛夫, 谢·米·
- Клемансо Жорж—74, 100 克里孟梭, 乔治
- Колле—190 柯勒
- Колчак—96 高尔察克
- Константин, король Греции—54, 107, 108, 115, 121, 122, 124, 145, 257 康斯坦丁, 希腊国王

Корнилов—205, 265, 266 柯
尔尼洛夫
Кресс фон Крессенштейн—39,
47 克里斯·冯·克里辛施
坦
Крупп—263 克虏伯
Кязым Карабекир паша—см.
Карабекир 卡兹姆·卡拉贝
基尔巴夏——见卡拉贝基
尔

Л

Лавришев А. А.—269 拉夫
里施切夫, 阿·阿·
Ламуш Леон—5 拉穆斯, 莱翁
Ленин В. И.—17, 18, 21, 60,
79, 80, 96, 103, 133, 134,
253, 255 列宁, 弗·伊·
Леонтьев, генерал—31, 33,
35, 37 列昂节耶夫将军
Лереверан—5 列维朗
Лиман фон Сандерс—25, 26,
28, 31, 34, 39, 60, 65, 68
李曼·冯·散德斯
Лимпус, адмирал—27, 251 李
姆普斯, 海军上将
Липпман Уолтер—227 李普
曼, 华特

Лирау Вальтер—6 李劳, 华
特
Литвинов М. М.—163, 261
李维诺夫, 马·马·
Ллойд Джордж Давид—7,
57, 65, 73, 77, 100,
112, 115, 121, 122, 124,
252 劳合·乔治, 达维

М

Мак-Коан Карлеваль—19 马
克·柯安, 卡莱尔
Мак-Магон Генри—252 麦
克·马洪, 亨利
Макбуле-ханым—159 马克布
勒女士
Макензен, генерал—53 马凯
逊将军
Маллет, сэр Луис—41 马里
特, 路易斯爵士
Маржери, де—27 马惹里, 戴
Маршалл—230, 231, 269 马
歇尔
Маршан Рене—5 马尔尚, 雷
内
Масигли—202 马西格里
Махмуд Шевкет паша—20,
21, 105 马茂德·谢夫凯特

巴夏
 Менеменджиоглу Нуман—
 205, 207, 265, 266 门尼曼
 兆格鲁, 努曼
 Мехмед V (Решад)—23, 253
 穆罕默德五世(烈沙德)
 Мехмед VI—см. Вахидеддин
 穆罕默德六世——见瓦希德
 丁
 Мидхат паша—111, 148 米德
 哈特巴夏
 Мидхат Шюкрю—64 米德哈
 特·修克鲁
 Мирс Элиот Гриннелль—6 密
 尔斯, 厄利奥特·格林内尔
 Молотов В. М.—266 莫洛托
 夫, 维·米·
 Мольтке Гельмут. фон—26
 毛奇, 格尔穆特·冯
 Мужен—120, 121 穆仁
 Муссолини—265 墨索里尼
 Мустафа Камаль—см. Ата-
 тюрк 穆斯塔法·基马尔——
 见阿塔丘尔克
 Мустафа Субхи—см. Субхи
 穆斯塔法·苏布希——见苏
 布希

Н

Наджие, османская принцесса
 —22 娜蟾, 奥斯曼的公主
 Нади Юнус—199, 202 纳地,
 尤努斯
 Назым, д-р—64 纳兹姆博士
 Новичев А. Д.—4 诺维切夫
 Нури паша—67 努里巴夏

О

Окьяр Али Фетхи—8, 119,
 150, 158—160, 198, 259,
 261 奥克雅尔, 阿里·费特希
 Оливер, генерал—268 奥利维
 将军
 Омуртах Салых—268 奥穆尔
 塔克·萨里希
 Орбай Кязым, генерал—266
 奥尔拜, 卡兹姆将军
 Орбай Хюсейн Рауф—75, 89,
 118, 128, 136, 139, 146,
 147, 150, 198 奥尔拜, 胡
 赛因·饶夫
 Осман I—129 奥斯曼一世

П

Павлов—205, 265, 266 巴甫

洛夫

Павлович М. П.—4 巴甫洛维奇

Паллавичини, маркиз—28, 42—44 巴拉维奇尼侯爵

Папен Франц. фон—180, 199, 201, 203, 205, 206, 263—266 巴本, 弗兰茨·冯

Пекер Реджеб—222, 223, 229, 232, 267, 268 皮凯尔, 列詹布

Перно Морис—5 帕诺, 摩里斯

Пико Жорж—58, 59, 65, 74, 252 皮柯, 乔治

Пломмер—126 普罗米尔

Пуанкаре Раймон—27, 35, 38, 51, 100, 101 普恩加贵, 赖芒

Р

Рауф бел—см. Орбай 饶夫贝伊——见奥尔拜

Реза-шах Пехлеви—6 列萨-沙赫·巴列维

Рефет паша—см. Беле 列菲特巴夏——见别列

Рибо—252 里保

Риза Нур—136 里萨·努尔

Рифат паша—43 里法特巴夏

Рузвельт Франклин Делано—206, 265 罗斯福, 弗兰克林·迭拉诺

С

Садак Неджемеддин—199, 229, 231, 269 萨达克, 尼志美丁

Сазонов С. Д.—33, 35—40, 45, 50—52 萨庄诺夫

Саид. шейх—150—154, 167, 259 赛义德酋长

Саид Халим паша—22, 28, 33, 43 赛伊德·哈里姆巴夏

Сайдам Рефик—197, 202, 203, 205, 213, 263, 265 赛达姆, 列费克

Сайкс Марк—58, 59, 65, 74, 252 萨伊克斯, 马克

Сака Хасан—136, 152, 208, 229, 232, 266, 268, 269 萨卡, 哈森

Салих Хулюси паша—255 萨里希·胡留西巴夏

Сандлер—188 森德列尔

Сараджоглу Шюкрю—119,

- 152, 158, 199, 200, 202
—205, 213, 216, 222, 223,
263—267 萨拉兆格鲁, 秀
科留
- Сарнер—266 萨尔帕
- Сёкменсюэр—268 肖克曼秀尔
- Сект, фон—68 塞克特, 冯
- Сенуси, шейх—102 塞努西教
长
- Сертель Зекерья—218, 220
赛尔泰尔, 塞凯里雅
- Соннино—252 索尼诺
- Сталин И. В.—3, 78—80,
83, 107, 108, 127, 253
斯大林, 约·维·
- Субхи Мустафа—20, 105,
110, 257 苏布希, 穆斯塔
法
- Сулейман I—12 苏列曼一世
- Сушон—36, 39, 42—44 苏邵
- Т
- Талаат бей, позже паша—22,
28, 32, 33, 39, 41, 43—
45, 65, 68, 84, 137, 253,
257 泰拉特贝伊, 后称巴夏
- Таунсхенд—48, 68, 252 陶斯
亨特
- Тевфик паша—108, 253, 256
泰菲克巴夏
- Тевфик Рюшту бей—см. Арас
泰菲克, 刘施图贝伊——见
阿拉斯
- Тойнби Арнольд—7, 104 汤
因比, 阿诺德
- Тошев—31 托舍夫
- Трикупис—123, 258 特里库
皮斯
- Трумэн—228, 268 杜鲁门
- У
- Узедом—37 乌兹道姆
- Уилки—265 威尔基
- Уоллес Генри—228 华莱士,
亨利
- Ф
- Фалькенгайн Эрих, фон—60,
61, 65, 84, 199 法尔肯
汉, 厄里希·冯
- Фаррер Клод (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псевдоним Ш. Баргона)—5
法莱尔, 克洛德(作品笔名
Ш. 巴尔哥纳)
- Фахреддин бей—44, 45 法赫
列丁贝伊

- Февзи паша—см. Чакмак 费夫西巴夏——见查克马克
- Фердинанд, болгарский царь—55 斐迪南, 保加利亚国王
- Ферид паша, Дамад—85—91, 94, 108, 254—256 费里特巴夏, 达马德
- Франклен-Булон Анри—116, 117, 120, 125, 186, 257 佛兰克林·布翁, 安里
- Франко—263 弗朗哥
- Франше-д'эспере Луи-Феликс-Мари—67, 253, 254 弗兰士·戴斯帕列, 路易·费利克斯·马里
- Франциск I, французский король—12 弗兰西斯克一世, 法国国王
- Фрунзе М. В.—117, 118, 128, 257 伏龙芝, 米·瓦·
- Фрю, английский пастор—90 福鲁, 英国牧师
- Фуад бей, полковник—45 符亚德贝伊上校
- Функ—186 丰克

X

Хаджианестис, греческий ге-

- нерал—123, 124 哈詹尼斯蒂斯, 希腊将军
- Халиде Эдиб—8, 82, 90 哈里德·艾迪布
- Халил бей—28, 33, 43—45 哈里尔贝伊
- Хикмет Баюр—см. Баюр 希克梅特·巴尤尔——见巴尤尔
- Хусейн ибн-Али—47, 97, 252 胡赛因·伊本·阿里
- Хюсейн Джахид—см. Ялчин 胡赛因·詹希德——见雅尔琴
- Хюсейн Рауф бей—см. Орбан 胡赛因·饶夫贝伊——见奥尔拜

Ц

- Цалдарис—269 查尔达里斯
- Цимике Курт—6 齐姆凯, 库尔特

Ч

- Чакмак Февзи—122, 227, 232, 266, 270 查克马克·费夫西
- Чемберлен Невиль—199, 200 张伯伦, 涅维尔
- Черчилль Уинстон—54, 56,

57, 100, 205—207, 265,
266 丘吉尔, 温斯顿
Честер—140, 258 捷斯特
Чиано—185 齐亚诺
Чирол Валентин—7 齐罗尔,
瓦连亭
Чичерин Г. В.—258, 260 齐
切林

Ш

Шахт—262 沙赫特
Шейх Саид—см. Саид, шейх
酋长赛义德——见赛义德酋
长
Шликлен Жан—5 施利克兰,
让
Шлиффен Альфред, фон—28
史里芬, 阿尔弗雷德·冯
Шюкрю Кая—см. Кая Шюкрю
秀科留·凯伊——见凯伊,
秀科留

Э

Эвэрзли Джордж Джон Шо-
Лефевр, лорд—7 艾物斯莱,
乔治·约翰·萧·列夫尔勋
爵
Энвер бей, позже паша—21

—23, 25, 28, 29, 31—35,
37, 39, 42—47, 56, 60—
68, 84, 87, 137, 205, 252,
253, 258 恩维尔贝伊, 后
称巴夏
Эрибергер Матнас—62 埃尔
茨柏格尔, 马提阿斯

Ю

Юденич—96 尤登尼奇
Юсуф Иззеддин, турецкий
престолонаследник—64, 252
尤苏夫·伊塞丁, 土耳其王
储
Юсуф Кемаль бей—120 尤
苏夫·基马尔贝伊

Я

Ягов Готлиб, фон—35 亚哥
夫, 哥特利勃·冯
Якуб Джемиль, малор—64
雅库布·詹米尔少校
Ялман Ахмед Эмин—71, 82
雅尔曼, 阿赫美德·艾明
Ялчин Хюсейн Джахид—71,
152, 198, 199, 208, 229,
230, 270 雅尔琴, 胡赛因·
詹希德